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日军
731部队
罪恶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

韩 晓　　辛培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哈尔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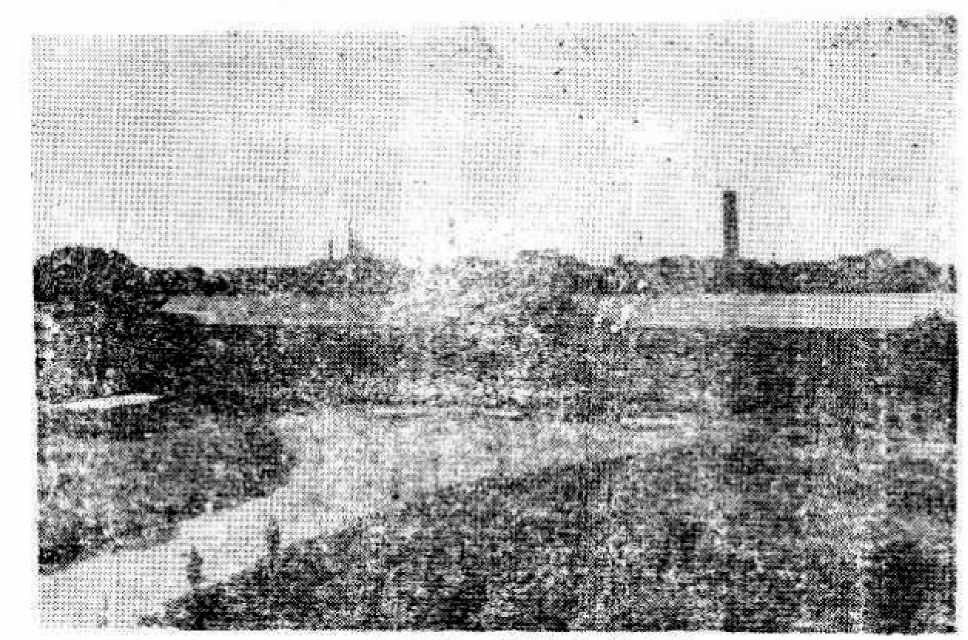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文新
封面设计　　陈　锺

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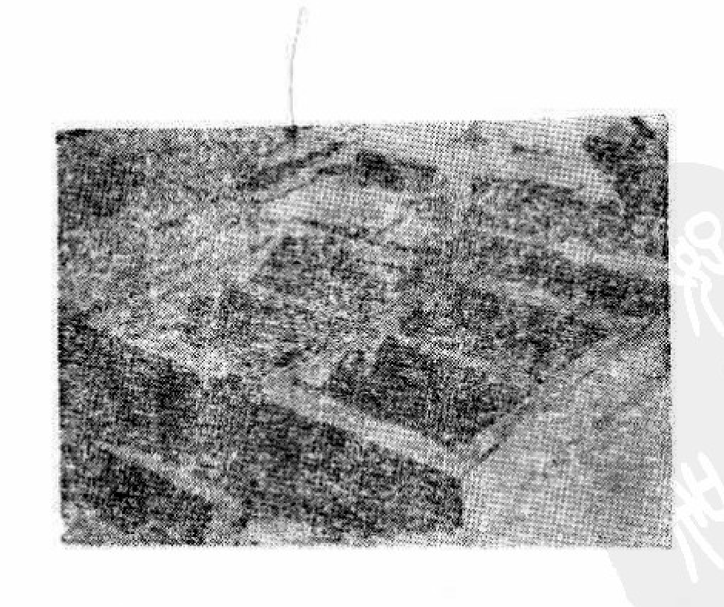
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水利印刷厂印刷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3/5　字数 260,000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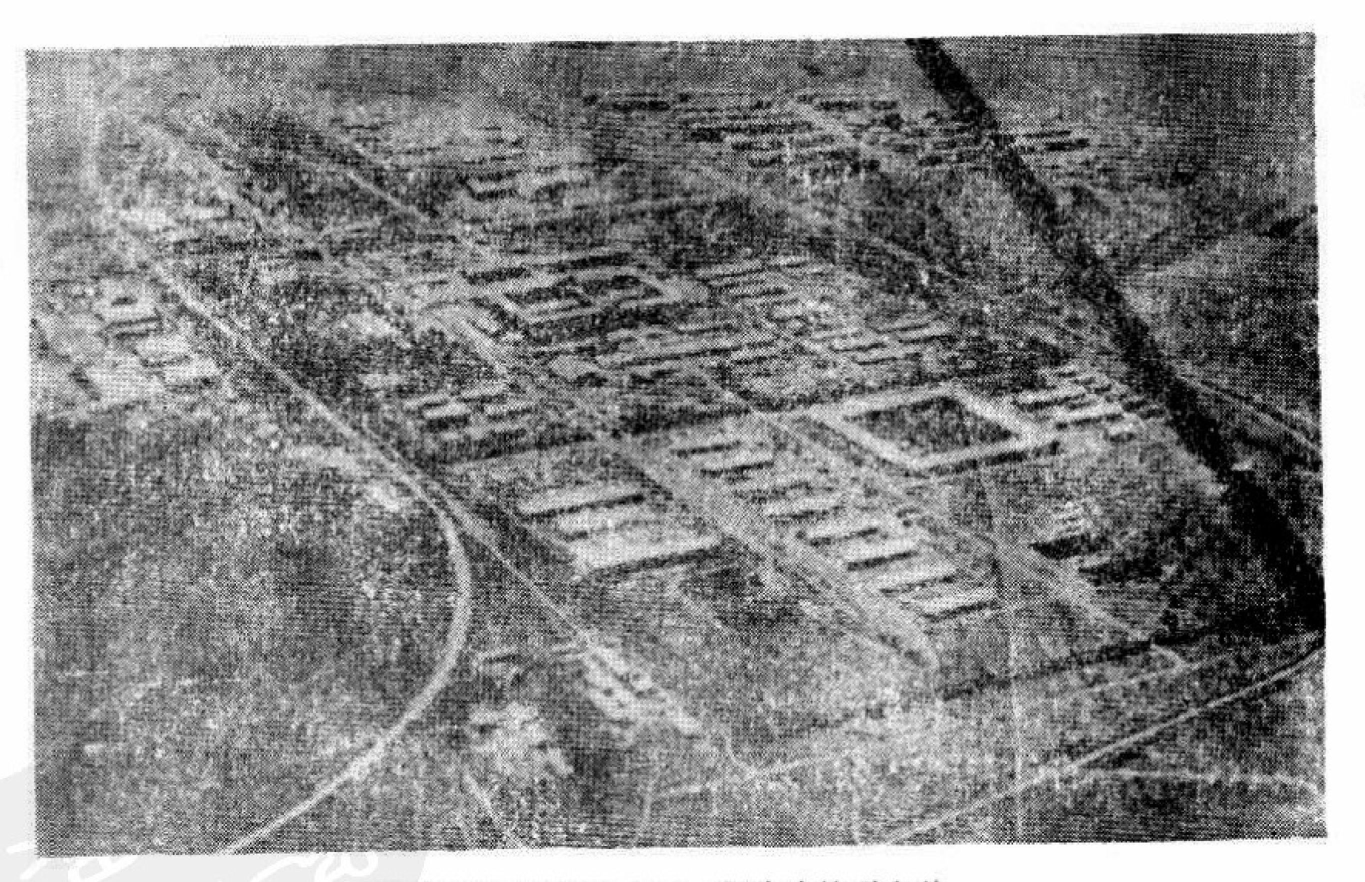
ISBN7-207-01996-3/K·180定价：4.30元



△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



△七三一部队四方楼及特别监狱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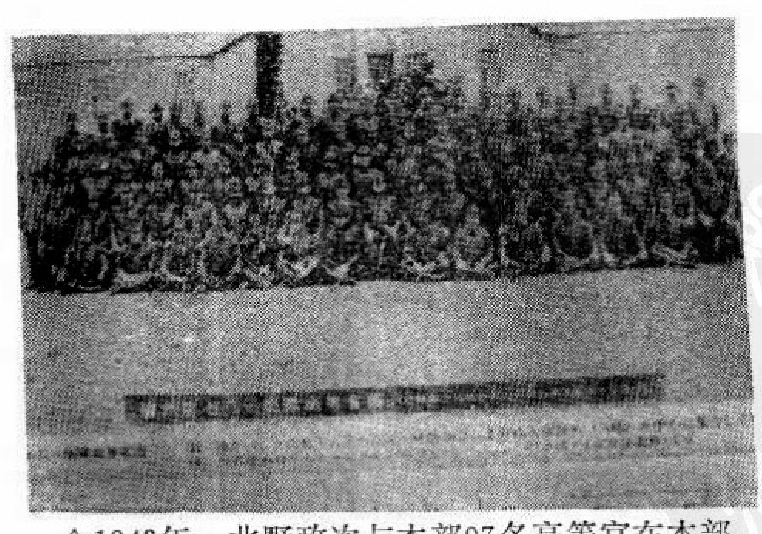
△1939年完成建设的七三一部队建筑群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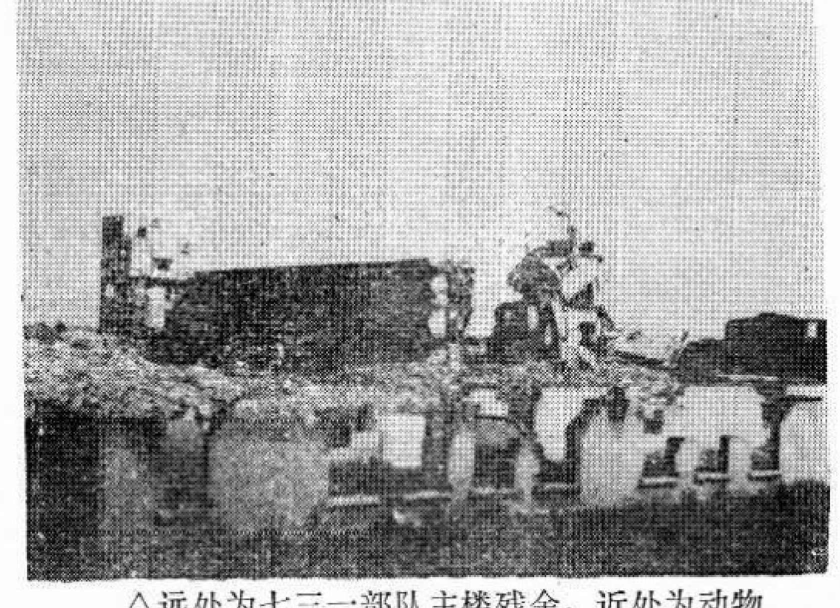


△中间者系七三一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

◁细菌战罪魁——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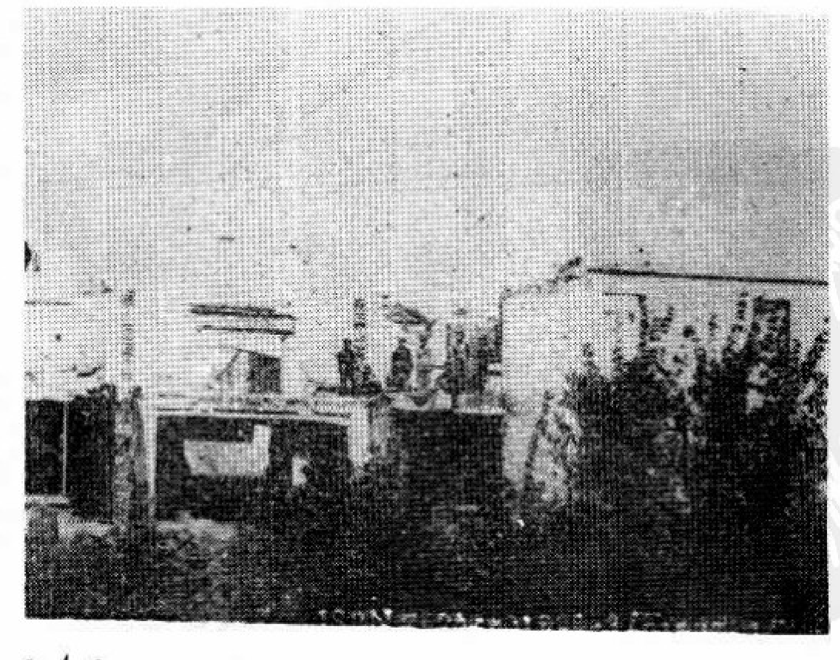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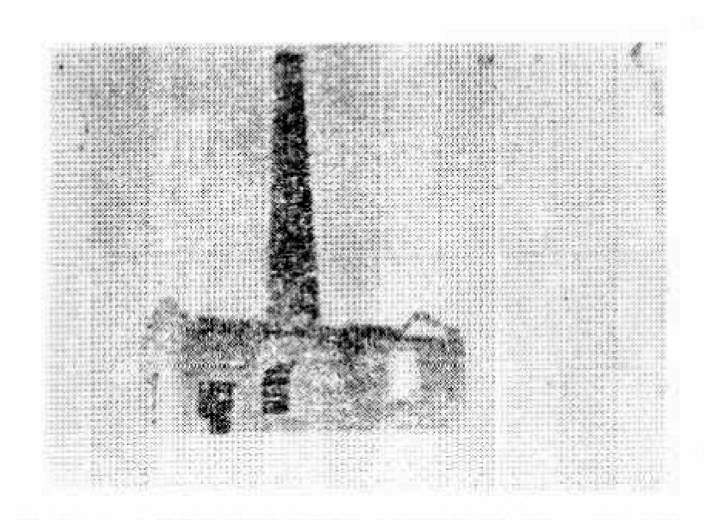
△1943年，北野政次与本部97名高等官在本部大楼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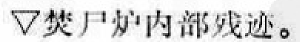
△远处为七三一部队主楼残余，近处为动物场（1948年摄）。

▽七三一部队试验楼残余，左下方为地下室入口处（194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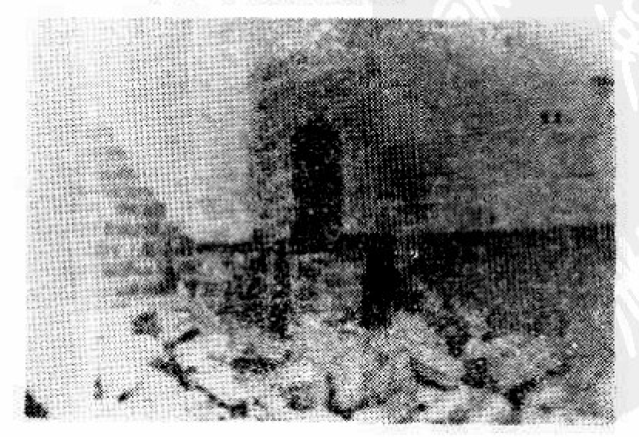




△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后，将尸体全部投入焚尸炉灭迹。图系焚尸炉外部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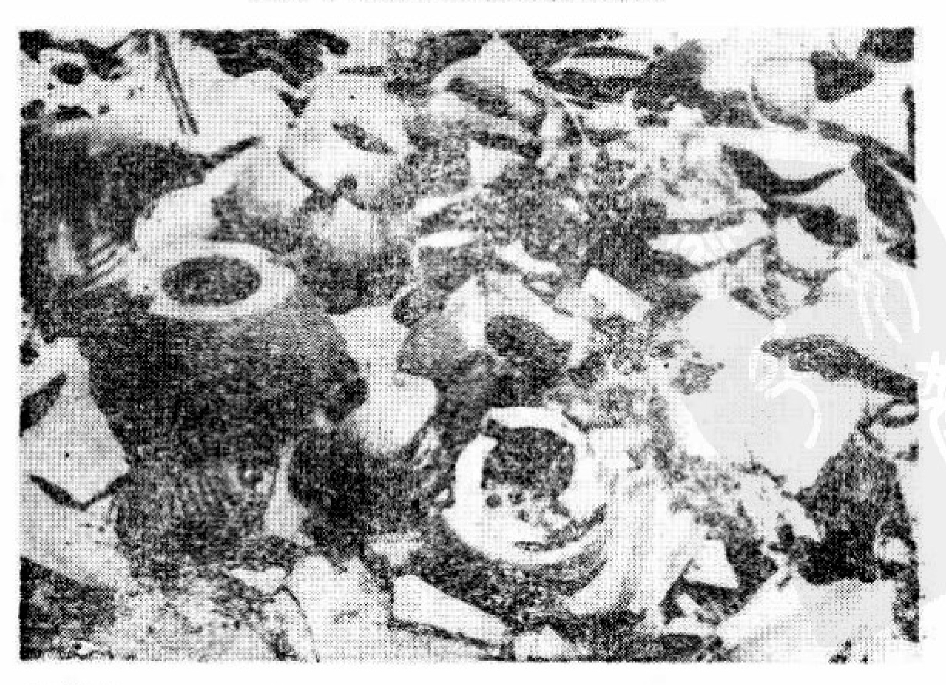
▽焚尸炉内部残迹。





△七三一部队逃离前，将染疫动物放出，致使1946年平房附近三个屯发生鼠疫，图为鼠疫患者尸体。

▽七三一部队逃离前，将细菌弹壳全部捣毁，图为宇治50型细菌弹壳碎片。



序

这是一本经多年酝酿准备编辑而成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书。本来这本书早应出版，但是历史性的事件需要多方面调查证实、各方面的配合。准备过程中，要通过协同联系而取得共识，还要克服若干困难，因而拖延了时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罪恶的细菌战的书籍材料，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已出版了不少有力的著作，其中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先后再版四次，曾在日本引起很大的震动。森村诚一本人曾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进行现场调查，并从日本、美国等国发现许多非常重要的有关细菌战与石井四郎、七三一部队的档案材料。我们对森村诚一先生的正义行动予以高度评价，我曾同他作过长谈并表示敬意。黑龙江省政协和哈尔滨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编辑出版了本书，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争侵华罪行的愤怒声讨。从中国是受害者方面，以翔实的材料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予以揭露，应当是更有说服力的。

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准备由来以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着手进行，石井四郎以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名义，在中国东北沈阳、长春一带组建部队，开始试验。到1933年即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一带，关东军防疫班正式开始以中国战俘和反满抗日义士为试验品，组建了细菌工厂，

以后以加茂部队名义转到哈尔滨郊区平房。到1938年关东军防疫部队又在哈尔滨平房大兴土木，修建试验场地和繁殖细菌的基地。从1938年至1945年这七年多时间里，几千抗日义士和中国劳工被他们作为试验品残酷地杀害了。不仅如此，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湖南的常德、浙江的宁波和山东、山西等地，用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传播病疫。在黑龙江的孙吴、牡丹江、安达以及海拉尔等地都有实验分场和细菌毒气部队，其规模之大、试验中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逃避罪责，他们对七三一部队在平房这个秘密屠场进行破坏，消灭罪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哈市平房区一带仍然传播鼠疫，成为黑龙江省鼠疫的重要疫源区，黑龙江省及东北地区曾有好多年鼠疫流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1947年前后，我在吉林白城子地区亲眼看到鼠疫流行的惨状，当地人民为了防疫、防蚤穿着白布袜，戴着白套袖、白口罩，在惊恐中度日。我们在白城子开会中就传来街道上发现鼠疫病人的消息，于是紧急堵截道路，划出封锁区，严密防止鼠疫蔓延。50年代哈尔滨市平房区还经常反复出现疫情。

日本战犯石井四郎在日本投降后被美军收罗续继进行细菌战研究，以至1951年后美国侵朝战争中还对朝鲜军民、中国人民志愿军及中国东北地区人民进行罪恶的细菌战，许多细菌武器的形式与平房日本细菌战基地产品极其相似。当时，黑龙江省成为美国细菌战的攻击区，美军飞机利用夜间偷越鸭绿江深入东北，向黑龙江省甘南县农村投掷大量带鼠疫菌的小老鼠，在辽宁省宽甸、凤城一带以及辽西等地投掷细菌弹，激起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

支持之下，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邀请，由廖承志同志亲自陪同国际和平人士英国李约瑟教授、瑞典安德琳博士、意大利欧利佛教授、法国马代尔教授、苏联茹科夫·维勒尼科夫教授、巴西贝索亚教授等各国的正义人士，于1952年来黑龙江省甘南一带调查。我当时兼任黑龙江省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因而亲自参与了去甘南调查的陪同。这些国际正义人士后来出版了美帝国主义在朝、中两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材料，发表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报告书。该书系统、具体地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罪恶细菌战的罪证。

时光流逝，现已进入九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但是总的说来，世界人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不仅区域性冲突不断，而且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科技战争。苏联国内动乱，东欧政局剧变，在海湾战争中得手使得美国霸权主义势力又有抬头。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特别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当然不能麻痹，半个世纪前的民族伤痛是教育我们自己、警惕新的阴谋的最好教材。

我们中国的新一代青年正在茁壮成长，但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民族、乡土在半个世纪前所遭受的灾难和辛酸不那么熟悉。我们当然要立足于当前的四化建设，治理整顿，改革开放，但更不能放松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不应忘记的。热爱祖国，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刻不可松懈。我们以真挚热烈的感情，最诚恳的、无限信任的希望，把这本书奉献

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祝愿他们永远继承先烈遗志，高举革命的旗帜，勇敢地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李剑白

1991年5月于哈尔滨



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犯下了无数滔天的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罄竹难书。其中，世人皆知的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罪恶最为昭著者。它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细菌战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最充分地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性、疯狂性、野蛮性和凶残性。数十年来，对它，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学术的有关人士也都义愤填膺，以各种形式予以揭露、谴责和抨击。

黑龙江省是深受日军七三一部队之害的受害国之重地，因此，当地人民对它更是恨之入骨。揭露它的罪行和丑恶的历史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黑龙江省政协及哈尔滨市政协决定编写这本《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并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前夕出版。这是很有意义的。于是，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玉成其事。韩晓同志多年来对日本细菌战和七三一部队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和考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向国内外作了广泛的宣传。辛培林同志长期从事东北地方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根据韩晓同志提供的初稿和有关资料，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补充，并按照历史的顺序、历史的观点，确定了全书的体例和内容，加以撰写、修改和最后完成。

本书在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揭露日军七三一部队细菌

战罪恶活动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七三一部队的产生、恶性膨胀及其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的产物，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当时的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从本质上看，七三一部队进行的细菌战活动已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和人类文明的准则。它的行径，从始至终、从动机到目的，都是围绕着侵略、征服、屠杀而进行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和研究。

第三，事实证明，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活动已不只是一般的"实验"，而是比较广泛地使用了；也不只是在"准备"，而是比较大规模地进行了。

第四，有的日本人对七三一部队用活人作实验材料问题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事实胜于雄辩，隐瞒、不承认都是徒劳的。七三一部队从脱胎之日起就干这种"食人"的勾当，而且，干这种勾当的不止七三一部队，还有长春的一〇〇部队、南京的"多摩部队"、"北京兵器研究所"等。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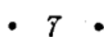
第五，赞扬了一些有良知的朋友的光明正大的言行，批评了一些人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这样做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在争取人类和平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道路上，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还是存在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总而言之，我们要以实际行动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本书问世的时候，希望广大读者与我们重温已故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说过的一段意

味深长的话：

“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编者



目　　录

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活动之始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由来已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已经开始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并对此作过设想和计划，还注意搜集了国外的情报。日本战犯河本大作在供词中说："日本军是从1918年11月前后开始研究细菌的。当时长谷部照信少佐同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进行联系，并获得情报。得知上述机关捕获了一名俄国密探，名叫亚历山大，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战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1918年末，长谷部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本部汇报。此后，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后来曾一度中断。"①

在七三一部队之前，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东京科学研究局"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由于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局长伊藤工学博士在"工作不力"、"浪费国家财力"等罪名下被逮捕法办，参加研究的四十名科学家也全部被降薪并调转其他工作。

二、石井四郎的登台表演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进行细菌战和细菌武器的研究，并真正大规模地搞起来了。其"功劳"应归于石井四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页.

郎。

石井四郎，1892年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战后改为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4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研究生，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192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充当东京陆军医院军医。1930年，他受陆军省第一课课长永田铁山的派遣，以日本驻外武官的身份两次周游欧洲各地，名义上是出国考察，实质是进行"特务旅行"。在欧洲他看到了纳粹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深深感到日本没有细菌武器是"国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别是他了解到14世纪中叶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灾害使欧洲各国的统治者至今还心有余悸，并把鼠疫菌排除研究之外时，更增加了对鼠疫菌研究的兴趣。他认为，被各国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应该单独研究的并仅有的一种武器。回国后，他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少佐），继续在陆军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教官。同时，他利用出国考察时得到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毒瓦斯和当时最新的关于细菌战、化学战的资料，极力鼓吹准备细菌战的必要性，叫嚷"战争专靠实力，这已过去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坏物质的有力武器，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指无人居住地带）建立起实验中心。"① 还说：制造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这对经济危机、钢铁缺乏的日本帝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恶性膨胀，战争

①② 韩蔚：《日军杀人罪行的见闻录》，《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

狂热到了极点。他们野蛮凶残、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阴谋策划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验。于是，石井四郎研究细菌武器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反动当局的赞赏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后晋升为少将）的推荐，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梶塚隆二等人的支持。据梶塚隆二供称："我从1931年起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1934年至1937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又积极参与了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以及拨调相当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石井四郎为第七三一部队长。"① 于是军部立即晋升石井四郎为军医少佐，并于1932年8月，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由他领导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当时，它设在防疫部的一处地下室里，规模较小，石井四郎也仅有5名助手，然而，石井四郎在防疫名义的掩护下，进行以细菌战为目的细菌研究和培养的罪恶活动却从此开始了。

为了加紧细菌战活动，1932年底，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并晋升他为军医中佐。

1933年，为了扩大细菌研究活动，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对细菌研究室进行了扩建，不仅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机械室、变电室和仓库，而且还修建了小型木结构的动物饲养室。扩建之后，改称为"防疫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这里实际上成了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大批的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8页。

的研究人员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①]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等细菌的培养、使用和预防方法的研究，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和在水面上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因此，在这个研究所的地下室里，设有培殖细菌和研制细菌武器的秘密工厂。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反复地作着动物血液注入人体、人关闭在染有炭疽菌的屋子里、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等各种实验；还把中国士兵的尸体肢解，将头颅及身体各部分作为标本进行陈列；把囚犯饿死，将其躯体完整地保存起来，以备研究之用。他们还把被俘的苏联军人如何被残酷地致死，分别注入鼻疽菌的马如何发病而死、以及检验马尸的全过程等拍摄成纪录影片，给研究人员观看，除传授技术，宣传细菌战，让他们相信自己研制的细菌武器威力外，还以此培养他们杀人不眨眼的野兽的“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性格。

石井四郎为了防止泄露机密和避免世界人民和舆论的谴责、唾骂，对这些研究资料严格控制。他把200份实验致死的人员登记表作为绝密材料锁在地下室的一个特别房间里，责成其亲信保管，并且只允许直接参加实验的人员查阅，但也必须签名具结，保证不将看到的资料告诉任何人。

因为这个研究所在研究和制造细菌杀人武器上有所成效，还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所以，石井四郎洋洋得意地说，它是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②]

---

① 《赤旗报》1950年2月8日，《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

② 同上。

祸移中国东北

一、险恶的用心

就在石井四郎领导的“防疫研究所”恶性发展的时候，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亲自执笔写出一份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这个报告中说：“由于军部不断地指导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为首的陆军细菌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本大本营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并由石井四郎指挥这支细菌部队。

他们选择在“满洲”建立细菌研究基地，主要考虑到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它靠近苏联国土，气候也与其相仿佛，一旦与苏军交战，将会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但在设置的具体地点上，发生了争议。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却执意把它建在“北满”的最大城市哈尔滨。结果，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大本营的支持。1933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实质是细菌研究所的“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70多公里以外的背荫河。

"石井部队"建立以后，石井四郎一直没有露面。原来，这是因为他已成为各国情报机关注目的人物，他担心这次来"满洲"组建细菌部队的活动露出马脚。因此，石井四郎为了把石井部队隐蔽起来，首先给它化名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并定了另一个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他还为了不让外界把自己和石井部队联系在一起，在"满洲医大"挂了个教授的虚衔，然后秘密地潜入哈尔滨，自己也改姓为"东乡"。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他就龟缩到长春，遥控指挥这支细菌部队的活动。

二、背荫河的"中马城"

"中马城"是石井部队（即"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别称。它附属于石井部队，和石井部队本部几乎是同时建立的。

背荫河距拉林镇不远，是一个不足200户居民的山村。自从拉（法）滨（哈尔滨）线铁路建成并在这里建立车站以后，它就逐步地形成了农副产品的小集散地，村东头还办起了一些杂货店、果子铺、饭馆，颇有一派农村小城镇特有的景象。

好景不长。1932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批日军选场址。他们来到背荫河，看中了这块宝地，决定在这里设"兵营"。于是，他们通过伪满拉林当局，强令这里的20多户居民及日升祥杂货店、王家果子铺等商号，在三天必须迁出，违者格杀勿论。他们没等村民搬完，就强占了日升祥杂货店一带的百余间房屋，并将其余的民房全部烧光。据果子铺业主的后裔王滨回忆说：日本军队在这里"圈定了五百米见方的地盘，划为军事用地，从此，这里与背荫河站截然地隔开了。"然后，日本军队又

"通过日伪当局，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昼夜不停地修筑'兵营'。"这个"兵营"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站的铁路专用线和飞机场。当时，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在1933年12月8日视察这里后说："粗具规模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好似要塞的印象。这虽然是他们努力的结果，20几万元的经费开支看来还是值得的。"①接着，"加茂部队"派来了一个名字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于是，人们称它为"中马城"。

"中马城"占去了背荫河的半个屯子，堵塞了这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它变成了与世隔绝极端秘密的军事城堡。它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墙顶上架设着两道铁丝网，中间还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修筑一座坚固的炮楼，安设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挖有两米半宽的护城壕。它的正门朝北，一座吊桥横跨在护城壕下；吊桥里侧是两扇黑漆城门，由两名日本兵持枪把守。这里不仅中国人一律不许靠近它，而且还将其附近的交通全部切断，过往行人必须绕道而行。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要将车窗帘布放下，严禁旅客向车外看望。这里的日军人员禁止一切外出；禁止使用日本真名，即使用化名同国内家属通信也得经过关东军司令部审查。在背荫河，夜间一律实行戒严，如果发现夜行人，不问青红皂白便抓进"中马城"内。当时，背荫河附近有的人就突然下落不明了。陈家岗有个叫王老二的青年，在一天夜里怀着好奇心去偷看"中马城"的秘密。第二天，人们就在其附近发现了他被子弹打穿了的尸体。这里，经常夜间出入的黄绿色帆布篷的大汽车以及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的惨叫声，给人们带来一个

① 《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

问，“中马城”到底是干什么的？它给外界的印象是一座监押号要犯的秘密监狱。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又叫它“东满大狱”。

“中马城”内有个单独的大院，四周是高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中国劳工只能在日本兵的监视下，在它的外围的指定地点服苦役。既或有时让劳工进到这个大院里从事特殊劳动，也得在进去之前，每人头上扣一顶“柳罐斗子”，由日本人牵领进去，劳工们把大木箱子扛在肩上后，再由日本人领出来。戴着“柳罐斗子”的劳工除了听到蝈蝈的叫声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大院，直到“中马城”迁走后，人们才发现是一座监狱。当地人王滨回忆：从残迹可以看出，院内有三座砖瓦房，偏西有两幢，构成拐把子型，房屋跨度8米，长约45米，设有中心走廊，两侧共有100多个房间，这就是我们猜测的东满大狱，据说能容纳千人。在这两幢房东侧几十米外，还有一幢南北走向的小砖房，它被一堵墙间隔着，那就是武器弹药库。在这里不远处曾发现埋在地下的破衣服和鞋帽；在一个大烟囱的地基旁边，还挖出过骨灰和尚未烧透的衣服碎片。

关于“中马城”内幕，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之一的冯仲云的回忆录《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中作了比较真实的记载。该书是反映抗日联军全面活动历史的，竟涉及到“中马城”的内幕，真是十分难得。这本书中说：“中马城”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运来的。在这里蹲监狱，生活上受优待，伙食很好，顿顿饱餐大米、白面，有时还能吃到肉食，逢年过节还给酒喝。这些营养丰富的饭食都由日本看守定时地送进牢房。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尽管他们不是重犯，可是都给戴着手铐、脚镣。更为奇怪地是，监号里的人经常被提

出去，却很少有回来的。当监号里的人减少后，又有新的犯人补充进来。每当被提出的人不见回来时，日本看守总是作着解释：被带走的那些人因患有疾病，送到外边治疗去了。为了证明这是真话，日本人还特意把拉出去的人送回几个，不过都是“病”得奄奄一息了，并被监押在单设的牢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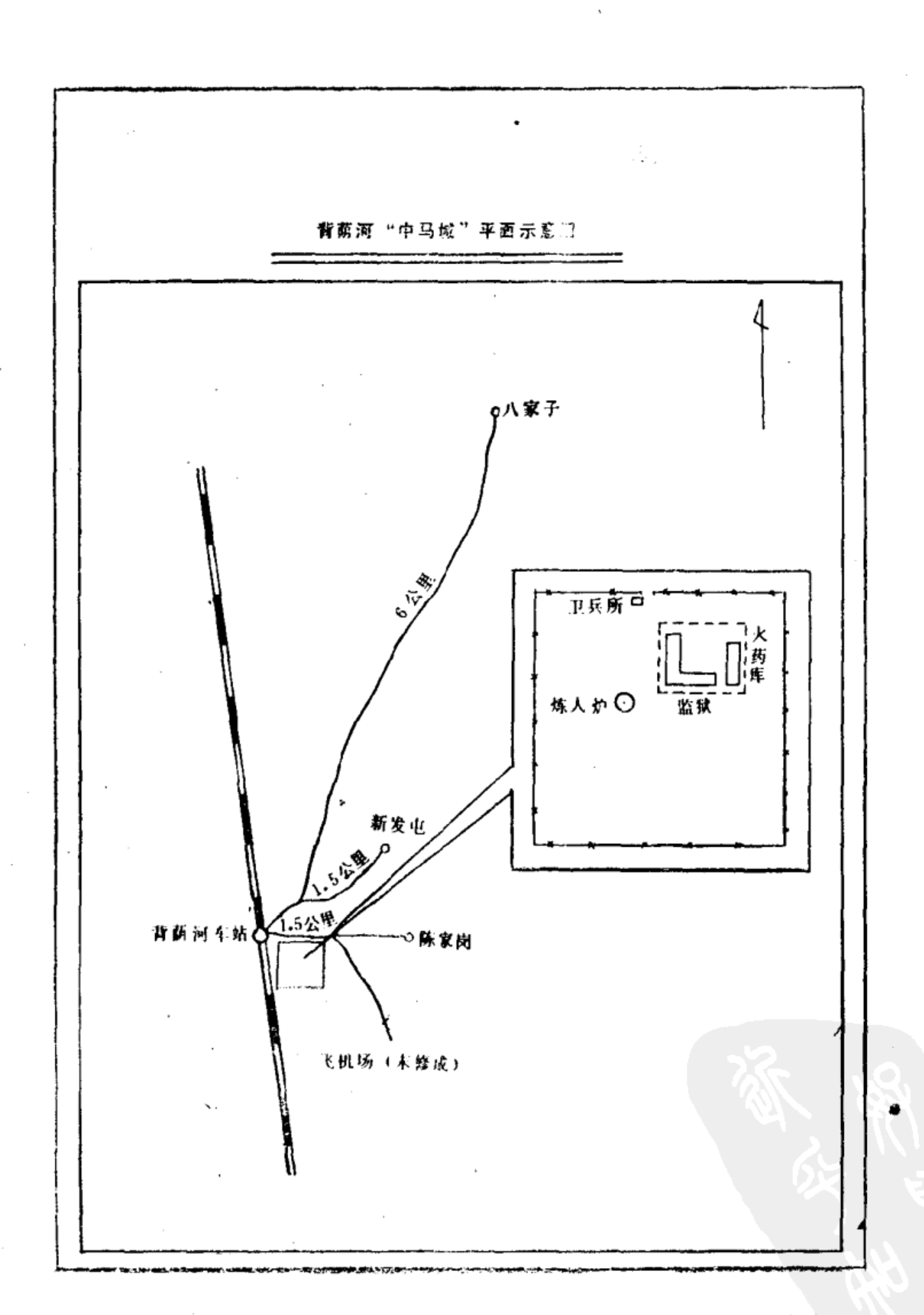
被监押在“中马城”里的人脑海里的问号，过不长的时间，即死亡临头的时候，才找到了答案。他们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的铁勾子上，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针管强行在他们的动脉血管上抽血。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没有使用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注射一种剧毒药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业人员拖去炼油，剩下的尸骨拖进炼人炉里焚烧，骨灰就地埋掉。在监狱西侧墙外，那座经常冒出令人作呕气味的浓烟的高大烟囱，就是“中马城”监狱的焚尸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一个日本雇员回忆说：“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这里的工作，当时化名叫细谷。被试验致死的爱国者，由日本人将其尸体秘密运到这里进行焚化，骨灰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①

1933年，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那里进行活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到：“11月16日，星期四，晴朗。午前8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内的实验场视察试验的情况”，“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试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②进行试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经过5分钟的试验，引起严重肺炎

---

① 据冯仲云《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

② 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的诬称。



背荫河"中马城"平面示意图

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2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使其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并未使其致死，最后连续通电流数分钟，始将其烧死。”①

这篇日记里的“交通中队”是“中马城”即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代称。加茂部队下设两个部（又称大队），一个是总务部，一个是研究部。研究部（大队）又分设两个中队，其中，从事防疫给水研究的“南栋中队”设在本部大院里；从事细菌研究的“交通中队”设在背荫河。

远藤三郎在另一篇日记中还记载：“被试验者一个一个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各种病原菌移殖于活人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②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曾不打自招地说过：“因使用了活人代替旱獭动物，当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冻伤治疗方面，获得在摄氏37℃热水中浸泡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是根据对活人进行生、杀、再生的宝贵试验而取得的结果。”③

三、“中马城”秘密的暴露及其迁移

“中马城”的秘密在它建成后不久就暴露了。1933年仲秋节夜晚，这里发生了暴动，30多人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幸存。他们投奔抗日联军后，把“中马城”的罪行揭露出来了。

---

①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17页。

② 《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

③ 《冈村宁次资料》，转引自《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

王子扬回忆说："半个月之前，我和老李正在哈尔滨的一条街上走动，突然街口被宪兵、伪警察堵住，不管是干什么的，只要年轻力壮就抓，我们二人未来得及躲藏，就被抓上了囚车。我们这批40多人从香坊车站被押上火车，连夜送往背荫河。被关进监狱后，发现情况异常。被送回牢房的人经过我们的耐心劝说，才透露了日本鬼子是用我们搞细菌试验的秘密。于是我们决定，不能在这里等着死，准备越狱，时间定在仲秋节（公历9月30日）晚上，利用敌人送饭之机动手。那天晚上，虽是仲秋，但不见明月，天上乌云密布，还下着蒙蒙的细雨。"中马城"除了岗楼里的日本哨兵之外，其余的日本官兵都在餐厅里饮酒作乐。他们把给牢房送饭的事都忘到脑后去了。到了深夜，日本看守才蹒跚地朝牢房走来，把一桶肉菜和一瓶白酒递进了栅栏口。我一边接菜桶，一边和醉熏熏的日本看守搭话，老李接过酒瓶子，突然朝日本看守的头上砸去，日本看守顺着铁栅栏倒了下去。我从这个日本看守腰上解下牢房钥匙，打开了几个牢房的门。接着，难友们在我的指挥下，向东墙移动。这时，"中马城"突然停了电，探照灯熄灭，一片漆黑，岗楼上发出了骚动声。这时，难友们架起了人梯，依次攀上墙顶，又翻过护城壕，向东跑去。墙内只剩下了老李一个人，因没人给他搭"梯"，爬不上来。这时，敌人岗哨发现了情况，开始用机枪扫射，并包围过来。老李英勇牺牲了。敌人追出了"中马城"，20多名难友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还有2名难友跑到距"中马城"15里地的八家子屯，被伪自卫团长、汉奸吴省三发现后，1人被就地砍死，1人被押回"中马城"。剩下的12名难友也跑散了。其中，5人跑到新发屯，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砸开了脚镣；7人跑到"中马城"以东3里的程家

肉，在吴泽民、吴化民兄弟帮助下砸开了脚镣，逃脱了敌人的追捕。第二天深夜，他们在一位慈祥的老人（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顺利地找到了抗联队伍。“中马城”的秘密就这样暴露了。对此，曾在“中马城”的萩原英夫（石井四郎的亲属）也证实过：“爪生荣二，我的舅父，从1933年起在五常研究所做石井部队特别班（活人试验所）的看守。被收容者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①

这次越狱事件发生后，日寇就预想到秘密会暴露，但他们存有侥幸心理。因此，仍在这里继续进行着细菌试验活动；11月16日，远藤中佐还会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前去视察细菌试验的情况。越狱事件的发生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马城”的警戒，并通过日伪当局在外围实行“併屯政策”，对中国人民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中马城”越狱事件发生后，石井四郎感到自己把细菌实验场设在背荫河是选错了地址，把它建在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游击区是一大失策。于是，他产生了将其迁走的想法，但为了减轻或推卸自己的责任，就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此后，虽然坚持了细菌试验活动，但由于抗联第三军对它不断的袭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促使石井四郎决心对“中马城”前途作出最后的决策。因此，是年年底，即12月27日深夜，石井四郎才用电话向远藤通报了“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他们为了处理“事故”决定第二天去背荫河视察。

12月28日，远藤三郎中佐和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在哈尔滨没有停留，直奔背荫河“中马城”。“中马城”实行了戒严，前来迎接的有中马大尉、伊达（即太田澄）大尉，还有石井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7页。

四郎的二哥细谷刚男少尉。在视察监狱的时候，石井四郎大发雷霆。细谷刚男少尉和中马大尉一个是管监狱的，一个是负责营区警戒的，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他们吓得面如土色，一声不吱。伊达大尉是细菌研究专家，当初是石井四郎点名要来的，石井四郎对他很尊重；这次越狱事件，他又毫无责任。因此，他代替细谷和中马做了检讨，使石井四郎未再大发雷霆。远藤中佐听取了详细的汇报后，就如何吸取教训、加强警戒、尽快恢复研究实验活动以及如何听从处理等问题作了指示。远藤中佐和石井四郎还作出了“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而对“中马城”搬迁的具体打算，他们一句也没有透露。

远藤三郎和石井四郎视察“中马城”这一秘密，直至1985年日本《每日新闻》公布了远藤三郎生前的日记才揭露出来。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12月28日，星期六，晴。昨日深夜，石井军医打来电话，说是细菌试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为了进行实情调查，决定于今天午前九时半，从长春出发去哈尔滨。我和石井军医正同乘一辆车赶赴拉林（实际是背荫河——译者注）视察设备情况，并听取关于发生事故的实际情况说明，作出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之后，于午后三时返回（长春）部队。”①

据《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的编辑者宫武刚介绍，远藤三郎从读书时起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在战争年代也没间断，至到临死的前一天还坚持着。由此推断，远藤三郎的日记是可信的。

1934年夏，“中马城”的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当时传说不

①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

一，有的说日寇不慎引起爆炸，有的说是抗联给炸的。为此，中马大尉还追查过责任，致使警备队的两个班发生了流血冲突。于是，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正式决定将“中马城”转移。其研究人员先行撤走，留下部分守卫人员拆卸机器设备，装上蒙着苫布的大汽车，运往哈尔滨。他们将拆下来的房架子、门窗等卖给了村民。至此，“中马城”变成了废墟。

四、蛰居“南栋”

据“中马城”日军留守人员透露，“中马城”的日军撤到“南栋”去了。“南栋”就是加茂部队的本部。它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之角，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以日本陆军医院作掩护，进行着秘密细菌研究活动。它临街的大铁门经常关闭着，并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里边有一座二层的小黄楼，一些日本军人和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出出入入。这里既象是工厂，又象是医院。它对外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加上生产滤水器这个半公开的招牌，也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

曾在这里当过劳工的龙江电影制片厂离休干部陈本源回忆了他的见闻。他说：“我当时给加茂部队制作土陶滤水管，单独在一个大院里活动。在我们滤水器厂前边有座用栅栏围着的小二楼。劳工们不用说进去，就是停留在旁边看一眼都不让。”

加茂部队在这里研制着各式各样的滤水器，分甲、乙、丙、丁四种型号，有可装在卡车上用的大型滤水器，也有可随意搬动的中型滤水器，还有可背在身上用的小型滤水器。它是石井四郎的一大发明，故称“石井式”滤水器。早在防疫研究所在日本期间，它就试制成功了。在“南栋”生产的主要是已大大地提高了

性能的改进型号，供给关东军各野战师团、各地日本陆军医院试用。其效果很好，不论浑浊到什么程度的水，经它过滤后，就变成了无杂质、无菌的净水了。可是，对这种“预防性武器”日本大本营并不重视，也不愿意增拨经费。为此，石井四郎前往日军参谋本部当众示范，往滤水器里小便，然后打开水嘴子接一碗经过过滤的尿，亲口喝了下去。在场人员目瞪口呆，日本大本营立即给他增拨经费。

盘踞平房

一、平房的历史沿革

早在800多年前，平房地区隶属于金国上京会宁府，据考古发现，这里有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时，臣民随之迁居而废弃的城堡。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归拉林副都统衙门管辖，并得到了重新开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拉林副都统裁撤后，该地隶属于阿勒楚喀副都统。在这个时期，在吉林通往哈尔滨、阿城的驿道上，兴建了义和屯、韩家店、后哈达屯等汉族村屯。嘉庆十七年（1812年），吉林将军富俊奉朝廷之命，在拉林河北开垦土地8000垧，旗人迁入，设置正黄旗等5个村屯；与此同时，在旗屯外还形成了其他的一些民人村落。当时，这一带村屯经常遭受盗匪骚扰，义和屯民众组织起来抗匪，保卫了村屯的安宁。于是，按着村屯领头人的提议，义和屯改名为平房屯。

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了拉滨（拉法——哈尔滨）铁路。它在靠近平房屯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小站，定名为“平房站”。

自1936年日本侵略军的两支部队设营驻扎，特别是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关于建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号命令之后，平房地区成为军事要地，逐渐为人们所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随着其细菌战及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揭

露，平房更举世闻名了。

平房站附近，除了铁路职工家属和小商小贩外，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平房镇街道两旁挂着日本人开办的“古力屋”、“酒保”、“料理店”等招牌，还有日本人、朝鲜人开设的妓院等。

如果把平房站附近的平房镇和一公里之外的日本空军第八三七二部队的营区和四公里之外的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营区等特别军事区域的面积统计在内，平房地区的范围有120平方公里。

二、大规模的营建

迁移和扩大加茂部队的战略计划，早在背荫河“中马城”崩溃的前夕就酝酿成熟了。于是，石井四郎以“意外的火灾”为由，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申请，不久，就得到裕仁天皇的批准。其迁移地点是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镇。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裕仁天皇的勅令，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了两支特种部队：一是侵驻哈尔滨市平房的石井部队（即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是侵驻长春市孟家屯的若松部队（即满洲第一〇〇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据当年的劳工幸存者候安钦老人回忆：1935年初夏，一队自称是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日本军人突然闯进了平房镇。他们在平房站以北4公里的地方，即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6个村屯的中间地带进行地质、水利勘测，把圈定的6平方公里的四周钉上了标桩，划为军事用地，说是要建一座“兵营”，驻扎日本军队。这里地势较为平坦，交通方便，北有两条直通哈尔滨的公路，南靠近平房火

车站。原七三一部队的一位高级军官说，这个位置是驻扎特种部队的理想之地。

侯定钦还证实说：1936年初春破土动工的建筑工地中心就是后来的七三一部队的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

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为了不暴露“加茂部队”，事先施放烟幕，忽而说修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忽而又说修建“东乡部队营舍”；在行文中则用“十七号军事基地”作为其代称。可是，它刚一动工，就引起了中共北满省委军委的注意，并立即责成东北国际情报组负责人庄克仁派人前去侦察。庄克仁回忆说：“1936年夏季，接到省委军委的指示后，立即派赵宗博、史顺臣和敬思瑞潜入平房侦察。他们回来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际是石井部队。我将派人侦察的情况，立即向省委军委王东周同志作了汇报。”

石井部队的营建，是极为保密的一项重要工程，被称之为“特殊工业”。因此，只能由日本关东军御用的建设株式会社设计和施工。当时兼任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长春进行了工程招标，最后确定由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它们分别派出了强有力的大林组、藤田组、松村组、铃木组，按期地开进了平房。尽管如此，对他们的信任也是有限的。为防止他们发现更多的秘密，在分配任务时，只让他们各自担负一个项目。这些施工单位中，最受器重的是铃木组。尽管它全员仅有500人，在日本千叶县是个很小的施工单位，但因为其头目铃木茂是石井四郎的同乡亲戚，所以也被从日本的加茂地方招募来，并承担内部工程，而把外体工程分给大林组、藤田组和松村组。1939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后，这些施工组被陆续撤走，而铃木组却

一手包办了收尾工程。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石井四郎对铃木组的信任，这就是：铃木茂的儿子“小铃木”是铃木组的材料员，他把施工用的钢材用汽车拉到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变卖，中饱私囊。石井四郎发现后虽然很气愤，本应军法处置，但却没予追究，反面对铃木茂信任如故。

两年多的时间，石井部队的营建工程就全面完成了。建起了水源地、供水室、备用的火力发电厂、平房站和孙家站的两条铁路专用线、本部办公大楼、特殊用途的四方楼及其附属建筑、“特设监狱”、专用飞机场、军用物资仓库、教育部队舍、半自动化生产用锅炉房等；在生活区，修建了东乡宿舍、东乡神社、东乡学校、东乡广场，构成了“东乡村”。此外，还有医院、大礼堂、酒保、“古力屋”、运动场、小花园等，应有尽有。1938年6月，石井部队的人员和设备部移驻到这里。其机构得到迅速扩大，“南栋”改为它的第三部（即防疫给水部）。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平房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

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远藤三郎少将，于1939年末亲临平房试验现场视察，看了平房石井部队的“惊人规模”，并同1933年背荫河细菌试验场相比后，“大有不胜今昔之感。”①

三、“特别军事区”的划定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其中规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依据”满洲国军机保护法施行规则，附件要图上

① 《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

所标明甲号地段应定为第三种区域甲地段。上述规则事项均适用于该地段”；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工号地段内，禁止建造二层以上新房屋。”

据考察，“甲号地段”是特别控制的“无人区”、“乙号地段”是一般控制区。哈尔滨市公安局保存的哈尔滨解放初期平房公安分局的调查材料中，有曾在平房宪兵分遣队当过翻译的王学德的一份证言，他说：平房特区分为甲号和乙号区域，而甲号区域不准有中国人居住，在乙号区域居住的凡是年满18周岁的中国人，都必须领取由香坊警察署签发的特别居住证明书。

在一张1943年绘制的平房区军事地图上，对七三一部队营区、城子沟细菌实验场和平房特别军事区所有的村屯以及有代表性的地形地物，等高线都做了详细的标示。

伪满时期住在正黄旗二屯、曾在七三一部队服过苦役的金方良说：平房特区有40多个屯子，分为甲号区域和乙号区域。甲号区域是以七三一部队和八三七二部队为中心，向四外扩展5公里。在这一区域内除平房站外，还有韩家店、张家店、三家子、韩四家子、正黄旗四屯、正黄旗三屯、正黄旗二屯、大南沟、小南沟、瓦盆窑、新五屯、新发屯、阎家岗、西大坝、东井子、后二道沟、义发源、东二道沟、平房屯、山嘴子、腰二道沟等21个村屯；乙号区域包括了孟家屯、朝阳屯、夏家沟、穆家沟、邓家沟、双榆树、腰大坝、杨家店、东大坝、后柳条沟、二门于家、柳条沟、后哈达屯、东戴家、西戴家、南戴家、前柳条沟、狼窝屯、张斌屯等19个村屯。

粗略计算，平房特别军事区总面积大约是120多平方公里，其中甲方区域大约32平方公里。当时，有21个村屯与七三一部队

的距离不足5公里，不符合建立“无人区”的规定。然而，日本侵略者明白，如果按规定将这21个村屯全部平毁，那会遭到当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它不得不把无人区缩小，只把最靠近七三一部队的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毁掉了。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除黄家窝堡灭迹外，另外的3个村屯得以恢复，大部分村人又重返家园。

为加强对特别军事区域的管制，平房警察驻在所在特区边界屯外1.5公里的交通路口处插设界牌。据金国忠、庄振芳、文继勇、文道斌、陈芳盛、陈芳新、无新富、邹洪彬和靖福和等看见过界牌的人回忆：界牌为木制，板面长方形，分两种规格，一种是长1米、宽0.8米，一种是长0.6米、宽0.5米，由埋入地下的木方柱支撑，离地面有1米左右高。牌面朝外，刷白色油漆，上写黑字，大意是：非特别军事区域内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入内，如有违者，以法论处。

对平房特区的居民，管制严格，凡年满16岁的居民，必须领有伪香坊警察署颁发的“特别居住证明书”。其封面是紫红色，有效期为一年，到期更换；必须随身携带，以备随时接受军、警、宪、特的检査，即使在田间劳动也不例外；贴有本人免冠半身照片，并盖有兰色“特”字印章。如果发现无证者，轻则挨打，重则按政治嫌疑犯抓进宪兵队或警察所。前来特区探亲、办事和打短工者，不论临时居住时间长短，都必须亲自到平房警察驻在所所属的派出所登记，领取规定期限的白皮“临时居住证明书”，离开时，还必须办理注销手续。

在拉滨铁路线上行驶的旅客列车在通过平房特别军事区域时，即在平房火车站的前一站（周家站或孙家站）必须放下窗

帘，严禁旅客向车外张望。有不少人因为不知道日伪当局的这个规定而向外张望，被日伪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抓起来，送进了警察署和宪兵队。久而久之，人们把从平房火车站到平房火车站下一站，长约60华里的铁路线称为“六十里地国境线”。

特别军事区域的上空也被严密控制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明文规定该地为“空中禁城”，严禁外部飞机飞越其上空，日军其它部队的飞机也不例外。如果发现违航飞机，可强迫其着陆，否则七三一部队有权击落。

四、特别军事区事务所的设立

日本关东军关于建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下达后，伪哈尔滨市公署又设立了平房特区事务所。它虽然隶属于哈尔滨市伪香坊区公署，但有独立的管理权，其区长、副区长都直接由伪哈尔滨市公署任命。为加强对平房特区的控制，关东军司令部还委派日本人担当副区长，掌握着管理平房特区的实权。

据历史档案记载，平房特区事务所下设总务股、动员股、实业股。

区长：董志军。

副区长：宫本丰郎（日本人）、袁明礼。

事务长：立松赖次郎（高木、佐藤也曾任该职）。

平房特区下设8个分区：平房分区（管辖4个村屯）、新发分区（管辖7个村屯）、朝阳分区（管辖5个村屯）、东井子分区（管辖6个村屯）、腰二道沟分区（管辖7个村屯）、后哈达分区（管辖7个村屯）、正黄三分区（管辖2个村屯）、正黄二分区（管辖2个村屯）、每个分区设有区划长1名，副区划长1至2名。

在设立平房特区事务所的同时，还设立了平房特区日满协和会和平房警察驻在所。警察驻在所下设平房屯、正黄旗三屯、新发屯等3个派出所。

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也派出分遣队驻守平房。

平房特区事务所和平房警察驻在所，名义上是伪满政、警机关，可是实权却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据伪平房特区区长董志军在解放初期的证实，平房区行政方面的大事都得向日本人副区长请示，平时的行政业务都由事务长（日本人）掌握。

曾在伪平房警察驻在所当过警长的王学德证实说："平房警察驻在所虽然是伪满警察机构，但所长都由日本人担任。第一任所长是田村守义（警佐），第二任所长是名越义美（监督警尉）第三任所长是土井智（警佐）；并派日本人加藤秀岭、石川掌握着内勤工作实权；各派出所的所长也是由日本人担任。此外，平房宪兵分遣队更不用说了、除配备中国翻译之外，全部人员都是日本人。

五、强迁民屯，霸占良田

石井部队营建完成之前，圈定了大约6.1平方公里的军事用地。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对它的保密和防范的要求，距它5公里之内不准许有中国居民居住，而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和正黄旗头屯等4个村屯距其尚不足2.5公里，无疑被划为强迁之列。1938年中秋节，伪哈尔滨警察局香坊警察署平房驻在所在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和正黄旗头屯贴出告示，限村民一个月内迁出，逾期不迁，将其民房除日本军以留用之外，其余全部强行拆除和烧毁，损失自负，违抗者以法论处。

强迁民屯和霸占良田，给平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据调查，当时4个村屯被强迁546户，拆除和占用民房1638间，强占良田610垧。黄家窝堡50多户居民被强行撵走，120垧土地被霸占，从此，“黄家窝堡”这个地名在地图上消失了。当年黄家窝堡的老住户马殿清记得，当时村边百年老榆树下有座土地庙，村民百姓都去敬香，求神保佑平安，可是神没显灵，世代居住的家园最终还是被日本鬼子毁掉，并变为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基地。当时有110多年开垦历史的正黄旗五屯的200多垧土地被作为修筑细菌工厂和专用飞机场的用地；340多户村民被撵走以后，全部草房改作劳工棚。流离失所的村民除了少数投亲靠友外，尚有200多户无亲可投，不得不在该屯西北3华里裴家窝堡挖了200多个“地窨子”居住。正黄旗五屯陈方胜父亲被冻死。日本侵略者对黄家窝堡、刘家窝堡和正黄旗头屯拆除的房屋，不仅没给分文损失费，而且对有的村民以拆除不及时为理由，将其房屋烧掉。对占用正黄旗五屯的房屋，只付给微不足道的损失费。据陈方新（现为正黄旗二屯农民）和陈方胜（现为东安机械厂食堂退休工人）证实：“当时八成新的草房每间价值300元，他们只给60元；每间能值八九十元的草房，他们只给30元钱。当时土地每垧价值400多元钱，日本人说是给120元钱，可七扣八扣，层层扒皮，实际拿到手的还不足一百元钱。”

日伪当局对反对迁屯移户的村民进行了镇压。正黄旗五屯的金志福、文道周、张世宝表示不满后，被平房警察驻在所抓去，送往鞍山铁矿当劳工。他们都死于异乡。

庞大的机构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队，历经三年的时间在平房建成。表面上看，它是背荫河细菌工厂的搬迁，实质上是石井部队的扩大。1938年6月，它的本部正式移驻平房，哈尔滨市内的"南栋"变成它的第三部。这时，对外的"加茂部队"的名称立即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后两个月，启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在1945年5月，当苏联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垂死挣扎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又将它改称"满洲二五二〇二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支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其侵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它的规模来说，远远超出了德国法西斯建立的所谓"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杀人工厂。就它在日本侵略军中的地位来说，名义上是编在关东军序列，而实质上是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因此，它的人员配备非同一般，比其他部队高出一等。它配有1名中将和4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全员为2600余人。

七三一部队部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年3月至8月又由石井四郎中将重任。

七三一部队下设8个部、4个支队、1个所。

8个部是：

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菊地少将任部长。该部下设从事鼠疫菌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传染媒介物——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四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的“川上班”（仅存在4个月，因川上技师病死而停止）。

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除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外，还通过“八木泽班”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设置了“石井”动物饲养班和培殖细菌传染媒介物的分部；在正黄旗三屯西南城小沟设立了临时实验场，在安达镇东35华里的鞠家窑附近设置了特别实验靶场，还有为细菌实验服务的“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

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滨市内宣化街，是在原“加茂部队”旧址重新组建的。它辖有滤水器制造厂和在杨马架子建立的细菌瓷弹壳制造厂。它在制造滤水器的掩护下，秘密生产土陶制成的“石井式”细菌弹壳。同时，它还在七三一部队本部所在地平房设置了各类小型细菌武器的研制、生产场所。此外，为整个七三一部队服务的“运输班”归该部领导。

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该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个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进行各类细菌的制造，由

柄泽班、有田班、朝北奈班、山谷班和山口班完成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

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兼任。该部是七三一部队的中枢部门，下设调查课，包括秋贞班、调查班、庶务班、兵要地志班、照相班、印刷班、电报室、图书室、邮政所；管理课，包括劳务班、工务班、建设班、庶务课，包括动力班、酒保、食堂、宿舍等，还有人事课，会计课，企画课，标本陈列室。它的权力很大，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文秘、人事、财务、计划、后勤和劳工管理等工作，还负责与宪兵队联系和接收供作细菌试验用的囚犯。

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下设卫生兵教育队、特种人员训练队、少年队等。这个部专门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细菌生产、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员。

器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下设第一仓库、第二仓库、兵器库、菌苗血清库等。它除了负责各种生产器材设备的贮存与供应外，还担负实验用的动物的运输和各类菌苗、疫苗的贮存任务。

诊疗部，永山大佐任部长。设诊疗室、日本军人家属医院，负责对日本人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它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4个支队是：

林口支队，又称一六二支队，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榊原秀夫少佐任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六七三支队，设在孙吴镇的西山，拥有日本

研究人员136名，西俊英中佐兼任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五四三支队，设在海拉尔市西南三里之地，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26名，加藤恒则少佐任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六四三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6公里处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名，尾上正男少佐任支队长。

1个所是：

设在大连市内的"满铁卫生研究所"，拥有日本研究、工作人员92名，由安东洪次少将任所长，它的主要任务是培殖各类疫苗。

本部的概貌

七三一部队在平房的本部驻地，有指挥中枢和细菌研究、生产、实验中心的第一、第四部，还有第二部、教育训练部及其他一系列的附属设施，十分庞大、复杂。它占地约16万平方米。本部大楼及四方楼等四周筑有高2米、长5公里的土墙。墙顶上架设电网和铁刺线，墙外设有宽3米、深2.5米的防护壕。设东门两处，南门、西门和北门各一处，门旁均设有卫兵所。

正对本部大楼的南门，是专供日本人出入的通道。这个门的跨度为8米，镶嵌着两扇铁栅栏门，门西侧另设一脚门。门内西侧设有一个建筑面积约为80平方米的卫兵所。紧靠门内是一个木制的岗楼，对面竖着一块长方型的揭示牌，上写有："未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不得入内"的字标。这里设双岗，配备一个班的日本兵昼夜把守，对来往行人进行严格的盘查；东门（两处）和北门专供中国劳工上下班使用；西门经常关闭着，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一、本部——1栋

从南门进入七三一部队营区，沿路北行不远，是1栋楼。它是七三一部队的指挥中枢所在地。它是一座砖瓦结构、人字型屋顶的两层建筑物，建于1938年 1942年扩建为2350平方米。该楼二层东端，是七三一部队长的办公室、洗漱间和副官室楼下是侍卫官室，其余部分全为总务部和宪兵室占据；正对二楼楼梯口的一个大约

80平方米的房间，是为摆放在细菌战活动中丧命的日本侵略者的骨灰盒而特设的“安灵室”，以供安定军心之用；该楼一阶西侧为诊疗部；二阶西端是细菌试验的标本陈列室。

该楼的一、二阶的中心走廊，向北延伸，与“四方楼”中心走廊连通。楼内设有兼作暖气管道用的地下通道，亦可进入“四方楼”的地下通道。在1号楼与“四方楼”连接处，设有地上和地下“更衣室”，洗漱设施完备，供日本人出入“四方楼”使用。

与本部大楼中心走廊相连接的有分为东西的两栋砖瓦结构的平房建筑，西侧的一栋，宽13.5米，长52.7米是配电室和器材供应部办公室；西侧的一栋，宽13.5米，长65.5，外连接一个长5.5米、宽6.5米的洗漱间和厕所。这栋房在1939年时为七三一部队日本人食堂，后改为存放刀、枪、子弹的“兵器库”。七三一部队所使用的常规武器都从这里领取。

二、细菌研究的中心——四方楼

“四方楼”是由3栋、4栋、5栋、6栋所组成的方型的高大建筑物，占地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除了位于南北的3栋、4栋轴心处是5层楼外，其余部分都为3层建筑。由于这个高大建筑物外表涂为白灰色，阳光一照，格外刺眼，从哈尔滨市这方向来到平房，首先就能看到它。刚派到七三一部队的日本人都为一片荒野上矗起的这样一座罕见的巨型建筑物表示异常的惊讶。因为四方楼是七三一部队的细菌研究中心，极其重要，极为秘密，所以在它的东面和北面又单独砌一道砖墙，西面拉了一道铁丝网，日本警备队昼夜武装守卫。这里不仅不准中国人靠近，而且连日本

人出入也得经过严格审查。

四方楼的第一层，是第四部管辖之下的“柄泽班”，实际是细菌制造厂；二阶有研究冻伤的“吉村班”，研究霍乱的“凑班”、研究赤痢的“江岛班”、研究脾脱疽的“太田班”、研究病理的“冈本班”和“石川班”、研究血清的“内海班”，三阶有研究伤寒的“田部班”、研究结核的“二木班”、研究毒药的“草味班”，它们都归第一部管辖。

此外，在“四方楼”北侧与其联结的平房建筑，是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和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还有，在“四方楼”外西侧的一栋平房，是从事立克次氏体研究的“野口班。”

在“四方楼”内侧，由于中心走廊的间隔，自然地分成东、西两个大院。内院里各有一座两层建筑的小楼，这就是七三一部队特别班管辖的“秘密监狱”。被日本宪兵拘捕的中国人和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特别输送”到这里监押。他们是七三一部队作细菌实验的“材料”。西院为7栋，监押男性“囚犯”；东院为8栋，监押女性“囚犯”。

距“四方楼”以西10米远处是解剖室，20米远处即是焚尸炉。

据原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供诉，“四方楼”范围内设有地下秘密通道，从监狱到各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到楼外的解剖室，以至到焚尸炉都由地下道连通着。“四方楼”及其附近的地下道，约有3米多高，3米多宽，很长，地面铺设着小铁道。地道每隔六七米远有一个电灯。地道东南方向有个地下室，镶有两扇大铁门，门上扣着一把2尺多长的大栓。地道西边有个小屋，是个实

验室。室内离天棚半尺距离的墙壁上，每隔半尺远探出一根铁管；四壁是水泥浇注的，夹层镶有铁板。通风窗口安设着牢固的铁栏杆；地面上固定着一根2尺多高的铁橛子，铁橛子顶端连接着碗口大的铁环，旁边放着一副张开的手铐。

“四方楼”西侧有饲养动物的“石井班”及其事物所1处、动物舍7处、大型菜窖4个、饲养加工房1处。这里饲养各种动物十几种，供细菌实验之用。二木班的马舍也设在这里。

在“石井班”的黄鼠饲养槽西北角200米处，是七三一部队对外绝密的“兵训班”。它是一个用房屋围成的大院，通称“方型栋”。南部一排建筑物是制造小型细菌武器的高温实验室、低温实验室、灭菌室、研究室、菌苗及疫苗贮藏室，东部、西部、北部的平房是汽车、坦克、火炮库，这些汽车、坦克和火炮都是“实验器材”。

“四方楼”北部是归属“吉村班”领导的冷冻实验室，一座砖瓦结构的有两层楼高的平顶建筑物。该建筑物长21米，宽11.2米，高墙上端和顶部设有若干通气孔，内壁有固定隔热层的铁勾，在室内东北角有固定冷冻设备的水泥基座，上边的固定螺丝还在。与该建筑物连为一体的平顶建筑物，是和冷冻室配套使用的实验室。它长4米，宽20米，分隔3室，上下两层。

“四方楼”的东北角是“田中班”昆虫动物舍，有4栋房舍，四周围有2.2米高的砖墙。

“四方楼”的东北部还有伪装成“玻璃工厂”的“山口班”，实际上是装配和贮存细菌弹的场所。原有房舍5—6栋，用砖墙围成大院。

在“四方楼”以东，过铁路专用线不远处的一座二层小

楼，是瓦斯发生室。七三一部队在这里对人进行“毒气试验”。

三、教育训练部

教育训练部是培训七三一部队各类专业人员的，同时兼管日本军人子女的普通教育。它位于本部大楼道南一个用土墙围成的长方型的大院里，设有东、南、西三门，在常用的东门旁边设有卫兵所。院内有队舍、实习室、食堂、仓库、浴室等砖瓦结构的平房建筑和练兵场；院外东北有“少年队”操练场，南部有一个较大的赛马场，北侧有“东乡国民学校”（后来迁至“东乡神社”西边）。

四、附属设施

临时实验场。远离七三一部队的细菌研究中心，有两处临时实验场。一处是位于正黄旗三屯以西3华里的城子沟；另一处是在七三一部队专用飞机场北边称为“靶场”的地方。

焚尸炉。七三一部队设立了3座焚尸炉，一座位于“四方楼”西北角，主要是焚化被细菌实验致死的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北岗上，以焚化动物尸体为主，偶而也焚化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原“八木班”的农田里，日本人死后在这里焚化。

庞大的实验农场。它即是位于“四方楼”西边的“八木班”名义上是七三一部队的农场，实际上是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实验场。“八木班”事务室北部，，有一栋大约1000多平方米的大温室，是植物病毒研究的室内基地；温室附近有大面积的研究小麦锈病和黑穗病的实验田和种植小麦、大豆、高粱等作物的大面积的农田。

物资仓库。在“四方楼”北部，“田中班”的西侧。它的面积很大，由第一仓库和第二仓库组成。第一仓库在东面，是军事物资库。有砖木结构铁瓦盖的库房4栋：第一栋是仓库事务室并兼作物资包装室；第二栋装有精密的仪表、仪器；第三栋存放着各类专用的机器和设备；第四栋装有玻璃器皿和生产专用的布匹、防护衣帽、鞋、袜、手套等。还有两栋板房仓库，其中的一栋装有硫酸、水银和酒精、酒精棉、石碳酸等消毒物资；另一栋装有为培殖细菌而准备的“牛肉松”和生产用糖。不怕风吹雨淋的各种木箱和各种规格的铝箱则堆放在露天大院的一角。此外，还有地下室。这里有11个日本人，其中，男7人、女4人；中国劳工有30多人。

第二仓库位于第一仓库西面，是七三一部队的生活物资仓库，有中国劳工30余人，此外还有少量的日本人。有两栋砖瓦结构的库房，存放着办公设备、服装和日常生活用品。此外，有些物资堆放在露天大院里。这里还设有被服加工厂和修鞋部。

在第一和第二仓库的中国劳工，多是被编入“少年队”的13岁至15岁的少年。

物资仓库不仅为七三一部队的本部贮存物资，也是所属各支队的物资供应站，因此，铁路专用线直通各库房旁边。

后勤三个班。即供热、供电、供力的“动力班”和营缮管理的“工务班”以及人员、物资运输的“运输班”。

“动力班”位于“四方楼”东侧，有一座三层楼高的钢筋水泥制的大型厂房。它是一个自动化的锅炉房，内设三台“科哈式”锅炉，负责对整个部队的生产用暖气和备用电的供应。在它的东南角，设有一座大约1000多米的地下水库。

“航空班”和“气象班”。在“动力班”大锅炉房的道东，有一座三层建筑的灰色小楼，这就是七三一部队的“航空班”和“气象班”。“航空班”是七三一部队为配合细菌实验而特设的，拥有飞机11架，分为吞龙式轰炸机、七九式重1型轰炸机、九七式重2型轰炸机、九九式双发轻型轰炸机、九九式单发轻型轰炸机、隼式战斗机、100式运输机和患者运输机等8个机种。各类轰炸机的内部设备都进行了改装，除了载运细菌炸弹装置外，还设置了细菌喷雾器和细菌投撒器；其战斗机，主要用于对空城的警戒和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的护航；运输机，多数供七三一部队将校级军官乘用，也有专用的运输机，押运“被实验人员”及运回尸体，或运输供实验用的各种菌苗和急用的实验器材。在“航空班”南边设有三座高大的飞机库。以飞机库为起点，向东南和东北延伸了两条飞行滑行道，再往东是一条偏东南的飞机跑道，其宽度约为120米，长度约为1200米。在飞机场北边，设有靶场一处。“航空班”有12名“少年队”的劳役，在日本人监视下擦飞机或把飞机跑道两侧的蒿草割倒。

五、东乡村内外

七三一部队在这里建设了供3000名日本人使用的包括教育、生活和享乐的设施。这些设施分布在“东乡村”内外。

“东乡村”是七三一部队的集中生活区，位于本部驻地的西南角，有三层建筑的日本军人家属宿舍楼6幢到8幢；日本军人独身宿舍三层建筑3幢，号称“连三楼”，“东乡宿舍”事务所设在这座楼的中间栋楼下；三层建筑的判任官宿舍6幢；三层建筑的尉官家属宿舍3幢，此外，在西岗还有三层3幢和二层2幢的共

5幢楼房，是高等官以及享受高等官待遇的宿舍。这些宿舍，设施完备。高等官宿舍豪华。

“东乡村”中心有“中心广场”，并设有洗衣房一处；东部，设有供应日本家属的鱼菜供应部；西部，设有日本饭店一处，建有体育场、游泳池；西北，拐把型平房建筑是供日本人享用的小“酒吧间”，还设立了“东乡神社”和日本小学校，各处分别建设了小花园。

在“东乡村”北200米处，用走廊连接的四栋砖瓦结构的平房是为日军军人及其家属服务的医院。

位于本部大楼西南200米处，一座正门朝北的二层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号称“63栋”的大礼堂，是七三一部队集会、娱乐的中心场所。剧场内拥有1000多个座席，二楼设有放映室，他们到这里听报告、看电影和戏剧。在剧场的东侧，设有“酒吧间”。与大礼堂后部连接的一个二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号称为第62栋，是一座综合楼，一层东侧有劳务班、邮政局、电报局、兵要地志班、图书室和教育部实习室，西侧为伙房及雇员、佣员食堂；二阶为高等官、判任官餐厅。

六、第三部——南栋

通称“南栋”的第三部，位于七三一部队前身的“加茂部队”的旧址(哈尔滨市的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也就是日本陆军第七部队医院的后边。它称为“防疫给水部”。这实际是整个七三一部队的对外的招牌。七三一部队本部1938年迁至平房后，它改为七三一部队的第三部，以研究防疫给水为主要任务，设有研究室、工作科和整备队。研究室主要探索细菌污染的条件及研究防疫给

水设备；工作科下分机械工厂、制造工厂、工具室、设计室、钢管工厂、木工厂等。主要负责滤水器制造、滤水管制造、医疗器械修理等。第三部的秘密就是在防疫给水研究的掩护下，从事土陶制的细菌弹壳的制造。这个细菌弹壳制造厂设在哈尔滨市西郊的杨马架子一带。

伸出的魔爪——七三一部队的分支机构

一、扩大细菌战基地的战略部署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意、日三国结成同盟，采取行动，相互配合，妄图共同瓜分世界。三国同盟的发起者里宾特罗甫对于这个同盟解释说："这是一箭双雕的政策。是对苏联和对美国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也把矛头指向苏联，企图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基于这一战略目的，它进一步加紧细菌战的准备。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摄政裕仁又发布了一个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即建立七三一部队的各个支队，扩大七三一部队及其细菌武器的生产。所以，在由日军大将、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四个支队的命令》中说，"在石井部队下，分设有许多交由日本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它们的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该部队的细菌武器"。其附件中，日军参谋本部对建队的时间、驻地以及配置人数都提出了要求，规定每个支队名额为300人，并指示各支队可以接纳雇员，但雇员人数不得超过各支队全员的30%。东条英机责令日本陆军医院和七三一部队要定额抽出医生、有关专家和士官派往各支队去工作。

据此，七三一部队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地分别建立了4个支队，其位置恰好选择在中国东北的西部、北部和东部靠近苏联边境的战略要地。1941年8月，号称"关东军防疫给

水部”的石井部队及其各支队改用了秘密番号。本部为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为五四三支队，孙吴支队为六七三支队，牡丹江支队为六四三支队，林口支队为一六二支队。

这样的战略布局，不仅可以按品种、数量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发挥各支队直接进行细菌攻击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在战局不利，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本部或者某一支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时，细菌战不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因此，石井四郎到海拉尔五四三支队视察，该支队在入舟饭店为他举行接风宴会，他说：“日苏战争迟早难免，因此我军医在生物化学战上，应特别提高自己职能的涵养；对于细菌战，我们是有信心的。要多采用医科大学细菌专科教授大量使用俘虏进行试验所研究的细菌；防疫给水部还拥有大量孵卵设备，……为避免敌方的轰炸和破坏，要分散培养细菌的设备，供战时使用。”①

为了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和实行必要的战略疏散，七三一部队经常不断地为各支队补充人员，特别是加强专业技术力量，同时帮助增添和更新必要的设备，使各支队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原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的课长唐泽富雄在法庭上供称：“1944年上半年，七三一部队的设备颇大一部份分散到各支队去了”。1945年3月，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军参谋本部又发出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为满足石井四郎的条件，不惜任何代价地为七三一部队及其所属各支队增加了专家人员和设备，进行垂死的挣扎。

---

①中央档案馆档案：汤浅谦的证言。

二、海拉尔支队

海拉尔位于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部，伊敏河与海拉尔的汇合处。它是内蒙古东部的边陲重镇。

1934年，伪满洲国设立兴安北省，以海拉尔为省会，当时，海拉尔兵营密布，军警机关林立，中国蒙汉居民仅25000人，而日伪军警人员却高达10多万，它实际上变成了进攻苏联的前哨。

1940年冬季，日本帝国主义在海拉尔设立了五四三特种部队，即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从此，一批批身着日本军服但不带军衔而专门从事细菌杀人武器研究和生产的日本人以“日本军属”身份，在这里神出鬼没，往返于海拉尔、哈尔滨或日本之间。

它驻扎在海拉尔市南1.5公里的地方（现在海拉尔市医院住院处西南）。当时人们看到，这里象是医院，但还设有动物舍，养着10匹马、鸽子和大量的老鼠。据森田供述，1945年夏天，这里饲养的老鼠达13000只。

据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人员关孝证实：“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七三一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进行细菌传染实验。他参预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发现这次效果不太好。”①

---

①据长春市公安局存敌伪档案.

三、孙吴支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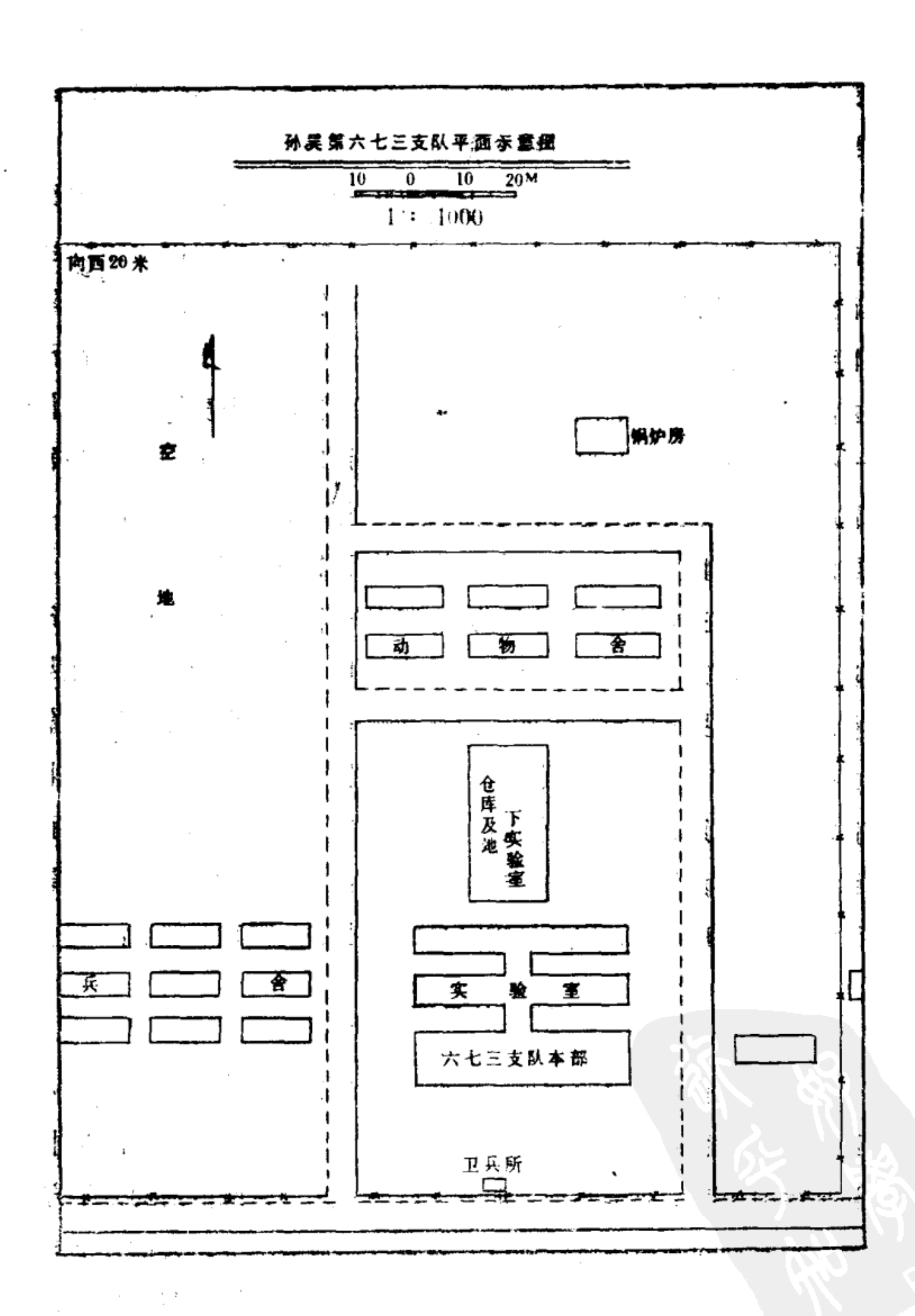
孙吴地处边境要塞，位于大兴安岭东麓，北安与黑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据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调查，当时日本侵略者在黑河地区设置兵营50余座，其中孙吴就有20余处；分布在黑河地区的飞机场共有13处，而孙吴就有3处；整个黑河地区有日本侵略军10万人，而1941年在孙吴的日本侵略军就由3万人增至8万人。其中，就有七三一部队的六七三支队。这个支队，于1940年6月在孙吴镇西南1.5公里的小山包上开始营建，同年冬完成。修筑营舍时，动用了从外地抓来的近千名劳工，竣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不使其秘密泄露，把这些劳工都秘密杀害了。

这支部队的日籍人员，最初只有30多人，到1942年增至80多人，最后达到130多人。第一任支队长是佐佐木少佐，1944年由西俊英少佐接任。

据原黑龙江省公安厅佟明贵于1954年9月16日的调查，整个部队有营舍300余间，其中15间用于培养鼠类和各种动物，共养鼠千余只，江猪200余只，兔子50余只，羊3只。此外，还培殖跳蚤。这里组织了培训班，培养细菌研究的各类专业人员，由金泽少尉负责。每年训练两期，每期学员十五六名。从1944年到1945年8月中旬，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培训学员近50名。

从1945年3月起，由于日军在南太平洋一带遭到严重挫折以及加紧对苏战争的准备，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按关东军战略作战计划所颁发的命令，孙吴支队也加紧了战备。此时，增建了设备室，七三一部队本部拨给的用于细菌生产的各种新设备投入抓紧


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平面示意图
10 0 10 20M
1 : 1000
向西20米
空
地
锅炉房
动
物
舍
仓库及池
下实验室
兵
舍
实
验
室
六七三支队本部
卫兵所

安装工作，备好的两台大锅炉已有一台安装完毕，不过这些设备尚未使用，日本侵略者就垮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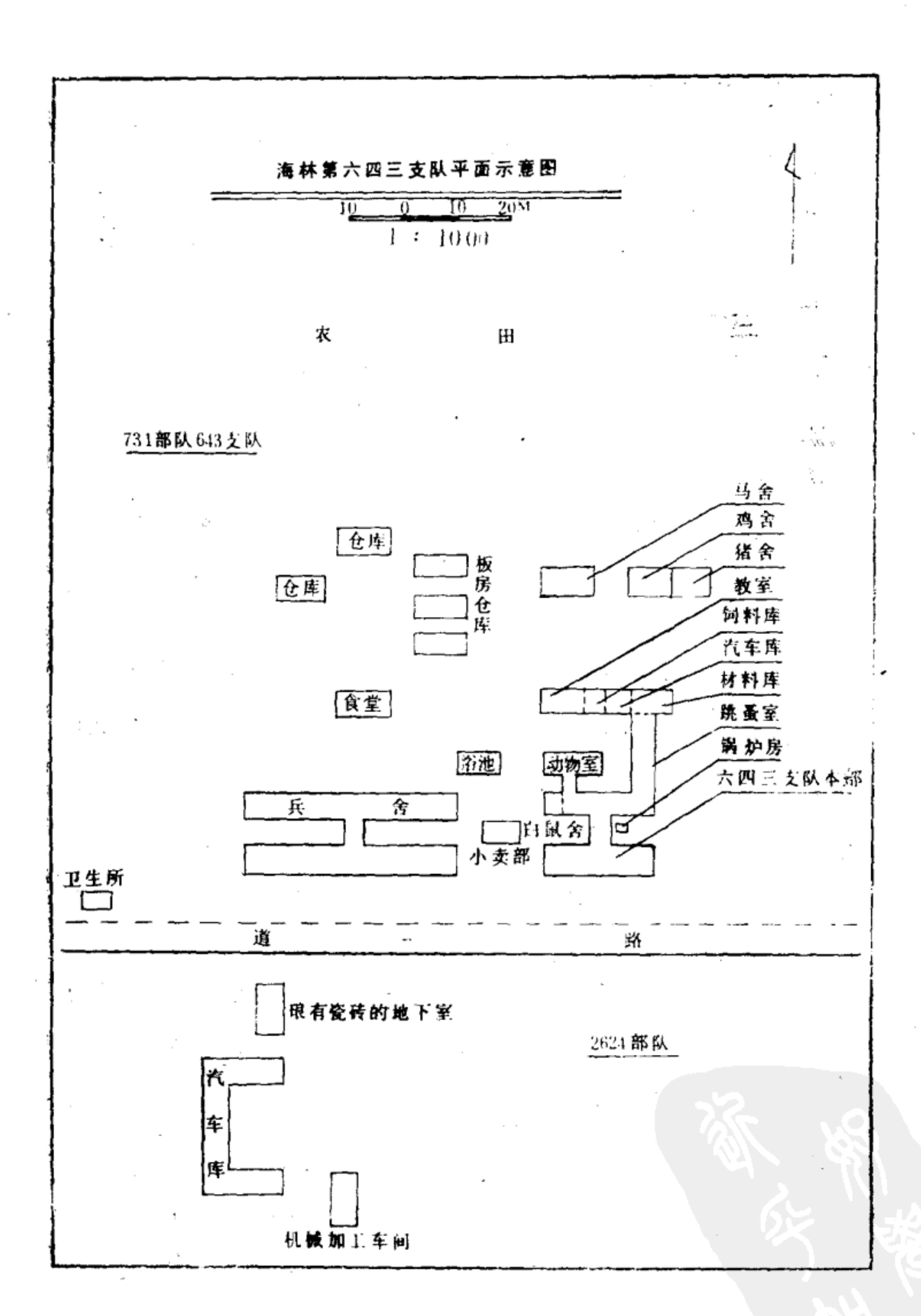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六七三部队遗址还可以看到：被炸毁的挂有铁刺线的土围墙。从东门进入，不远处有堆成山一样的老鼠笼子垛。西南二座大型房屋旁边有一方型洞口，上边盖着镶有把手的大约1平方米的铁板。掀开它，踏着10多个水泥台阶下去，便是一条宽敞的地下走廊。走廊两侧各设5个房间，左侧第一个房间里散放着几根木头橛子，其余房间，都在工作案台上摆放着数不清的玻璃试管和圆型玻璃盘。这种玻璃盘直径10厘米，是两个为一组，上下摞在一起。这显然是细菌研究室。①

除六七三支队外，在孙吴北面，还有一个番号为二六四五的部队。这个部队与日军物资仓库紧挨着，拥有营舍25间，其中制药室、化验室占用15间，另外10间是动物舍。据证实，在这里饲养白鼠50余只，红灰鼠200余只，兔子40余只，还饲养着苏雀。化验室有中村少尉等5名日本人，养鼠班有山口班长等。他们除了每星期对动物进行抽血外，还对在这里的300名劳工，以检查身体为名抽血并化验。这是日本军事团所设的一支细菌部队。

四、牡丹江支队

七三一部队所属的牡丹江支队（即六四三支队），位于海林镇北5华里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以一条南北道为界，西半部是中国居民，东半部是六四三支队的营区。营区占地28万平方米，长方型的四周围有铁刺线。营舍占据地盘不大，大部分土地为农田。从海林车站延伸过来的铁路专用线，从该支队营区通

①原中共孙吴县委党校副校长孙书智证言。



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平面示意图
10 0 10 20M
1 : 1000
农 田
731部队643支队
马舍
鸡舍
猪舍
教室
饲料库
汽车库
材料库
跳蚤室
锅炉房
六四三支队本部
仓库
仓库
板房仓库
食堂
浴池
动物室
兵 舍
白鼠舍
小卖部
卫生所
道 路
限有瓷砖的地下室
2624部队
汽车库
机械加工车间

过，一直进到斗银沟的另一个日军医院和仓库。

六四三支队规模略小，但机构比较健全，曾设有总务部、第一部（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部（细菌研究）、供给部和训练部。其人员配备只有200名左右，始终没有达到关东军作战命令的要求。支队长尾上正男少佐。

这里有中国劳工30名，他们受到日本统治者的严格管制和残酷的虐待。

繁殖致命细菌的传染媒介物——跳蚤，是这个支队的首要任务。于是，他们投放大量的人力去专门研究和繁殖它。由第一部部长中村兼管的专门培殖跳蚤的分部，设置了专用的地下跳蚤培养室。由于没有现代设备，采取了用空汽油桶代作跳蚤培育器的办法，经过多次试验获得成功。1945年5月，石井四郎向各支队下达了大批繁殖跳蚤的任务。于是，六四三支队于同年6月派两名专业人员到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去接受培训，接着又派3人参加七三一部队本部举办的培训班。然后，立即投入了大批繁殖跳蚤的准备活动。为加速跳蚤繁殖的进度，7月，又由一名准尉带领6人专程到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取回相当数量的“母本”跳蚤。由于培育器不足，经军事团批准，从牡丹江市内的军事仓库领回200个空汽油桶。在此期间培养出的跳蚤，都按规定数目上交了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从7月末到8月9日，又由铃木带队先后两次专程把25公斤的跳蚤送到了哈尔滨。

六四三支队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饲养各类动物。这里的动物有：马4匹、羊3只、兔和江豚各30左右只、鸡50只、猪8头、鼠1000余只。饲养这些动物都是为了抽血。他们配置了动物室，有岛崎、小林甲及士兵井上等10多名日本人在内工作。由该支队供给

部部长榊尾兼动物室的主任。在这里有两名中国劳工：一个叫李宝昌，另一个姓裴。开始，动物较少时，由他们去喂养。后来，由于动物增多，鼠类由日本人岛崎和小林甲雇员以及士兵井上专门饲养，他们只负责喂养其它动物。

1943年，北野政次部队长命令这个支队注重对白鼠和黄鼠的繁殖。为此，他们组织了两个饲养鼠类专业队，每个专业队配置5人，分别培殖白鼠和黄鼠，并派人到七三一部队本部取回白鼠和黄鼠各500只，作为“母本”，加速繁殖。

尽管大力繁殖白鼠和黄鼠，但还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6、7月间，全支队的人员几乎倾巢出动，甚至榊尾部长也亲自出马，到附近农村或田野里去捕鼠。捕来的大量黄鼠，除了部分留在支队使用之外，绝大部分送往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发货单上写着“滨江站”或“平房站”，发往滨江站的黄鼠是供应七三一部队第三部的；发往平房站的黄鼠是供应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尾上正男在法庭上供称：“六四三支队共捕鼠七千只，每月送往七三一部队去的黄鼠有100只到150只，家鼠有150只到200只，灰鼠有200只。”

六四三支队还根据七三一部队本部的指示，培殖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和结核菌，配备了专业人员和6台蒸煮营养液的锅炉（这种锅炉直径1.5米，高2.5米）以及其它所必需的设备，但因技术没过关，只收到微小的成效，整个计划没有实现。

六四三支队设有储存菌苗和疫苗、血清的地下库，还有地下饲料库。

六四三支队还通过所属的教育部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在实验室隔壁的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常有穿白工作服的日本军医给他们

队员讲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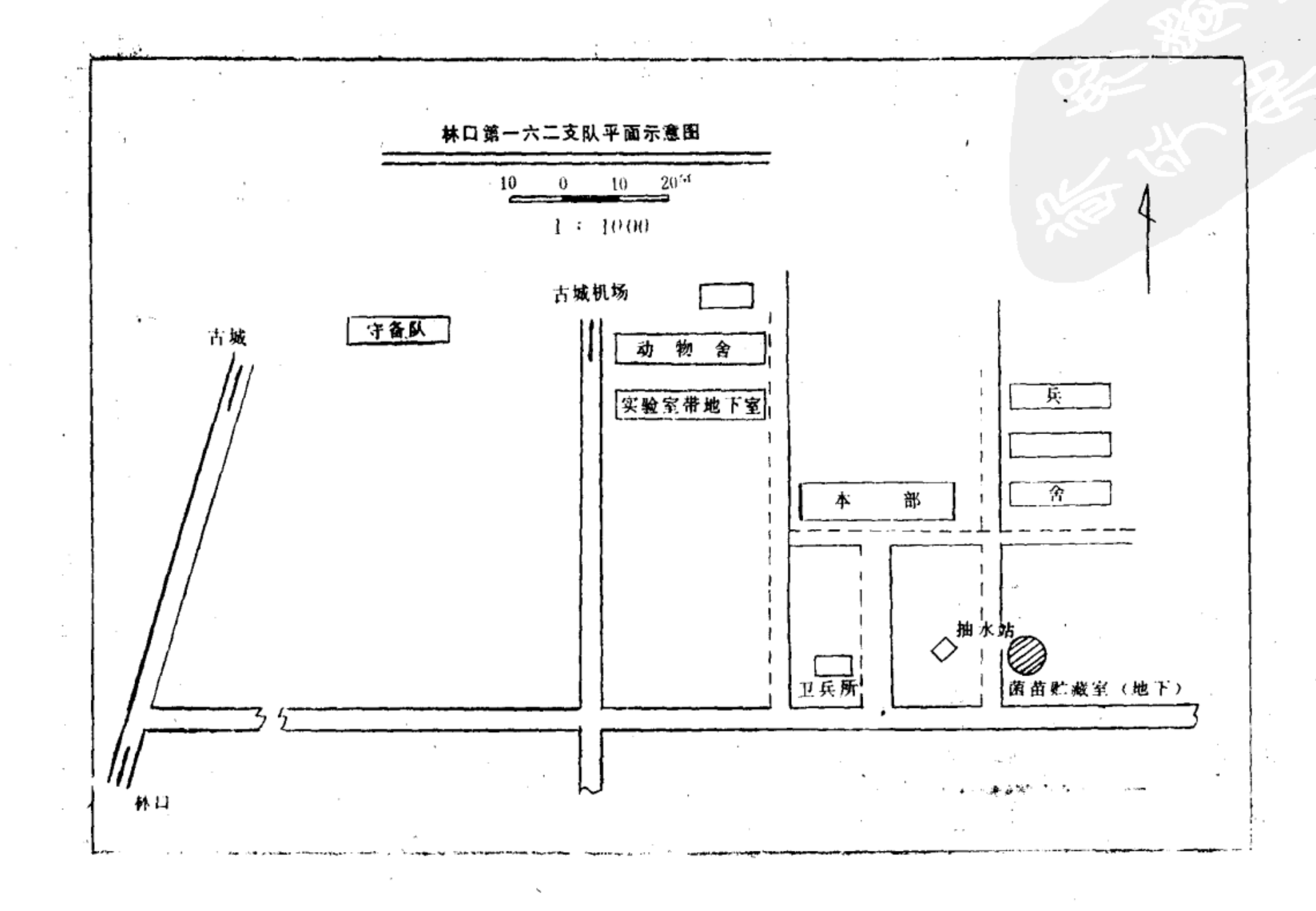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9日晚，七三一部队昆虫动物研究班班长田中少佐给尾上正男支队长打电话，要求把跳蚤发送到总部去，其余物资全部毁掉。8月13日，该支队焚烧营舍，把尚未运走的跳蚤及北野政次于年初拨给的三车皮（每车25吨）蛋白消化素、液汁、肉精及煮盐等物资一并烧毁。

此外，还有一支二六二四部队，它和六四三支队同驻在一个大院内，只是一道之隔。这个部队主要房舍有三处：一处是四壁镶有瓷砖的地下建筑物；一处是内装汽车的“匚”型房舍；一处是机械加工车间。它是一支与六四三支队有着密切联系的特种部队。它也在日军败退之前，把所有建筑物和设备毁之一炬。

五、林口支队

林口是牡佳线和林密铁路的交通枢纽，是东北地区东部的边防要塞。番号为一六二的七三一部队林口支队，就设在林口镇与古城镇（现叫新城）之间的东岗梁上。在一六二支队北部是日军设置的专用飞机场，西北部300米处是保卫一六二支队的拥有100余名日军的警备队。

一六二支队占地大约1平方公里，四周用铁刺线圈围，南正门设有卫兵所。从正门进去，绕过圆型花包，北行不远便是支队的本部办公室；西北处筑有长200米、宽8米的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它兼有地下室，并配置供消毒用的特种锅炉，实验室的北侧是动物室；在本部的东南处筑有半卧式圆顶水泥建筑物，是菌苗地下仓库；在四周各处还建有宿舍、临时仓库等，由于山顶上无水源，在西北坡下乌斯浑河畔设有抽水泵房，抽取这里的河水供


林口第一六二支队平面示意图
10 0 10 20
1：1000
古城
守备队
古城机场
动物舍
实验室带地下室
兵
舍
本部
抽水站
卫兵所
菌苗贮藏室（地下）
林口

实验和人、畜食用。支队长榊原秀夫少佐住在林口北山日军官邸，经常乘坐专用小汽车来往于支队与林口北山之间。

该支队的人员共226名，其中有3名军医、1名司药官、1名军需官和5名将佐级军官以及60名军佐。下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细菌传染的研究和动物培养），第二课（防疫给水研究），资材课（器材保管；备有甲式滤水器2台、汽车40辆、显微镜20台、大型高压灭菌槽2个，外有其它物品甚多）。

该支队准备进行细菌战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培殖跳蚤和各类动物。在动物室东面的一个大房间饲养着从日本运来的白鼠2000余只，由日本人亲自饲养；西面的一个房间装有本地的各种鼠类，由1名日本兵领着4名中国劳工进行饲养。在其余各房间内，饲养着兔子四五十只，“江猪”，也称荷兰猪，江猪七八十只，还有12条狗。

每隔一个星期，榊原秀夫带领日本研究人员到动物舍给动物抽血，有时在地下室内宰杀当地鼠取血。

由于培殖鼠类供不应求，这个支队还不止一次地组织队员到附近各地捕捉黄鼠。据曾在一六二支队服役的上野证实：“在林口支队，捕鼠工作比培养细菌还重要。我在第二课防疫室工作阶段，曾参加两三个月的捕鼠工作。外出捕鼠时，不准提部队的名称，穿着便服让人看不出是哪个部队的。从1944年末开始，仅用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在千振、佳木斯一带活捉5万只老鼠”。①

该支队也很重视跳蚤培养工作。据榊尾供称，为加速培养跳蚤，1945年6月，根据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命令，派细矢少

①长春市公安局存敌伪档案。

佐到本部领来1公斤母本跳蚤，由有经验的细矢少佐及4名军佐负责进行培养。

一六二支队的罪恶活动还有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据在该支队第一部细菌实验室担任见习实验员久留岛佑司供称："我在宫丰军曹和细尾军医少佐的领导下，把结核菌、伤寒菌、副伤寒菌放到营养液上去，准备实验仪器，调剂孵育器的温度。"这显然是在试制细菌。

一六二支队败退前，就把文件资料、贵重仪器投进锅炉里烧掉了。8月11日，他们又慌忙地把部队的房舍全部点火烧光。据榊原秀夫被俘后说：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后，支队受命配属于驻延吉的第三军。11日苏军进驻八面通。本部装载物资向牡丹江进发，因道路已坏，在桦林被苏军队袭击，部队人员多数战死阵亡。①

六、大连卫生研究所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始建于1925年8月。它是日本侵略者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细菌研究机关。它在大连市下葭街20号，占地114700多平方米。1926年1月，整个工程尚未结束时，它就开展了对细菌、血清和疫苗的研制。一年以后，又对病理、化学进行研究，同时把日本中央实验所担负的药品、饮用水、食物和其它卫生实验业务接收过来。从此，满铁卫生研究所成为细菌研究、实验和生产的部门了。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卫生研究所急速发展，曾两次增加人员。1934年，又盖了注射室、采血室、第二马舍，还扩建了小动物舍。1935年，扩建了

①中央档案馆敌伪档案。

预防液制造室和新建了血清贮藏库。1936年，又扩建了鼠疫研究室及新建了鼠疫预防液制造室。

所长安东洪次医学博士。所内设置了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和总务7个科。拥有医师、兽医、药剂师、农学士、职员、雇佣员124名（包括32名中国人）。细菌科主要从事对细菌预防、治疗的研究和疫苗的制造；病理科主要对滤过性病毒、伤寒的预防、治疗的研究和疫苗的生产；化学科对化学品毒的预防的研究和制造；卫生科是关于水、食物消毒剂的研究和制造；血清科是关于毒素的预防研究和血清类的研究及制造；疫苗科是疫苗和狂犬病预防液的研究和生产；总务科负责全所的行政、后勤和物资供应。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而加紧扩大细菌战的准备活动。1938年，七三一部队本部移驻平房后，大规模的细菌研究、细菌生产和细菌实验即将开始，急需防疫及其研究也同步进行。因此，日本关东军产生了接收满铁卫生研究所的想法。它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在不妨碍军用的前提下供应民用为条件，接收了满铁卫生研究所，并交给了石井部队，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同时对其业务作了调整，确定了以制造为主、研究为辅的方针。每当该所血清原料供不应求时，七三一部队本部负责补充；当七三一部队本部及各支队需要血清、疫苗时，该所保证满足供应。血清和疫苗对七三一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七三一部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检验细菌或病毒的效能，又能够防止队员被细菌或病毒传染而丧命。由此可见，七三一部队和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密切关系及其所进行的卫生防疫研究的真正目的了。

魔窟里的奴隶——中国劳工

一、招骗和强征劳工

石井部队的建筑工程刚一开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劳工，用闷罐车运到平房站。他们都是日伪当局通过“把头”从哈尔滨、阿城、海伦、佳木斯、牡丹江和锦州、大石桥、海城等东北各地骗招来的。

据如今尚健在的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退休工人赵殿启回忆：

1936年初春，从河北省献县逃荒来的他和两个同乡在锦州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活干，只好沿街乞讨。一天，他们看到在一张广告前围着一些人，有个穿长袍的中年人在作招徕宣传，把劳工的待遇说得天花乱坠：“哈尔滨要建工厂，招收大批建筑力工。那里吃大米、白面，活计轻，挣大钱。干得好将来可留作工人，可以安家。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晚了连名都报不上……”赵殿启等3人无路可走，便报了名。接着，又有100多人报了名。然后，“把头”把他们带到锦州车站，上了一列闷罐车，每人发给了3个高粱米面、苞米面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车厢上了锁。火车开了一天两夜，在一个小站停下了。下车后，又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一个用铁丝网圈着的大院。它四角各架着一盏探照灯，明亮的光柱直射在中间位置的一片劳工棚上；门口有日本兵持枪把守，给人一种恐怖感。劳工们“享福、

挣大钱”的愿望就象气泡一样破灭了，等待他们的是奴隶般的生活。

天亮时，“把头”吹口哨，把劳工们集合到门前。一个日本军官训话，李初亭（大连人）给翻译。他要求大家好好的为“皇军”效劳，还严厉地说：如果偷懒，不给工钱，并要强行送去下煤洞；逃跑者，抓回来就枪毙。日本军官训完话，劳工们吃点饭，就被日本兵押送到建筑工地。他和两个同乡被分到靠道边的一幢地号上作为工，搬石头、倒砖、筛砂子。一天三顿饭都是窝窝头和白菜土豆汤，而且还定量，根本吃不饱。每天干活从天亮到天黑，由日本人监工，干不动就挨打或者罚跪。

按规定每天开8角工钱，可是，除去“把头”抽去20%和扣除伙食费，一天仅剩3角钱。就是剩余的这一点工钱也不能拿到手，而是放在柜上存着。这样，换季、看病都没有钱，只好光着膀子干活。当他回忆怎样离开七三一部队这个魔窟时，赵殿启激愤地说：“当时我们中国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亲眼看到有的劳工当场被打死，预感到我们将来的命运也是这样，于是产生离开这里的念头。可是日本人看管的很严，无法逃脱。后来实在忍耐不住了，于是在秋天的一天深夜，按事先和两个同乡的约会，假借上厕所的机会，钻出北面的铁丝网。敌人发现了，子弹嗖嗖地飞来，怕敌人追捕，我们钻进尚未割倒的苞米地，往北走不远就拐向西边的正红旗五屯。这是逃出管制区的最近的路线，我们放心地踏入双城县境。”

曾在七三一部队做了6年苦工的裴富也回忆了那段辛酸的经历：

他原住北京东四胡同，因生活所迫，不远千里来到“北大

荒"，听说巴（巴彦）木（木兰）通（通河）要招用修铁路的筑路工人，就去巴彦报了名。在兴隆镇，不仅吃的是橡子面，而且干活累，还不挣钱。于是，他又流落在哈尔滨街头。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大"把头"王省三招工，他后来才知道是给石井部队干活。当时石井部队刚建成，他在第一仓库当装卸工。干活由日本兵看着，一点自由都没有。因为老五屯的劳工棚四周都设有日本岗哨，逃跑也没有机会。服苦役一直到日本鬼子垮台。

从1936年到1939年是石井部队的建设时期，盖宿舍，建厂房，修飞机场，急需劳动力，被骗招来的劳工一批又一批，增至1000多人。北洼地的劳工棚住不下，就在正黄旗五屯南门外和黄家窝堡屯搭起了数十栋劳工棚。随着修筑围墙、挖掘和运输的土方量的增加，劳工不够用时，就通过当地的"把头"，在平房附近村屯廉价雇用临时劳工和马车。

在日伪统治下，由于平房地区的中国老百姓生活极度贫穷，因此，尽管石井部队雇用劳工每天只给8角钱，每台马车给四五元钱；当地村屯的头面人物充当"把头"抽取10%工钱，在平房地区的40多个村屯，每天还出动500多名劳工和100余台马车。

当石井部队主要建筑工程基本竣工并投入使用后，外地劳工大量走死逃亡；特别是七三一部队准备细菌战而加强细菌武器的生产，使附属性劳动量增大，这样，只靠雇用本地的劳工，不仅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还要大量增加经费。于是，石井部队决定，通过日伪当局在东北各地强征劳工，使用无代价的劳工。它提出需用劳工计划，由伪满洲国劳动部给各省下达指标，各省按计划强征并负责押送。日伪当局为了管理和运输的方便，把哈尔

滨、阿城、双城以及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作为征集的重点，特别规定：这些地方主要承担为七三一部队提供劳工的义务。在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强征劳工，是由哈尔滨市公署动员科下达指标，平房区事务所催促落实。

七三一部队根据劳务班、石井班、动力班、工务班、八木班、建设班、仓库班、运输班的工作量预计需要800至1000名劳工。因此，平房区事务所对平房特区作出了特殊规定：

1.正黄旗四屯、正黄旗三屯、正黄旗二屯等较大的村屯，必须各出劳工80名、马车10台；新发屯、新王屯、瓦盆窑以及特区之外的大乔家屯，必须各出劳工40名、马车5台。除特殊情况外，必须常年保持这个数量。

2.凡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性劳动力都必须承担这个专项劳役的义务。即使“国兵漏”在勤劳奉仕之前或期满后也不例外。如果实在有困难，经过批准可由男性少年代替。

3.平房特区内的每一个男性劳动力，每年必须服劳役4个月；特区之外征集的劳工服役期限，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定为6个月、1年，甚至几年。

强征劳工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正黄旗二屯的孙如学原住山东省巨野县，因连年灾荒，生活不下去了，闯关东落户在正黄旗二屯。在这里生活照样艰难。父亲常年给地主扛活，他12岁时就给地主放猪。1942年，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死，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刚满18岁的哥哥肩上。就在这危难之机，哥哥摊上出劳工。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只好由刚到15岁的孙如学替哥哥进七三一部队当劳工。

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平房区平新乡退休干部赵官型家住正

黄旗二屯，当时两个叔叔都病魔缠身，只靠他父亲支撑着10多口人的家。按照伪满当局的规定，必须出一个常年劳工。如果父亲去当劳工，全家就难以生活了。正在高小念书的赵官型休学，替父亲去当劳工，但劳务班长工藤嫌他人小力单，说啥也不要。为此，他父亲还借债买了两包果子求本屯的劳工中队长朱有礼说情，才把赵官型收留了。

当时，逼得中国老百姓走投无路的事太多了。正黄旗三屯有两个年近花甲的老头：一个姓董，另一个叫梅永才，他们都是老俩口相依为命。1944年，区事务所让他们出劳工，他们说干不动不能去。区事务所的人就把两人痛打一顿。老梅头无依无靠，只好去七三一部队服了4个月劳役。干活时，他体力不行，日本人说他偷懒，险些把他打死。①

据调查，当时平房地区约有男劳动力1500多名，差不多都当过劳工，常年在七三一部队做苦工的不下五六百人。

七三一部队所需劳工，不仅仅向平房以及附近各县征要，而且还向外省城乡强征。

1944年夏，七三一部队为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急需1000名劳工，其指标通过日伪当局下达给锦州和海城。锦州、海城当局感到再征劳工有困难，准备用年初从锦州、海城送到兴安北省与乌奴尔去挖山洞的1800多名劳工顶替。于是，通知七三一部队直接派人去领取。七三一部队立即派劳务班长工藤带领4名宪兵，看守兵和劳工大队长王庆久、翻译李初享等去押解。这些劳工，由于高寒气候，生活低下，繁重劳动的折磨，很多人冻死，病死和累死，还剩下800多人。

①访问侯安钦记录。

这批服役期满盼望回乡与家人团聚的劳工，被七三一部队的押解队用绳子每10人拴在一起，一伙一伙的押上一列有十几节车厢的“闷罐车”。途中，不少人病死，工藤下令将尸体扔出车外。到平房站后，日本鬼子怕死去的劳工有传染病，就把装劳工的“闷罐车”在车站封闭3天，消毒后才被挂走。劳工也被迫扒下衣服交出被褥，送去消毒。800多名的劳工光着身子，排着长队走向劳工棚。这些劳工们住在潮湿的劳工棚里，加上路途上的折磨，没过几天就死了四五十人。①

二、正黄旗五屯——劳工集中营

1938年，石井部队的主要工程已基本竣工。为保守秘密，石井部队决定把营区附近的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刘家窝堡和黄家窝堡等4个村屯的百姓强行迁走。留下正黄旗五屯作为“劳工村”。石井部队驱使一些劳工在屯子四周架设铁丝网，在门口修筑哨所。把原村长于春元住的四合院的五间草房当作劳务班办公室，旁边改设劳工食堂和一个拘留所。在劳务班斜对过，给班长工藤和翻译李初亭各改建一套住宅院。除把老百姓腾出的房子改作“劳工屋”外，还在屯的西南角搭设了20多栋“劳工棚”。从此，正黄旗五屯变成了七三一部队的劳工集中营。从外地新征来的劳工直接往这里集中。原来分散住在北洼地、正黄旗头屯、黄家窝堡等地的劳工也都陆续地搬进了“劳工村”。

起初，本地的劳工也集中食宿，后来由于外地劳工不断增加，劳工棚容纳不下，经石井部队长批准，才允许本地的劳工通勤。

①访问白武斌、张朝清记录。

三、劳工的苦难

劳工一进入七三一部队，就象进入牢笼，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劳工们每天总是担心：这一天能否平平安安地度过。有人形象地说，劳工一天要过“五关”。

第一是朝礼关。每天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起床哨就“嘟嘟”地响个不停。劳工们得赶紧从大铺上爬起来，到劳工棚外站队；回家食宿的本地劳工也得按时赶到，迟到的也要遭到体罚。各小队点名之后，劳工都得以立正姿式站着，并脱帽。在日本监工带领下，劳工们面向日本鞠躬，以示效忠天皇。接着，要用日语背诵“国民训”，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毒打。

1942年春，一天上朝礼，劳工李咏由于年过半百，动作迟缓，站在那里腰挺不起来，腿也立不直。日本监工真田走过去，一边骂着“巴嘎”，一边在后边冷不防地朝李咏的双腿踢下去，李咏倒在地上。真田仍觉得不解恨，又打了李咏一顿嘴巴子，连毡帽都被打飞了。真田还从屋里拽出一把炉勾子往他头上刨，刨得脑袋鲜血直流。那仗势欺人的狼狗也扑到了李咏的身上。李咏由于伤势过重，抬回劳工棚后不几天就含恨死去。

第二是门岗关。所有的劳工都觉得进营区比过“鬼门关”还难。七三一部队营区共有5个大门，都由岗哨昼夜把守。南门只许日本人通过，西门平时锁着，有特殊情况才临时打开；规定中国人只许从北门和两个东门出入。

初期，劳工都是集中上工。路过门岗时，首先要一个一个地递上部队颁发的“劳工卡片”，卫兵所的日本人用打号机打上进入营区的时间。接着，搜身检查，看你藏没藏带火柴等易燃品，才

准许进去。收工路过门岗，也要先接受搜身检查，然后在“劳工卡片”上打上出营区的时间，这样才允许离开营区。后来，日本人感到这套手续，不仅繁琐，而且防止不了有破坏目的的人混入。于是改为验查“劳工证明书”的制度。劳工一进营区，劳务班就发给一个“劳工证明书”，那上面贴有照片，压上钢印，注明劳工的职务和劳动地点。出入营区要反复查验证明书和对照像片，防止有人冒名顶替。搜身检查比过去严格了，有时迫使劳工脱光衣服进行检查，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不准违反这个规定。

家住正黄旗二屯的劳工刘利虎，冬天在冷屋子里干活，不准带火柴，也不能生火，自带的午饭只好凉着吃。有一次，他偷着带了一盒火柴被门岗查出，日本人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几天不能上工。

有个姓王的外地劳工，家境贫困，冬天穿着破旧单衣，单裤和破胶鞋干活，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拣了条空水泥袋子套在裤腿上和包在胶鞋上。可是，日本人便以偷军用品的罪名，把他痛打一顿。最后硬是把他送进劳务班拘留所，关了7天禁闭。

当时部队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中国劳工路过门岗，必得脱帽给日本人施礼。张作礼刚来时，有人告诉过他这个“礼节”。可是，他没注意听。在第一天上工时，他向门岗施了个举手礼，当把劳工证明书往上一递时，一下子被真田打落在地。“巴格呀路，什么的干活”？真田一边骂，一边抡起枪把子朝他打去。“太君，我是苦力的干活。”真田严厉地说：“行礼的，再一遍地干活。”张作礼恍然大悟，就向真田鞠了一躬，才被放行。天长日久，在劳工中就流传着一套顺口溜：

卫兵所是鬼门关，

阎王真田把岗站；
搜身检查还验证，
挨打受骂家常饭；
人间地狱鬼子设，
过关还比上天难。

第三是监视关。七三一部队把营区分为内营和外营。内营包括本部大楼、四方楼及特设监狱、航空班（包括飞机库、飞机场）、兵器班、石井班、吉村班、山口班、田中班、二木班、运输班、工务班、气象班、无线电班、第一仓库、第二仓库、动力班等部队的指挥机关、细菌武器研制部门和生产后勤部门。外营包括八木班、医院、建设班、大礼堂、劳务班、教育部队（包括少年队）、东乡宿舍、东乡神社、东乡学校、酒保、“吉力屋”等一般性生产和教育、医疗、生活等管理部门和单位。

内营戒备更加森严，四周架设一圈足有5公里长的铁丝网，四面分别设置了5个卫兵所，同时还设了若干个流动哨。而本部大楼、四方楼及特设监狱部分，又单修筑一圈高深的土墙，墙顶还架设着高压电网。土墙外的各交通路口设有哨所，防止中国人靠近。

中国劳工只能在禁区的外围限定的地点活动，别的地方不准去。为防止劳工们逃跑或给中共地下组织当密探，实行了“十人联保”制，一人出事拿其他九人问罪。劳动的时候，都由日本人跟班监视。此外，还在四方楼、航空班楼、动力班锅炉房、给水塔等制高点上密设瞭望哨；在一些要害部门的周围安设流动哨；在医务所、饭店等处派密探。劳工稍微有点不规的行为，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发现。

第四是衙门关。为管制中国劳工，七三一部队在劳务班大院里专设一个“巴篱子”，里边备有老虎凳、杠子、橡皮鞭子等刑具。不少劳工经常被抓来“过堂”，因此劳工们称这里是“刑衙”。据幸存的劳工白武斌的回忆，“刑衙”里有“匣床”，“匣床”是一种刑具。它是案台式的，离地面有0.5米多。床面有2米长，1米宽，两侧各有2个皮带式的扣环，那是卡人的胳膊、腿用的；一头有个30公分的方型的木匣，分上下两扇，一侧镶着折页，一侧安有两个铁扣卡，把人脑袋放进去就可卡住。可是，用它给人上什么刑，谁也不知道。有一天，日本人让他和师兄佟玉臣去“衙门”修门窗。他二人刚被带进屋，就听对面的一间屋子里传出人的惨叫声。他们知道是日本人正给中国人上刑，但从来没见过。他们好奇地透过半开的门缝往里一看：一个人被绑在匣床上，日本人手拎水壶正对方匣的缺口往里灌凉水，灌一阵审问一阵。当灌水的时候，那人难以忍受，便不时地发出声声惨叫。当天下班路上，佟玉臣告诉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匣床，它是日本人逼他作的，当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他还说：如果知道是给我们中国人上刑用，说啥也不能干啊！从那以后，佟玉臣就有了离开七三一部队的念头。不久，他就失踪了。

佟玉臣至今还健在，住在南岗区平准街1号。他早已退休。对当年被迫制作匣床的事，仍觉得痛悔不已！

方振生也是受害的幸存者之一。他住在正黄旗四屯。在七三一部队当了一年半的劳工。日本投降那年的7月下旬，他突然得了伤寒病。日本人不给治，还怕传染别人，于是给了他7天假回家休息。可是过了两周也没好。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七三一部队加紧进行细菌

武器的生产，催他去上工。他因病没好而没去，日本人就以“泡蘑菇”为由把他抓进了“巴篱子”。“巴篱子”押有十几个人，在里边吃在里边尿，满屋子臭气熏天。有一天，食堂伙夫穆芳有来送饭时，向他们透露说日本人要垮台了，七三一部队把楼房都烧了，可能还要烧拘留所，并用斧子把窗户砸开，帮助他们逃出去了。

第五是生活关。在七三一部队铁蹄下，中国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国劳工一年四季栖息在数十栋席棚子里。劳工棚搭设在一条臭水沟上，下边不断地流淌着细菌生产所排放的污水，冬天冰冷刺骨，夏天臭气熏天，难受已极。

外地劳工的伙食非常差。每天发给3个用橡子面、高粱米面和苞米面混合制成的窝窝头，还有用盐水清煮的冻土豆、或者是咸菜，如果能吃上白菜汤、酸黄瓜就算是最好的菜肴了。劳工们吃不饱，饿得难以忍受，就到垃圾堆拣食物充饥。

日本人不顾中国劳工的死活，死一个中国劳工不如死一只小鸡。1939年7月，新五屯有个外号叫“王大个子”的劳工，由于他身强力壮被分配到动力班烧锅炉。因上顿接下顿地吃“三合一”的窝窝头，得了肠梗阻，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日本人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在旁边看笑话，致使这个劳工忍痛死去。劳工们夏天衣不遮体，冬天有不少人穿不上棉衣、棉鞋、甚至拣条水泥袋子裹在夹衣外边或套在夹鞋上防寒。

当时，没饭吃而饿死的，患病不给治而病死的，冬天由于衣不遮体而冻死的，不计其数。据调查，七三一部队在盘踞平房的9年间，强征劳工5000余人。除2000名本地劳工幸存外，其余3000名外地劳工基本上都死在平房。其尸体都埋在正黄旗五屯北

门外的一片荒野上。天长日久，这里变成了数千名死难劳工的墓地，因此人们称这里为"劳工坟"。它的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劳工们死后，身上的破衣服被日本人扒下来留给活着的劳工用，赤裸裸地被拖进坟坑里埋上。由于劳工死的越来越多，墓地被占满，无处挖掘坟坑，就几十具尸体埋在一个坑内。

逢年过节时，日本鬼子也假惺惺地拿着果品来到"劳工坟"进行祭奠。这绝不是他们对中国死难劳工的"同情"，而是因他们作恶多端，胆颤心惊，甚至总觉得在"东乡宿舍"夜里经常出现奇怪的响声，"闹鬼"的事情经常在"四方楼"里发生。特别是有的劳工临死前大骂日本强盗，并说到"阴曹地府"也要报这个仇，迷信鬼神的日本人唯恐死去的劳工的"阴魂"会报应，于是演出这样的丑剧，甚至有时还请来道士念经镇邪。可是，日本鬼子擦掉眼泪之后，又凶相毕露，照常抡起皮鞭，哄起狼狗，置劳工于死地。

四、充当"实验材料"的劳工

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阿城等地劳工棚的30多名劳工，在日本兵的武装押送下，进入了七三一部队营区的北大门。手握皮鞭并牵着狼狗的劳务班班长工藤给他们分配任务。除一个姓李的和其他四五名会干木工活的劳工留下安装门窗外，其余20多名劳工被带走了。他们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知道；晚上收工以后，也没见他们回劳工棚。第二天，一群日本兵闯进了劳工棚，把那20多名劳工的行李和衣物都装上汽车带走了。

1939年春，"劳工失踪"的事又一次发生了。一天凌晨，劳务班代班主任关冈来到食堂对伙夫付景岐说："从今天起，每天

早、中、晚都要把300人的饭菜用桶装好，我们提前派人来取。饭菜刚装上桶，一辆马车就停在食堂的门口。赶车的老板是正黄旗四屯的劳工张有才。关冈监督把饭菜装上车。张有才赶着马车把饭送到四方楼东北的一个脚门旁，四五个日本兵抬走了张老板送去的饭菜桶。一个多小时后，张有才把日本人送回的空饭桶，又送回劳务班食堂。一个多月以后，关冈又通知劳务班食堂，每顿饭菜少做两桶。付景岐估计，这两桶饭菜足够七八十人吃的。他还看到锦州、大石桥劳工棚没有一个劳工回来。由此断定这七八十名劳工又失踪了。又有一次张有才送饭回来对付景岐说："又有一批劳工让小鬼子给害死了。"接着，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中午，张有才按时把饭菜送到四方楼，日本兵把饭菜接走以后，突然传来细弱的喊声。他透过铁丝网，一眼瞅见远处的露天厕所的墙头上探出个人头来。看样子，是一个劳工。那劳工说："老乡，请帮个忙。我叫王××，是从锦州被抓来的劳工，现在给鬼子修地下工程。昨天晚上，鬼子把我们一起干活的一百多人带走了，至今没见他们回来。实际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活可干了，鬼子不放我们出去，肯定都要把我们害死，看样子过不了今天。如果有那天的话，请你务必给我老母亲捎个口信。我家住在山东省……"这时，几个日本兵抬着空饭桶朝门口走来，话被打断了。

第二天，关冈来到食堂通知说："那份饭菜不要做了，也不必送了，那批劳工在昨天晚上都被放回家了。"同样，一群日本兵又闯进劳工棚，把这些劳工的衣物装上汽车拉走了。

日本战败后，曾在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的一名队员供认，我们怕这批修筑四方楼地下工程的劳工暴露秘密，把他们送进"特别

监狱”里，充当了第一批“实验材料”。

劳工刘广才亲身经历过七三一部队把中国劳工当作“实验材料”杀害的事。他是辽南人，1941年3月28日早晨，在锦州街头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围住，扭送到火车站，关进闷罐车厢里。火车走了三天到了哈尔滨的平房站。日本兵把他们赶进石井部队营区的西北一个警戒森严的圈子里不久，日本人用汽车拉走了30多人，一去不回。隔了10多天，又拉走30人，也是音信全无。6月9日晚，刘广才逃回了席棚。他说：鬼子把劳工送进一处地下室，听他们在里边直骂，不让往身上打药针，也不让抽血。说着说着就没声了。我看情况不妙，趁敌人不防之机逃了出来。拉走的人都被鬼子害死了，咱们快逃吧。

正说着，一个日本兵冲了进来抓逃犯。劳工们一想，早晚也是死，干脆和他拼了，于是，一拥而上把他勒死了。然后，劳工们躲过了岗哨，冲出了铁丝网。

五、在中国劳工身上喂养虱子

1940年的一天，几个日本人来到劳工棚领走10个年过半百的老年劳工，让他们背着行李，来到一座刚腾出来的空房子里。这时，日本人向他们交待：“你们每天要交上一百个虱子，必须是大个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这简直是世界上没有的怪事。日本人还宣布了四条规定：严禁与其他人接触，不准私下议论，不许脱衣服睡觉，每天必须完成任务。一周以后，差不多天天有几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来，让他们翻弄脱下来的“开花”棉袄、棉裤捉拿着有“火柴头”那么大的虱子，放进日本人准备好的小铝盒内。小个的虱子不要，但也不准掐死，要放回“开花”

棉衣里继续放养。这样，日本人每天都能带着数以千计的虱子回到田中班。

这10位老劳工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粮菜有人送来，他们自己挑水、作饭；日本人还定期地给他们打预防针，但长年不给他们理发，在酷夏季节棉衣也不得脱身。后来，这10位老人都陆续地死了，日本人将他们的尸体偷偷地埋在正黄旗五屯北门外的“劳工坟”里。

六、劳务班和劳工大队

七三一部队为加强对劳工的管制，建立了两套管理机构：一是由日本人组成的劳务班，一是由中国人组成的劳工大队。

劳务班是七三一部队负责对中国劳工的调配和管理的组织，隶属于总务部。其中工作的都是退伍的日本军人。初期由关冈代理班长，后来派工藤与四郎大尉担任。工藤是在日军中退役后，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嘱托的身份来到七三一部队。他穿着文官西服，结札着领带，戴有横式软质肩章，左前襟上方佩带着嵌镶五个紫色五星的胸章。他虽然没有军衔，是个判任官，却享受着高等官的待遇。不仅同级文官对他高看一眼，而且佐官也很尊重他。

工藤来后，关冈变成了他的助手，担任代班主任。真田、武木田负责劳工调配，青木管理财务，西尾管理劳工证件，菊池负责对日本士兵的管理，加藤、安寿、秋花、中代、方本、高桥、竹田、秋叶、佐藤、申马、千山、山室、德永等雇员分别担当各作业班的监工，监视中国劳工。

这些日本人虽然被编入七三一部队的劳务班，但实属部队宪

兵室的特工人员，归宪兵系统调遣。起初，劳务班设在62栋楼里，后来迁至正黄旗五屯。

劳工大队是在劳务班控制下的中国劳工的劳动组织。

初期，近千名中国劳工被编成9个班，正黄旗二屯的劳工被编入第一班，正黄旗三屯的劳工被编入第二班，新五屯一带的劳工被编入第三班，第四班和第七班都是正黄旗四屯的劳工，新五屯的劳工编为第五班，锦州一带的劳工被编入第六班，大乔家的劳工被编入第八班，正红旗屯一带的劳工被编入第九班。班长都由平房本地人担任，他们只有组织劳动的责任，没有任何实权。劳工的调配权直接掌握在劳务班的日本人手里。

1941年，由于从平房和外地强征大批劳工，劳工增至2000多名。这时，劳工组织体制作了改变，成立了劳务大队、中队、小队这三级劳工组织，分别配备了队长和队附。大连人王庆久担任大队长。劳务大队的设立是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华治华”的恶毒办法加强对中国劳工的管制。

劳务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其人员编队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正黄旗二屯的劳工较多，都划归为第一中队。第二中队除保留正黄旗三屯的劳工外，又增加了正黄旗四屯、大乔家的人。第三中队都是新五屯、新发屯、瓦盆窑一带的劳工。到1945年7月，劳工增至3000多名。劳工组织在原有的三个中队的基础上，增设了第四、第五中队。此外，把原有的锦州一带的劳工以及在这年上半年从赤峰、黑山、阿城等地抓来的劳工，单独地编成了劳工队。

当把劳工分派到部队的各个作业班的时候，又成立了一套组织，叫作分队。它虽然对外也称以日本人命名的班名，但他们并非该班的成员，只是该班的苦力。这样做，劳工的大、中、小队

组织并不打乱。分队的劳工只不过是受劳务班和各作业班的双重领导罢了，其工作受各作业班支配，而劳动调配权却归劳务班。

七三一部队对锦州、海城、大石桥、赤峰、黑山、海伦、佳木斯、牡丹江和阿城等外地的劳工，管制要比平房本地的劳工严得多，对他们实行单独编队、单独食宿、单独地安排特殊的劳动。劳务班还给他们下条禁令：不准与本地的劳工接触，不准擅自离开劳动岗位，不准谈论部队的工作内容和所见所闻。他们上下班都由日本兵武装押送，住宿和工作地也分设岗哨看守。他们劳动没有期限，象被判处无期徒刑一样，充当着日本人的奴隶。

七、协防班

早在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修建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范和控制，哈尔滨宪兵队在七三一部队设立了宪兵室。宪兵室在中国劳工头目当中物色并秘密发展一批“特工”联络员。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建成以后，宪兵室的“特工”联络员队伍也扩大了。1942年4月，宪兵室在原发展的“特工”联络员的基础上，组织了“协和防谍班”（简称协防班）。

协防班成立大会是在“汉芳饭馆”里秘密召开的。事先，日本翻译春日只是通知劳务中队长以上职务的劳工头目开会。当人员到齐后，当场宣称他们都是“协防班”的班员，由中国翻译李初亭任班长，并颁发了委任状。翻译李初亭、劳务班长工藤与四郎和宪兵室特工关冈分别大放厥词，要求每个班员都注意发现间谍以及反满抗日的政治嫌疑分子，还要注意中国劳工的思想动向。同时诱惑地说，一经发现情况要立即报告给宪兵室，抓到一

个"特嫌"或"密探"就赏100元钱。

后来"协防班"的组织扩大了，连劳务小队长都被发展为协防班员。编为8个班，原来在中队发展的班员分别担任班长，而李初亭担任了总班长。

开始，普通的中国劳工不知道有什么"协防班"，天长日久，这个秘密暴露了，不仅知道谁是"协防班"成员，而且还知道他们是搞劳工动向调查的。于是，劳工把这些"协防班"的人称为"灰色劳工"。"协防班"成员潜伏在劳工活动地区的各个角落。劳工稍不注意就要遭逮捕、受审讯。他们特意派李初亭之弟李汉芳在劳工棚附近开设了"汉芳饭馆"，在春日的授意下，李初亭把自己的女儿安插进去"跑堂"，使这里变成了"劳工思想动向调查"的据点。有个外号叫"傻柱子"的海城劳工，在光复的前5天（即8月10日），"傻柱子"探亲回来，听到一些"日本人惊慌失措"，"四方楼是浓烟滚滚，好像是烧什么"的风言风语。可是七三一部队表面上异常的平静，又好像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日本人、劳工都在照常上班，就是不像以前那样管事了。"傻柱子"犹豫不决：是离开呢还是上班呢，正举棋不定的时候，他背着日本人用身边仅有的几个钱在饭馆里喝酒浇愁，和对面坐着的两三名劳工边吃边闲谈，"傻柱子"毫无防备地说："在火车上听说有的城市挨了炸，人们议论说小鬼子要完蛋了。我本想不回来了，但因火车已走了好几百里地，起了车票不坐也白瞎了，于是我就赶回来了。"这些话被李初亭的女儿听去，并报告给了宪兵室。当天下午，傻柱子就被抓进了劳务班拘留所进行拷打。只是日本鬼子还没有审讯完傻柱子就投降了。

七三一部队"协防班"设立的秘密侦探据点，星罗棋布，

到处可见。劳务班在老五屯还设立一个专为劳工看病的医务所。因为劳工常去看病，宪兵室认为这个地方是进行“劳工思想动向调查”的好场所，于是吸收医务所的大夫徐敬修为协防班成员，由于他向宪兵室反映了一些劳工的思想情况，使不少劳工蹲了“禁闭”。还有劳务班的洗衣房，也是劳工常去的地方。宪兵室在那里也安插了协防班成员。因此，劳工们说，中国劳工就像被圈在笼子里一样，连喘气都得加小心。

据当年劳工金万库回忆：

在七三一部队成立“协防班”的第三年，即1944年秋，由哈尔滨宪兵队平房派遣队、伪香坊警察署平房驻在所，在平房特区范围又成立了一个“协防班”。据曾在平房宪兵派遣队当翻译的王振生证实：“在平房特区设立了“协防班”，总班长由伪平房区区长董志军兼任，副总班长由中国人的副区长袁明礼（又名袁从周）兼任。在各分区设有八个‘协防班’，其班长都由各区划长兼任。无论是协防总班或者是协防班，其头目都是由平房宪兵派遣队委任，并发给任命状。”

从此，七三一部队的协防班和平房特区的协防班组成了地区性的联防网，无论是在七三一部队营区里，还是在平房特区范围内，一旦出现有侦缉“特嫌”和政治嫌疑犯的任务，两个协防班都一齐出动。

曾担任协防班长的侯玉书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七三一部队协防班的大小头目，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有任务时给大家各发一件军用棉大衣和一台富士牌自行车，总班长还给配一支匣枪。我们知道出动都是白扯淡，可是还都跟着去了，结果连‘特嫌’的影子也没捕到，反而能够领到一元钱夜餐补助费。”

虽然七三一部队到处都张贴着"防止间谍"的标语，协防班三年来进行了多次个别侦探和集体出动，但抓到真正的"密探"极少，而残害的无辜的老百姓却甚多。1943年，劳务大队队副检查劳工宿舍时，发现一个自称是从海城来看儿子的李放文的陌生的老头，并没有办理临时居住证明书。于是，协防班怀疑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特务"，便抓进劳务班拘留所进行刑讯。这个老人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最后被日本人给打死了。1943年4月一天下午，在老五屯北岔道上值勤的一名协防班长发现一个过路的朝鲜人没有居住证明书，便将他押进劳务班拘留所。当天晚上，协防班总班长李初亭和宪兵室日本翻译春日立即对他进行刑讯，最后也将这个朝鲜人杀害了。有一次，据平房特区协防班的举报，平房宪兵派遣队去狼窝屯，将一个潜伏不久的地下抗日工作者武之峰逮捕了。

1942年春，平房特区协防班成员从周家站"鸿顺魁"杂货店经理刘福芝口中得知周家站张宗武家私藏枪支，因此怀疑他是抗联游击队员，便报告了平房宪兵派遣队。宪兵派遣队立即派人将张宗武逮捕。经日本宪兵沟儿和宪补金道仁的审讯，张宗武承认有枪，是护院用的，但不承认是抗联游击队员。对此，日本人不相信、在他家炮楼里搜出一支手枪后、把他扔进狗圈里。张宗武由于伤势过重，保释后不久就死了。他的老婆也一气之下服"大烟"（鸦片）而自杀了。

尽管协防班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但七三一部队宪兵室对它还是加以拉拢，不断打气。于是，七三一部队借欢度1944年元旦的机会，以劳务大队的名义召开了"劳工庆功奖励大会"。除劳务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参加外，还吸收一部分劳工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劳务班班长、宪兵室"特工"工藤主持，并向部分劳工发了奖状。实际上，他们都是隐瞒身份的"协防班"成员，这是普通劳工所不知道的。

会后，工藤把得奖状的人全部留下，摆上酒席，举行了一次招待宴会，还发给每人一条香烟。

中国劳工的所见所闻

一、进过四方楼的中国劳工

四方楼是中国人的禁区，在七三一部队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很难靠近它、了解它。然而，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发现一些重要现象。

当时，在西岗的高等官宿舍当博役的鞠复全和候安发，经常受佐级以上的日本军官的指使，因此有机会进入四方楼。

鞠复全回忆说，一天上午，一个中佐级的日本军官说是按照上司要求，暂时搬进四方楼去住几天，于是命令他把行李运进四方楼。鞠复全杠着行李跟在日本中佐军官的身后，来到营区的南门口。日本军官向卫兵所的哨兵递上特殊的证件，并说了几句日本话后，就被顺利地放行了。当他们进入本部大楼以后，日本军官示意鞠复全停下，从兜里掏出一条白布带子，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用一手扶着肩上的行李，一手拽住中佐军官的衣襟往里走，约走了200余步后停下了。鞠复全觉得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日本军官一边接过行李一边对鞠复全说，在这里一步也不许动要等他回来一起出四方楼。鞠复全站在那里，什么也看不到，只能闻到浓浓的消毒水味。

候安发回忆说，一个日本技师让他帮着把一个白布包裹送进四方楼。候安发不知白布包裹里边是什么东西，象是个很沉的仪器。他照样被蒙住了眼睛，也是被领到四方楼内的一定地方就不

让往里走了。候安发按照日本技师的吩咐等在那，了里过好长时间，不见日本技师回来，候安发出于好奇，把蒙眼布拉开一条缝，朝中心走廊走去。走廊里没人走动，暗淡的灯光照射下显得更加阴森。走廊里每隔不远便挂着一道布帘。当他掀开第三道布帘时，便看到走廊右侧的门开了，穿着文官服的日本人押着一个脚戴镣铐的人穿过，进了标有号码的房间。候安发惊诧之际，突然窜上来一个日本兵，问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进到这里来？候安发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日本兵一边打他耳光一边审问他看见什么了？候安发便撒慌说什么也没看见，只是想找那个日本技师。大概那个日本兵怕上司追查责任，便把候安发撵到本部大楼门外。日本技师来到本部大楼门口发现候安发站在那里，对候安发没守规矩很不满意，又把他痛打一顿。

付景岐是当年在高等官食堂的伙夫。1943年 5 月的一天，七三一部队的总务部下达了紧急通知，要求各作业班全力以赴地大搞环境卫生。事后，劳工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迎接关东军司令部的长官来视察。这次关东军司令部的长官来视察，四方楼是重点。于是，通过劳务班从62栋“酒保班”把伙夫付景岐、鞠复昌等人抽到四方楼旁边去清运垃圾。四方楼东南角垃圾满地，干了一上午也没清除完。劳务班长工藤与四郎不准劳工去吃午饭，可他却去午休了。工藤离开后，付景岐便凑近四方楼。可是，一层楼的窗户都镶着不透明的玻璃，里边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付景岐用粉刷墙壁的大梯子，爬到二层楼高的地方，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只见几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在里边摆弄着一部大机器，立式的大轮子在飞速旋转，鲜红的血浆偶而从圆罐的隙缝处溅到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身上，还有个日本人手托着一支装血的大

肚玻璃瓶上下摇晃着。这时，鞠复昌在下面轻声地告诉付景岐，让他快点下来。付景岐急忙下梯子。他刚落地，工藤手拎一根1米多长的铁筋朝他走来。工藤朝他发出一声冷笑，严厉地问：什么的干活？付景岐说是擦玻璃。工藤明知他在撒慌，抡起铁筋就把付景岐打昏在地。工藤以为付景岐死了，便命令劳工把他送到焚尸炉炼掉。劳工们不忍心这样做'在抬着他去焚尸炉的途中，顺道把他抬出了营区的北大门。幸运的是，没等把他抬到家，他就苏醒过来了。付景岐看到了什么呢？资料中记载，四方楼二层东南角那个位置，正是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

二、从四方楼推出来死人

石井班的马厩正对着四方楼，站在马厩的门口，透过铁丝网，就能看到日本人在四方楼外的活动。这天，喂马的中国劳工黄国荣铡完马草，清完马圈后，走出马厩。黄国荣感兴趣的是那神秘莫测的四方楼、人所共知的炼马炉和那不让中国人靠近的狼狗圈。因为这些地方经常发生一些让人猜不透的事。当黄国荣往东看时，发现有个穿白色工作服并戴着白口罩的日本人从四方楼的西角门推着一辆像手术台似的平板车出来。平板车上苫着的白布单被风吹起来，露出了停放在车上的人。只见那日本人推着平板车直往石井班建筑群中间的那座小平房走去。劳工们都知道那是炼马炉。把死人送到炼马炉的情景，使劳工们有了新的发现，产生了新的怀疑。

三、有一条地下通道

据曾在七三一部队工务班当装卸工，现在是平新乡机械修配

厂退休的干部韩行岩回忆：工务班位于本部大楼的东南，紧靠铁路专用线。这条铁路专用线是从平房站一直引进七三一部队的。日本人因工务班、动力班的劳工经常在这里干活，对四方楼的保密不利，就在它的东面和北面修起一道砖墙，并留着两个经常锁着的角门，在墙外靠近铁路专用线地带留出一条供劳工进行短途运输物资用的车道。

1942年初，一天上午，日本人分配韩行岩跟随汽车到第二仓库往回运木材。第二仓库位于四方楼的西北，从工务班到那里必须经过四方楼墙外的这条道。当汽车驶到四方楼东侧的时候，坐在车上的日本人突然大声喝令韩行岩低下头，不准看。韩行岩假装没听懂日本人的吆喝，惊呆地往四方楼方向扫视一眼，发现一伙身穿青色棉袍的人，推动着一台大型的绞盘机，正往一个地洞里铺设电缆线。旁边站有两个日本兵。洞口面朝东，它西面不远处就是四方楼。很明显这电缆线是铺往四方楼地下的。不久，汽车拉运木材又路过这里，韩行岩看见洞口被封上，安设着两扇黑色铁门。从此，四方楼有地下通道的事秘密地在劳工中传开了。

据住在瓦盆窑屯的朱景臣回忆，他当时去过四方楼的地下道。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朱景臣等14名劳工被临时抽调到营缮班（也称工务班）院内。营缮班位于本部大楼东南，铁路专用线道西。院里停放着一辆满载水泥的马车，车旁站着几个日本人。当劳工们被带到马车旁边的时候，日本人发给每个劳工一条白布带子，让把眼睛蒙上。然后，日本人逐个地进行检查，看蒙眼布是否露出缝隙。这样反复试验了好几次，还觉得不放心。最后，他们问："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劳工们痴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转动着脑袋。这样，日本人才放心了，把劳工们

领到马车前，命令他们每人杠起两袋水泥。14名劳工排成一队，每个人都摸着抓起两袋水泥，杠在肩上，面朝北站着。日本人递过一根木棍，让排头人握住，后边的人用一只手一个接一个地拉着衣襟，走出东开门的大院。劳工们走了大约5分多钟，感到眼前暗了些。当日本人让放慢脚步的同时，他们觉察到进的是一个地洞，下坡路挺长，越走越深。估计离地面有5—6米深。洞内温度很低，穿着单衣凉嗖嗖的。洞里没人说话，机器"隆、隆"声和电动机的"嗡、嗡"声听得一清二楚。劳工们卸下水泥后被迫直挺挺地靠边站着，由日本人又沿原路把他们领了回来。当解下蒙眼布后，才知道又回到了营缮班院内。离开营缮班前，日本人又警告说："到外边去，说话的没有，要说话的，死啦死啦的有！"

四、高压蒸汽灭菌罐

1944年夏天，七三一部队铁路专用线上一列货车在动力班附近卸下了1个大木箱。

这个大木箱约有2米多高、1米半宽，外边包一层苇席。刚把它卸下车，就派来两个日本兵持枪看守，无关人员谁也不准靠近。看样子里边装的是保密性很强的大型设备。在卸车时，劳工们从没注品名的标签上发现，它是从日本国运来的。这个大木箱，是在一天晚上，四方楼东墙打开了2米多宽的豁口，用滚槓把它滑进了四方楼的，然后，连夜又把墙砌上了。

几天后，劳工们在第一仓库看见了十几个同样的箱子，日本人迫使劳工把这种箱子连同其它一些物资分别装在三、四节货车上。劳工们从标签上看到是准备发往海拉尔、孙吴、海林、林口

的。据曾在七三一部队林口支队工作过的一名队员1988年时回忆说，七三一部队从战备分散角度考虑，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将高压蒸汽灭菌罐、细菌培养基箱、干热灭菌等设备以及细菌培养基原料，分别发往各支队，要求各支队尽快进行细菌的保存培养。他就是这个时候在七三一部队接受专业培训结业后，被分配到林口支队去的。高压蒸汽灭菌罐正是高2.5米，直径1.5米的大型设备。偷偷运进四方楼的这台大型设备就是高压蒸气灭菌罐。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成员石桥在1987年时回忆说，有一次，他往"特设监狱"押解"犯人"，路过第四部灭菌室时，曾看到3台高压灭菌罐在那摆着，也是这种规格的。

五、装血粉的铝箱

曾在七三一部队赶马车的劳工王志洪提供了这样一件事实：

在四方楼外的西南不远处，有一座东西向的大筒子房，那是劳工们所共知的"野口班"。这座房子很大，宽18米，长40米，在房的南面开了个3米宽的双扇包铁皮大门。七三一部队对这里看守得很严。有一天，日本人派他赶着马车到那里拉东西。当把车赶到房门口时，日本人命令他停下，出来的一个日本兵接过鞭子把马车赶进大筒子房内。王志洪趁大铁门开启的时机往里偷看，发现这房子很宽敞，室内铺设一条铁道，旁边整齐地堆放着不少铝箱，有3个日本人正把一种铝箱一个一个地码在车上。车装满后，日本人把马车赶出室外交给王志洪，让他把这铝箱送到铁路专用线的货台上。铝箱约有2尺半长、1尺半宽、1尺半高；箱盖中间镶有折页，可以两边开启，每头各安两个锁扣，箱两端是抠手。铝箱挺沉，王志洪在卸车时不小心把锁扣碰开，在箱盖

张开的一刹那，看到箱里全摆放着一样的装血的玻璃管，瓶口用药棉堵塞着。管内的血已凝固了。他看没人注意，急忙把箱盖扣好。

王志洪赶着马车，一天往返两三次，拉运这种铝箱。临近傍晚，他看见劳工们把这些铝箱往停在专用线上的火车上装。显然，这些血粉是往外地发运的。

六、兵器班的秘密

原在七三一部队工务班服劳役的劳工白武斌讲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1944年夏季的一天，工务班内营缮组的日本头目原田雇员派他和陈洪起、梁万选三人到兵器班去做白铁活。他立刻捏了一把汗，因为兵器班的戒备与四方楼一样，进去就有可能不让出来。可是，日本人的派遣他不敢违抗，只好硬着头皮去报到。他们三人带着工具来到兵器班门口，一个日本军官给每人发一条白毛巾，让把眼睛蒙上。日本人走在前面，白武斌握住他递过来的一个小木棍，又让后面两人扯着前边人的衣襟在走廊里走。到兵器班院内，日本人才让他们把蒙眼睛的手巾拿下来。这个内院有个高出地面1米多、敞着口的方型水泥池子。日本人要他们把这个水泥池子上边搭上铁瓦盖。这个池子4米正方，卧入地下4米深，底部有个1米正方的洞口，中心伸出一根30厘米粗的铁管，探出地面有3米多高，管子顶端由6厘米粗的铁管焊成平放着的十字型。一看就明白，这是一座不知其用途的秘密地下仓库，伸出的铁管是作通气孔用的。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他们在方型池子的四角竖起四根木桩，留出门口后，就围着木桩钉上鱼鳞板，并在顶盖钉上瓦方、铺设铁皮，把通气孔露在外面。他们一连干了三

四天。每天干活的时候，日本人始终在旁边看守着。幸运的是工程结束后他们被放回了工务班。兵器班院内及其北栋房存放着的备用的大汽车、坦克、炮车，由5—6名中国少年劳工擦拭和保养；南栋房却不准中国人接近，可是那里不仅有比汽车、坦克、炮车还重要，而且与汽车、坦克、炮车有密切关系的秘密武器。“兵器班”这个名称是从中国劳工口中传出来的。顾名思义，“兵器班”是制造武器的场所。它确实是归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管辖的“兵器班”。主要生产菌苗、疫苗，同时还研制各类小型的细菌武器。这里有消毒池、小动物实验室、低温室、地下室等。

七、“升汞”和“牛肉干”

1981年有位叫松村优一的日本朋友要求到平房访问，会见一位叫韩行斌的中国朋友。韩行斌家住平房区平房乡腰二道沟村。原来，韩行斌和松村优一是1912年至1945年期间在平房站当挂车员时相识的，已经分别36年了。韩行斌回忆说：1942年，松村优一调来平房站以后，我们二人就负责往七三一部队的专用线上甩车皮。七三一部队对中国人控制的很严，除了允许我随车进入七三一部队营区外，专列进入营区之前，还必须换掉中国司机，由日本司机把专列开进营区。我们在甩挂车皮的时候，看到有从日本运进来的白鼠和各种叫不出名的设备；也有从东北各地运来的黄鼠、“乌米”①；还有从七三一部队发往外地的各种保密物资。运进的个别物资有时写有“石井部队长收”和“北野部队长收”字样。

① “乌米”即患有黑穗病的庄稼长出的果实，如麦穗、苞米穗。

有一次，在甩进来的一节车皮里，装有20—30个小瓷罐，在铁皮包装箱上标有“品名：升汞，重量：50公斤”字样。还有一次，甩进了6节车皮，里边装的都是大木箱，注“牛肉干”品名，上边写着“生产材料，不可食用”字样。这些物资都由七三一部队的中国劳工运进第一仓库里。曾在第一仓库服劳役的中国劳工刘仁富回忆说，七三一部队里有两个军用物资仓库，各有分工，第一仓库专门储存军用生产物资，第二仓库储存军用生活物资。尽管第一仓库主任福利觉藏对军用生产物资管得很严，但有时日本兵撬开大木箱，偷吃牛肉干，于是中国劳工也偷着吃。这牛肉干虽然没有咸淡，但嚼起来也够香的。这些物资都被四方楼里的日本人陆续地领走了。升汞亦称“氯化汞”，化学式H_8CI_2。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末，溶于水，杀菌力强，有腐蚀作用。稀溶液（如1:100。）可用以清毒。此药有强烈的毒性。因此，资料中记载，在七三一部队生产细菌、疫苗场所，都在进口处设一消毒池，有关人员出入时都要在消毒液里走过。这种消毒液就是升汞稀释而成的。

“牛肉干”是细菌培养基的主要成份。细菌的培养过程就是把菌种栽植在具有多种营养成份的培养基上，加之一定的条件就能培殖出大量细菌。而将牛肉干煮沸，提取的牛肉汁，就可当作细菌培养基使用。牛肉汁最好从新鲜牛肉中提取，但七三一部队的细菌生产量相当大，新鲜牛肉供不应求，不得不从外地运进一些牛肉干加以补充。

八、进行病理研究的“川上班”

在七三一部队的劳工中，不少人都知道在航空班小楼的北面

不远处有个“川上班”也叫计算班。这里的负责人是日本病理学专家川上渐博士。他在石井四郎的眼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所领导的计算班，也得到石井四郎的器重。

在这个班里，除了有三四名日本人外，还有8名中国人在内劳动。他们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既要有文化，又是日本人认为靠得住的，经过保密训练的；不准与外界人接触，连吃饭都不能出屋，到外边也不准谈论计算班的情况，并规定，如果有人要问，就说是给日本人计算工资，或者说给日本人测量身长、体重。

实际上，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就象蒙在鼓里一样，根本不知川上渐苦心经营这个计算班的真正用意。他们每个人都用着一台日本人发给的属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计算机。七三一部队宪兵室每隔一阶段要送来一批彩色图画册，每人每次只发给一本，每本20页。图画册里画的是人体构造图，每页只画一个人，而且每个人型构造都有区别。可以想象，它反映的是不同的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计算班的人员按照要求，在图上测量与计算手掌的大小，手指、脚趾的各关节的长短，胳膊和腿的尺寸。这些数据都要准确无误地标在有关部位旁边。当把这册人型图计算完后，由宪兵把整个图册拿走，然后又发给新的一册。

计算班的工作正是日本人进行病理研究的一道程序。他们为了研究白种人、黄种人的抗菌能力，曾以苏联人、美国人、蒙古人、朝鲜人以及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在实体细菌实验前后，通过索取的各种有关数据、观察与分析各种族人体的生理变化。而“川上班”所接触的各种族的人体图，正是他们所研究的代表体。日本军队曾在太平洋战争中，俘虏了500名美国军人，监押在上海战俘营里。七三一部队的病理研究人员，曾到那里对美国

战俘进行了细菌实验，并获取了有关这方面的数据。

“川上班”的工作只进行了4个月，因川上渐突然病死，使这项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了。从此，川上班及其研究项目并入病理研究班。

九、“吉村班”的冻伤实验室

在四方楼北边，第一仓库和第二仓库旁，有一座相当于二层楼高的很大的筒子屋，和它连接为一体的还有一座平顶房，中国劳工知道那里是“吉村班”。

刚建时，在这里当“苦力”的赵明武、王国福、刘仁福、刘仁廷、陈方胜、刘茂清和一位姓邢的十几名中国劳工知道建的是冷冻室，但不知其真正的用途。这个冷冻室实际是冻伤实验室。那是根据吉村寿人技师提议而增设的。过去“吉村班”所进行的冻伤实验只能在严寒冬季里进行，这个冷冻室建起以后，由于室内密封性良好，四壁挂有隔温层，只要开动冷冻机和低温空调设备，就能使室内保持所要求的衡温，因此，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可照常进行冻伤实验。冻伤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屋子里，还修筑一个长3米、宽2米半的水泥池子，临时放进半米深的水，迫使被实验者哈下腰把四肢插入冷水内，逐步给水降温，观察冻伤效果。这是冻伤实验的方法之一。冻伤实验室距离“特设监狱”很近，一旦要进行冻伤实验，从四方楼内侧的“特设监狱”押解出被实验者，通过不长的一段地下通道就可以进入冻伤实验室的大院，外人无法看见。

利用动植物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活动

细菌研究离不开对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研究，而细菌传染最理想的媒介物就是某些昆虫，而它们的宿主往往是某些动物，因此，细菌研究离不开动物。让致害于人类的鼠疫菌发生效力，要先在江豚、旱獭、骆驼、猴子、白鼠、黄鼠身上实验；养狗是为了培殖狂犬病菌；养鸽子等飞禽也是寻求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另外，研究炭疽鼻疽就离不开马匹；制造牛瘟、羊瘟和猪瘟就必然以牛、羊、猪为靶子。七三一部队饲养着各种各类的动物的罪恶目的，就是在研究和制造残杀人类和牲畜的传染病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

一、石井特别饲养班

在四方楼的两侧，交错地排着数十栋动物舍，分别饲养着牛、马、骆驼、猪、羊、狗、鸡、猴、江猪和各种鼠类等十几种动物。这就是不对外开放的“动物园”——“石井特别饲养班”。在这里饲养的各种动物，既不供人们观赏，更不为人们提供肉食，而是做为细菌实验的材料用的。七三一部队里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是管理监狱的，一个是饲养动物的。可见，它和对外绝密的“特设监狱”一样，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石井四郎安插他的三哥石井三男担任班长。畜牧技师出身的石井三男，是佩带红刀带的佐官。这样的配备，在七三一部队的各个班中是为

数不多的。由此可见石井班的重要地位了。

石井特别饲养班，设有事务所，是一幢三室的平顶砖瓦房。在动物舍群中，设有马厩3—4栋，马的存栏数约有120匹，此外在露天马圈里还栓有东北当地马4—5匹和朝鲜马40余匹，猪、羊舍一栋，内养猪80头和羊4—5只；猴、江猪舍一栋，猴子12只，江猪数十只；鼠舍一栋，分别饲养着白鼠和黄鼠数千只；在搭设的牛圈、骆驼圈、狗圈和鸡舍里，分别饲养着牛10多头、骆驼13头、狗20条，还养有数百只鸡以及、鹿、白麻雀、驴、骡等动物。

这里有十几名日本人，有男有女，他们大多数是监工。常年固定的中国劳工40多名，被编成劳务小分队，队长由日本人担任，副队长是中国人。

饲养各种动物所用的饲料、饲草、饲菜由“八木班”供给。他们设了4个大菜窖，贮存着大量白菜、胡萝卜等，供各种动物食用；还设有饲料、饲菜加工房。这里专门安排一些劳工保管、加工和运送饲料。每到冬春。日本人给中国劳工规定，每天要往鸡舍、猴舍、江猪舍、鼠舍送一次饲菜，饲料由日本人自己倒进各类动物舍内。白鼠舍和狗圈是中国人的禁区，那里都由日本女人管理。在动物饲养舍里，喂马的劳动量大，经常有20多名劳工饲养着数百匹马。

各种动物的来源，有的是从各地运进的，例如骆驼、驴、马、猴子等。白鼠就是从日本专程运来的。由于它供不应求，七三一部队便极力从中国东北各种鼠中寻找代替日本白鼠的鼠种。当他们通过研究得知黄鼠是一种有效的传染细菌的动物以后，一面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捕捉，一面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大力繁殖。因

此，动物舍里的各种动物，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数量。

除七三一部队本部外，它直属的安达特别实验场和各个支队也饲养了一些动物，只是品种、数量没有那么多。据原黑龙江省公安厅佟明贵于1954年9月16日的调查，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在西山驻地把15间房屋做为动物舍，动物存栏常年保持鼠千余只、江猪200余只，兔子50余只、还有3只羊。同时还在北孙吴用10间房舍饲养白鼠、红灰鼠、江猪和苏雀。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不仅饲养着各类动物，而且还饲养着鸽子。林口第一六二支队除饲养鼠、兔、“海猫”之外，还饲养着为实验用的狗。

二、田中班——昆虫研究班

田中班设在四方楼三层的东侧，是第一部的昆虫研究班。在四方楼东北约1000米远的一座单独的大院里，四周修筑了一人多高的砖围墙，设有西、南两门。这个大院，是培殖各种昆虫的分部，也叫做“田中研究室”。这个院套很大，除了三大栋房舍之外，其余的地方却是大片空场。到了夏季，院内杂草丛生。日本人决定抽调劳工吴邦富等人把蒿草割倒。割草时，日本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不准劳工四处乱看，必须低头干活。吴邦富趁日本监工不大注意时，偷偷地往一个大房子里看，屋里摆放着数不清的铁丝笼子，笼子里装的是红眼老鼠。后来才知道这是田中班的昆虫动物舍，是专门研究和培殖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昆虫动物的。这个班的头目是田中技师。

这里饲养的红眼老鼠的特殊用途是通过它繁殖数以万计的跳蚤。为此，他们专门用连为一体的两大栋房子存放着大量的黄鼠。这些鼠类有时放置在铁丝笼子里，有时散放在水泥制地下室

内。他们把房屋地基砌得二三米深，就是防止这些老鼠从这里倒洞逃遁。为了保密，日本人经常使用暗语，如：把跳蚤叫“粟子”，虱子叫“穗子”，老鼠叫“饼子”。在这个昆虫饲养舍的西边修筑了一座很深的水池，细菌研究所排放的废水，通过这里流往新五屯旁边的沟子里。由于这水里含有大量的有毒成份，所以老鼠掉进水池子里，浮游一会便死去。

三、“老鼠部队”

对七三一部队来说，老鼠的用途很广泛，它既可以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又可作细菌实验的先行“牺牲品”，同时，用它的血还能培养细菌。因此，七三一部队及其各支队，都把培殖鼠类当成主要工作来做。在石井动物饲养班里饲养的老鼠数量最多，连专门负责饲养它的日本雇员也说不清它总计有多少。由此来看，人们称七三一部队为“老鼠部队”，还是比较恰当的。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了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当时，在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汇报的石井四郎急忙飞回平房，并立即召开了本部各部长会议，传达参谋总长关于加紧准备细菌战争，七三一部队在短期内必须完成培殖200公斤跳蚤任务的训令。在这次会议上，石井四郎赤裸裸地道出了加紧细菌武器生产的意图：“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已开始的德对苏战争和关东军准备实施反苏军事措施的‘关特演’计划，要求我们军队应当充分具有细菌武器，以及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

当时，七三一部队包括各支队在内，最大生产能力是3—4个月繁殖出45斤（约1亿4千5百万只）的跳蚤。这已是一个十分惊人

的数目了。尽管七三一部队具备生产和储存足以够用的各种细菌的条件以及随着战争的进展与扩大所需要的细菌，但是，由于跳蚤、虱子、臭虫等细菌传染媒介物生命有限，不可能大量地长期储存，都是在需要时有计划地按规定的程序安排生产。因此，要繁殖200公斤，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然而，日本参谋本部所要求的这个“短期”，是不超出3个月，而又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的命令。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要繁殖出这么多细菌传染媒介物，如果不扩大生产规模，那是根本办不到的。由于细菌传染媒介物生产量的增大，造成了存栏的鼠类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采血和和繁殖跳蚤需要的新困难。于是，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和器材供应部部长大谷章一再建议，设法在中国找到合适的鼠类来补充日本运来的白鼠数量的不足。因此，七三一部队本部和各支队找到了可作为跳蚤宿主的黄鼠、土拨鼠和灰田鼠，大力进行繁殖。

1945年5月以后，由于战事更加紧张，日军参谋本部要求七三一部队在短期内生产1—2吨跳蚤。老鼠供不应求的矛盾更为突出了。此时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已调离，石井四郎又重返老巢。他立即召开各支队长及大连卫生研究所长会议，叫嚣要为分担日本侵略军苦战的困难，全力以赴地加紧准备细菌战。因此，七三一部队饲养鼠类的品种和数量要成倍地增加，甚至使石井班鼠舍容纳不下，不得不连本部大楼的走廊里也都摆满了鼠笼。

各个支队也把主要力量投到老鼠的培殖工作上。据原牡丹江第六四三支队长尾上正男供述：“仅在1945年上半年，就抽调10名人员组成2个专业组，分别繁殖白田鼠和白家鼠。当时支队里种鼠数量很少，于是派人从七三一部队本部各领了500只，开始

大力繁殖”。为了繁殖这两种鼠，还专门设计了一种长50厘米和宽、高各为30厘米并在底层设有包铁皮抽匣的铁丝编制的网状饲养笼。林口一六二支队在动物室东面一个大房间里饲养着从日本运来的白鼠2000余只，由日本人亲自饲养。西面的一间房子里装着本地的各种鼠类，由一名日本兵领着4名中国劳工进行饲养。鼠类繁殖后就及时分笼，每笼只装20只，这种事都是日本人自己动手去做。由于白鼠大量繁殖，饲养箱不足，不得不把部队的木栅栏拆下来制作鼠笼。同时，还到林区采伐木材360立方米备用。在日本投降之前，这个支队饲养的大白鼠有5000只、小白鼠有1000只。据调查，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仅在1945年夏天，就饲养各种鼠类13000多只。孙吴六七三支队和安达特别实验靶场，也饲养着大量的鼠类。

日本关东军也把饲养老鼠纳入备战计划，命令各军事团、陆军医院以及各地军用仓库，都要饲养白鼠，以便供给七三一部队。

捕捉黄鼠是他们补充鼠类不足的另一个办法。七三一部队及其各支队分别组成专业捕鼠队到荒郊野地里和城镇、村屯去捕捉。有时还抽调劳工参加捕鼠队伍。

1945年4月，石井四郎命令各支队大量捕鼠。据此，林口支队立即从七三一部队本部领取了500个捕鼠器，并成立了以间所少尉为头目的25名队员参加的专业捕鼠班；还组织了以渡边中尉、岛田准尉为首的几个临时捕鼠班，到千振、龙爪开拓团和佳木斯一带进行捕鼠，并把日本开拓民也鼓动起来，分给他们捕鼠指标，不完成不行。

他们外出捕鼠时，穿着便衣，不暴露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带

着“鼠害”的小册子一个劲地宣传，让人们相信他们是来干“好事”的。

据曾在一六二支队工作过的上野雇员说：“在林口支队，捕鼠工作比培养细菌还重要。我在第二课防疫室工作阶段，曾参加两三个月的捕鼠工作。仅用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在千振、佳木斯一带捕捉了5万只老鼠”。又据久留岛佑祠在法庭上供称：“我两次参加捕鼠活动，每次7天，亲自捕鼠二三百只”。

同年7月，鸡宁炭矿公司的劳工住宅区，发生了流行性出血热病症，林口支队派去以七夕曹长等25名队员组成的防疫队，还给他们分派捕鼠任务。这批老鼠单独放置，经过检疫后才能和大批老鼠混到一起。

在海林镇的牡丹江第六四三支队，为捕捉老鼠，除了到附近村屯、田野去捕鼠之外，还派出一支专业队进到牡丹江城内去捕捉。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在城市内捕鼠有成效。因此，这支城市捕鼠专业队由10人增到30多人。

侵驻在牡丹江市的第五师团军医部长佐藤少将也指示所属的驻军，要组织力量捕鼠，并把捕来的鼠交给六四三支队，然后集中往七三一部队发运。

七三一部队通过伪平房区事务所，向“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内的居民索征黄鼠，每月每户必须上缴5只。每个居民把捕获的黄鼠交给分区事务所，然后分区指定专人送往七三一部队，有时七三一部队还派出马车把集中起来的黄鼠取回。远离七三一部队10公里以外的双城县第二区郎家烧锅、南烧锅一带，也都分配了捕鼠任务，但他们往往都完不成指标。于是七三一部队组织了30多名劳工参加的“收鼠队”前去督促。据王启奎证实：“1945年

7月，日本人带领着‘收鼠队’每天去一次，拉回两马车鼠”。据正黄旗二屯的老户李忠祥证实：“村公所向村民摊派大眼贼，说是‘国防’任务，每户每月要上缴5只，不交不行。由于要的数量多，在近处鼠洞都挖遍了，还是达不到上缴鼠的数字，最后只好到10里以外的荒原、坟茔地挖洞捕鼠。我那年挖了50多只黄鼠，都顶任务被七三一部队用车拉走了”。

为了增加捕鼠数量，日本人采取了“物质刺激”的手段。七三一部队的日本人说，“谁交一只大耗子奖给‘极光牌’香烟两支，交一只小耗子就奖给一支烟卷，尽管这样还是完不成指标”。为了收缴黄鼠，七三一部队组织一批劳工当收鼠员，分派到附近的各村屯去，每个村屯派一名。七三一部队给每个收鼠员发一个专业身份证，这身份证是硬白纸皮，内贴有本人的一寸照片，写明姓名、年龄和籍贯。捕鼠任务由各村长往下摊派，说：“交一只大鼠奖给一角钱，交一只小鼠奖给五分钱”。村民捕的鼠集中一块，由收鼠员负责装笼，七三一部队派车把鼠拉回。

铁路沿线和各支队附近的地区，收缴黄鼠的任务量更大，甚至包括学生在内，要求每人每月必须上交5只黄鼠。据林口当地老人说：“康德十年（1943年）春，日军命令七星泡村百姓每人必须捉5、6只鼠，指日上缴给古城镇的南山部队（指林口一六二支队）。康德十一年（1944年），日军又通知古城镇和林口镇一带的居民也得尽此类义务”。日伪当局还根据每户的人数，发给一只或两只捕鼠笼，然后定期去收缴老鼠。编织这种鼠笼的任务摊派给了一六二支队附近的七星泡村的老百姓。鼠笼规格是长二尺半、宽和高为一尺，编成网状；所用材料由林口南山的日军仓库供给。

由于七三一部队需要的老鼠量太大，日本关东军于1945月2月12日向伪满洲国兴农部提出索要黄鼠计划。伪满洲国兴农部次长于3月18日给四平、奉天、龙江、滨江、北安、锦州等省发出通知，要求本年捕捉活黄鼠30万只，协和会、青年团协助。4月1日，石井四郎又与伪满兴农合作社中央会理事长松岛签署了索要老鼠的协定书，规定：黄鼠由铁路附近的国民学校负责捕捉，由合作社收买，日军到各车站去接收，其代价包括一切费用在内每只黄鼠1元零10钱。第二天，石井四郎就把“协定书”先印送给龙江省次长。要求龙江省所属的龙江、泰来、富裕、讷河等四县必须搜集5万只，限期一个月完成。但龙江省对下安排了56000只，期限不得超过10天。向各县索要的数量是，泰来县12500只、杜尔伯特县4500只、景星县3000只、龙江县14500只、富裕县3000只、讷河县14500只、甘南县4000只、林甸县（不祥）。①

其它各省也按照“协定书”所要求的指标，下达了索要计划。尽管各省对下层层加码，施加压力，但都没完成任务。龙江省只完成6600只、奉天省完成5400只、四平省完成3200只，总共才完成15200只。第六五九部队发给四平、奉天、龙江三省6408元的奖品。②

下表是1945年向东北人民逼索黄鼠文件目录①：

序号	发文号	日期	发文者	收文者	事由	附记
1	满防经173号	2.17	满洲第六五九部队长	龙江省次长	协商搜集黄鼠和计划	
2	12林薪炭25号	2.26	兴农部次长	龙江省次长	搜集黄鼠要领	
3	12林薪炭25号	3.18	兴农部次长	龙江省次长	搜集黄鼠的通知	此件同时发给四平、奉天、滨江、北安、锦州各省
4		4.1	龙江省	所属各县	搜集黄鼠要领	
5	满防经第281号	4.2	满洲第六五九部队长	龙江省次长	供应军用黄鼠的协定书	
6	电报	5.3	满洲第七三一部队长	龙江省民生厅保健科	由七三一部队派员接收黄鼠	
7	12兴林政8－15	5.17	满洲国兴农部次长	龙江省次长	发奖品代金	同时发给四平、奉天省
8	电报	5.15	龙江省民生厅长	讷河县合作社	送容器	
9	电报	5.23	讷河县合作社	龙江省次长	送容器	
10	电报	5.28	讷河县合作社	龙江省次长	送容器	
11	电报	5.29	讷河县合作社	龙江省次长	送容器	
12	电报	6.13	龙江省次长	景星、甘南、讷河、林甸县长	验收事宜	
13	电报		林甸县长	龙江省次长	索要容器	
14	电报		讷河县合作社	龙江省次长	容器困难	

①②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

①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

七三一部队索要老鼠，除上述各省外，还有东安省等省。

从1944年到1945年上半年，七三一部队责成所属的林口支队到佳木斯市购买黄鼠。佳木斯市伪公署卫生科通过开展所谓“防疫周”的活动发动全市学生捕鼠。据当时在协和校优级部读书的周绍谦证实：“1945年春季，学校动员学生捕鼠，事先发给捕鼠笼和捕鼠食物（像元宵似的丸子），捕的鼠交给学校，然后统一送到市公署。捕鼠活动进行有两三个月”。又据当时在佳木斯市公署卫生科工作的许文章证实：“1944年和1945年，每到春天，佳木斯西南岗子的日军部队，通过市公署卫生科叫全市学生捕鼠，每天往卫生科送老鼠300多只，西南岗子日军部队亲自装箱，每箱装三四十只，然后用汽车运走。

七三一部队还在兴安省收买黄鼠的代用品——松鼠。据海拉尔支队长加藤恒则少佐供述：“本部索要的鼠量太大，只好在内蒙地带收缴田鼠，数量不足也可用松鼠顶任务”。

七三一部队的各个支队根据本部的指示，把捕来的大量黄鼠除了部分在支队留用之外，绝大部分送往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集中在石井班的动物舍内。原六四三支队长尾上正男在法庭上供述：“我们支队在1945年上半年共捕鼠7000只，每月送往七三一部队的黄鼠有100只到150只，家鼠有150只到200只，灰鼠有200只”。据榊原秀夫供述，林口支队于千振、佳木斯附近实行捕鼠工作，每月送本部有6000至9000只。“从1945年4年至同年7月，送往七三一部队的黄鼠共计26000只，其中四月份1000只，五月份10000只，六月份8000只，七月份7000只。此外还送去了支队饲养的白鼠1000只”。

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的前两天，还有装黄鼠的火车开进平房

站。当时，七三一部队的日本人都逃命去了，把这列车扔在那里也不管了。①

四、马血的抽取

七三一部队之所以饲养大量的动物，就是把这些动物做为细菌实验对象，或当作传播细菌的媒介物，或为制造菌苗、疫苗和血清提供血源。

“石井班”里的劳工们经常看到“二木班”和“植村班”的日本人到这里来。他们穿着白色防疫服，拿着注射器给动物注射一种药水，说是“预防疾病”；有时给动物测量体温、体重、身长和身高；有时分别从各种动物身上采血。最常见的是日本人到马厩从马身上大量的抽血。

在这里饲养的马，屁股上都烙印着号码。抽血的前几天，日本人就吩咐中国劳工要把某某号的马精心地饲养，并加量供给精饲料，甚至进行单槽饲养。这时日本人常来马厩进行视察。当马长到膘肥体壮的时候，穿着白色防疫服的日本人当即命令劳工将他选中的马牵出来，栓在室外的马桩上。随后日本的实验助手用酒精棉在马脖子处进行擦拭消毒。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日本的实验员手持一支大型的注射器，对准马脖子的动脉血管猛扎进去，霎时，马血顺着导血胶管流进备好的大肚子玻璃瓶里，当马血几乎要抽尽的时候，马的四条腿颤抖不止，马头立即耷拉下来。日本人停止抽血后，被松绑的马就立刻栽倒在地。据现正黄旗四屯的方振玉说：1941年3月，七三一部队从齐齐哈尔运进75匹东北马，由于经过半年的精心饲养，个个膘肥体壮。9月的一天，

① 目击者庄振芳的证言。

来了4个穿着白色防疫服和长统水靴、戴着口罩的日本人，手拿玻璃针管和圆型大肚铝瓶，从第六栋马厩里，挑选了4匹马，在每匹马身上抽取6大瓶（每瓶1000毫升）血。

有时候，在一匹马身上第一次只抽取少量的血，然后再精心地饲养，待体质复壮时再进行第二次大量地抽血。日本人给马抽血，有时使用抽血泵。抽血泵一开动，只用几分钟就把马抽倒了。

他们为了在一匹马身上抽取大量的血，在使用抽血泵之前设法让马激烈地运动。一天，黄国荣亲眼看到日本人牵出一匹大洋马，让一个劳工骑上它猛跑。那个劳工骑上马飞跑起来。当他把马骑回来后日本人迅速把马栓到马桩上，并开动了抽血泵。转眼之间马血被抽净，马瘫痪在地，不久便死去了。

这种事几乎天天进行。抽取的马血，由专人送进"四方楼"，而马尸则由中国劳工用马车送到焚尸炉烧掉。

正黄旗三屯的劳工潘义发干的就是运送马血的差事。石井班的日本人把抽取的马血装在玻璃试管内，然后把数十只装血的试管摆放在备好的铁篮子内，让他送进四方楼。但日本人规定，他只能送到四方楼门口，不准往里边去，铁篮子由日本人接进去。

当劳工们打听抽取的马血的用途时，有的日本人却不加掩饰地说："制造药物"。

七三一部队人员还在其他动物，主要是灰家鼠的身上抽血。这里饲养着通过各支队搜集来的大批灰家鼠。原计划用它培殖跳蚤或当作鼠疫蚤的宿主，但由于它毛短，附着的跳蚤指数过低，因此不得不把它当作实验动物使用，即给它注上鼠疫菌液，一两天以后，通过抽血检验鼠疫菌的效用。

七三一部队所属的各个支队以及大连卫生研究所也抽都把动物血做为重要的研究程序。据在林口一六二支队当过劳工的张清林证实："支队里有一个不让中国人接触的老鼠舍，每隔一个星期，支队长榊原秀夫少佐带领日本研究人员来到这里，抽鼠血进行化验，看样子这些鼠都被染上了鼠疫菌。有时他们在地下室内把鼠就地解剖了"。

在海林六四三支队动物舍当饲养员的李华民曾多次地看到日本人在一匹马身上抽有半大玻璃瓶子血。事先在瓶内放进一颗乳白色的像玻璃球样的东西（防止血浆凝固的化学物质），装进血以后，它就溶化了，保持血浆不凝固。如果抽白鼠血，每次只用10来只，每只只抽半酒盅血。可能由于鼠的血型不同，有时把几只鼠的血混装存一个瓶内，有时把每只鼠的血分别装着。此外，他们还从兔子身上抽血。

各支队采集的动物血，基本上都上交给七三一部队本部。大连卫生研究所对动物血是自采自用，有时不够用，还要求七三一部队本部供给。

五、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八木班"

在四方楼西边、东乡村道北，有一座砖瓦结构的平房，这就是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八木班"，由农业技师八木泽领导。

这个实验农场拥有十几垧土地，从表面上看，种植着麦、黍、豆和胡萝卜、白菜等作物，还种植了大量苜蓿草。这些作物大体上分布在三个地块上：一片在"八木班"事务所北面，有10垧地，大部分种植黍、豆类和蔬菜作物；一片在教育部东南，那

里种的麦子；苜蓿草则种植在“建设班”南面的空地上。在日本人的逼迫下，农忙时除了有40—50名常年劳工在这里从事农业劳动之外，还从附近村屯雇用男、女短工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每到冬季，只留下20—30名劳工，转入菜窖里从事倒菜和给石井班动物舍运送饲料的劳动。

石井四郎曾说，七三一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需要这样一个自给性的农场。实际上，它所收获的粮、菜都供给了石井班动物舍。在“八木班”事务所北边有一座面积很大的温室，里边试种着上百种粮菜作物；在“八木班”里还专设了一个实验室，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劳工的禁区。温室北面是一大片畦田，培育着十几种麦子。在这里劳动的劳工发现，棵棵麦穗都长有“乌米”。在麦子秀穗时节，抽调少年劳工昼夜看护，防备麻雀吃掉。麦熟后，日本人领着劳工连麦棵一起拔掉捆好，运到北岗的一个大院里垛好。更为奇怪的是，平房附近的农田里，苞米、小麦的乌米穗格外多，据附近的中国农民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正是这样，每当夏季，日本人就抽调几十名劳工，到附近的农田里去采集乌米。每当秋季，七三一部队，还从外地用火车运进乌米麦穗。劳工于忠尧曾经看到满载乌米麦捆的货车停在铁路专用线上。劳工裴富曾不止一次将乌米麦捆卸下车来。采集的和从外地运进的乌米也都运进北岗的大院里上了垛。据劳工张廷礼证实：“每到冬季，日本人又迫使中国劳工把乌米麦穗压碎，并装进麻袋，又用火车运走”。后来得知，七三一部队把碾碎的乌米运到外地后，在麦、黍扬花季节，漫撒在大地里，进行“黑穗病”的传染。

八木班为了加工饲料和快速粉碎乌米，于1945年4月，还增

添了一套粉碎设备。这套设备是从哈尔滨“天兴福”火磨拆下来的。当时动用700多名“勤劳俸士”队员大兴土木，但没等安装完，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

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七三一部队在准备细菌战的过程中，在生产大量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的同时，还进行着以活人为材料的细菌武器效能实验。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知，准备细菌战以及运用细菌武器残杀无辜的人民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而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细菌传染效应的试验，更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动。因此，它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这一罪恶活动的。也正因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其战败之时，迫不及待地销毁罪证，特别是把四方楼炸毁，使其面目皆非，成为一片废墟。然而，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于1949年末，在苏联滨海军事法庭上揭露出来，并成为爆炸性的新闻：七三一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的“细菌工厂”；它通过细菌试验残杀了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3000多名。

早在七三一部队初创的背荫河时期，就开始用活人作为细菌试验的“实验材料”了。他们把这些活人称为“马路大”，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实验材料”者，是3名中国抗日志士。他从中苏边境的鼠疫传染自然疫区抓来40只老鼠，并从这些疫鼠身上取下染有鼠疫的跳蚤203只，再设法提取其液汁，给3名中国抗日志士注入体内。第一个人，19天后发高烧达39.4°C；第二个人，12天后发高烧达40°C。最后，他们在昏迷状态中被活活地解剖了，还由石井四郎亲自写了检验报告。

据在七三一部队工作的不少队员证实，用活人进行的各种试验，其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例如：

菌液注射试验，即把含着各种细菌的溶液注入被试验者的静脉内，观察其病变过程，致死后秘密地投入炼人炉；有时被试验者接受注射试验而发病后，他们还给注射抗菌素加以治疗，实际也是一种细菌效能的试验；有时对幸存的被试验者，还要进行第二次或作另一种试验；有时幸存的被试验者没有再进行实验的价值时，便以治病为名给予注射一种毒液，使其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死去。

口服染菌的食物传染试验，即把细菌掺入饭食内，或者将菌液注入瓜果里，或者把菌液混入水中，强迫或诱骗被试验者食用或饮用，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

冻伤试验，即在严寒季节里，将被试验者押赴到室外，迫使他们将手、脚插入凉水中，接着将手、脚拖出来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然后把他们抬入屋内。再用不同方法进行解冻：有的要插入冷水里，有的要插入温水里，有的用开水烫，观察其冻伤程度。有时对冻伤者进行治疗，有时在其冻伤处抹上染菌药膏。这样，有的冻伤者幸存下来，但他们多数的手指和脚趾烂掉，有的则丧命。

毒气试验，即强行地把被试验者塞进密闭的实验室内，注入各类毒气使其窒息身亡。这类的试验对象多数是冻伤试验的幸存者。

人血和马血换用试验，即他们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里，又把人血注入马体内，观察其血液的变化。

真空环境的试验，即将被试验者塞进密封的实验室内，用真空泵将实验室内的空气抽净，使被试验者窒息而死。

人体倒挂试验，即将被实验者头在下脚在上的倒挂着吊起来，使其受折磨。

移植手术试验，即有时将手、脚互换接肢，有时将直肠直接连在胃上，有时将肝、脾、胃摘除。

梅毒传染试验，这类试验多数是在女“犯人”身上进行。

武器性能试验，即有时将被试验者押入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对着坦克喷射，观察其在什么程度可以烧死；有时用步枪或手枪对着排列成一纵队的数名被试验者，发射带毒的子弹，看一枪能穿透几个人体；有时运用试制的“手枪式”、“手杖式”的小型细菌武器，对活人进行试验，观察这类武器的效能。

这些实验惨不忍睹，令人毛骨悚然。1941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亲自进行过多种实验的七三一部队雇员小林智神秘地告诉上田弥太郎：往人的静脉里注入5CC空气就是致命量，人就可以死亡；把马血注入人体内的反应是，超过100克，人便感觉痛苦，达到500克左右，人就会死亡；低压真空环境的试验证明，空气压降到0.5以下时，人的血管就开始破裂，眼睛鼓出来，把人憋死用不上一分钟的时间；至于人体倒挂折磨致死需几个小时。然而，七三一部队却把每次试验都拍成纪录影片或绘制成画面存档，同时采集各类标本做为“科研”的成果进行陈列。

七三一部队的这些虐杀活动都是在四方楼里或者室外实验场里秘密进行的。

一、各种细菌传染试验

七三一部队的刽子手们使用活人进行的实验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仅细菌的传染实验就有四五种，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内服法”。

他们对试验对象采取了诱骗和强制相结合的手段。在进行菌

液注射试验时，他们说是给打预防针；菌液内服试验的方法是偷偷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和水里，或者把各种菌液注入瓜果、面食内，分发给在押的人员吃喝。开始，被关押的人员不以为然，后来逐渐发现，食用某种食品后不少人患病乃至死亡，是日本人在食品上搞了鬼。于是，监狱里经常发生绝食、绝水的斗争。七三一部队在其欺骗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就采取强制手段。他们有计划地提出试验对象，先将其绑在柱子上，由持着手枪、皮鞭的特别班成员在旁边监视，如果发现违抗行为就用皮鞭抽打，对特别"顽固"者，有的当场击毙。这样，日本的实验人员就把菌液注射到"实验材料"的体内，或者灌到嘴里。通过灌菌后的观察发现，霍乱、肠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较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3至7天死亡。白喉菌也能发生致人于死命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其死亡原因也不在于胃肠道的传染，而是呼吸道的传染所致。

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曾指导军医和技师把破伤风菌的毒素分为最低致命量的千倍、百倍、十倍，接种给10个人。他们还把进入人体内产生毒素的芽胞，又接种给另外两个人。被接种破伤风毒素的人，有3名死亡。①

1943年5月由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调至七三一部队担任实验分队长的山下升在供述他所犯下的细菌杀人的罪行时说："我在七三一部队是专门负责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特别是搞灌菌试验。强行灌菌的对象有中国人，还有俄国人，同时还有女的。在我担任细菌实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仅灌菌试验就使用了一百多名

①《朝日新闻》，1984年8月16日.

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方法的试验把他们都杀害了”。①

二、三种细菌传染方法的对比试验

1942年1、2月间，川岛队三谷班每次选定45名被监禁的“犯人”，作为鼠疫菌注射、埋入和内服的三种方法对比试验的对象。每种试验使用5人，每5人为一组，分别注射0.1克、0.2克、0.3克鼠疫菌液。埋入量和内服量与注射量相同。结果证明，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的被实验者一天以后即死亡；其次是埋入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传染法，经过6天才能使人死亡。②

上田弥太郎把这三种试验所产生的效果，制成了比较表。因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注射传染法的研究上。

1943年1月中旬，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由宇野诚技师负责，以试验鼠疫菌毒力为目的，对监禁在特设监狱的两名中国人进行菌液注射试验。田村良雄作为助手参与了这一杀人活动。

这两个人很顽强，怒骂他们是“白衣野兽”。特别班的和田雇员帮着把这两个中国人强行捆绑起来。宇野诚技师将准备好的含量为0.03瓦的鼠疫菌液，给被实验者注射1CC。3天以后，这两个人感染了鼠疫重症，不久便死去了。

由于他们在进行实验中，经常遇到被试验者异常激烈的反抗，但又为了达到试验目的，所以就不得不施展种种欺骗手法。

---

①中央档案馆档案：山下升供词

②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

1942年10月，宇野诚技师让田村良雄协助他做一次细菌试验。这次，他们欺骗5名被监押者说是进行预防注射。首先对被监押者各抽5CC血液，测定其免疫价；次日，对其中4人都注射了4种混合疫苗，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对另一人始终没有进行预防注射。11月中旬，他们进行细菌传染试验时，又欺骗被试验者说，只有进行第二次预防注射，才能防止疾病传染。于是，他们又一次对4名“犯人”通过抽血测定免疫价，然后对所有的5人分别地注射了含有0.05瓦鼠疫菌的液体1CC。注射之前，他们特意把贴有“抗百病疫苗”字样的药瓶拿给被实验者看。三天后，被试验者都发了病，在隔离期间有3人死亡。死者被送第一部的笠原班，由铃木启之执刀，一个一个地解剖了。其余两名感染鼠疫病的被试验者，被送到诊疗部。这种所谓“治疗”，仍是“白色野兽”进行的试验。最后，还是充当了刽子手的牺牲品。①

三、“A”号实验队

据历史档案的记载，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班于1942年5月中旬成立了代号为“A”的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方法制造的疫苗，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疫苗，对活人进行两种疫苗的对比性实验。实验地点在“特别班”7号8号牢房内。

在监号里选定了20名被实验者，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首先对他们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霍乱疫苗，还有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这些活动是小林嘱託和细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

井技师亲手干的。

山内是第一次进到对日本人来说都是秘密的场所，一无所知，于是好奇地问班附小林准尉："被试验的都是什么人"？小林恶狠狠地说："是匪贼！这不是部队随便抓来的，都是经军司令部许可，由外部送来的死刑犯！用不着担心这些，只有好好工作就是了"。

免疫处理20天后，进行了人体的感染试验。川名技师和千叶技师把霍乱生菌混入牛奶里，让被实验者喝下去。感染用的霍乱菌，对人的致死量为1‰克，而这次用量是2‰克，因此，被实验者根本没有活命的可能。然而，实验结果是，接种超声波疫苗的人中，除1人稍有头痛和腹痛之感，第二天就复原外，其他人无任何反应；被注射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疫苗的人中，多数上吐下泻，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被预防接种的那4个人都先后发病，第三天皆死。后来，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这种类似的试验，都证明超声波疫苗具有特效。于是，石井四郎便命令菌苗班大量生产超声波疫苗。

9月下旬，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发生了鼠疫。与此同时，农安县也发生了鼠疫。对此，石井四郎欣喜若狂，因为这对他们到预谋的鼠疫地区去进行实地研究大有好处。于是，七三一部队紧急组织了所谓的"防疫班"，石井四郎也亲赴疫区督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挂在长春街头。

石井要求菌苗班迅速提供大量的鼠疫菌苗。因此，菌苗班全员出动、昼夜不停地赶制。但由于混入的杂菌多，延迟了供菌的进度，渡边在电话里受到石井四郎的叱责。渡边说明设备条件有限，又遭到石井的大骂。为此渡边当夜乘火车去长春。可是，第

二天早晨，在长春大和旅馆前发现了渡边的尸体。传说他死于交通事故，但七三一部队的一些人都认为是被石井四郎害死的。这件事引起了菌苗班的人心浮动，不少人想离开七三一部队。为缓和矛盾，石井四郎一反常态，答应了菌苗班去大连卫生研究所的要求。同年12月，山内雇员和石井雇员带着4台超声波设备，先行去了大连。

四、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见闻和罪恶活动的自述

川岛队三谷班是鼠疫研究班。它不仅研究鼠疫菌种，而且还亲自做验证毒力的活人试验。上田弥太郎雇员就是曾经多次作过活人实验的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作为江田武一曹长助手的上田弥太郎雇员要到7号栋监狱去，对牢房受过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进行病变的观测。这是他的本职，天天要这样做。当时，江田提醒他在里边不准随便说日本话，并带有神秘的语气解释说："里边押有朝鲜人，他们都会日语"。江田又嘱咐他："所拿的器械不能放在窗台上，注意不要把手伸到窗口内。那里的爱国分子很厉害嘿！弄不好，他们抓起器械砸你，或者把你的手折断"。

上田在入口处，出示了"特别许可证"，并领了一张"细菌试验观察记录表"。记录表印有编号，还有记载体温、白血球、红血球、白色素、血沉、血压、血的培养等栏目。这张表不论用或不用，既使填写废了，也不准随便丢失，用后必须交回。上田跟着江田到7栋内南侧楼下的一个牢房前。这里边监押着5个人，他们的实际年龄都不太大，大约二、三十岁，非人的折磨使他们变得苍老。一天前，他们接受了一次鼠疫菌液注射试验，如今虽

然还能走动，但距离死亡为期已经不远了。上田按照号码分别把他们叫到观测窗口前，按观测记录表上的要求逐项检查，并进行填写。第三天，上田照例去这个牢房观察时，发现一名被试验者死了。他立即通知警备队人员，把尸体送进了解剖室，进行了解剖，最后，尸体被推进特别班的焚尸炉里烧掉了。由于上田担负着填写观测记录表的任务，所以，他经过鼠疫菌液试验的全部过程。最后，将这个项目都填满的表交给了江田曹长。

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上田又按照小林松藏技师的命令到了7号栋内北侧楼下的牢房对5名被试验者作观察记录。当他在一个被试验者右臂动脉管上抽血时，发现那个人胳膊上有注射针眼，知道对这个人的试验的时间不太久。次日，当一名被试验者死后，上田跟随推尸小车来到解剖室。这次，他看到的是执刀者采取的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分别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这具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天下午，上田又看见两个被试验的人死了。其中一名年纪约30多岁，手指特别细，看样子不象经常劳动的人，是不久前被抓来的。其余两名幸运地活下来了，一周后复原。上田明白，他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不久就会在另一次或另一种试验中死去。①

如果说，上面这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50年代初的供述还不够具体的话，那么，再看一看另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80年代令人毛骨悚然的自述和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认识：“在我的眼里，那些要亲自制止灭绝人类的细菌战的中国人，其形象当然不会变化。‘只有把这些家伙顺利地用于实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无论如何，我绝不后退’。我看了一下表，偷偷地溜了出来。这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供词。

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走上了研究室的楼梯。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恋于疯狂的杀人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精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即"马路大"之意，日语）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劈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我送去被惨杀者的尸体之后，快步走近三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

哇……………………………

'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眼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

‘畜生！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

‘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

‘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①。

“731部队的极恶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

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手或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践踏国际法规和人道原则’的恶劣典型。

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爪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追悔莫及。

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决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当化或美化的风潮”②。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谴责，对日本那些至今仍别有用心地否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七三一部队细菌战活动的人是一个有力批驳，他们应该承认事实受到教育，有所醒悟。

五、在城乡各地居民区的实验

七三一部队不仅用“细菌武器”残杀狱中的人，而且把实验范围扩大到其他中国百姓的身上。1940年9月，第四部今野信次技师

①② ［日］田村良雄(防疫诊疗助手兵长)：“细菌战—731部队的野蛮行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

指挥田村良雄等3名工作人员，将鼠疫菌配制注射剂，装入2000支500CC容量的瓶子内，转交给诊疗部。他们通过所属的医务室，以预防注射为名，把鼠疫菌液注射到居住在七三一部队附近的中国人身上。被注射试验的人都得了传染病，并有2人死亡。除此之外，七三一部队还经常把大量的鼠疫菌注射剂，转交给由诊疗部、第三部人员参加的"防疫班"。在长春疫区，他们当作预防剂使用，后果是把人全部治死了①

在海拉尔以南150公里的鄂温克旗的辉索木，日本宪兵逮捕了企图杀死日本特务上牧赖三郎的蒙古青年牧民马萨尔等人。几天后，马萨尔等被杀害，两名青年被放回辉索木。被放回来的青年都发高烧，上吐下泻，两三天即身亡。接着，在辉索木就发生了类似的传染病，瘟疫在迅猛地扩散着。辉索木的牧民要求日本人给予防治，但他们不敢到辉索木去，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一种汉族常发的病症，没有灵丹妙药，就是"天神"也是无能为力的。结果，辉索木在这场瘟疫中死了240多人。后来查明，被放回的那两个青年在监狱里时，五四三细菌部队曾给他们进行了菌液注射，并让他们吃放进了细菌的面包和奶茶。实际上，这是海拉尔支队在少数民族地区秘密进行的一次细菌传染实验。

这样的罪恶活动，不止一次，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员关孝证实："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七三一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这种试验把人和动物都杀死了。岛崎参与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

在日本侵略军盘踞中国东北时期，不少地方出现了病原体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

不明的无名热。因它多发生在虎林、孙吴一带，故称“虎林热”和“孙吴热”。当时在满洲医大任教的北野政次，对此很感兴趣。他企图将这种流行性出血热变为“细菌武器”。当他担任七三一部队长后，立即把它作为主攻对象。在他指挥下，第一部笠原班发现了其病原体是滤过性病毒的一种，是用显微镜几乎都看不见的极小的微生物，寄生于老鼠的“扁虱”体内，并以“扁虱”为媒介传染病毒。北野曾说：“从扁虫体内抽出毒液，注在猴子身上，让它罹患流行性出血热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能证明扁虫体内藏着这种病原体，但不能证明能够传染于人。如果证实扁虫体是这种无名热的传染媒介，还要根据对人体的实验才能得出结论”。① 这表明，北野政次要进行“活体试验”。1944年12月，他在由各部长、支队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意地说：“将流行性出血热的患者血液给猿注射上，猿便呈现出和人同样的症状。寄生于流行地带鼠身上的壁虱，将其血液也给猿注射，同样可以发病的”。可见，北野政次已经完成了对活人进行的这种传染实验。

六、残酷的毒气试验

毒气试验是七三一部队在以活人为材料的试验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七三一部队的实验人员每天三次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试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

1942年2月，由于被试验者的反抗，打乱了技师伊藤的注射试验的计划。于是，他们气急败坏，使用毒气将7号牢房的人全

---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榊原秀夫的证词。

部毒死。这个日本刽子手竟毫无人性地说："正好要搞一次毒气试验，那就让他们先享受享受吧！"①

同年4月，又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对活人的毒气试验。那天，第四部第三班正准备研制鼠疫干燥菌，要到第一班去取生菌。当上田弥太郎路过中心走廊时，突然闻到从7、8号牢房散发出来的浓厚的瓦斯气味，并被熏得睁不开眼睛，流着泪。

七三一部队在特别监狱里更大规模的使用毒气杀害被关押的人是在1945年。当时，7号牢房二楼的一个房间发生了暴动，发起者是一位苏联人。这些被关押者采取的办法是，有人向特别班谎报说那个苏联人得了病，把看守的日本人骗进牢房时举事。果然，在日本警备人员进入牢房内查看时，那个苏联人突然地跳起，抡起铁铐将其砸昏，随即夺得了手枪和开牢门的钥匙。然后各室也冲出牢房，但因整个监狱的大门锁着，造反的人在走廊里东冲西闯，跑不出来。于是石井四郎当即命令使用毒瓦斯，把7号房的人全部毒死。为此，七三一部队还曾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责备。②

七、冻伤试验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专设了一个冻伤研究班，班长叫吉村寿人，因此，对外称"吉村班"。它研究的内容有：人在什么样冰冷的气候下能冻伤，不同程度的冻伤会带来什么后果，怎样治愈冻伤。

七三一部队研究冻伤完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供词。

②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供词。

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遍了整个中国东北。同时，它还准备北进苏联。这样，它就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严寒地区条件和在严寒地区作战问题，于是，七三一部队承担了预防和治疗冻伤的研究任务。

他们感到，冻伤试验以动物为对象，不能取得直接的效果，因此必须用人进行。

平房位于北纬46度，每年的1月、2月和12月天气最寒冷，有时低于零下35°C。吉村班常常利用这个天然实验场对活人进行冷冻试验，把作为“特别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苏联人、还有女的，从特别监狱押出来，关进桶式的大院里，让其带着手铐脚镣，在端着上有刺刀步枪的日本兵和手持木棍的特别班队员的监视下，露出手、脚、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试验。在严寒的室外，他们都陆续失去了知觉，当吉村班的试验者用木棒敲他们的胳膊和腿发出“梆梆”的声音时，才将其一个一个地拖进室内。

吉村班对活人的冻伤试验，还经常改换方式。“抗寒”试验就是其中的一种，1940年冬天，细菌研究室的山内丰纪雇员无意中透过窗户发现，在吉村的亲自监视下，院子里有6名中国人都穿着单衣背着很重的物品，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段反复吃力地走着，连续进行了10多天。山内丰纪观察发现，开始时他们都很健壮，后来逐渐地消瘦，当体力消耗殆尽的时候，活动也就停止了，不久便产生冻伤，人员也逐渐地减少，最后都无影无踪了。

山内丰纪联想到夏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吉村班的人迫使几名中国人作类似这样的活动，累得他们满头大汗，最后晕倒在地。他晃然大悟，那是进行耐热的实验。至于那些被试验者命运如

何，山内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但他想到是不会活着出去的。①

后来，七三一部队的冻伤试验可以在室内进行了。1943年4月，上田弥太郎奉命到7、8栋特设监狱里给被试验者测量体温，突然传来一阵拚命的叫喊声，他看见2名警备队队员和3名冻伤研究班的人把1名中国人往一个玻璃屋里推。这个玻璃小屋就是吉村班的冷冻实验室。只见穿着棉衣的警备队员，强行将这个人的手浸在结冰的水盆中，不一会又给拽出来，旁边电扇开动着，那个人在痛苦中倒下去，造成了冻伤。至此，残忍的室内冻伤试验告一段落。不久，上田弥太郎在7栋监狱里看见了这个被试验者，他的手指已被切去，只剩下光秃的手掌了。②

在1943年夏季，吉村班在四方楼外东北修筑了一座更大的冷冻实验室。从此，冷冻试验随时都进行了。

解冻试验是很残酷的。七三一部队队员用凉水往一部分被试验者身上泼去，顿时他们的冻伤部位结上一层冰，不一会，冰便融化了，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着。另一部分被试验者的手脚被插进温水或热水中，立刻红肿起来，有的还脱了皮。不少被试验者在折磨中死去；幸存者得不到治疗，冻伤部位溃烂，骨头变黑而被截去。

对冻伤进行"治疗"，也是一种残忍的试验。有的轻度冻伤者被涂上治冻伤的药膏后，虽然生命保住了，但留下的手指和脚趾都是残存不全的。被涂上染菌药膏的人，他们处境更坏，往往死在得不到治疗的人的前面。

这样，七三一部队通过在被试验者身上进行冻伤、解冻和

---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山内丰纪的证词。

②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言。

“治疗”试验，得到了资料。

八、解剖台前凶残无比的刽子手

七三一部队对人体细菌传染试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和病理观察三个阶段。它的解剖观察，一般是作尸体解剖，但根据试验的需要，也搞活体解剖。活体解剖是对病体的解剖，也对个别健康肌体进行解剖，其目的是为了作对比性观察。

无论是对人的病体解剖还是对人的健康肌体解剖而取出的脏器，都作为标本陈列保存，以供病理研究。

田村良雄说：一天，跟着宇野诚技师进了特别班的解剖室作解剖前的准备。解剖室里有三张解剖台，一张解剖台的排水口正往下滴着鲜红的血，滴进放在下面的玻璃瓶里。消毒器里正在咕嘟咕嘟地煮着解剖器具。这里刚刚作完解剖。另一张解剖台上，早已停放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他是一个等待死亡的被试验者。现在就要对他进行解剖观察了。

这时铃木启之少佐和带班的细矢技师走进解剖室，他们都穿着橡皮防菌衣。随着铃木“开始”的命令，细矢暗示田村递过来解剖刀和止血钳，早已被泼上消毒水的那个中国人，脸庞紫胀，口在流着血，呼吸极度困难，处在昏迷中。铃木看了中国人一眼后，又下令注射强心剂。被注射了樟脑液，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凝视着棚顶，从极干渴的喉咙里，象要发生追究暴行的叫声似的，但是不能出声，嘴仅是动动而已。

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矢，用右手的手术刀咔嚓一声，沿着

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血吱的流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把头左右摆动。这一来，颚部的绳索勒了进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我惊慌地擦去血。拿止血钳子等着的宇野，用钳子搅弄伤口，一看见颈动脉，咔咔两下便夹住了血管。细矢用手术刀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中国人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从颈动脉流出的鲜血，流进了我拿着30CC的软木塞瓶，不一会儿，忽然停止了。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迅速地变了脸色，咽了气。

细矢倒拿着解剖刀，从上腹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向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拉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分别拿着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疗用玻璃器皿，等待露出内脏的这三个人，是抓住人肉不放的饿狼。他们为了制造细菌疫苗杀害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分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我们看着这个被惨杀的身体，像吃饱了的狼。

过了一会，他们又回到解剖室连续"作战"了。这一次要做的是须藤良雄，是不许说的绝密！大木拍拍我的肩膀——这是很少有的动作，然后开始穿防菌衣。他说："让须藤良雄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效忠天皇陛下呀！"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为五天前鼠疫菌的大量生产而感染了鼠疫菌。七三一部队出于细菌战的需要，把他也放到了监禁中国人以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班里，并送进了解剖室。

须藤良雄赤身露体地由特别班班员抬到解剖台上。直到四五天前谈起女人还很活跃的须藤，现在完全变了样了。他只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有无数紫色斑点，由于过分痛苦而搔伤了一大片胸

部，血从撕破的伤口那里冒出来，在睁开的发呆的眼里流下泪水，嘴巴松驰无力地张着，痛苦地喘着气，一起一伏地抽动着肚子。

我很早就和须藤交往。我开始用消毒水擦抹须藤的全身。为了装作心情平静，我尽可能干得粗暴些。大概是消毒水的冰冷，恢复了他的知觉。他睁开茫然若失的眼睛，动了动脑袋，想要环视一下周围。每动一次，颈上的绳索就勒紧一下。由于痛苦，他脸已变形，咕嘟咕嘟从嘴里吐出黑紫色的血。铃木把须藤全身检查完毕，下令开始解剖，并命令我从消毒器里取出解剖刀。“为天皇陛下效忠”。把解剖刀递给了细矢。反握着解剖刀走近须藤的细矢又把解剖刀交给了宇野。宇野接过解剖刀，为了看清切的地方，开始抚摸须藤的肚皮。完全想的是给自己治疗的须藤，正在挣扎之中。拿着解剖刀的宇野，手稍微有些震颤。这时，大木用歇斯底里的声音高喊：“快干”！宇野反握着解剖刀，刺进了须藤的上腹部，往下切去。他用翻手刀撕开胸部的皮肤，血流向解剖台的血池，啪嗒啪嗒地落下去。

“畜生！”从流着血的须藤嘴里，喊出这样一句。与此同时，在解剖台上，内脏明显地露了出来。他死了。

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里，铃木启之少佐正用显微镜观察着活蹦乱跳的鼠疫菌。对须藤良雄来说，他的死是自作自受，死有余辜，毫不怜悯。然而，他死于七三一的解剖台上这件事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连同类也不放过，大下毒手，其兽性、无比的凶残性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九、惨死在解剖台上的中国少年

1943年，七三一部队想用一个男性少年作为实验材料，进行

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特设监狱里没有这种“实验对象”。于是，他们按照北野部队长决定，去寻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少年。但是，为了避免造成意外的麻烦，他们没有从平房附近捕捉，而是采取了“外部进货”的办法，这个任务交给了七三一部队的宪兵室。在春田中一翻译官的指使下，“协防班”成员奔赴长春，在长春街头寻找。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门前，发现了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中国流浪儿，于是，便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并带回平房，关进了七三一部队的拘留所。当晚，春日中一来到了拘留所，把这个小孩领走了。这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被带进解剖室后，被扒光衣服，推到铁制的手术台旁。几个“白色野兽”扑了过来，将其按在手术台上，用扣带紧紧地固定住了挣扎的四肢。在小孩身上用酒精棉擦拭消毒后，便注入了麻醉剂，不一会他就失去了知觉。“白衣野兽”们找好部位，一刀将腹部切开，直到变成一具空壳的尸体后被秘密地投入炼人炉。

第二天清早，春日中一有意识地来到了拘留所。当“协防班”人员问及那个小孩怎么处理的时候，春日中一假惺惺地说，他是一个要饭的流浪儿，经审查他没有什么问题，怪可怜的，昨天晚上就把他放走了”。“协防班”的人都不相信春日中一的话是真的。

战后，原七三一部队的一名队员承认了这一事实：“把抓来的一名年仅12岁的少年进行活体解剖，肠、胰腺、肝、肾、胃等各种内脏，从睡眠状态中的少年体内顺次取出，经一一分理，砰、砰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

抽动。”①

十、阴森可怕的焚尸炉

随着细菌部队的高大建筑物的落成，在四方楼西北20多米处也竖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它几乎昼夜不停地吐着滚滚的浓烟，顺风时可以闻到从浓烟中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异味。它四周用2米多高的木板墙挡住人们的视线，不许中国劳工靠近它，更不让他们知道它的用途，有一次，中国劳工王志兴指着大烟囱问日本雇员户口：“那里边炼的是啥，怎么有一股腥气味？”户口有意地嗅了嗅，不耐烦地说：“中国苦力的说话的没有。这是军事秘密，不许随便打听。”在仓库服役的中国劳工王英富也曾问过一个与之很熟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却直言不讳地说：“人死啦的，马死啦的，那边火的给。”于是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座焚尸炉。

石井动物饲养班里饲养的各种动物，大部分只供抽血用的。因为每天都有日本人轮流地抽取各种动物血，所以经常有不少动物死去。抽血死去的马、牛，日本人从来不食用它，也不让中国劳工吃，一律投进焚尸炉炼掉。一次，由于石井班对马抽血过多，一天就有3匹大洋马死掉。日本人命令中国劳工王继学用马车把死马送到焚尸炉的停尸房内。当他往下卸死马的时候，竟在另一排停尸房内看到有几具尚未炼掉的人的尸体。他第一次知道这座焚尸炉真正的用途。

这些待焚化的人尸是从哪里来的呢？1943年6、7月间，中国劳工陈方东看到从铁路专用线旁边开过一辆像冷冻车似的汽车，

---

① 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第一部。

进了焚尸炉大院后，七三一部队队员立即把大门关闭了。中国劳工任广全告诉大家："这冷冻车是拉人的。那里装的大部分是死人，也有活着的，他们哼哼呀呀的声音都能听到。都运到焚尸炉院里去了。"所以，每当"特别汽车"开进焚尸炉大院之后，焚尸炉的大烟囱就冒烟了。这样的事大部分发生在夜间。这些尸体来源包括安达特别实验场在内的野外实验场。七三一部队把在野外进行细菌实验而致死的人体，都一个不少地用汽车运回部队，投进焚尸炉。还有大量的尸体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每个实验室以平均两天实验三个人的速度，把"实验材料"从特别监狱押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转运解剖室，最后由解剖室通过地下暗道送至焚尸炉。甚至有的尚未咽气的活人，不经过解剖，径直地送去火化了。这是七三一部队用细菌杀人的全部过程，也是消灭"实验材料"的主要途径。他们的这个秘密，曾被中国劳工杨准昌发现。炼人炉内像铁柜似的，每个铁抽匣里放一个人，浇上汽油，就开始火化。此外，从大烟囱吐出的烟雾，也露出了他们的破绽，每当气压低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异味。于是他们采取了保密措施，即借助于本部队特设的气象班提供的天气预报决定开炉、停炉。这种措施虽然能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但不能满足七三一部队的需要，因为它每天实验致死的尸体有20多具，①如果不连续地焚化，就发生积压，停尸房里装不下。特别是夏季，尸体停放一天就会发臭。如果遇到鼠疫传染致死的尸体，停放时间越久，所带来的威胁就越大。于是，七三一部队决定增设焚尸炉。增设的焚尸炉在北岗上。由于这里地势高，不论什么风向和风力，随时可以开炉。但是有时还能闻到炼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山下升的证词。

尸的气味。于是，他们又把烟囱接高几米。这座焚尸炉建成后，日本人公开让中国劳工运送死去的动物，这样，给外界的印象它是炼马炉。

七三一部队虽然对焚尸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致命的漏洞。例如，炼尸本是一种肮脏、危险的活，似乎应该交给中国劳工去干。可是，却全部由日本队员自己干，这就明显地暴露出焚尸炉与它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是连在一起的。

各个实验场及野外实验活动

七三一部队在准备生物、化学战的过程中，还不断进行野外实验，检验它制造的各类细菌、病毒、毒药以及化学毒气武器的效能。他们往往把各种各样的实验叫做“实战演习”。

为了进行野外实验，它在东北各地设立了一些实验场。这些实验场都是按照他们试验内容、目的的需要及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确定的。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固定的。如在七三一部队附近地区的城子沟和安达、佳木斯、陶赖昭等地设置的实验场。较为常用的是安达特别实验靶场。

另一种是非固定的。如在肇东县的满沟、呼伦贝尔草原、东北东部的山区等地设置的临时实验场。

在这些实验场中，既使用伤害人体的各种细菌、病毒，又施放对牧畜传染的各类细菌，同时还兼用各种类型的毒气。使用的品种、数量，依据实验对象而定，有时单品种使用，有时采用多品种，甚至必要时，采用细菌和毒气的混合型实验法。当进行综合性实验的时候，七三一部队，一〇〇部队以及五一六毒气部队都派人员到场，甚至在各个实验场附近地区的日本各军事团的“细菌、毒气谋略队”也参预这种活动。因此，无论是固定实验场还是临时实验场，都是杀人场，而且是比实验室更大规模的，更残酷的杀人场。

城子沟实验场

城子沟是辽金时代的古城址，方圆约9万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土墙，并有城门四处。七三一部队把它变成了进行各种细菌、毒气试验的实验场。

从1941年至1945年度，正黄旗三屯的鞠复庆、侯安钦、吴帮富、王凤喜、鞠复智、侯克才等人多次看到七三一部队在这里进行细菌或毒气实验。有一次，在土城中心竖立的几十米高木架子的顶端插上了一面作为目标的红旗，日本兵在土城四周半公里之外站岗放哨，他们还鸣枪把在田间劳动的或过路的行人撵回村屯，实行戒严。

一辆装有马、牛、羊、猴、兔、鼠等实验动物的汽车开进土城后，城门用木板堵住。这时，飞来一架无标志的飞机，在城子沟上空约200—300米的高度，对准插红旗的地方连续投下几颗炸弹。顿时，随着一阵闷声闷气的爆炸声，几股烟柱从土城内缓缓地升起，顺风飘散。与此同时，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七三一部队的队员蜂拥而进。他们在检查实验的效果，记录着有关数据。

演习之后，城子沟附近村屯的农民到土城里种地时发现，在一堆堆尚未烧尽的木炭中有被烧焦的各种动物尸体；灰堆旁边的庄稼和草棵上还沾有点点血迹？铲地过程中还能看到外皮为紫色内为白色的细菌炸弹碎片。后来得知，这次搞的是炭疽菌的传染实验。

对七三一部队在城子沟进行细菌实验的情况，上早班的二木班马舍的中国劳工任广全说：1944年的一天早晨，他一进马舍，就发现马舍里缺了不少马。刚要下夜班的劳工悄悄地告诉他，昨天

晚上9点多钟，几个日本人闯进了马舍，选了几匹大洋马，让中国劳工牵到室外的马桩旁，并用绳子将马固定在马桩上。日本人操起战刀朝蹄子上部砍去，马腿的动脉血管被砍断，鲜血直流。他们连夜把受伤的马匹运到城子沟去搞实验。马被烧焦尸体还堆在那里。

原劳工大队长朱有礼从日本翻译春日口中听说，城子沟不仅是七三一部队的细菌实验场，而且还是毒瓦斯实验场。日本人把各种动物赶进土城，用飞机投扔毒气弹，各种动物被毒死，他们对毒死的动物就地解剖，把其内脏器官带回部队，剩下的尸体就地浇上汽油烧掉。

曾在七三一部队工务班当过劳工的韩行岩回忆说：他13岁的那年夏天，看到从七三一部队来了一队日本兵，往空中打枪，吓唬他们快点走开。他出于好奇，躲在附近的苞米地里偷看，发现在城子沟四周都设了岗哨。不一会开来了几辆大汽车，有的装着马，有的用笼子装着黄鼠、江猪。最后一辆是带铁棚的汽车。日本人把马牵进城子沟的土墙里。那些笼子里的动物也被抬了进去。从铁棚汽车里押下几个带着脚镣子、蒙着眼睛的中国人。当把这些人押进土墙里边后，土墙的断口处就用席子档上了。又过了一会，一架飞机对准插有一面小红旗的大木架子往下投炸弹。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他顺着苞米地逃回了家。第二天，他又特意到城子沟去，看见土墙里边有两三个熄灭了的火堆和几只死鼠，火堆旁边的草上都溅有血点。

七三一部队在城子沟搞毒气试验，中国劳工李增印也曾看见过。有一次，他病休在家，听说七三一部队又要搞试验时，就从门缝往外看，发现有两辆“特别汽车”径直开进城子沟土城里，

过半天的时间，“特别汽车”才又开回部队。事后，他和几个人到现场去看，还能嗅到毒气的味道。

城子沟进行毒气试验，在七三一部队食堂当伙夫的中国劳工付景岐曾身临其境，不知不觉地当了一次被试验对象。他说，1945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七三一部队教育部的大院里停放着几辆大汽车，日本兵正在集合站队，准备进行军事演习。食堂的10名伙夫也带着炊具随军行动。汽车都用绳网罩上，并插些长叶的树枝，每人的头上都戴个柳条圈。七三一部队企图迷惑中国劳工，汽车出了营区一直往西开去，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了双城堡。汽车在双城堡转了一大圈后又往东行，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来。我们认出了这是城子沟。下车后，教育部的教官田中少佐命令一部分日本兵站岗。随后给我们10名伙夫每人发一条白色毛巾，让自己浇上尿，捂在嘴上，外边罩上防毒面具。准备就绪后，命令我们面朝西的爬在东边土墙上。我们偷着往土墙内中心看，那里立着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大木架子，顶端插着一面小红旗。木架子用一圈苇席挡着，里边一点也看不见。不一会，七三一部队的特别囚车停在土城的北门，从车里押出几个人，并一直带进苇席圈里。这时，一架飞机低空盘旋，连续往苇席圈里投了几颗炸弹。炸弹爆炸的声音不大，但它一落地，就有一股浓烟从土城中腾空而起，形成巨大的烟雾，遮得连苇席圈都看不见了，大约十几分钟才散去。几个穿防护服、戴防毒面具的七三一部队队员，冲到苇席圈里，抬出些“东西”，装进了特别囚车。10名伙夫不但没有在野外作饭，而且送回部队后又休息了一天。照常上班时，不让他们下厨房，只在屋里呆着。日本军医来一边给他们检查身体，一边问那天闻到什么味没有？他们回答说，除了尿味外什么味也没

闻到。于是，日本军医说可以照常下厨房了。

对付景波所谈的上述试验情况，一个叫卢田的原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于1937年到平房访问时说：七三一部队毒气班不止一次做过这种试验，其目的是既检验毒气弹的效能，又检验防毒面具的功能。因此，检验毒气弹效能的试验，要以被监押人员为对象，因为他们的死活是无所谓的；而检验防毒面具功能的试验，要用中国劳工。一旦防毒面具功能差，被试验对象就可能中毒，但不会死。

另一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访问平房时说：七三一部队担当毒气试验的是吉村班，送进毒气试验场的"材料"主要是经冻伤试验和血清试验而幸存的人。他们手脚已经腐烂脱落，身体象被漂白过的一样，除了还剩一口气之外，简直就是一架活骷髅。他们被装进特别囚车，是从七三一的后门运往毒气实验场去的。

据当时在毒气实验场工作的原七三一队员回忆：从特别囚车上下来的人，被一个个转移到台车上。台车有手推车的一半大，上面装有一根柱子。被试验者被绑在柱子上。台车可以在铺好的轨道上移动，沿着轨道直接进入实验室。镶有玻璃的小屋像公共电话亭大小。一打开小屋的门，绑着活人的台车就可以推进去。尔后，门立即关闭，实验就开始了。

据七三一部队和五一六部队队员一致证实，在镶着玻璃的小屋里，每次实验时，都将鸟、豚鼠、狗、鸡等和活人一起放进去。根据所用毒气的种类和浓度，也改变被实验者的装束，有时让被实验者戴上防毒面具、穿军装进入实验室；有时让他们露出皮肤、只穿裤衩进去。象小温室一样大的实验小屋就有六七个人在围着它忙碌。

七三一部队的毒气实验场不止城子沟一处，在距七三一部队西北4公里远的洼地和七三一部队飞机场北边500米远的地方都曾设置过。后一个地方修筑着半卧式掩体、外人称它为航空班特别靶场，也进行过以活人为对象的毒气实验。

二、安达特别实验场

安达镇位于滨洲铁路线上。1941年，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为了进行室外细菌实验，在该镇东18公里的仅有40户人家的鞠家窑附近秘密设立了一个特别实验场（也称安达特别靶场）。实验场本部设在距鞠家窑1公里远的一个土岗上，周围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

它隶属于七三一部队第二部（细菌试验部）。这个实验场是在附近村屯征派中国民工修建的。建筑材料都是从七三一部队资材部运去的。这里的建筑有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由于地下工程对外保密，往往都在夜间突击施工，连参加地下工程施工的中国劳工也不知道它的用途。

这里的大草原长的是碱草，而且比较平坦、开阔，稍加修整便可成为一般飞机的跑道，即使雨天，飞机也可照常起落。

经过两年的修建，建起了4栋约有70多个房间的地下室，做为营舍、实验室、汽车库、食堂、浴池；地上建筑都是简易板房，有仓库，井房子、马棚、猪圈以及鼠舍。在实验场区分别竖起了4个三角形的大铁架子，作为投掷细菌炸弹的标志点。

为了保密，实验场四周拉上铁刺线，设置岗哨，不准中国村民靠近。中国居民站在远处，只能看到有飞机起落，偶而看到有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日本人在营区里走动。日本人在这里饲养着供

实验用的各种动物，其中有马12匹、牛60头，还有不少鼠类。他们饲养的20多头猪，除日本人食用外，也供实验使用。

在营区东南的地下室里经常监押着一些在实验之前从平房运来的“实验品”。另外在一座不大的木板棚内和一处地下室内，散放着不少铁板和80多条带血的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棉被。这是被实验者用过的防护器材。

1943年以后，日本飞机起落更加频繁了。每当机场的十几米高的旗杆上升起红白色的风向筒时，日本兵就把在地里干活的中国农民撵回鞠家窑，村东口也被封锁起来，村里的人不准出屯。这样的戒严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周围的中国人从远处看到，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便扔下炸弹，把运进特别实验场的马匹炸伤，进行炭疽热菌的传染实验。据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在战后证实，对这些被炸死的马经过细菌检查后，偷偷地就地挖坑埋掉，几次实验大约用了100多匹马。

鞠家窑的关占和在安达特别实验场当劳工时看到，用马进行了4次实验，每次10匹马。投弹前把马栓在靶场上等距钉好的马桩上；实验后，经日本人查验，把死马埋进已挖好的坑内。有时实验之后，日本人还把死马、猪、狗拣回去，通过对动物尸体的解剖来检验实验的效果。

对动物进行细菌实验，往往是以侵驻长春的一〇〇部队为主进行，七三一部队加以配合。如果对活人和动物混合试验，或者就是以活人为实验对象，那就要以七三一部队为主了。在安达特别靶场所进行的细菌实验，多数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1944年冬的一天，七三一部队队员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镣的人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间隔20公尺距离的木桩上，飞机

从低空将炭疽弹投向目标，炸弹爆炸后使人感染肺炭疽或皮肤炭疽。然后，将被试验者运回实验室里检查感染发病情况。最后，也是在"治疗"之下残酷地杀害，尸体供病理解剖之用。据原七三一部队雇员上野说，参加实验的汽车从安达靶场回来，汽车上的尘土里都沾上了细菌，把这尘土抹在培养基上又生出菌来。①因此每当参加实验的汽车回来后，都要进行全面消毒。

七三一部队还曾组织有关人员参观在这里进行的野外实验。1945年4月，第二次支队长会议刚刚结束，石井四郎对大家说："今天，在安达搞一次演习，支队长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机去开开眼界。"各支队的人很难得这样的机会。于是，很快地作好了去的准备。下午1时，海拉尔支队长加藤恒则、牡丹江支队长尾上正男、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和第一部的肥之藤少佐一同搭乘航空班长平泽少佐亲自驾驶的轻型轰炸机到了安达机场。在靶场，第二部的碇常重中佐等人及靶场的30多名士兵正在进行"演习"的准备。不一会，又有一架运输机飞来，警备人员从机上押解下来4名身穿日军军装的人。这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的泄密事故，而进行伪装了的被监押的中国人。被实验者都被反绑在实验中心的每隔25至30米距离埋设的一根木桩上。

当参观者穿上防护服，退到隐蔽地之后，一架轻型轰炸机飞临"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不少颗"石井式炸弹"。这些炸弹在50米高处爆炸，里面填装的炭疽菌迅速飞散。被试验者被弹片擦破皮肤的感染上了皮肤炭疽；吸入鼻腔内的得上了肺炭疽。榊原秀夫证实说："当我们先行乘机返回平房的时候，那几个中国人还在那里绑着。听说消毒后，被押回部队监狱，观察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野的证言。

其病变情况，死后又作了尸体解剖”。①

三、陶赖昭实验场

陶赖昭实验场距陶赖昭车站1公里左右。它是靠近松花江的一个天然砂场，面积很大。1941年9月的一天，刚一上班，小林技师把上田弥太郎、细昭清一、中村道夫等3名雇员叫到他的实验室，向他们布置了准备1000个玻璃皿以及玻璃试管的任务，并要求一天内完成。于是，他们开始进行这些器具的消毒，并将它们装入几个特制的包装箱内，送到了停机坪。当晚，第三班副班长江田武一在其召开的全班人员会议上说："明天要到陶赖昭去实战演习，石井命令要组织50人参加实验队，要我们抽调20名人员去。"第四部第三班去参加这种"演习"，实际上是实验它制造的炭疽干菌的细菌武器的效力。因此，前一天，它就把研制的一批炭疽干燥菌交给"山口班"装成了炸弹，并转运到航空班。宣布参加"演习"的名单上还有第二部的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总务部照相班的人员。

次日上午，全体实验队人员穿着军用便衣乘汽车到哈尔滨火车站，然后乘专用列车于当晚到达陶赖昭，并夜宿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天刚亮，他们悄悄地徒步去东北方向的实验场。在那里，他们自己动手搭设帐蓬，做好"演习"的准备。

他们在这个地方连续地搞了两次试验：

第一次是把30名被捕的反满抗日人员用"特别囚车"从本部"特设监狱"里押来，绑在排成圆型的木桩上。实验人员退至800米之外的观察点。实验开始前5分钟，上田和利本雇员将观测

---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榊原秀夫的证词。

的风向、风速、气温和温度数据报告现场指挥者、第四部第三班（干燥菌生产）的班长三谷恒夫少佐。

发出实验开始的信号后，飞机在靶场上空盘旋两圈，在大约500米的高空投下装有炭疽干菌的炸弹。炸弹爆炸后，一批穿着防疫服的日本人迅速进入现场，给被试验者松绑，并拖进特别囚车，运回七三一部队本部。与此同时，另一批穿着防疫服的日本人，在现场收集飞散在各处的细菌弹片。

发出解除实验的信号后，隐蔽在观测点的日本人返回实验现场。这时，收集的碎弹片都装进玻璃器具里，并用红色标注着弹片飞散的方位和距离。负责细菌培养的上田等人在每个装有弹片的容器内，加入50CC食盐水，搅拌后又涂在“寒天”（洋粉）上，然后又把容器装进细菌培养器内，用飞机运回平房。

第二天，这种实验又进行了两次。然后，为了消除实验的痕迹，进行了两天精心的善后处理。

细菌弹片的细菌培养工作，还是由三谷班操作。检验证明，试验是“成功”的。在炸弹爆炸时产生高温的条件下，炭疽干菌并没有完全杀死，从染菌的弹片上又培养出了新的菌株；而那30多名受弹伤者，被炭疽菌感染后，陆续地在痛苦中死去了。①

四、防疫给水演习

七三一部队组织防疫给水演习早在它成立的初期就已开始，并投入了实战。

在“关东军防疫部”——加茂部队建立的第二年，石井四郎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株式会社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细菌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言。

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和部下胜矢技师，设计了放毒时必须使用的器材——毒性测量器。就从这时起，他们利用室外演习场，多次地进行防疫给水活动的演习。

榊原秀夫在供词中还说："1940年11月，我在陆军军医学校学习时，石井四郎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的课。当时石井是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就像当年当防疫学教官那样，以内行的身份这样做的。""他结合让我们看中日事变（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防疫给水班的活跃的纪录影片，讲解如何在军中实施防疫给水问题。""电影反映的内容是，事变当初在上海、九龙发生'虎疫'（即霍乱传染病）情形和当时医院收容患者情况以及'虎疫'的治疗法；在津浦线附近作战时，运用防疫给水班的情况以及石井亲临指挥对第一线部队给水的场面"。"中日事变初期的防疫给水班，都是由七三一部队动员和编成。这一电影是根据石井指示而制作的。"①

后来，以各式滤水、消毒车为主要武器的防疫给水班，正式活跃在"诺门罕"战场。

1943年2月1日至2月20日，在海拉尔北部一带，进行了一次"冬季消毒法"、"燃料试验"和"野战消毒车试验"的特殊演习。是以七三一部队第三部为主与所属各支队共同组织的，参加者还有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津山少佐军医。这次演习取得了成功。

各个支队也单独地组织过防疫给水演习。林口一六二支队选定了离部队西北约15公里的森林地带作为演习场。那里有牡丹江的支流乌斯浑河，其上游有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村庄。他们假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榊原秀夫的证词。

设河水遭到细菌的污染，又有敌人的攻击。于是，他们一边组织"防御战斗"，一边利用水源。为了使抽水机在严冬正常运转，采取了一种防冻法，把冰凉的水抽进滤水器里滤水。在演习人员安全地饮用上，经过滤水器过滤的水时，结束了演习。第三天上午，该支队演习人员撤回驻地。①

五、跳蚤指数的调查实验

鼠疫菌用于细菌战，是七三一部队的主要研究课题，为此，专设了细菌研究部。跳蚤是鼠疫传染的媒介物，而印度跳蚤传染能力最强，在中国东北地区，这种跳蚤到处都有。然而，老鼠又是跳蚤的宿主。利用这个自然条件，解决鼠疫传染途径问题，必须首先根据寄生于老鼠的跳蚤的数量来加以判定。也就是说，从统计学角度看，如果每只老鼠身上的跳蚤指数达到2—7个时，则鼠疫的流行是可能的。然而，每个地区能否传染鼠疫的跳蚤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调查跳蚤的指数。

他们采取了两种办法：

一是调查跳蚤寄生于宿主老鼠身上的系数。其计算公式是：跳蚤指数等于老鼠繁殖跳蚤的总数量除以老鼠总数量。

即：$$\frac{\text{老鼠繁殖跳蚤的总数量}}{\text{老鼠总数量}}=\text{跳蚤指数}$$

要在若干鼠身上取下平均值，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为此，七三一部队经常以防疫为名，派出人员到鼠疫源地或到正在发生鼠疫的现场去进行对比性的调查。例如，正在发生鼠疫的通辽地区的跳蚤指数为1:3.5；郑家屯地区是1:3。也就是说，在通辽地区每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榊原秀夫的供词。

一只老鼠身上平均寄生着三只半跳蚤、郑家屯地区每只鼠身上平均有三只跳蚤才能发生或流行鼠疫。

二是通过撒布方法确定跳蚤指数。

1944年7月，在七三一部队不远的新五屯、瓦盆窑一带，突然地出现了一阵紧张的气氛。日本兵封锁了瓦盆窑南的一片良田，强令附近的农民将生长着的大豆砍倒，然后，四周设上了岗哨，不让中国村民靠近。七三一部队用大卡车拉来几千个大铝箱子，摆满了足有2平方公里地面上，同时从七三一部队向这里接通了电源。入夜，由于灯火管制，七三一部队的营区一片漆黑，而这个地方却灯火通明。原来那摆放满地的大铝箱子里各安设一支500瓦的灯泡。接着，这一带上空有飞机盘旋，也有闷声闷气的炸弹声。七三一部队的这一举动，使周围村民感到大祸临头，惊恐万状。其实，这就是七三一部队搞的一次通过撒布方法确定跳蚤指数的调查实验。他们把无菌蚤装入特制的土陶炸弹体内，利用飞机投掷，炸弹在离地面几米的高度爆炸，数以万计的跳蚤散落下来，附着在铝箱的取样板的粘液上，由此来判断细菌炸弹爆炸后跳蚤分布的指数情况及其效能。

六、发射坏疽菌炮弹试验

1944年11月，榊原秀夫少佐到林口接任一六二支队长。在与前任支队长荒濑少佐交接工作时，发现在荒濑个人保管的文件中有一份细菌弹实验的调查报告。报告记载了1942年，在靠近哈尔滨的松花江中游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用迫击炮发射硅藻土制成的炮弹的情况。

当时，七三一部队第二部队员把几十名特设监狱关押的

“囚犯”运到小岛上，并捆绑起来，然后，从哈尔滨附近的某地向这个小岛发射装有耐热性炭疽菌的迫击炮弹。野崎少佐亲自调查了这种炮弹爆炸中心点、碎片散落距离和命中情况。结果，被实验者都染上炭疽菌，受伤处溃烂，不久便死去了。

野崎少佐就此写出调查报告，并赠送给他的同学荒濑作进行细菌战活动参考的。出于私人之间的关系，荒濑又把这份材料给榊原看了，然后，便带走了。荒濒少佐也不只一次地参与了瓦斯坏疽弹的试验。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的高等官山内丰纪，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出差时，还听到二木技师讲的用瓦斯坏疽弹作活人试验的秘密。

那是在北安，将中国人绑在固定的木桩上，用装置瓦斯坏疽菌的炮弹进行炮击，将人打伤；然后，对被试验者用血清进行治疗。因为这类试验与大连卫生研究所有关，所以这个少佐把拍摄实验情况的电影，公开地在大连卫生研究所食堂里放映了。历史档案证实，具体实施这次实验的还是野崎①

七、电引爆细菌弹的试验

七三一部队在航空班附近秘密设立了一个实验靶场，室外的细菌试验也经常在这里进行。

1941年5月，在这里搞了由第二部课长碇常重中佐和山口技师指挥，第四部人员也参加的一次电爆破细菌弹试验。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命令田村良雄等6名队员带着普通“寒天”培地和远藤式培地各100块，随同山口班的6名队员，先行来到实验场。山口技师又命令他们在50平方米范围内的指定位置上挖了12个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山内丰纪的证言。

坑，并如数埋上了木桩。

这时，一辆囚车驶来，宪兵室田坂曹长等5名宪兵押送来12名中国人，并将其分别绑在木桩上。

这是一场用电流引爆细菌弹的试验。细菌弹早已在实验场地中心埋好，并接上了长长的导火线。当实验人员暂时撤离以后，山口班的人员一按电钮，细菌弹在实验场地爆炸。被试验者都被炸伤，并很快被拖进了囚车，押回特别班的实验室。这时，田村良雄等人进去后，操作着消毒器，对实验场进行普遍消毒。

在电引爆细菌弹之前，第二班曾搞过数次爆炸演习，把不装菌的炸弹，埋进砂堆里，爆炸后把弹片收集起来，对弹片散落情况进行研究，山内丰纪亲自参观了这样的演习。①

八、细菌的"雨下试验"和气球炸弹

如何把自己制造的病原菌，变为攻击对方的特种武器，既能高效能地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又不留下痕迹，不被对方所觉察，这也是七三一部队经常苦心研究的一个问题。他们曾设想，把鼠疫、伤寒和白喉等病原菌在空中象下雨一样喷撒下来的办法，有时在晴天，并有时在雨天，进行了多次反复试验，通过对比，观察细菌在不同环境下落地后的分布情况和成活率。

1940年7月，菌种班在细菌制造室里，不分昼夜地制造各类传染病菌。这天，川岛清军医大佐（后晋升为少将）命令把一批肠伤寒菌，完成液体，交给航空班。柄泽班奉命专门抽出12名队员，带着50片大型平板培养器和"远藤式"消毒桶，到距离七三一部队本部约3公里的一片已被警备队戒严了的黄豆地，在宫崎淳臣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

中尉的指挥下，两个人一组，把平板培养器分散摆放在大地里，揭开上盖，然后退出演习场地。

实验开始，航空班的一架飞机准确地飞进演习场的上空，肠伤寒菌液雾状般地落下，菌株附着在培养器板上。然后，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日本实验人员迅速跑上前去，扣上培养器的盖。这批培养基板被带回柄泽班的培殖室后，果然又培殖出肠伤寒菌来，而且分布均匀。他们把实验的数据一一地做了记录。

据柄泽班的田村良雄和山内丰纪雇员证实："这种预备性的演习，共参加三次，其中一次是在雨天，投撒的是霍乱菌，另一次使用白喉菌。"

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撒布没有染菌的跳蚤或苍蝇，研究它们和气压的关系。柄泽班的上田弥太郎曾作过跳蚤和苍蝇分别从500米、1000米、1500米和2000米的高度投撒下来结果的"比较表"，它表明，越是在高空，效果越差，在2000米高空投撒，跳蚤和苍蝇就几乎全部死掉了。

他们曾在1939年8月，用飞机投撒过鼠疫菌蚤，但是，因在高空的情况下而报废了。于是，他们又想，放弃高空投撒法，采用低空投撒法。然而，这又无法避免机毁人亡的危险。因此，又重新进行高空投撒方案的实验，并反复地进行着。[①] 七三一部队为解决染菌的跳蚤在高空撒落时大批死亡和低空投撒易遭对方打击的这个矛盾，设想了用无人驾驶的气球代替飞机，即把石井式细菌弹附在用生丝作成的气球上。气球上设有发生装置，在预定的经纬度发火，炸弹便落到指定的地点。因此，它也被称为"经纬度炸弹"。落下的炸弹自行粉碎，并不露出明显的痕迹。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山内丰纪、田村良雄的证言。

这种新式武器是在石井四郎主持下，由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主任内藤中佐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的技师们于1943年着手研究的。内藤与石井同为京都大学医科毕业，精通机械原理，曾发明过野战消毒车，被看作石井的后继者。

1943年某一天，《每日新闻》发表了一则新闻，说在美国洛杉矶的山中落下了一个载体气球，使山中失了火。这在日本和美国的军界都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美国分析，寻求这颗特殊的空运载体的用途及其肇事者是与其敌对的日本军队。事实正是这样。这就是刚刚试验成功的“经纬度炸弹”。它是在有气象观测站的筑波山上发放的，成功地落到预想的地方，但炸弹里没有装入细菌。1944年，一六二支队的细矢少佐也透露说，这是日军特种部队所干的勾当。

九、海拉尔的特别演习

日本侵略军的细菌部队也经常利用呼伦贝尔草原这个天然的“实验场”进行“特别演习”。

1940年冬，由七三一部队（包括所属的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一〇〇部队和五一六化学部队组成的一支特别实验队在海拉尔市东南40公里的巴彦汗地区进行一次细菌、毒气效能的实验，给当地蒙族牧民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巴彦汗附近有一片高岗，其南面是日本军队驻守的要塞碉堡；北面是一片大约有36平方公里的草原，演习场就设在这里。这些不穿军装的日本军人，从海拉尔乘着汽车来到此地后，在中心位置插上红旗，四周拦上草绳，设立岗哨，并把蒙族牧民撵走，使之成为一个禁区。还从海拉尔东山的日本兵营往这里铺设

了一条供通讯联络的专用电线。

当地牧民从远处看见，从演习场升起的滚滚浓烟，直到这些日本军队撤离很久，还不能完全散去。到第二年春，冰雪融化后，牧民还能闻到一股特异的臭味。现场遍地都有经过伪装的直径约有1.8米大小的深坑；在一堆堆的灰烬里，还有用火烧过的铁棍、铁丝和木头。从这些东西上可闻到难闻的毒气味，甚至刺激得眼睛流泪。

此后，牧民们不敢到这里放牧、打草。尽管这样，附近还是连续几年发生了牛瘟。

十、在东宁的一次秘密实验

1940年到1942年间，七三一部队在东宁县南部的一个山沟里开辟了一个临时的实验场。

参加“演习”的既有牡丹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的人员，又有盘踞在东宁一带的日军化学部队的特种兵。他们把100余名被捕的中国爱国者和抗日游击队员圈在这个口袋形的山沟里。然后，投放了细菌和毒气武器。仅数分钟的时间，坏疽菌就穿透了衣服和鞋底而腐蚀肉体。这些被试验者在细菌和毒气的痛苦折磨下，几个小时后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去，没死的也被就地枪杀，尸体就地掩埋了。①

① 牡丹江市公安局档案。

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直接证据

1983年秋，庆应义塾大学博士研究生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中发现了两份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报告书，一是《因“黄弹”射击造成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是《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同年8月15日，日本的《每日新闻》首先对报告书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8月16日，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以《日本发现原关东军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为题发表了消息。这两份报告书是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直接证据。它的发表，对日本国内那些企图通过否定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进而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阵营对战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严正判决的极力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1985年3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的松村高夫教授等4人来哈尔滨原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考察，并赠送了两个报告书的影印件及其介绍文章。《黑龙江文史资料》（1985年第19期）首次刊载了这两份报告书及其介绍文章的译文。由于这两个报告书及其介绍文章对全世界所有愿意了解、认识和研究“七三一”的人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现实的和历史的价值，因此，仍将它作为一个部分编入本书。在这里，也按照庆应义塾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的要求，删去了报告书作者的姓名。

一、松村高夫的七三一部队的实验报告书

（一）

在1984年度历史学研究会大会近现代史联合会第三组上，常石敬一就“现代的和平诸问题”，以《从哈尔滨到福特·德托列克》为题作了冲击性的报告。该报告搞清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所谓“七三一部队”）为细菌战进行人体实验问题和战后免去战犯责任问题以及从美国交换过来的美方有关人员的诸调查和取得实验结果的过程。现在，第三次教科书的审定诉讼正在尖锐地揭发1980年教科书的审定问题，其中“七三一部队”成为重要的争论点之一。庆应义塾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在1983年秋得到了“七三一部队”为研制有关生物化学武器的实验报告书，本文主要介绍明确记载把人体作为对象的实验报告书。

明确记载人体实验的是以《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的症状观察》和以《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为题的两册报告书。前者是1940年9月7日至10日实施的，汇集了向人体发射芥子气毒气弹（是致死性的糜烂性的毒气，原是无色的，但通常混杂夹杂物，呈淡黄色，因此被称作“黄弹”）的实验，使人饮用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与芥子气同样是致死性的毒气，更有速效性）的水溶液的实验等五种实验结果。报告书由日文打字的一页目录和39页正文构成，末尾附有五幅症状一览表和三幅毒气弹发射时的人员安置图。封面的左下

角印有“加茂部队”（这是取原“七三一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故乡的地名，该部队有时这样称呼）的字样，旁边用毛笔写着“A少佐担当”，右上角盖有“极秘”的红色印章（使用的是写有“昭和十、六，大阪OK纳”字样的陆军用纸）。①

后者即《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是把破伤风毒素和芽胞接种于体人，测定发生症状时肌肉电位变化（“时值”）的实验报告，将破伤风杆菌的毒素分为最低致死量的十倍、百倍、千倍进行接种。除封面之外，报告书由打字的正文十二页和三幅附表构成，封面的标题是毛笔字（使用的是印有“东京助川纳”字样的陆军用纸）。作为实验承担者，写着“指导永山中佐，A军医少佐、B技师”的名字。

除此之外，我们研究会这次得到的资料尚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中的五项报告。这五项都是明确记录A军医少佐是执笔者的铅字印刷品。即（1）《关于航空体质的研究——冻寒期航空对人体的影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第一卷第一号别册，1943年7月）、（2）《关于南京攻克战的中国军伤兵的血型》（同上，第一卷第三号别册，1943年9月）、（3）《在一定浓度的硝基三氯甲烷熏蒸下动物生存时间等的观察》（同上，第一卷第五号别册，1943年11月）、（4）《发疹热的实验室工作感染例》（同上，第一卷第五号别册，1943年11

① 如《每日新闻》（1984年8月15日）报道的那样，A氏否定了这个《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的症状观察》报告书，提出：“我于(昭和)17（1942）年被调至731部队，因此没有参加实验的可能．与此无关”．对于写着“A少佐担当”之事、A氏答道：“极秘文件不写担当者名字．象所见到的那样，仅在那里用毛笔写着担当者名字，这是保管文件的人写上的”．A氏承认我们带去的其他全部报告书（本文揭示的以下的题目）“都是我的”．1984年夏A氏正在滋贺县其长子家养病．这是A氏在我们要求说明带去的报告书时通过其长子所作的回答．

月）、（5）《满洲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生及分布（其三）——八面通附近部队的流行性出血热调查报告》（与C技术员合著，同上，第一卷第六号别册，1943年12月）。其中最重要的是《满洲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生及分布（其三）——八面通附近部队的流行性出血热调查报告》。

流行性出血热是发生高烧，皮肤出血并呈现紫斑、头痛、下痢的病毒性的怪病，在北满的死亡率平均约为15%。最初的报告是关于1938年流行于苏联国境附近的情况，使用流行地虎林站（同年5月）、二道岗（同年7月）、孙吴站（1939年8月至12月）的地名，被称作虎林热、二道岗病或孙吴热。北野政次在《陆军卫生史》卷七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夏季以来，在北满特别是苏满边境地区闪电般地流行一种罕见的怪病，以蛋白尿、特殊的容貌、出血、出血倾向以及严重的自觉症状为主要症状，由于发展迅速，许多人病死，造成极大的威胁"①。"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名是陆军在昭和十七年七月命名的，并以陆普的名义作了公布"②，指定为战时流行病，但当时尚未发现病原体。

北野接着这样写道："昭和十七年八月被任命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长之时，至前任石井部队长时期发现流行性出血热已经过了整整四年了，然而无论是病原体还是感染途径都尚未确定，成为防疫上的重大障碍。因此，为了确立防疫方针，痛感首先发现感染途径是先决问题。于是重新组成研究班，并对其进行直接领

① 北野政次《关于在这次战争中的二、三病原的研究》第一章《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陆军卫生史》卷七，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1971年《军阵防疫》）134页。另外，关于流行性出血热，常石敬一在前述《从哈尔滨到福特·德托列克》（《历史学研究》534号增刊号，1984年10月）中也进行了论述（174--176页）。

② 北野前揭书，183页。

导”①。A军医少佐就是在北野直接领导下的这个研究班，是报告书（5）的执笔者。如这个报告书提到的那样，“为调查昭和十七年以来在满洲牡丹江八面通附近部队多次发生的流行性出血热，我们自昭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奉命前往该地”（第一页），在开头就明确记载着报告书的完成者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北野军医少将）陆军军医少佐A、陆军技术员C（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受理）。”根据该报告书，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满洲第七〇部队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为153人，调查结果表明，病源媒介动物是老鼠，特别是附着于黑线姬鼠身上的北满螨及跳蚤等．1943年9月北野政次在满洲医学会以及日本传染病学会上报告病原体是病毒，一九四四年四月笠原四郎亦作了同样的报告。②

但是A军医少佐首次进行生体实验是在1941年年底，他在孙吴地区用注射器采日本兵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血液，“注射到两名在地区医院干活的中国苦力身上”。③“自1942年1月起，在（七三一）部队内至少对七名被称作‘木头’的中国囚徒使用媒介动物作了实验。据说其方法是，首先使吸过日本兵患者血的虱子和跳蚤处于一昼夜空腹的状态，再把这些跳蚤和虱子装入底层罩着铁丝网的玻璃瓶中，在“木头”的腹部和肩、大腿内侧吸血

---

① 北野前揭书，183页．

② 同上，184、192页．

③ 《每日新闻》（大阪）1981年10月16日夕刊．这份报纸提到的A军医中佐与本文中的A军医少佐同为一人．关于这点，1984年夏在我们通过上述长子与A氏接触之际证实．

20～30分钟，反复进行感染实验”。① 战后，A军医少佐于1959年以《满洲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研究》一文获得博士称号。我们研究会还得到了A氏本人在战后写的手稿《1930年～1945年第二次大战中有关生物物理学的日本军阵医学之经验》（400字原稿纸115页）。该手稿的开头如下这样写着A氏本人的简历：“我在1930年～1945年的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期间作为军医参战。在此期间，在满洲各地、华北、华中、千岛、北海道、宇品，或者作为第一线军医，或者在航空队、船舶队、研究机关从事军阵医学的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第一页）。A氏在广岛时日本战败，1946年2月被开除公职。以后在私人医院工作，二十余年前开始在大阪开办医院。

（二）

毒气实验报告书《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的症状观察》

本报告书的构成如下：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病例

第三章　水疱内溶液之所见及人体试验成绩

　第一节　水疱内溶液之所见

　第二节　人体试验

第四章　血象之所见

---

① 这位A军医少佐就流行性出血热作了如下的回忆：“那是可怕的病，尸体也充分地解剖了”。“用一些动物作了实验但总也没搞清楚，只有用人作实验了。开始，被置于实验台上的人的症状清晰地出现了。全身突然出现斑点，我想是死了吧？但是没有死。我尽管作了实验，但也全都进行了治疗”（同上页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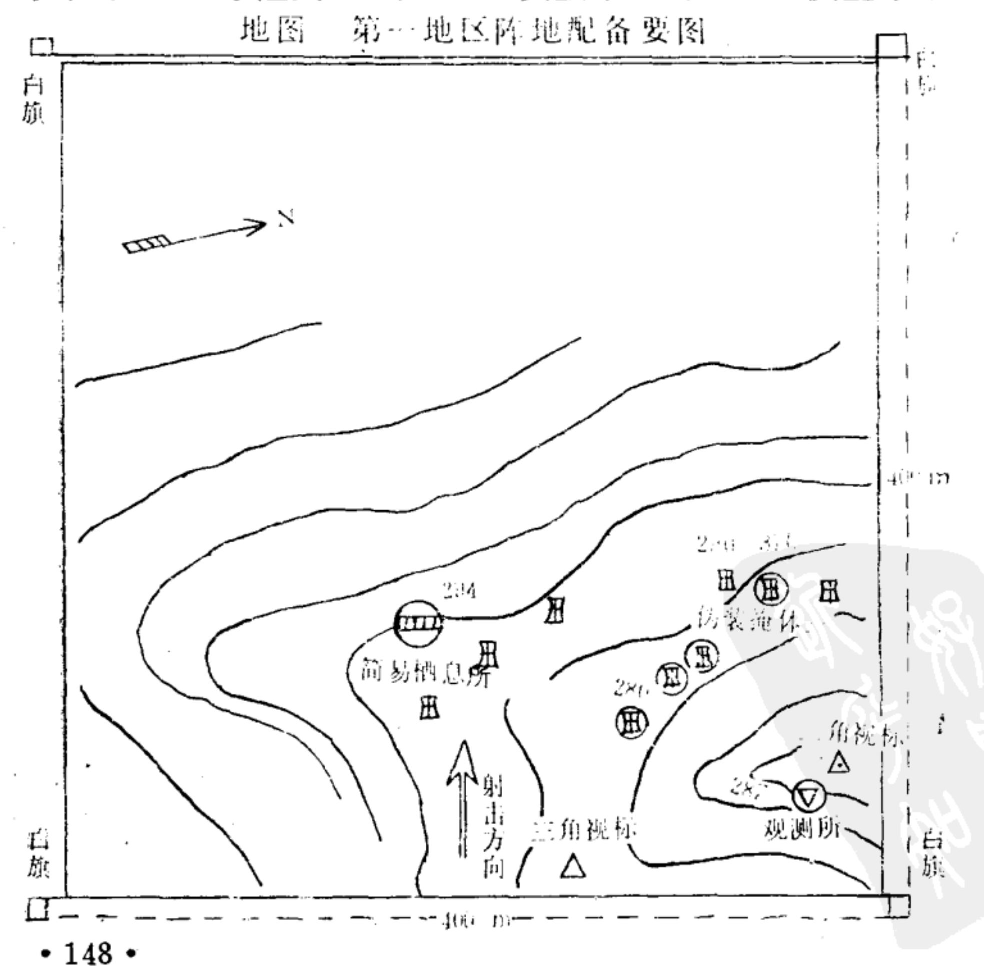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便尿之所见

第六章　结论

第七章　附记

实验自1940年9月7日至10日进行。向着衣、面具、所处场所条件各有不同的，被安置在三个地区的人发射芥子气弹，观察其发生症状的过程。换算为野炮，向第一地区发射了 1,800 发芥子气弹、向第二地区发射了3,200发、向第三地区发射了4,800发。在发射后的4小时、12小时、24小时、2日、3日或5日后，观察包括神经损害的一般症状、皮肤、眼部、呼吸器官、消化器官的症状。在第一地区安置5人、第二地区安置6人、第三地区安置5人，

地图　第一地区阵地配备要图



每个人都被编上三位数的号码。上面的地图是第一地区的“阵地配备要图”，记录着毒气弹发射的“发射方向”，标有箭型符号。向第二地区发射的芥子气弹为第一地区的二倍，向第三地区发射的为第一地区的3倍，这也是企图搞清对人的效果的差异。

首先全文转载第一章《绪言》。

自昭和十五年九月七日至昭和十五年九月十日，由间炮4门（600发）、十榴8门（600发）实施黄弹射击。

第一地区发射弹数每公顷100发，总数1,800发（换算为野炮）。射击时间40分钟，即射击15分钟、间休15钟、射击10分钟。

第二地区发射弹数每公顷200发，总数3,200发。

第三地区发射弹数每公顷300发，总数4,800发。

被检物被分别安置于地区内的野炮伪装掩体、壕沟、简易栖所、观测所，有覆盖物的MG座监视所、特种结构的建筑物内。

安置于第一地区阵地的着无帽便服、衬衣裤、室内鞋，无面具。

在第二地区阵地内着无帽夏季军衣裤、穿鞋、无面具者31名，带面具者3名。

安置于第三地区阵地的着夏季军衣裤，无面具者2名，带面具者3名。

黄弹射击后，在4小时、2小时、24小时、2日、3日或5日后观察一般症状（包括带有神经损害的症状）、皮肤症状、眼部、呼吸器官、消化器官症状的变化。

实尚施水疱内溶液的人体接种试验，血象及便尿检查。

在第二章《病例》中，以20页篇幅详细记述了被安置于3个地区的16人中的15名“被检者的症状及以后的变化”。7日在第一地区“交通壕内”遭受1,800发芥子气弹袭击的“376号”的症

状变化记载如下：

7日18时许，全身倦怠、垂涎。颈、前胸皮肤呈现潮红。见眼睑水肿、流泪多量、结膜充血。

8日6时许，颈、前胸、上腹、阴囊呈现潮红浮肿状，遍布粟粒乃至小豆大小的水疱。眼睑、结膜充血并水肿，睁眼困难。18时许全身倦怠、难受，体温37度。肩胛部呈现糜烂。鼻涕多量。粘液血性下痢，腹痛，尿见蛋白。

9日7时许，全身倦怠，四肢无力，眩晕，情绪不佳，体温37℃。面部皮肤同样呈现潮红，颈部明显肿胀。背、颈、前胸肿胀，由肩胛至背部糜烂，疼痛。四肢特别是上臂呈现肿胀浮肿状，上臂内侧、手背部出现小豆乃至大豆大小的水疱簇。腰、大腿一般性膨隆肿胀，遍布大豆大小的水疱。多处呈现糜烂面。阴囊、阴茎弥漫性肿胀，见糜烂溃疡。眼睑水肿，流泪多量，结膜充血并水肿，角膜明显混浊，存在小豆大小的角膜溃疡，眼裂附着黄绿色的分泌物。鼻涕多量，声音嘶哑，咳嗽。颈内有搔破感，呼吸困难，咽后壁发红。前胸部一般性呼吸音弱，恶心，呕吐，腹痛，有粘液性血便。没有记载以后如何变化。“280号”7日于第一地区“被安置在野炮伪装掩体防毒覆下”，遭受毒气弹的轰击。出现如此症状。

依10日17时许的观察，诉说全身倦怠，四肢无力，心跳加快。体温37度。面部皮肤发生的水疱逐渐增加，局部存在薄痂皮，一般性肿胀，颊部见糜烂。肩胛部背面弥漫性发红，肩胛部呈现糜烂。阴囊肿胀、糜烂、有灼热疼痛感。四肢的潮红有几分减少。呼吸器官症状为咳痰，咽下困难，呼吸困难，喘鸣。前胸部心音弱，脉搏130次，听有笛鸣音、呻轧音、啰音。以后的症

状在这里也没记载。此外，还记录了第一地区的“287号”、“296号”（安置于伪装掩体、伪装网下）、“294号”（在开着门的简易栖息所内）的症状，本文省略。

9日在第二地区遭受3,200发毒气弹轰击的6人，各自处于以下这样的条件。“265号”在野炮伪装掩体内，带面具；“464号”在野炮伪装掩体内，无面具；“468号”在野炮伪装掩体下；“499号”在有防毒覆盖物（橡胶的简易覆盖物）的伪装掩体内、无面具；“513号”在有简易覆盖物的观测所内，无面具（没有关于“490号”所处条件的记载）。“513号”（无面具）9日开始发病，至12日出现这样的症状：

10时头痛，全身倦怠，心跳加快。体温38度。面部皮肤出现特有的暗黑色，发生水疱部分全部覆盖薄痂皮。肩胛呈现一般性糜烂，布满小豆乃至大豆大小的水疱。腹部见白色薄痂皮多处。眼睛惧光，疼痛，视力受障碍，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并水肿，角膜混浊，见附着分泌物。

鼻涕，声音嘶哑。诉说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咳痰，下咽困难，胸部疼痛以至有压迫感，呼吸明显困难，喘鸣。

听到前胸有笛鸣者、呻轧音、啰音。以后的症状如何，这里亦无记载。

“265号”的症状变化如下：

9日22时许，颈内有搔破感，仅仅咳嗽，无显著变化。

10日7时许，头痛，食欲不振。体温37度。面部皮肤特别是颊后面皮肤出现潮红，诉说颊部有搔破感。眼睛惧光，流泪多量，结膜充血。声音嘶哑，咳嗽，咽后壁发红，诉说疼痛、恶心、呕吐。

10日22时许，眩晕，体温37度。脐内部皮肤糜烂，周围发红，颈有搔破感。诉说腹、四肢疼痛。眼睑结膜充血，眼裂附着黄绿色的分泌物。

10日8时使其饮用250毫升漂白粉消毒水，见明显症状。

11日转用于持久效力试验。

对这个“265号”的实验更加骇人听闻，他在11日又被“转用于持久效力试验”。所谓“持久效力试验”是“在黄弹射击停止约2个半小时之后再安置被检物，从10日22时放置到11日4时半，然后进行观察”。这个“被检物”9日曾遭受毒气弹的袭击，而11日再次被作为实验对象，在夜间被放置于“监视所（有天棚，三面通壕沟）内”，长达6个小时，无面具。这个“265号”的“持久效力观察”结果如下：

11日9时体温37℃，头痛，食欲不振。面部皮肤特别是前额、鼻、口周围、眼围、耳廓、腕关节、脐、臀部、阴囊发生弥漫性潮红，脐内部呈现糜烂。面部、臀部有轻度压痛。眼睛惧光，疼痛，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见角膜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后壁发红，肿胀，疼痛，诉说恶心，呕吐。

12日10时体温37℃，情绪不佳。肩胛部呈暗褐色，臀部疼痛，见红斑。阴囊有搔痒感，脐部有白色薄痂皮。眼睛惧光，疼痛，视力障碍，流泪多量，眼睑浮肿，结膜充血，角膜混浊。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咽后壁发红，肿胀，诉说疼痛。左前胸部闻及摩擦音。

除“265号”之外，被作为“持久效力观察”对象的还有3人。“359号”“暴露地面，无面具”；“449号”“暴露地面，

带面具”，“375号”被安置在“有覆盖物的MG座，无面具”。这3人都仅仅作为“持久效力观察”的对象，没有受到毒气弹的轰击。在芥子气毒气弹停止射击二个半小时之后，对带面具和无面具的人实验6小时，以后观察其症状的变化，这一实验的意图自然就明白了吧。

下面看一下在10日受到4,800发毒气弹轰击的第三地区。5名“被检物”被分别安置在这样的条件下。“303号”在“特种结构建筑物（闭锁枪眼门）内，无面具”；“485号”在同样的地方，带面具；“486号”在“有覆盖物的MG座内，无面具”；“327号”在“单人立射壕内，带面具”；“358号”在“交通壕内，带面具”。“303号”的症状变化作了如下记录：

10日23时头痛，皮肤无显著变化，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诉说咳嗽、恶心、呕吐三次。

11日7时食欲不振，体温37℃。面部皮肤、颈部搔痒。左耳后部、两膝盖、阴囊发生潮红。眼睛惧光，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浮肿。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频繁，咽部发红，诉说恶心、呕吐五次。

11日17时眩晕，不适，全身倦怠。面部特别是口周围、颈、腋窝、肘、阴囊、龟头、臀部发生弥漫性潮红。面部、颈搔痒显著。眼、背、颈、鼻孔、阴囊、口周围遍布粟粒大小的小水疱，诉说刺痒性疼痛。眼睛惧光，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并水肿，角膜呈现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诉说咳嗽。扁桃腺发红、肿胀。前胸部呼吸音粗糙，背部左上部听见浊音。

12时19时食欲不振，体温38℃。在口周围、鼻翼、头部生

长毛发之处有小豆大小的水疱，疼痛显著。头部见脓疱化的湿疹，疼痛。阴囊疼痛显著。眼睛惧光，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浮肿，结膜充血。流鼻涕，咳嗽，咽部发红。

另外，“无面具”的“486号”发现这样的症状：

10日23时头痛，食欲不振，不适……

12日10时 体温 38 ℃，四肢皮肤特别是腕关节、大腿内侧、背、腋窝、颈发生潮红。四肢、背部呈现一般性浮肿状，出现粟粒乃至小豆大小的水疱簇。眼睛惧光，疼痛，视力受障碍，流泪多量，结膜水肿，角膜混浊。声音嘶哑，咳嗽、咳痰，咽部发红、肿胀，见苔皮，恶心，呕吐。

原水攻击

所谓“原水攻击”是使人饮用芥子气毒气和路易氏气毒气的水溶液。5人在9月7日至10日期间饮用之后，观察其3—5天的症状。五人中有四人发射了芥子气弹。有两例实验是饮用用木炭或除砒剂消过毒的毒气水溶液。这也是在设想实战中使用毒气弹的场合和受到毒气弹攻击的场合，其意图十分明确。以下全文转载《原水攻击的效果观察》。

479号

9月7日　原水饮用（攻击）。

9月8日　（攻击后12小时）呕吐，下痢，里急后重，排粘泻液血便。

9月9日　因下痢食欲不振，呕吐，里急后重，有粘液血便。在试验实施赤痢菌检索时见细菌集聚（远藤氏寒天）。

9月10日　20时以原水点右眼。

9月11日　见右眼结膜发红、充血。

287号

9月9日　使其饮用（攻击）用木炭消毒的原水300毫升。

芥子气原水15mg/L

路易氏气原水15mg/L

9月10日　本日期间无显著变化。本日白天使其饮用（攻击）用活性炭消毒的9日的原水600毫升。

氧化铁芥子气〇

路易氏气〇

木炭芥子气〇

路易氏气19.9mg/L

9月10日　无显著变化。

9月11日　食欲不振，大便一日一次，普通便。

9月12日　存在轻度的食欲不振。

464号

自10日白天起使其饮用9月9日晨的原水（芥子气148mg/L路易氏气26mg/L），12小时后食欲不振，诉说恶心、呕吐。

11日食欲不振，17时许呕吐3次，恶心，腹部压痛。

12日食欲不振，恶心，依然呕吐。

490号

自10日白天起使其饮用（攻击）9月9日的原水（用除砒剂消毒的）600毫升，12小时后恶心，呕吐4次，24小时后食欲不振，恶心。

至11日食欲不振，轻度恶心，呕吐1次。至17时普通大便1次，无呕吐，右下腹部压痛，有雷鸣音，食欲稍见恢复。

485号

10日使其饮用（攻击）原水（芥子气141.9mg/L路易氏气87mg/L）300毫升。

11日7时恶心，呕吐3次，17时恶心，无呕吐。

12日大便1次，普通便，无显著变化。

第三章《水疱内容液之所见及人体试验成绩》由两节组成。第一节是分析内容液。这一内容液是从在前述第二地区中受毒气弹袭击的“被检物”“468号”身上生出的水疱中采取的，采取时间是发射12小时后。第二节是记录将水疱内溶液接种于5个人人体的实验结果。

第一节　水疱内容液之所见

水疱内容液清澈，呈淡橙色，弱碱性。水疱内容的细胞数为20乃至50余个，淋巴细胞41.2%，中性多形核白血球52.9%，大单核细胞5.9%，淋巴细胞22.4%，中性多形核白血球75.5%，杆状核细胞2.1%。

在攻击468号后12小时间，对出现在前臂的水疱进行吸引检查，发现淋巴细胞30%，中性多形核白血球65%，大单核细胞5%。24小时后检查水疱内容液，淋巴细胞34.8%，中性多形核白血球60.9%，大单核细胞4.3%。淋巴细胞依然稍占多数。

第二节　人体接种试验

12日无菌穿刺吸引的水疱内容，供以下试验所用。

（一）在479号右上臂部皮下注射该液0.2毫升。

12小时后、24小时后观察，未能发现什么症状，毒力试验终于阴性。

（二）在479号的左眼角膜内注射0.1CC，一昼夜中见轻度

的巩膜充血及结膜充血，但在二昼夜中恢复正常。

（三）在485号、468号、358号、372号计41人的左上臂、右上臂皮下注射该液〇，2毫升，在一昼夜的观察中未能发现什么反应症状，毒力试验终于阴性。

第四章《血象之所见》是测定在上述三个地区受到不同数量毒气弹袭击的“被检物”的血色素量、红血球数、白血球数、淋巴细胞等变化的差异，测定时间是发射5小时后、12小时后、2日后、3日后、5日后。特别是在第三地区进行持久效力试验的结果，白血球数显著增多，2日后为32,000，31日后为37,700。这与3日后第一地区的6,300～13,500、第二地区的10,400，第三地区9,800的数值相比较是非常高的数值，从而如实地显示了毒气浓度对人体的影响。从第一地区、第二地区、第三地区“被检物”的血象所见到的记录本文省略，以下仅转载“第三地区持久效力试验成绩”。

第三地区持久效力试验成绩

血色素量在攻击5小时后为64%，12小时后为64%，2日后为61.3%，3日后76%，有逐渐增加的倾向。

红血球数变化不大。

白血球之所见

白血球数在攻击5小时后为14,100，12小时后为12,300，3日后为32,000，3日后为37,700。与正常相比，从开始就激增，随着时间的延长有逐渐增加的倾向，见多形核分裂。

淋巴细胞在五小时后为15%，12小时后为11%，2日后为14.5%；中性多形核白血球在5小时后为79%，2小时后为85%，2日后为81.8%，3日后为92.5%，显示出逐渐增加的倾向。

嗜酸性细胞在5小时后为2.7%，12小时后为1.5%，2日后为2%，3日后为2%，逐渐减少。

大单核细胞5小时后为5.3%，12小时后为4%，2日后为3.5%，有逐渐减少的倾向。

红血球数难以见到显著变化。

第五章《便尿之所见》也是分析在三个地区的“被检物”的便尿随时间延长有何变化，在此省略。

第六章《结论》把以上一系列人体实验的结果作了如下的汇集。

根据由前述的一般性临床观察所取得的实绩，可大致区别液滴（侵润）、蒸气、吸收三种效力。

在第一地区液滴效力表现最大；第二地区液滴效力也表现显著，蒸气效力稍显著；在第三地区液滴、蒸气、吸收效力均可见到。

总而言之，（一）自觉症状障碍效果的出现主要是在攻击后4乃至5小时期间。

（二）皮肤水疱的形成约在12小时以后开始明显出现。

（三）呼吸器官受到损害约从12乃至24小时以后开始。

（四）消化器官受到损害最早约从4小时以后，最迟在14小时以后一定开始。

（五）眼睛症状都是最早从4小时以后，最迟均在12小时以后出现。

（六）上述各症状的极期是在48小时以后。这是把资料中能够确认的20人（总数）作为“被检物”，进行30例实验的结论。另外，关于1940年9月关东军化学部在北满实施毒气大演习与本报告书的关系，作为今后需要研讨的问题留下来。

（三）

破伤风杆菌接种实验报告书《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

这个报告书是将破伤风毒素和芽胞接种于人的足背部，测定发生症状时肌肉的电位变化（“时值”）的实验报告。被作为实验对象的有十四人（其中被以3位数或4位数号码记录的有12人）。其中在实验结果中明确记载为死亡的有3人，但如后所述，这一实验使更多的人致死。报告书的构成如下：

第一章　结论

第二章　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

第三章　实验成绩

第四章　总结与探讨

此外附3幅附表，这是3名“被检物”的症状变化一览表。

第一章《绪论》这样记载着：

我们在将破伤风“毒素”、“芽胞”接种于被检体足背部的场合，测定发生症状时的所属肌肉“时值”，比较被检体可检肌肉的毒素在实施芽胞接种、预防接种等场合值的变化。

第二章《实验材料及实验方法》如下这样的写道：

实检材料

毒素1000MLD三例（275、665、990）再接种（实施预防接种）1例（1026）

毒素100MLD4例（517、340、691、970）

毒素10MLD2例（973、595）

芽胞3.0CC1例（991）

5.0CC1例（985）

对照　毒素1000MLD　100MLD1例

对照　芽胞3.0CC1例

以上毒素9例、芽胞2例、对照毒素1例、对照芽胞1例，对咬肌、鼻肌、眼轮匝肌、胸锁乳突肌、背阔肌、肋间肌、胫骨前肌、腓肠肌等进行实验，分别测定“基强度”（r）及“时值”（δ）。大体在接种3至10日后，即从将要发生症状之前至发生症状之后，随着症状的不断变化，测定肌肉“时值”。根据以上各所属肌“时值”的刺激传导的变化率，试探求随着神经机能的亢进或减退，在该神经支配下的肌肉机能的亢进是上行性还是下行性。

第三章《实验成绩》记录了被用破伤风芽胞3CC作皮下注射的“991号”的病例，表示为致死。

观察右足跖皮下注射芽胞3.0CC场合（991）之例，“基强度”为50乃至60V，在发现症状之初，咬肌（正常值为0.3乃至0.4）的“时值”比正常值极大。在接种后的第八天为0.8，至第九天时，即随着接近死亡而又变为极小值0.009，以至表现出明显的挛缩。其次是眼轮匝肌，与正常的0.7乃至1.00比较，发病当初“时值”的值极大，为3.00，以后逐渐变小，第八天减少至0.18。在死亡之前，即随着第九天、第十天变为极小值0.08、0.015，肌肉越发敏捷，紧张度也增高（参照附表）。

这样，这个“被检体”在接种后十余天死亡了。在附表上以座标表示了咬肌、鼻肌、眼轮匝肌、胸锁乳突肌、背阔肌、肋间肌、胫骨前肌“时值”的值逐渐低下的变化过程。

接着，写了如下这样的接种破伤风毒素后的变化过程：

毒素接种的场合变化过程极为迅速，实验期极短，不过2至

3次，但接种后“时值”的值一般表现为极大的值。然而在至死之前所有的肌肉，特别是以在面部的咬肌、鼻肌、眼轮匝肌为主，背阔、肋间、腓肠各肌肉均见以0.3乃0.003这样小的值引起已经挛缩的肌肉神经的兴奋性增高的倾向（参照附表）。

在接种毒素的场合，毒素进入体内，比产生毒素的芽胞“变化极为迅速”。附表上表示出：接种毒素100MLD的“691号”在接种5日后死亡，接种毒素10MLD的“595号”在7日后死亡。因此，被接种毒素1.000MLD的3人，接种毒素100MLD的另外3人，还有接种芽胞相当多即5CC的一人大概也确实死亡了吧。总之，破伤风菌的接种实验大概确实使“被检体”致死。

第四章《总结与探讨》写道：

在这次实验中，开始咬肌、眼轮匝肌最早出现痉挛，肋间肌比较迟缓，背阔肌、腹直肌，腓肠肌、以至胫骨前肌等挛缩不显著。症状虽有发展，但挛缩有不与此并行的倾向。

面部肌特别是咬肌、鼻肌、眼轮匝肌大约在毒素、芽胞接种后二、三日间“时值”的值加大，随着症状的发展值又变小，在临死之前表现为极小的“时值”值。

也就是说，自接种后至发病从属肌肉处于一时麻痹的状态，以后随着病状加重兴奋性增高，在临死之前以令人吃惊的小“时值”的值达到已经引起挛缩的程度Reizbarkeit（敏感——引用者注）。

A氏在我们要求作出解释时说明：“破伤风的实验是在上司的指导下进行的”，从而承认了实施过实验。

以上资料现在都为庆应义塾图书馆所藏。本文是庆应义塾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代表　田中明）共同工作的一环。

二、《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

（指导　永山中佐）

陆军军医少佐　××××

陆军技师　××××

第一章　绪　　论

对于搞清脑脊髓或末梢神经疾病的种类、程度、变化经过及其预后，与从来惯用的神经诊断法相比，认定“时值法”更为精确的看法已由许多研究者（永井、宫本、小泽）发表。

而对于这种诊断法来说，问题在于能否以肌肉的所谓正确“时值”作为标准进行诊断，因此仔细研究正确值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在将“毒素”、“芽胞”接种于被检体足背部的场合，测定发生症状时的所属肌肉“时值”，比较被检体可检肌肉的毒素在实施芽胞接种、预防接种等场合值的变化。

第二章　实验材料及实验方法

实验材料

毒素1000MLD3例（275、665、990）

再接使（实施预防接种）1例（1026）

毒素100MLD4例（517、340、691、970）

毒素10MLD2例（973、595）

芽胞3.0CC1例（991）

5.0CC1例（985）

对照　毒素1000MLD100MLD1例

对照　芽胞3.0CC1例

以上毒素9例、芽胞2例、对照毒素1例、对照芽胞1例，对咬肌、鼻肌、眼轮匝肌、胸锁乳突肌、背阔肌、肋间肌、胫骨前肌、腓肠肌等进行实验，分别测定“基强度”（Υ）及“时值”（δ）。大体在接种后3至10日后，即从将要发生症状之前至发生症状之后，随着症状的不断变化，测定肌肉“时值”。根据以上各所属肌“时值”的刺激传导的变化率，试探求随着神经机能的亢进或减退，在该神经支配下的肌肉机能的亢进是上行性还是下行性。

人体的RH的测定法

要求得“时值”，首先要测定RH，这是固定的方法。

在此首先进行准备工作，即旋转整流电压调节器的把手，送直流电200V，将动物更换器的把手指向人体，将时值基流更换器指向基流，将人体用低抗更换器指向11000Ω，最后关闭整流器盘上的电源开关器。其次，检验者应首先在患者（被检体）的手腕上测出一个刺激点（Reizpankt）。为此，把与（ナ）侧联系的板状不偏电极用0.4%的食盐水湿润，压住患者的胸部，然后抓住患者的手腕，把拉比克氏刺激导子一一浸入食盐水中，专心致志地探求刺激点。因此器械的操作应当委托于助手。如果电极因体温而逐渐变干，以至影响电源通过，就要再三抽出以食盐水湿润。刺激点的发现，不但需要有相当的经验，而且要按照以下的

顺序操作。

（1）在开始测定RH值以后，将（ト）的把手转向时值之时即CH之时，尽管设计电压计指针指示为二倍于RH场合的电压，尚不免有几分误差。为此，在这种情况下转动向的把手，在确认了度电压计的指针确实达到RH场合的二倍后，即将（ル）的把手停止于这个位置上。既然修正需要进行一日以上，那么至测定终止，不可用手接触（ル）的把手。

这时，用拉比克氏电极在患者的手腕各处作最强的刺激，找到出现的点。这个点就是所求的刺激点。当然，在此期间要不断地上下调整充放电键。

不可将电极从所求到的刺激点上移开。

其次，当把（ト）的把手指向基流之时，（ウ）的指针当然指示为60V。在此再次慢慢调节（ソ）及（ヌ），测出在同一刺激点的最小刺激度，并记录在那种场合下的（ウ）及（ョ）的指针读数。这就是RH的值。

人体的时值（CH）的测定法

要在求RH的同一刺激点上测出CH的值，就应将（ト）的把手指向时值，而丝毫不必用手接触（ソ）及（ヌ）等，仅仅靠调整レ、ソ、ツ、ネ就会了解测出RH的节和求得完全相同程度的激值。这レ、ソ、ツ、ネ的读数之和就是所求的CH的值。

现在如果　レ的读数……1

　　　　　ソ的读数……2

　　　　　ツ的读数……6

　　　　　ネ的读数……2

那么レ　　$1\times1=1$

ソ　　　$2 \times 0.1 = 0.2$

ツ　　　$6 \times 0.01 = 0.06$

ネ　　　$2 \times 0.001 = 0.002$　（＋

即取读数的CH的值……＝1.262一百万分之一法拉

然而如果以1Σ即11000秒表示，在本装置中相当于一百万分之一法拉＝3Σ

（M.F）　　（Sigma）

因此$1.262MF = 1.262 \times 3 \quad CH = 3.786\Sigma$

但是，蓄电器容器上的标志与实际之间必然带有误差。因此必须要用附在器械上的误差表修正上述的测定值。误差表上明确记载着：

レ的误差…………－0.3（Σ）

ソ的误差…………＋0.005（Σ）

ツ的误差…………－0.0008（Σ）

ネ的误差…………＋0.00025（Σ）

如果这样，CH的正确值为

	－0.03	（Σ）
	＋0.005	（Σ）
3.786	－0.0008	（Σ）
	＋0.00025	（Σ）

即　3.785－0.02555

答＝3.760445（Σ）

第三章　实验成绩

观察右足跖皮下注射芽胞0.3CC场合之例，“基强度”为50乃至60V，在发现症状之初，咬肌（正常值为0.3乃至0.4）的“时值”比正常值极大。在接种后的第八天为0.8，至第九天时，即随着接近死亡而又变为极小值0.0009，以至表现出明显的挛缩。其次是眼轮匝肌，与正常的0.7乃至0.8比较，发病当初“时值”的值极大，为3.00，以后逐渐变小，第八天减少至0.18。在死亡之前，即随着第九天、第十天变为极小值0.08、0.015，肌肉越发敏捷，紧张度也增高（参照附表）。

毒素接种的场合变化过程极为迅速，实验期极短，不过2至3次，但接种后“时值”的值一般表现为极大的值。然而在至死之前所有的肌肉，特别是以在面部的咬肌、鼻肌、眼轮匝肌为主，背阔、肋间、腓肠各肌肉均见以0.3乃至0.003这样小的值引起已经挛缩的肌肉神经的兴奋性（EΓVRbaΓbeΓtvon Muokol n）增高的倾向（参照附表）。

第四章　总结与设想

在以往的电诊断学中，虽然对电刺激下的肌肉神经兴奋性的变化作了量的（阈价刺激的大小）和质的（挛缩样式及形态的变化）检查，但是时值测定法（chronax imetrie）在0.001秒以内的短暂时间中，依靠断续电流装置，以控制使肌肉神经兴奋所必须的电流通过时间长短的方法，把以往的最小挛缩值（引起kasz所需要的最小电流）作为Rheobase（基强度），并以其2倍的电流强度，把获得最小挛缩所必须的最短电流通过时间称为chroha

xie（表现为0・001秒），用这种“时值计”进一步精密地测定了肌肉神经兴奋性的变化。然而，在这次实验中，开始咬肌、眼轮匝肌最早出现痉挛，肋间肌比较迟缓，背阔肌、腹直肌、腓肠肌、以至经骨前肌等挛缩不显著。症状虽有发展，但挛缩有不与此并行的倾向。

面部肌特别是咬肌、鼻肌、眼轮匝肌大约在毒素、芽胞接种后二、三日间“时值”的值加大，随着症状的发展值又变小，在临死之前表现为极小的“时值”值。

也就是说，由接种后至发病从属肌肉处于一时麻痹的状态，以后随着病状加重兴奋性增高，在临死之前以令人吃惊的小“时值”的值达到已经引起挛缩的程度Reizbarkeit。

991	芽胞	3CC	
	时值	基强度	
咬肌	3.000（3日后） 3.616（5日后） 0.856（8日后） 0.009（9日后） 0.009（10日后）	50—60	10 9 8 7 6 5 4 3 2 1 0.009 0.856 3.000 3.610
鼻肌	3.000 3.032 0.180 0.0772 0.0151		10 9 8 7 6 5 4 3 2 1 0.015 0.772 0.176 3.000 3.032

眼轮匝肌	3.000		10	0.003 0.0123 0.0753 3.035 3.000
			9	
	3.035		8	
	0.0123		7	
	0.0753		6	
	0.0031		5	
			4	
			3	
			2	
			1	
胸锁乳突肌	0.300		10	0.003 0.0123 0.0753 0.300 2.923
	2.923		9	
	0.0123		8	
	0.0753		7	
	0.0031		6	
			5	
			4	
			3	
			2	
			1	

背阔肌	1.2100 0.9223 0.2702 0.1149		10 9 8 7 6 5 4 3 2 1	0.1149 0.2702 0.9223 1.2100
肋间肌	13.390 1.573 1.692 4.210		10 9 8 7 6 5 4 3 2 1	1.573 1.692 4.210 13.390
胫骨前肌	11.88（5日后） 9.77（10日后）			

691	毒素			100MLD
	时　　值	基强度		
咬肌	2.923（3日后） 0.003（4日后） 0.003（5日后）	60 50—60	5 4 3	0.003　　2.923
鼻肌	3.000 0.003 0.003		5 4 3	0.003　　3.000
眼轮匝肌	0.450 0.003 0.003	5 日	5 4 3	0,003　　3.450
胸锁乳头肌	3.069 0.003 0.003	后 10	5 4 3	0.003　　3.069
背阔肌	3.600 3.000			
肋间肌	13.184 3.000 3.000		5 4 3	3.00　　13.184
锯齿状肌	3.300 3.000			

595	毒　素		-10MLD	
	时　值	基强度		
咬肌	4.003 (3日后) 4.349 (4日后) 0.300 (6日后)	60 60—70 50—60	6 4 3	0.300 4.003 4.349
鼻肌	4.273 0.003 0.003		6 4 3	0.003 4.273
眼轮匝肌	3.708 0.003 0.003	7 日	6 4 3	0.003 3.708
背阔肌	3.660 3.300 3.000	后 10	6 4 3	3.000 3.30033.660
胸锁乳头肌	3.515 3.000 3.000		6 4 3	3.000 3.515
胫骨肌	3.415 1.510		6 4 3	1.510 3.415
腓肠肌	3.000 2.000		6 4 3	2.000 3.000

三、《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

第一章 绪 言

自昭和十五年九月七日至昭和十五年九月十日，用炮4门（600发）、榴弹炮8门（600发）发射“黄弹”。

第一区域发射弹数为每公顷100发，总数1,800发（换算为野炮）射击时间是40分钟：射击15分钟，间歇15分钟，再射击10分钟。

第二区域发射弹数是每公顷200发，总数3,200发。

第三区域发射弹数是每公顷300发，总数4,800发。

在被检者的区域内设置了野炮伪装掩体、壕、简易住所、观测所、掩盖MG座监视所、特种建筑物等。

在第一区域的阵地内安排的被检者，穿无帽便服、内衣，穿鞋子，无面具。

在第二区域的阵地内安排的被检者，着用无帽夏军装衣裤，穿鞋子，无面具者3名，有面具者3名。

在第三区域的阵地内安排的被检者，着用夏军装衣裤，无面具者2名，有面具者3名。

在黄弹发射后的4小时、12小时、24小时、2天、3天，或者5天，对一般症状（包括伴随的神经障碍症状）、皮肤症状、眼部、呼吸器官、消化器官的发展经过进行观察。

另外，以水疱内容液对人体实行接种试验，检查其血象、尿及粪便。

第二章　症　　例

第一区域阵地内被检者的症状及发展经过。

287号：

9月7日，黄弹射击后四小时，全身倦怠，口周发红。第二天，从8日1时起感觉全身倦怠无力，颈部发红，颜面浮肿、眼睑水肿、前臂背面发红。22时起口周发生粟粒大的水疱。

从9日22时起，口周多数粟粒大乃至米粒大的水疱丛生。10日17时，发烧37℃度（原文如此——译者注）、肩胛部、腭部、前胸、腹部、四肢、阴囊普遍发红。眼疼、羞明，结膜水肿、角膜混浊、眼有分泌物，咳嗽、流鼻涕、咽后壁发红。

11日17时，全身弥漫性发赤、肿胀，阴囊发红、疼痛并流鼻涕、音嘶哑、咳嗽，自诉颈内有搔破感。

12日10时，颜面肿胀、疼痛，项部各处有痂皮，肩胛部发红，腭部的水疱一部分脓疱化，四肢、腹部发红，阴囊糜烂，阴茎各部有痂皮。眼症状也有逐渐恶化的趋势，眼睑浮肿，结膜充血，明显地水肿。

9日12时，用300毫升经过木炭消毒的水进行攻击（饮用），到10日无显著变化。10日12时，用600毫升经过活性炭消毒的水进行攻击，至11日有轻度的食欲不振。12日食欲不振无显著变化。

280号（安置在野炮伪装掩体防毒覆盖下）：

射击后四小时，全身倦怠，愁眉不展。颜面、颈部、肩胛及

阴囊等各处皮肤潮红。眼羞明，大量流泪，结膜充血。

8日从6时起出现嗜睡；颜面浮肿，脉搏增快；颈部、前胸、肩胛等处皮肤发红；浮肿的面部，特别是口唇和阴囊处出现粟粒大的水疱，龟头发红肿胀；眼流泪多，眼睑水肿，结膜水肿并充血，角膜混浊；流鼻涕、咳嗽、声嘶哑。

8日18时，体温37℃；面部和颈部的皮肤散布着米粒大的水疱；两眼睑水肿、结膜充血、睁眼困难；音嘶哑，呼吸困难。

9日17时，体温37℃；面部和颈部皮肤上米粒大以至黄豆大的水疱多数密集，一般都肿胀隆起；阴囊潮红，自诉有针刺样疼痛灼照感，见有小豆大乃至黄豆大的水疱出现，眼部的症状也逐渐恶化：眼疼痛，视力发生障碍，眼裂附有黄绿色的分泌物。

10日17时观察，全身倦怠无力，心悸加重、体温37℃。颜面皮肤生出的水疱逐渐增多，一部分有薄的痂皮，肿胀的面颊发生糜烂。肩胛部背面弥漫性发红，肩胛部呈现糜烂。阴囊肿胀糜烂，有灼热疼痛感。四肢潮红稍减。呼吸器官症状：咳痰、下咽困难、呼吸困难、有喘鸣。前胸部心音减弱，脉搏130次/分，肺部听有笛鸣音、呻轧音、啰音。

296号（安置在伪装掩体伪装网下）：

7日18时，自觉全身倦怠，颜面下腭部皮肤呈现潮红，颈部散布着粟粒大的水疱。眼睑、结膜均肿胀充血，有鼻涕流出。

8日6时，全身倦怠，愁眉不展，嗜睡，食欲不振。颜面颈部发红肿胀，有粟粒大乃至米粒大的水疱丛生。龟头潮红见有小豆大的水疱。腋窝、膝盖部均发红。眼的症状是：流泪多，眼睑肿胀，结膜充血、颈内有搔破感，流鼻涕。

9日17时，精神困顿萎靡乏力，食欲不振。颜面、颈部皮肤

丛生粟粒大乃至米粒大的黄色水疱。龟头发红生有小豆大的水疱。眼睛的症状：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流泪多、睁眼困难。鼻涕多，颈内有搔破感，声嘶哑。前胸听有啰音。

十日十七时，心悸加重，咽后壁发红、疼痛。体温37℃度。

颜面皮肤特别是前额、眼周围、面颊弥漫性潮红。下腭部、颈后面连结出现粟粒大乃至豌豆大的水疱。两侧腕关节有多数粟粒大的水疱呈环状。尿道口部发红，呈现糜烂。头部、颜面、颈后部、前胸、腋窝、四肢等，轻压有疼痛感，特别是颈后面呈现弥漫性肿胀。后背呼吸音弱，听有呻轧音、笛鸣音。自诉恶心、呕吐、腹痛。

294号（安置在开着门的简易住所内）：

7日18时，自诉全身倦怠乏力，食欲不振。颜面皮肤潮红，眼羞明，眼睑、结膜充血，流鼻涕，咽后壁发红。

8日6时，自诉有全身倦怠乏力感。颜面皮肤呈现潮红，眼羞明，眼睑充血，结膜充血，流鼻涕，咽部发红、

8日18时，颜面、颈部潮红，眼睑、结膜水肿，流泪多，鼻涕多，声音嘶哑。

9日6时，上述症状有逐渐恶化的倾向，特别是鼻涕流出的症状加重。

10日6时，眩晕，颜面、背部、前胸、腹部弥漫性潮红、肿胀，红斑明显。颈部有粟粒大的水疱丛生。体温37℃。

17时，全身倦怠乏力精神不佳，眩晕，体温37℃。颜面皮肤潮红肿胀，自诉有灼热感。眼睑、口唇糜烂、颈部后面弥漫性潮红，粟粒大的水疱丛生，轻压有疼痛感，见有较薄的痂皮。胸部、腹部弥漫性潮红肿胀，各处有痂皮。上臂潮红，阴囊发红肿

胀，灼热疼痛。眼疼痛，羞明流泪，视力障碍，眼睑水肿，角膜混浊，眼裂附有黄绿色分泌物。流鼻涕，声音嘶哑，咳嗽，呼吸困难，颈内有搔破感。咽后壁发红，前胸呼吸音弱，有呻轧音。侧胸听有摩擦音。

376号（安置在交通壕内）：

7日18时，全身倦怠，流口水，颈部、前胸皮肤发红，眼睑水肿，结膜充血，大量流泪。

8日6时，颈部、前胸、上腹部、阴囊潮红呈浮肿状，散布有粟粒大乃至小豆大的水疱。眼睑结膜充血，伴随水肿睁眼困难。

18时，全身倦怠，愁眉不展，体温37℃。肩胛部呈现糜烂。大量流鼻涕，粘血性痢便，有腹痛，蛋白尿。

9日7时，全身倦怠乏力，眩晕，精神不佳，体温37℃度。颜面皮肤均潮红，特别是颈部呈现肿胀。背部、颈部、胸部肿胀，由肩胛连结至背部呈现糜烂，有疼痒。四肢特别是上臂肿胀呈浮肿状。在上臂内侧、手背部有小豆大乃至大豆大的水疱丛生。腰部及大腿膨隆肿胀，散布有大豆大的水疱，各处呈现糜烂面。阴囊、阴茎弥漫性肿胀，糜烂溃疡。眼睑水肿，大量流泪，结膜充血并水肿，角膜明显混浊，有小豆大的角膜溃疡。眼裂附有黄绿色分泌物。鼻涕多，咳嗽，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呼吸困难，咽后壁发红。前胸呼吸音弱，恶心，呕吐，腹痛，有粘液性血便。

第二区域阵地内被检者的症状及发展经过。

265号（安置在野炮伪装掩体内，有面具）：

9日22时，颈内有搔破感，咳嗽，余无著变。

10日7时，头痛，食欲不振，体温37℃。颜面皮肤特别是颊后部潮红，颊部有搔破感。眼羞明，大量流泪，结膜充血。

声音嘶哑，咳嗽，咽后壁发红疼痛，恶心呕吐。

10日22时，眩晕，体温37℃。脐内部糜烂，周围发红。颈部有搔破感，腹部及四肢疼痛。眼睑结膜充血，眼裂附有黄绿色分泌物。

10日8时，给被检查者饮用250毫升经过漂白粉消毒的水，见有明显症状。

11日，转用持久效力试验。

464号（安置在野炮伪装掩体内，无面具）：

9日22时，无著变。

10日7时，体温37℃，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皮肤症状：颜面特别是前额及上半身潮红，阴囊发红疼痛，四肢有搔痒感。眼睑结膜充血，声音嘶哑。

11日19时，体温37℃。颜面皮肤特别是颊部、口周围、前胸皮肤潮红。声音嘶哑，咳嗽，颈内有搔破感，咽部发红。

12日19时，全身倦怠，头痛，眩晕，体温37℃。颜面皮肤，特别是颈部、肩部皮肤呈暗红色。背部、腹部、大腿发赤潮红，右膝下小腿见有脓疱化糜烂部位。自诉阴囊稍有针刺样疼痛。眼疼痛，结膜充血，流鼻涕，声音嘶哑，咳嗽，咳痰，咽后壁肿胀。

10日8时，给被检者饮用600毫升经漂白粉消毒的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

11日，食欲不振，下痢1次。17时，恶心呕吐3次。

12日，食欲稍有恢复，依然恶心呕吐。

468号（安置在野炮伪装掩体下）：

9日23时，颜面特别是前额、颈部、肩胛、前臂、下肢等处皮肤潮红搔痒。

10日7时，轻度头疼，眩晕，体温37℃。颈部、四肢背面、胸部、阴茎皮肤潮红。特别是颈部、前臂散布着粟粒大乃至小豆粒大的水疱。眼羞明，食欲不振，呕吐5次。

19时，体温37℃，头部皮肤散布着大豆般的水疱。肩胛、阴茎包皮边缘水肿。腰部及四肢有小豆大乃至大豆般大小的水疱。眼羞明，眼裂附有分泌物。咽后壁稍稍发红，自诉恶心呕吐。

11日9时，眩晕，食欲不振。皮肤症状：肩胛部、腰部、大腿及小腿（原文下缺——译者注）。

到11日17时，食欲稍好，右下腹部有压痛，可听到雷鸣音，无呕吐，大便一次为普通便。

499号（安置在有防毒覆盖〔用橡胶护膜简易掩盖〕的伪装掩体内，无面具）：

9日18时，皮肤有著变，咳嗽。23时，食欲不振，全身倦怠，体温38℃。全身皮肤有搔痒感，阴囊潮红，灼热疼痛。眼羞明，恶心，连续呕吐6次。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后壁中等度发红。

10日19时，食欲不振，体温38℃。肩胛部有轻度搔痒感，潮红，灼热疼痛。阴囊、阴茎包皮尿道口发红疼痛。四肢症状不明显，仅右大腿潮红。眼睑轻度充血，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下困难，咽后壁发红肿胀，恶心呕吐，稀水样便2次。

11日9时，眩晕，精神忧郁，体温依然38℃。右耳翼、耳

根、大腿皮肤及阴囊潮红，灼热疼痛。眼流泪多，眼睑浮肿，结膜充血。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部发红。恶心呕吐1次，腹部有霍鸣音，有压痛，大便为粘血性痢便。

12日19时，体温依然38℃度。右大腿部皮肤出现一铜钱大的褐色色素沉着，并有针刺样疼痛。后背各处可见斑纹状色素沉着。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部发红。恶心呕吐1次，肠鸣音亢进，腹部有压痛，里急后重，下粘血性痢便。

12日21时，体温依然38℃，依然有恶心呕吐、粘血性痢便、里急后重等症状。

513号（安置在有简易掩盖物的观测所内，无面具）：

9日19时，面部、肩部皮肤弥漫性潮红。四肢各处可见潮红红斑，有搔痒感。眼羞明，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流鼻涕。21时，体温37℃。颜面、颈部、肩胛、上肢内测、膝盖等处皮肤潮红，有搔痒感。颜面特别是颊部散布着粟粒大乃至小豆大的水疱。颈部、肩胛部弥漫性小豆大的水疱丛生。眼流泪多，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显著，角膜混浊，两眼裂附有黄绿色分泌物。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恶心呕吐达四次。

10日20时，食欲不振，心悸亢进，体温38℃。全身皮肤有搔痒感，头部前额、颊部、耳周围、耳根、口周围出现粟粒大乃至小豆大的水疱。前胸弥漫性水疱如大豆大乃至雀卵大。颈部、肩胛部小豆大的水疱丛生。肩胛部呈现糜烂。后背弥漫性潮红，粟粒大的水疱丛生。眼羞明，流泪多，眼睑水肿，结膜充血，角膜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下困难，头部发红肿胀。

11日9时，全身倦怠，食欲不振，体温依然38℃。颈项、肩胛、腋窝、上肢、前胸、大腿、阴囊等各处皮肤潮红，呈现弥漫性肿胀。面部弥漫性水疱丛生，多数溃破。颈部、肩胛部有米粒大乃至大豆般大的水疱丛生，部分糜烂。上肢腋窝各处散布着小豆大的水疱。尿道口周围糜烂，灼热疼痛。

眼羞明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伴随喘鸣，左背下面听有呻轧音。

12日10时，头痛，全身倦怠，心悸亢进，体温38℃。颜面皮肤呈特有的暗黑色，水疱发生部都覆盖着薄痂皮。肩胛部均呈糜烂状，散布着小豆大以至大豆大的水疱。腹部见有很多白色的薄痂皮。眼羞明疼痛，视力障碍，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浮肿，角膜混浊，附有分泌物。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咳痰，咽下困难。胸部疼痛并有压迫感，呼吸困难明显，有喘鸣。前胸听有笛鸣音、呻轧音。啰音。

第三区域的阵地内

303号（安置在特种建筑物〔关着门、开着射击孔〕内，无面具），

10日23时，头痛，皮肤无著变。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恶心，呕吐3次。

11日7时，食欲不振，体温37℃度。颜面、颈部搔痒。左耳后部、两膝及阴囊等处潮红。眼羞明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水肿。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多，咽部发红，恶心，呕吐5次。

11日17时，眩晕，精神萎靡，全身倦怠。面部，尤其是口周

围、颈部、腋窝、肘部、阴囊、龟头、臀部弥漫性潮红。面部和颈部搔痒明显。眼部、背部、项部、鼻孔、阴囊、口周围散布着粟粒大的小水疱，有针刺样的疼痛。眼羞明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扁桃腺红肿，前胸部呼吸音粗，背部左上部有浊音。

12日19时，食欲不振，体温38℃。口周围、鼻翼、头部发际有小豆大的水疱，疼痛明显。头部见有脓疱化湿疹，有疼痛。阴囊疼痛明显。眼羞明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流鼻涕，咳嗽，咽头发红。

485号（安置在特种建筑物〔关着门、开着射击孔〕内，有面具）。

10日23时，初见一般症状，其他无著变。

11日9时，头痛。前额、口周围、左项部、腋窝、阴囊、前臂内侧皮肤潮红。流鼻涕，咳嗽，咽后壁发红。恶心呕吐3次。17时，眩晕，食欲不振，体温37℃。颜面、口周围、耳后部、前胸、阴囊发赤潮红。耳后部、前胸部见有浮肿。眼疼痛，流泪多量，轻度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流鼻涕，咽部发红，颈内有搔破感，咳嗽。

12日18时，食欲不振，体温37℃。颈内有搔破感，咳嗽。

13日8时，阴囊皮肤糜烂，各处带有白色的薄痂皮，有灼热痛。膕关节见有赤褐色的色素沉着。

10日取经过黄弹污染的原水300毫升，于11日8时，给被检者饮食，11日7时（原文如此——译者注），恶心呕吐3次，至17时，恶心呕吐症状消失。12日大便1次为普通便，症状变化显

著。

486号（安置在掩蔽MG座内，无面具）：

10日23时，头痛，食欲不振，精神忧郁。头部有针刺样疼痛，躯干各处呈现弥漫性发赤潮红，四肢尤其是大腿内侧各处潮红。眼羞明流泪，结膜充血水肿。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恶心，呕吐达5次。

11日7时，全身倦怠，精神忧郁，食欲不振。颈项、背部皮肤弥漫性发红。腋窝、上臂内侧、腕关节、腹部、阴囊各处皮肤潮红。阴囊表皮肿胀。右腕关节部位、左大腿部位散布着大豆大以至胡桃大的水疱，右大腿散布着小豆大的水疱。眼羞明，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部发红肿胀疼痛。恶心呕吐次数。17时，体温38℃，头痛，全身倦怠，精神忧郁，食欲不振，心悸亢进。全身皮肤搔痒。头部见有弥漫性红斑。前额、眼睑周围、口周围、耳翼、上腹部、下腹部、背部、腋窝、前臂内侧、手腕、手背、左大腿、臀部、阴茎包皮发红，见有红斑。上腹部、下腹部、背部形成环状红斑。

另外，背部、腹部肿胀，有粟粒大的水疱丛生。大腿、阴茎包皮亦潮红，有密集的粟粒大的水疱。眼羞明疼痛，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伴有水肿。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咳痰明显，咽后壁、扁桃腺发红，见有苔皮，恶心呕吐。

12日10时，体温38℃。四肢特别是腕关节、大腿内侧、背部、腋窝、项部的皮肤潮红。四肢背面均呈现浮肿状，有粟粒大乃至小豆大的水疱丛生。眼羞明疼痛，视力障碍，流泪多量，结

膜水肿，角膜混浊。咳嗽，声音嘶哑，咳痰，咽头发红肿胀，见苔皮，恶心呕吐。

372（安置在单人用立射壕内，有面具）：

10日23时，头痛，全身倦怠，食欲不振。腕关节皮肤发红疼痛。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

11日7时，前额、颈部、腕关节、膝部、阴囊等处皮肤搔痒，呈现潮红。眼疼痛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恶心呕吐6次。

17时，眩晕，全身皮肤搔痒。前额、鼻部、口周围、耳翼后部、腕关节、阴囊等处皮肤潮红。眼睑泪多，眼流水肿，结膜充血。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后壁发红，依然恶心呕吐。

12日18时，体温37℃，头痛，眩晕，精神忧郁，食欲不振。头部搔痒，上肢各处有赤褐色的色素沉着。阴囊搔痒明显。眼睛仅结膜充血。颈内有搔痒，感，咳嗽，恶心呕吐4次。

358号（安置在交通壕内，有面具）：

11日23时，头痛，食欲不振。颊部、项部、腕关节皮肤有搔痒麻痹感。流鼻涕，轻度咳嗽，恶心呕吐2次。

11日7时，眩晕，食欲不振。腕关节、手背、左下肢内侧、膝部、阴囊等处皮肤搔痒发红。颈内疼痛，咳嗽，恶心呕吐四次。17时，轻度头痛。阴囊潮红，自诉有轻度搔痒。咽部发红疼痛，恶心。

12日18时，头痛，食欲不振。阴囊皮肤有灼热痛。右肘关节皮肤见有瘢痕处。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咳嗽，恶心，呕吐，腹痛，下痢2次。

18日8时，体温37℃，仅眩晕、恶心，皮肤症状有显著变化。

持久效力及饮用泵水效力的观察

持久效力观察，就是在黄弹射击中止后约2个半小时再放置被检者，从10日22时起，放置到11日4时半，然后进行观察。

359号（安置在暴露的地面上，无面具）：

11日9时，食欲不振，有乏力感。颜面皮肤、尤其是眼睑、鼻、口周围、项部、腋窝、颈部、背部、腰部、右前臂、两大腿等处皮肤潮红。眼羞明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角膜混浊。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并有灼热痛，咳嗽，咽部发红。

12日10时，全身倦怠有乏力感，食欲不振。颜面尤其是颈部散布着豌豆大的水疱。前臂、腕关节、手背等处散布着豌豆大以至鸡蛋大的水疱并形成环状。在腰部、臀部有粟粒大以至小豆大的水疱环状丛生。四肢、腰部、臀部各处的水疱围绕成环状，见有暗褐色的色素沉着。

眼羞明，视力障碍，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混浊并附有分泌物。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频繁，呼吸音粗糙。19时，体温38℃，食欲不振。四肢尤其是外侧、背部、腰部、臀部皮肤上见有斑点状赤褐色的色素沉着，特别是形成环状的水疱内部较显著。臀部有搔痒感，右腕关节、左前臂、阴茎、腰背等处有灼热痛。前臂的一部分发生糜烂。眼羞明，疼痛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眼裂附着有黄绿色的分泌物。恶心呕吐1次。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后壁发红肿胀。前胸、后背下部听有笛鸣音、呻轧音。

13日8时，体温38℃度，全身倦怠乏力，精神忧郁，食欲不

振。项部、肩胛部、四肢特别是外侧延续至下腹部有赤褐色的色素沉着，有粟粒大乃至小豆大的环状丛生的水疱，中间部位存在着特别明显的色素沉着。水疱部位有压痛。阴茎、阴囊均有暗褐色色素沉着。水疱的皮也带赤褐色，疼痛明显。阴囊各处散布着小豆大的水疱。

眼羞明疼痛，视力障碍，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混浊。鼻涕多，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喘鸣，呕吐。

449号（安置在暴露的地面上，有面具）：

11日9时，眩晕，食欲不振。颜面皮肤特别是从耳翼后部延续至颊颐部，以及臀部、大腿、阴茎、尿道口、阴囊等处皮肤均潮红，呈现浮肿。眼仅羞明，有呕吐。

12日11时，体温37℃。面部有弥漫性暗褐色色素沉着。臀部有豌豆大乃至拳头大的水疱环状丛生，在肾部赤褐色色素沉着部位及有水疱部位均疼痛。阴囊部无著变。

375号（安置在掩盖MG座内，无面具）：

11日9时，食欲不振。颜面特别是前额、眼睑、右前胸、右肘关节、前膊、左腕关节、大腿等各部位皮肤潮红。眼轻度羞明流泪，结膜充血。咽部发红。

12日10时，体温37℃度，全身倦怠。四肢特别是肘关节皮肤发红，散布着粟粒大乃至小豆大的水疱。眼羞明，眼睑水肿，结膜充血。

265号（安置在监视所〔三面敞开的有顶棚的壕〕内，无面具）。

11日9时，体温37℃，头痛，食欲不振。颜面皮肤特别是前

额、鼻、口周围、眼周围、耳翼、腕关节、脐部、肾部延续至阴囊弥漫性潮红。脐内部呈现糜烂。颜面、臀部有轻度压痛。眼羞明疼痛流泪，眼睑水肿，结膜充血，角膜混浊。流鼻涕，声音嘶哑，颈内有搔破感，咳嗽，咽后壁发红肿胀疼痛，恶心呕吐。

12日10时，体温37℃度，精神不佳。肩胛部皮肤呈暗褐色，臀部疼痛见有红斑。阴囊有搔痒感，脐部有白色薄痂皮。眼羞明疼痛，视力障碍，流泪多量，眼睑水肿，结膜充血，角膜混浊。流鼻涕，颈内有搔破感，咽后壁发红肿胀疼痛。左前胸听有摩擦音。

原水攻击效果观察

479号：

9月7日，原水饮用（攻击）。

9月10日20时，对右眼用原水点眼。

9月11日，右眼结膜发红充血。

9月8日（攻击后12小时），呕吐，下痢，里急后重，排出粘液血便。

9月9日，因下痢食欲不振，呕吐，里急后重，有粘液血便。在试验实施赤痢菌检索时见（远藤氏寒天）细菌集聚。

287号：

9月9日，使之饮用（攻击）经木炭消毒的原水300毫升。

芥子气原水15mg/L

路易氏气原水15mg/L

9月10日，10日一天当中无显著变化。10日白天，使之饮用（攻击）经活性炭消毒的九日的原水600毫升。

氧化铁芥子气　　○

路易氏气　　〇
木灰芥子气　　〇
路易氏气　　19.9mg/L
9月10日，无著变。
9月11日，食欲不振，大便1日1次为普通便。
9月12日，存在轻度食欲不振。
464号：
从10日白天起，使之饮用（攻击）9月9日晨的原本（芥子气148mg/L路易氏气26mg/L），12小时以后，食欲不振，恶心呕吐。
11日，食欲不振，17时许呕吐3次，恶心，腹部有压痛。
12日，食欲不振，依然恶心呕吐。
490号：
从10日白天起，使之饮用（攻击）9月9日的原水（用除砒剂消毒的）600毫升。12小时后恶心呕吐4次，24小时以后，食欲不振，恶心。
至11日，食欲不振，轻度恶心，呕吐1次。至17时，便1次普通便，无呕吐。右下腹部有压痛，有肠鸣音，食欲稍有恢复的趋向。
485号：
10日使之饮用（攻击）原水（芥子气141.9mg/L路易氏气87mg/L）300毫升。
11日7时，恶心呕吐3次，17时无恶心呕吐。
12日，大便1次，普通便，无著变。

第三章　水疱内溶液之所见及人体试验的成效

第一节　水疱内容液之所见

水疱内液体清澈，淡橙黄色，弱碱性。水疱内液体的细胞数为20至30余，淋巴细胞41.2%，中性多核白血球52.9%，大单核细胞5.9%，淋巴细胞22.4%，中性多核白血球75.5%，杆状核细胞2.1%。

对四六八号在攻击后12小时，在前臂发生的水疱作抽引检查，结果是：淋巴细胞30%，中性多核白血球65%，大单核细胞5%。24小时后检查水疱内液体，结果是：淋巴细胞34.8%，中性多核白血球60.9%，大单核细胞4.3%，淋巴细胞依然稍多。

第二节　人体接种试验

12日，对水疱内液体作无菌穿刺抽引，供以下试验用：

（一）在479号的右上臂部皮下注射该液0.2毫升。

12小时后、24小时后观察未发现什么症状。毒力试验结果是阴性。

（二）在479号的左眼角膜内注射0.1克，1昼夜见有轻度的巩膜充血及结膜充血，经2昼夜恢复正常。

（三）在485号、468号、358号、372号计4人的左上臂、右上臂的皮下注射该液0.2克，作一昼夜观察，没有任何反应。

毒力试验结果阴性。

第四章　血象之所见

第一地区的成效

攻击5小时后，血色素量是87—100%，12小时后是78—

87%，2日后是66—85%，3日后是57—63%，逐渐减少。

红血球似无显著变化。

白血球之所见

白血球数，攻击后5小时是9,500乃至12,000，12小时后是11,600乃至14,800，2日后是13,300乃至15,700，显示出逐渐增加趋势。至3日后是6,300乃至13,500，4日后是7,900乃至13,900，5日后是9,200，显示出减少。

一般多核白血球多数成为多型核分裂。

淋巴细胞，攻击后5小时平均27%，12小时后10%，2日后8%，3日后7%，逐渐减少。

中性多核白血球，攻击后5小时平均71%，12小时后85%，2日后96%，3日后91%。嗜酸性细胞5小时后2%，12小时后3%，3日后1%，4日后3%，5日后4%5日后6%，有逐渐增加倾向。

嗜碱性细胞是1%，大单核细胞5小时后2%，12小时后1%，2日后3%，3日后2%，如此增减。

第二地区试验成效

红血球很难看出有显著变化。血色素量攻击后五小时88%，12小时后73%，2日后55%，3日后59%，4日后58%，5日后5%，显示出逐减少。

血白球之所见

白血球数攻击后5小时为9,000，12小时后为11,600，2日后14,300，3日后为10,400，4日后为17,600，5日后为18,000，逐渐增加。

淋巴细胞5小时后为26.8%，12小时后为27.6%，2日后为19.2%，3日后为18.4%，4日后为9.7%，显示出一时增加随后

逐渐减少的倾向。

中性多核白血球5小时后70.3%，12小时后79.8%，2日后74.6%，3日后87.7%，4日后86.7%，逐渐增加。

嗜酸性细胞5小时后1.5%，12小时后2.7%，2日后2%，3日后2%，4日后1%，逐渐减少。

大单核细胞5小时后2.3%，12小时后2.2%，24小时后2.8%，3日后3%，有渐次增加的倾向。

碱性细胞是1%，无增减。

第三地区试验成效

血色素量攻击后5小时65.4%，12小时后59%，2日后54.5%，3日后58%，红血球无大变化。

白血球之所见

白血球数5小时后16,300，12小时后14,000，2日后10,0000，3日后9,800，渐次减少，比正常激增。

淋巴细胞5小时后14.8%，12小时后13.2%，2日后10.2%，3日后13%，4日后13.5%。

中性多核白血球5小时后80.6%，12小时后83.8%，2日后85.6%，3日后83%，4小时后81.5%。

嗜酸性细胞5小时后2%，12小时后1.5%，4日后1%，5日后1%，显示出渐次减少。

大单核细胞5小时后2.8%，12小时后2.1%，2日后1%，3日后3.5%，4日后3%。红血球难以看出显著变化。

第三地区持久效力试验成效

血色素量攻击后5小时后64%，12小时后64%，2日后61.3%，3日后76%，有渐次增加的倾向。

红血球无大的变化。

白血球之所见

白血球数攻击5小时后14,100，12小时后13,800，2日后32,000，3日后37,700，起初比正常激增，随着时间的发展有渐次增加的倾向，见有多形核分裂。

淋巴细胞5小时后15%，12小时后11%，2日后14.5%。中性多核白血球5小时后79%，12小时后85%，2日后81.8%，3日后92.5%，显示出渐次增加的倾向。

嗜酸性细胞5小时后2.7%，12小时后1.5%，2日后2%，3日后2%，渐次减少。

大单核细胞5小时后5.3%，12小时后4%，2日后3.5%，有渐次减少的倾向。

红血球难以看出显著变化。

第五章 粪便及尿之所见

第一地区的试验成效

攻击后尿呈酸性或弱酸性，乳黄红色、黄褐色、乳黄褐色等，随着时间的发展，次第变成淡橙黄色，普遍混浊，经过一定时间变成清澈。

攻击后5小时蛋白阳性1名，尔后消失。尿糖阳性1名，重氮反应皆阳性，肠T·B反应皆阳性，尿胆元皆阴性，尿兰母试验阳性2名，酮体阳性1名，24小时后消失，红血球、白血球均可见到。

酪氨酸阳性1名，上皮细胞阳性1名，粘膜、管形不存在。

大便次数2至6次，每次都是下痢粘血便，潜血阳性。

第二地区的试验成效

攻击后及经过一段时间，尿都是淡黄色、清澈，呈酸性，蛋白阴性。尿糖阳性2名，重氮反应阳性2名，尿胆元阳性 2 名，尿兰母试验阳性2名，少数可见到红血球、白血球。

上皮细胞阳性1名，粘膜、管形都可见到。粪便是软便 或 者是下痢便，潜出血都呈阳性。

第三地区的试验成效

尿淡黄色，清澈，酸性，蛋白阴性，尿糖阳性1名，重 氮 反应阳性1名，肠T·B反应皆阴性，尿胆元阳性1名，尿兰 母 试 验阳性1名，有红血球、白血球，粘膜、管形都不存在。

粪便是硬便，潜出血阴性。

第六章　结　　论

根据上述一般的临床观察得出的实际效果，大致区别一下液滴（浸润）、蒸气、吸收的三种效力。

在第一地区发现液滴效力最大，第二地区液滴效力也显著，蒸气效力稍明显，在第三地区，液滴、蒸气、吸收效 力 都 可 见到。

总之，（一）作为主要自觉症状障碍效果的出现，是在攻击后4至5小时；

（二）皮肤水疱形成从12小时开始明显地出现；

（三）呼吸器官障碍是在12乃至24小时开始出现；

（四）消化器官障碍最早从4个小时以后最迟是在12 小 时后一定出现；

（五）眼的症状都是早在4小时，迟在12小时出现；

（六）上述各症状的极期是在48小时以后。

第七章　附　　记

我的仅供参考的治疗是：在一部分水疱液被吸出的部位，当作一般皮肤炎治疗，试用氧化锌软膏、佩利多耳软膏，该部位分泌减少，干燥得也较快，显示出有良好的效果。

另外，初期在受伤部位用5％的碳酸钠水溶液洗涤、湿罨法，也可取得相当大的效果。

对于结膜充血、结膜炎，以0.5—1.0碳酸钠水溶液洗脸，涂入碱性眼膏，其效果良好。

一度受到侵害的皮肤，潮红，呈现红斑。在面部、背部、上前臂部滴入黄弹的液滴，大部分出现红斑，潮红，极少数红斑严重随后出现水疱，并有褐色色素沉着的残留。

水疱多数是从皮肤的皱褶处发生，常常也从毛囊孔丛生。

在3至4小时发生的多数粟粒大的水疱，渐次增大到拇指大成多房性，其余为单房性。

水疱在潮红或红斑部位发生时，形成环状的算珠式地连在一起，内部呈现有赤褐色、褐色或黑褐色的色素沉着，又多发生在颈项部、肩胛部背面，特别是肩胛中间、面部的前额、鼻尖、鼻翼、口周围、耳根等处。另外，鼻涕流下增多呈线状。

尿所见，攻击后5小时发现蛋白性1名，尔后消失；其他都是蛋白阴性。不见有上皮细胞、粘膜管形等。

依照马歇尔氏的说法，芥子气中毒时不侵害肾脏。即芥子气在体内被分解，通过肾脏时被变成无害物质排出。

据松村高夫教授介绍，至今还在世的A少佐否认那次“黄

弹”试验与他有关，对此，我们暂且不予评论。然而，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这个铁的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也是无法否定的。这两份报告书中没有提供实验地点，也不能确定就是本书前面记述的那两次实验地点。但是，不能因实验地点不同，就认为报告书中所记录的实验与野崎、荒濑等人无关。这是因为，这种实验不是总在一个实验点上进行的。由于每进行一次这种实验，实验场都会受到污染，所以，必须经常转换实验场。

特别监狱

由于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和细菌武器效能实验的“实验材料”是活人，所以，它设立了一个关押这“实验材料”的“特别监狱”。因此，特别监狱就成了七三一部队贮存活体“实验材料”的仓库。

通常认为，用活人进行各种细菌的传染试验，那是第一部的事。其实不然，连制造细菌的第四部以及“南栋”第三部和诊疗部也积极进行。至于室外实验，参加的人员就更广泛了。因此说，整个七三一部队就是细菌杀人的魔窟。①

各个研究班在进行某项实验之前，都向特别班预约“特殊实验材料”，特别班根据各个班提出的年令、性别、种族以及健康情况等条件，对被试验者进行号记。有时各研究班可直接进入牢房，隔着栅栏窗口选择或指定。他们对被试验者采取强制手段。如被试验的人顽强反抗，日本宪兵就施用武力、用刑或当场击毙。因此，这些被试验者的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一旦被押进实验室就不得不任从实验者的摆布。他们有的经过一次试验就丧了性命；有的虽然还能够多活几天，但等待他们的仍是接二连三的各种试验更大的折磨和痛苦，最终还是七三一部队细菌试验的牺牲品。

① 中央档档馆档案：山田丰纪的证词。

一、德国式秘密建筑的结构和设施

《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简称《审判材料》）一书中曾指出，“特别监狱”密设在四方楼的内院里。由于四方楼是一个“口”型建筑，其内侧形成东、西两个内院，特别监狱分别隐藏在两个内院里。对它，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吹嘘说：“这是采用德国式的‘秘密建筑法’。”①这一点，不仅有一张反映七三一部队建队初期的主要建筑物四方楼及特别监狱的照片为证，而且还有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成员石桥对它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说，石井刚男（少佐）为特别监狱管理班班长，这个班每个时期都保持有20余名七三一队员，而他本人也是初期的队员之一。

设在四方楼内院里的特别监狱，西院的那座为7号，东院的那座为8号。每座监狱建筑长约35米至40米，宽约20米，都是钢筋水泥制二层楼，并设有地下室，外部抹有灰色水泥面。它们东、西两侧各距四方楼内壁约有3米远，南、北两侧各距四方楼内壁约有20米远，对称地排列在四方楼中心走廊的西侧。所以，它的一层有一段仅几米的走廊与四方楼中心走廊连接，这里也是它的唯一出入口。

7号监狱和8号监狱的内部构造相同。每层中间设有走廊，其南北两侧各6间牢房，共有12间牢房。这样，每个监狱有24间牢房，两个监狱为48间牢房；牢房四周设有环形走廊；牢房有大有小，多数为集体牢房，还有少数单人牢房；每间牢房内的一角安

---

① 〔日〕田村良雄（防疫诊疗助手兵长）：“细菌战—731部队的野蛮行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

着水洗式便池，靠中心走廊那面在离地1.2米高开设一个长30厘米、宽25厘米大小的观察窗。靠外墙那面，也在离地50厘米高的位置上开设与观察窗大小差不多的投饭口；各个牢房里安装着相互连通的通气管道；在监狱的出入口安装双层铁门，在门外四方楼中心走廊的西侧设有特别班管理室，东侧是“犯人”的伙房。

关于特别监狱里监押“犯人”的数量，根据牢房的数量和每间牢房可容纳10人，因有几间单人牢房，所以，按平均每个牢房监押3至6人的容量计算，整个特别监狱至少监押250人。

石桥先生还讲述押送“犯人”的经过以及所走的路线。“犯人”平时都被监押在上边的7号或8号牢房里，对他们进行烈性传染病菌试验就是在地下室进行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押着“犯人”去过那里。

这些地下室，就是设在特别监狱和四方楼一层（第四部）下面的活体实验室。“白衣野兽”们，就在这里对活人进行细菌传染效能的试验和病理试验。它是个绝密的地方，就是七三一部队内部一般人员也既不知道更进不去；需要进去的人，也必须经过严格的长时间的审查，才能领到许可证。

二、被关押的“实验材料”

“特设监狱”里监押着“特别输送”来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当时七三一部队的雇员上野和上田弥太郎是目击者，上野于1942年受训期间，听看守俘虏的小山中士说：“在地下室里押有俘虏，这些人都是实验的材料，象这种事在日本的大学内是看不到的。”上田弥太郎当时在第四部担任实验助手，

在试验中，只接触到被监押的中国人，但他意外地知道了这里还监禁着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

1942年10月的一天，上田、伊藤、伊东和新平雇员在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大门口看见三辆专运“犯人”的汽车开进了本部大院。

那么，“特设监狱”里究竟关押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被当作实验材料而死去了呢？据川岛清所的供诉，这里同时监押着300—500人。这些被监禁的人都被编为三位数的号码，到1942年末，这些数字就循环了三次，此后的两年半时间，仍然是照旧继续进行的。据此推算和当事者的证实，从1939年至1945年8月，通过细菌实验杀害的人至少有3000以上。①

日本人警备队虽然对四方楼和特别监狱严密把守，但它的种种神秘色彩和一系列的奇怪现象，也使中国劳工们推测到那里监押着一些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文道礼是七三一部队酒保的马车夫，专门负责用马车往各处送货。1944年夏天，酒保的日本头目交给他每天午后4点钟往四方楼送一次面包的特殊任务。这种用精粉制作的面包是供应日本判任官、高等官和技师以上人员食用的，雇员、佣员和士兵、学员只能在每周改善生活时吃到。把它成箱的送到四方楼里去，是给什么人吃呢？文道礼无法弄清日本人的用意，只好按着他们的命令，准时把面包送去，那里果然有几个日本人在外接应。有一次，文道礼赶着装面包的马车准时到四方楼门口，但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日本人出来迎接。他看时间已过，急于下班的心理使他闯进院内，推开了两扇小铁门，进入

① 《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

了深深的洞口。这时，他突然被一个佩红刀带的日本军官用手枪逼住，使他不敢往前挪动一步。那个日本军官给宪兵室挂了电话。宪兵室的翻译官春日到后，一边用中国话审问文道礼，一边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又给酒保头目石冈打电话。石冈照春日的指令迅速到地洞里，被春日打了一顿。石冈为了出气，又把文道礼痛打一顿。事情发生后，四方楼里所需要的面包都改由日本人亲自送了。他们不仅往四方楼送面包、精粉、猪肉等食品，而且还往里送粗粮、蔬菜等食物。

白武斌敏感地猜想：四方楼并没有日本官兵食堂，运进这么多的粮食给谁吃呢？如果说是给中国人吃的，那四方楼里边根本没有中国劳工呀！难道四方楼内部秘设着监押"犯人"的监狱……

劳工王英富和日本雇员清野经常在一起。有一次，他带着未解的"疑团"问清野。清野告诉他："那里边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人。""他们的心大大的坏了，我们希拉密（虱子）的给、药的给、死啦死啦的，那边火的给。"王英富终于听明白了，他们抓来的是"反满抗日"的人，有苏联人，也有中国人，并在这里杀害。致于用什么方法杀害的，他是不清楚的。清野讲完，立刻显露出恐惧的神情，一再告诫王英富不要把他的话传出去，因为他说的话一旦传出去，将会丧命的。

三、惨死的荷兰共产党人

1985年夏季，有位名叫韩希望（译音）的澳大利亚籍的荷兰人寻找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期间在哈尔滨南20公里处设置的一座兵营来到平房。因为这座兵营用特殊手段残杀了他姐姐的未婚

夫。这个消息是国际红十字会于1946年通知他姐姐的。他姐姐由于对未婚夫的怀恋，并盼望其能够意外地归来而没有结婚。可是，她白白地等了40年，未婚夫确实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了。经查询，他的被害地就是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盘踞地——平房。她想要远渡重洋看看这个地方，但始终未能如愿。这次，她弟弟韩希望要到中国办理国际贸易业务，临行前委托其弟弟无论如何要到平房一趟，哪怕带回去一张有关照片也好。

韩希望过去对七三一部队有一些了解，这次到平房七三一部队遗址参观考察后说："他的殉难地就在这里，看来是不会错了。"

韩希望和他的姐姐及姐姐的未婚夫原来住在荷兰的海滨城市鹿特丹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全家迁居澳大利亚。

1940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鹿特丹市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荷兰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他姐姐的未婚夫也是荷兰地下党员。由于战争环境，尚未与他的姐姐结婚，独身一人寄宿在他家。当时，德寇为了控制地下反法西斯战士的活动，对市民实行口粮、副食配给制。他姐姐的未婚夫没有户口，得不到口粮的配给。在这种情况下，姐姐说服了母亲，全家省出一些口粮给她的未婚夫吃，并使其有了隐身之地。不幸，她的未婚夫被捕，德国占领军把他监押在一处临时地下拘留所里，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没有屈服。一周以后，当德寇要对那批被捕人员进行处决的时候，他乘敌人防备不严之机逃跑了。他在去加拿大路过苏联时，被苏军误当德国间谍逮捕，押赴西伯利亚。经审查，排除了他的"德国间谍"的嫌疑，并吸收为国际情报组织成员。不久，他被

派到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执行侦察任务，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认定他为不可救药的危险分子，送交驻哈尔滨市以南20公里的平房的一座兵营里杀害了。他们接到国际红十字协会的通知后，就查询这是一座什么兵营，从50年代《人民日报》大量的报道中知道它是一支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

最后，韩希望连续拍摄了"特设监狱"，七三一部队的本部大楼、石井四郎的办公室的照片，带给了他的姐姐。

特别输送

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的材料，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石井四郎等人秘密策划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计划。为此，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特别输送处理”的密令，就是宪兵队及伪满警察署把认定为重犯的被捕者，不须提交法庭审判，直接由宪兵队“特别输送”给石井部队，当作“细菌试验品”而害死。

于是，“特别输送”成为这一罪恶活动的专用名词，而日伪当局也利用它来掩盖其罪恶活动。

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关押的“特殊试验材料”中国爱国志士、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八路军、新四军被俘官兵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士，他们大多是日伪军警宪特通过各种形式在各地抓获后送到“特别输送”来的。

在已查阅的全国各地的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34个“特别输送”案例，送往七三一部队的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共有1,203。其中，涉及地下情报工作者的48例60人、涉及反满抗日人员的43例790人，涉及抗日地下工作者13例35人，涉及特务嫌疑的10例54人，涉及中共地下党员的9例38人，涉及中、苏、蒙战俘的8例120人，涉及无业游民的2例105人；有中国人1173名，苏联人16名，蒙古人7名，朝鲜人7名。

尽管这些“特别输送”对象，被“输送”到“特别监狱”后，在失掉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失掉了姓名，其身分被号码所代

替。但到目前为止，仍查出了59个被害者的姓名。他们是冯玉祥（中共富锦县委书记）刘某(中共富锦县委宣传委员)、王某（情报员）、敬子和（原名敬恩瑞，谍报员）、张文善（原名张忠慧，谍报员）、朱之盈（谍报员）、孙朝山（谍报员）、吴殿舆（谍报员）、姜巴拉江吉（蒙古人，谍报员）、彭志克达西（蒙古人，谍报员）、王瑛（爱国志士）、钟民慈（爱国志士）、崔得恩（中共党员）、得姆琴科（苏军战士）、马文焕（反满抗日分子）、柯基姆洛夫（俄国人，谍报员）、赵殿卿（谍报员）、聂冠军（谍报员）、李某（反满抗日分子）、叶克塞也夫（苏军战士）、刘相征（谍报员）、金世贵（反满抗日分子）、张某（反满抗日分子）、孙殿宝(反满抗日分子)、许某（反满抗日分子）、康永昌（反满抗日分子）、王勤山（谍报员）、马尚文（谍报员）、刘维平（谍报员）、王照儒（谍报员）、吴春福（谍报员）、唐永金（谍报员）、尹文生（谍报员）、赵新贵（谍报员）、刘某（谍报员）、叶风春（谍报员）、孔庆玉（谍报员）、刘喜山（谍报员）、吴天贵（谍报员）、周殿平（谍报员）、赵福源（谍报员）、史顺臣（谍报员）、杨某（八路军战士）、李某（谍报员）、金安东（爱国志士）、沈得龙（反满抗日分子）、李忠善（反满抗日分子）、王耀轩（反满抗日分子）、王学年（反满抗日分子）、杨某（谍报员）、稚宪度（中共党员）、刘某（谍报员）、李清泉（抗日工作者）、王殿模（抗日工作者）、赵振明（抗日工作者）、桑元庆（抗日工作者）、张玉环（抗日工作者）、田某（抗日工作者）、于置林（抗日工作者）。

一、特别输送的命令

在缴获的日伪档案材料中有一份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紧要案件部1943年3月12日密发往关东军宪兵队各队长、各独立分队长的关于“特别输送”件通知的第120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全文如下：

关于“特别输送”的通知

兹奉命通令，本问题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但在选定应派犯人时，望参照下面附件所定标准办理。此通知发送关东宪兵队长（包括各个独立分队长）。

这个“通知”中所说的“附件”，乃是一种表格。① 它把“犯人”划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分子）两大类，并根据犯人的类别、罪状性质和具备的条件，确定“特别输送”对象的标准：

“依其罪行程度，预料到必须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

“一贯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分子，至今仍怀有亲苏反日思想，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

“虽然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是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且顽固地怀着亲苏反日情绪，并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者”；

“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或从事具有同等危险作用活动，无接受感化希望者”；

① 据《审判材料》。

"因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与'特别输送'的犯人同一思想，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从选择"对象"到"特别输送"给七三一部队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二、日本宪兵队——"马路大"的转运站

为进行细菌战争的准备，日伪军、警、宪、特与七三一部队狼狈为奸，紧密配合。日本宪兵队在大肆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斗争过程中，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爱国志士、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等"特别输送"给七三一部队，从而成为"特殊实验材料"的最大供应地和转运站。

曾在七三一部队第四部担任部长、在日本投降的前半年调任关东军第五部队防疫给水部部长的川岛清（少将军医），被俘后不得不供认，他曾亲眼看到第一部（细菌研究部）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犯人，石井四郎对日本宪兵当局"特别输送"非常满意。前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司令部的副官木村供称，有次他当场听到石井将军在同哈尔滨宪兵队司令春日馨的谈话中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作实验。①

曾给石井部队长当过汽车司机的越定男，回国后沉默了38年，最终还是不顾石井的禁令，揭发了日本宪兵队与七三一部队相互勾结的罪行。他说："当时石井部队每两天去一次哈尔滨市内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接收被押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大半是用列车运到哈尔滨的。他们被换上日军的军服，戴上手铐，关在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1页。

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一下火车立即被宪兵队关押。石井部队运送中国人使用载重量为4吨的卡车，都伪装成公共汽车的样子，叫做护送用的'特别车'。"

七三一部队的"试验材料"不仅来自日本宪兵队，而且日本特务机关、日本驻哈领事馆和伪满洲国军警宪特也是"特别输送"的供应地、转运站。伪满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橘武夫供认：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的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反满抗日分子。这些被捕的人没提交法庭审讯过，径直把他们送到七三一细菌部队去消灭的。曾任伪满洲国秘密警察机关——保安局三江地方保安局负责人的岛村三郎说他指挥对苏联进行谍报和反谍报工作时，"一旦某个间谍不再有利用价值（如被苏方怀疑、察觉，得不到新情报），不经任何人批准，即可由保安部门随时杀害。如果怕其他间谍知道而不便杀害时，便与特务机关联系，送往哈尔滨平房七三一细菌部队，作细菌试验之用，经我的手就送去三名"。①

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公安部门的档案中，保存着许多"特别输送"的表格名单。兹抄录两份如下：

第一份

时　间：1939年6月。

命令者：哈尔滨市新市街宪兵分队长、少佐赤诚茂三。

内　容：哈尔滨香坊附近，侦察到中共阿城县委中朝工作者25以上集会，均已逮捕。

结　果：于飞机场内用石井部队的毒物注射死亡。

①〔日〕岛村三郎《中国归来的战犯》，第73页。

第二份

时　间：1941年3月。

场　所：北安至黑河的列车上。

命令者：北安宪兵队长、中佐和田昌雄。

执行者：宪兵少尉渥美清志、军曹饭原金司，翻译奥田胜，宪兵补杨仲田、赵永邦。

内　容：乘警宪兵在北安至黑河的列车上，检查身份证明书时，逮捕无身份证明书之谍报员赵殿卿，由渥美清志押至北安宪兵队本部。然后，“特别输送”哈尔滨石井部队。

三、一批又一批的被“特别输送”者

日伪当局的“特别输送”是有据可查的。在历史档案中，有一张昭和十四年（1939年）牡丹江宪兵队一名宪兵亲笔记载的“特别输送”一览表。① 仅列举其中三个案例。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938年2月6日。虎林县境内的阿布沁河河口距苏联不远，河面上被冰雪复盖着。虎林铁路警察队的流动哨在这里巡逻。当他们换防的时候，发现一个身穿棉袍的人从北岸而来，对其进行了检查。该人持有饶河县警察署颁发的居住证明书，注明姓名叫蔡风春，21岁，原籍山东省。警察发现证明书的照片有伪造的痕迹，并从他的棉帽子里搜出130元钱。于是，将其逮捕交给东安宪兵队。蔡风春受审时承认他是苏联派遣的情报员，准备到勃利县建立情报网，计划取得日军的情报后于1939年4月4日返回苏联汇报。东安县宪兵队认为他是不可救药的危险分

①牡丹江市公安局档案。

子，通过哈尔滨宪兵队在1939年4月20日"特别输送"给七三一部队，将其杀害。

第二个事件也是发生在虎林县境内。孔庆玉，35岁，原籍山东省，也是苏联的情报员，1939年1月5日潜入虎林县李家店村，第二天被东安宪兵队虎头分队的宪兵查出，在他的"满洲服"内搜出250元钱，同时发现其所持饶河县三叉屯警察署颁发的居住证明书是伪造的。于是，将他逮捕，立即送交了佳木斯宪兵队。佳木斯宪兵队的审讯毫无收获，在同年4月21日将其转交给哈尔滨宪兵队，不久就"特别输送"给七三一部队，当作"试验材料"而被杀害。

第三个事件是1939年1月18日东安宪兵队虎头分队在虎林镇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叫刘喜山，30岁，奉天省人，并查出所持饶河县警察署颁发的居住证明书是伪造的，在"满洲服"内藏有100元钱。于是，将其逮捕。他是受苏联的派遣，于1月4日潜入虎林镇，准备与中国东北内地的情报人员接头，到佳木斯一带搜集日军情报的。审讯时，他拒不招供。于是，佳木斯宪兵队于3月18日把他"特别输送"给七三一部队。除上述这样的"特别输送"案件外，还有许多，例如：1940年，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东安支队把在东安保安局拘押的中国爱国志士李某（40岁左右）送到七三一部队杀害了。①

1941年4月，牡丹江宪兵队将一名中国爱国者转交给哈尔滨宪兵队进行审讯，他们毫无收获。于是，日本宪兵矢花军曹根据特高课长佐泽少佐的命令，将这个爱国者送往七三一部队杀害

①黑龙江省公安厅档案。

了。①

1941年6月，哈尔滨宪兵队在哈尔滨道外逮捕了一名中国人，查出发报机一台，审讯后，认定他是地下无线电情报工作者。于是，哈尔滨宪兵队防谍班长高野健三准尉根据哈尔滨宪兵队长加藤圭二中佐的命令，将其送往七三一部队杀害了。②

1943年3月和1944年1月，哈尔滨宪兵队在哈尔滨新阳区和马家区逮捕了一名中国人和一名苏联人，并在住处搜查出电台两部，审讯一无所得，于是，将他们送至七三一部队杀害。③

1942年，哈尔滨宪兵队香坊分队平房分遣队，在五常县沙河子附近的向阳山先后4次逮捕抗联战士7人，押回平房后交给七三一部队杀害了。④

1943年11月上旬，阿尔山独立宪兵分队长田附大尉带队，以巡捕苏联情报员为目的到白狼森林警察队盘查所，在位于阿尔山西北约60公里通往三国山的要道上，发现了5名为苏联作情报工作的中国人。双方开始互相射击。交战中，除1名中国人牺牲外，其余4名被捕。田附大尉即派冈田曹长去现地进行审讯，并指导白狼警察队将被逮捕的4名中国人送交兴安特务机关。不久，兴安特务机关又将其转送到七三一部队杀害了。⑤

据哈尔滨特务机关秋山稔证实："某宪兵队曹长永田春夫和铁西宪兵队长青柴丰都向七三一部队送过犯人。"⑥

另据4名日本宪兵、6名伪满警察、6名伪满铁警和1名伪满宪兵的供述，他们亲自参与和闻知的杀害反满抗日志士的暴行，除逮捕、投狱和处死者外，送往七三一部队的达61人。

---

①②③④黑龙江省公安厅档案.

⑤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原阿尔山独立宪兵分队庶务主任津田玄郎供词.

⑥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原哈尔滨特务机关人员秋山稔供词.

据前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苏联滨海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将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输送”到七三一部队。

四、一次大规模的“特别输送”

1939年8月9日，一列由客车和瓦罐车混合编组的列车抵达山海关车站。早就等在那里的日本宪兵立即把挂在列车尾部的一节瓦罐车包围起来。原来，这节瓦罐车厢里边关押着90名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

日前8月8日16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就发出了第二二四号作战命令，要求承德宪兵队、平野宪兵队和关东宪兵队教导队派出官兵，在锦州宪兵队长的统一指挥下护送这节瓦罐车，平野宪兵队担负其主要任务。平野宪兵队在接到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的命令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发布了第一号作战命令，派稻邑曹长带领24名宪兵及一名卫生下士官，立即由新京出发，第二天准时到达山海关。出发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领取了81具脚镣、52具手铐、40根捕绳和25根护送绳，在途中，又从沈阳宪兵队补充了30具手铐和40根护送绳。稻邑曹长带领宪兵准时到山海关，与锦州宪兵队长办好接交手续后，立即把这节瓦罐车厢挂在山沈线的列车上。8月10日11时15分，这列火车从山海关车站出发了。半夜时分，当列车要到哈尔滨的时候，锦州宪兵队长命令稻邑曹长挑出30名被押人员，在哈尔滨车站交给七三一部队。列车进了哈尔滨站。被押下的30名被俘人员，由哈尔滨宪兵队的宪兵推上了早已等在站台上的七三一部队的“特别囚车”。其余60名被俘人员在瓦罐车里沿着滨北线、北黑线行驶，

于8月13日零点到达孙吴站。这批被“特别输送”人员到孙吴后，关押在军管区的监狱里，七三一部队及其所属的孙吴第六七三支队的研究人员，随时在他们身上作“孙吴热”的传染及治疗的试验。然后，其幸存者又继续成为冻伤试验对象。这就是60名被俘抗日人员被“特别输送”到孙吴的原因。从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第二二四号命令中可以看出，这是第二批“特别输送”，显然，这样大规模地“特别输送”也不止一次了。

五、牡丹江事件

苏联出版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记载：“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宪兵队文件中，我们知道某些牺牲者底姓名。我们知道有牡丹江的一个铁路员工孙朝山，有木匠吴定兴、修理匠朱志猛”。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离休干部庄克仁是这一事件的知情者。他是当时东北国际情报组的负责人。在牡丹江被捕的那几个人都是在他领导下的牡丹江国际情报站的地下情报员。据庄克仁说，《审判材料》里提到的孙朝山的名字是对的，朱志猛、吴定兴是错的，实际上，他们一个叫朱之盈、一个叫吴殿兴。此外，庄克仁还提出另有两个人不知去向，他们是张慧忠和敬恩瑞。

据庄克仁介绍，张慧忠的妻子还健在，她叫龙桂洁，在锦州市图书馆离休；朱之盈的妻子敬兰芝，是敬恩瑞的侄女；还有个叫敬锡成的人，他是敬兰芝的弟弟，也都健在，住在哈尔滨市。他们都是“牡丹江事件”的见证人。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6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退居在天津的东北国际情报组又重返白色恐怖下的东北，在牡丹江和沈阳分别秘密设立了地下国际情报站，开展工作。他们既直接与伯力的国际情报组织进行通讯联络，又经常地与东北国际情报组保持着联系。

1941年夏季，在沈阳的庄克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牡丹江地下电台的呼号，长期地下工作的职业感和经验使他觉察到牡丹江情报站可能出了问题。不出所料，牡丹江情报站遭到了牡丹江宪兵队的彻底破坏。那是7月16日清晨3点多钟，张慧忠在刚刚完成收发报工作并上床休息时，发现一群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已把房屋团团围住。张慧忠急忙跳窗而走。宪兵闯进屋里后，搜出了一部电台。这时，张慧忠逃脱未成，又被抓了回来。于是，他们被押进了牡丹江宪兵队，与此同时，朱之盈、敬兰芝、孙朝山也先后被捕；与朱之盈一起作地下情报工作的吴殿兴闻讯后，当晚即从牡丹江乘火车来到哈尔滨，住在道外七道街的敬恩德家，日本宪兵跟踪而来，也将其逮捕押回牡丹江宪兵队。

牡丹江宪兵队对张慧忠、龙桂洁、朱之盈、敬兰芝、吴殿兴、孙朝山进行了多次刑讯，除龙桂洁、敬兰芝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说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而获释外，其余的人都被押解到哈尔滨宪兵队。从此下落不明。直至1950年，苏联公布了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材料后，庄克仁才意外地发现了朱之盈、孙朝山、吴殿兴都被“特别输送”到七三一部队秘密杀害了。张慧忠是中共党员，又是牡丹江地下情报站的负责人。从被捕那天起，敌人就把他当作首犯进行刑讯，然后，也秘密输送到七三一部队杀害了。张慧忠的化名叫张文善，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历史档案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案例：“1942年夏季，牡丹江宪兵队在五河林镇

逮捕一名与张文善有联系的人。根据都筑敦中佐的命令，将他'特别输送'给哈尔滨的石井部队了。”至于《审判材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和敬恩瑞的名字，这是因为该材料仅是举例说明“特别输送”的，不可能也没必要把牡丹江事件所涉及到的人一一都列出名字来。在五河林镇被捕的这个人就是敬恩瑞。他是在“牡丹江事件”发生后，逃到宁安县一个小镇，不幸第二年（1942年）暴露身份而被捕的。

在牡丹江事件发生的同时，还发生了“白塔堡事件”——另一个“特别输送”的事实。在东北国际情报组派人去牡丹江建立情报站的同时，还派赵福源、史顺臣到奉天开辟地下国际情报工作。庄克仁也从天津潜入奉天，指挥牡丹江、奉天两个情报站的活动。开始，赵福源和史顺臣在奉天大东门里的鼓楼跟前，以开百货店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后迁移到东城根。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后，奉天日本宪兵队更加紧了对地下电台的搜查，因此，他们不得不把电台先后转移到深井子区荒地沟村、铁西区的一个煤球厂和白塔堡。不久，电台被奉天宪兵队察觉。1943年2月12日凌晨，一百多名宪兵突然将其包围，正在发报的赵福源当场被捕。然后，把史顺臣也抓进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对赵福源和史顺臣进行严刑拷打，一无所得，于是，把他们也“特别输送”到七三一部队而秘密杀害了。

六、一个宪兵队长的忏悔

1978年初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五次访华团”来平房访问，并参观七三一部队遗址。他们是曾参加侵华战争的原日本军人，是来赎罪的。其中，有原鸡宁县日本宪兵队长上坪铁一

（中佐）。他为了让其子女了解日本过去侵华的一段罪恶历史，把在中国大连出生的儿子上坪隆也带来了。

上坪铁一回忆了他1944年在鸡宁县担任宪兵队长时，亲自批准将22名认定为间谍的中国爱国者，送交给驻扎在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充当“细菌试验材料”而杀害了。

上坪铁一的所作所为，从回国的原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的口中得到证实。吉房虎雄说，1944年8月，刚刚擢升为中佐的上坪铁一，担任了鸡宁县宪兵队长。他深知，实现“出人头地”的理想，必须做出“优异”的成绩，为七三一部队提供更多的“特别输送”对象。为此，他命令平阳宪兵分队，以“探察军情”和“开展反满抗日运动”的罪名，将平阳镇的张玉环及其父亲等15名平民逮捕。平阳宪兵分队长曾场中尉组织30多名宪兵，对被捕者进行了连续一个月的严刑拷打，上坪铁一也亲自跑到平阳镇去指挥刑讯，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捞到。于是，他为了完成“特别输送”的指标，显示自己的“成绩”，就把张玉环及其父亲等被拷打成重伤的6名无辜百姓和后来又抓到的16名“政治嫌疑犯”共22名，“特别输送”给了七三一部队了。

在参观七三一部队遗址过程中，上坪铁一忏悔地说：“我有罪，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些无辜者虽然牺牲于石井部队，但实际上也等于我亲手杀害的。我杀害的中国人不止这些，要比这多好几倍。战后三十多年，每想到这些事，总觉得心情不安，对中国人民欠下了血债。今天终于得到赎罪的机会”。在“特别监狱”遗址前，上坪铁一从其儿子手中接过早已备好的一束白花，插在残垣断壁上。他们双手合十，默祷三分钟。随后，上坪铁一祷告说：“饶恕我吧，九泉之下的英灵。我要用‘发展中日友好事业’

的心情来弥补我的罪过。”说着说着，他失声地痛哭起来。

七、特别囚车与特别列车

1945年7月的一天下午，中国劳工潘洪生奉工务班日本头目的命令代替日本人司机驾驶着“道吉”牌大卡车往“南栋”送建筑材料返回平房，从北正门驶进七三一部队的营区。车刚过“兵器班”，宪兵室的春日翻译官把车拦住，要潘洪生把东边不远处那台车拖出来。潘洪生一看，是“特别”囚车！这种车经常在运输班大院里放着，里边两侧是长排的木制坐椅，在每个靠背的中间部位都铆着一副牛皮扣带，用它把囚犯腰部扣住，再戴上手拷、脚镣，既使不用看守，也难以逃脱的。于是，他把“道吉”卡车开到“特别”囚车旁边，并下车把牵引钢丝绳一头挂在车后。钢丝绳另一头由日本人司机挂到“特别”囚车尾部。

要拽车的时候，潘洪生看见几十名囚犯戴着手铐和脚镣，规规矩矩地坐在车厢里，其中，有黑色头发的人和黄色卷曲头发的人，他们的头发都很长脸色也煞白。特别囚车被拖后，急忙地往四方楼方向开去。

中国劳工付景岐还从几个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谈话中得知这些“犯人”从哈尔滨市区押送到七三一部队的一些情况。1945年7月深夜，高等官餐厅的中国劳工、伙夫付景岐按照宪兵室的春日翻译官的吩咐准备了一桌酒菜。半夜12点多钟，翻译官春日中一和执行秘密任务从哈尔滨市内回来的宪兵曹长仓原一吾以及一个汽车司机开始喝酒。付景岐长期在七三一部队当劳工，学会了一些日语。这时，他虽然退到餐厅后屋，但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春日吹捧仓原一吾是劳苦功高的勇士，多次在危险的处境中完成了

“特别输送”任务。仓原一吾也得意忘形地说他在哈尔滨车站等了两个多小时，还到香坊保护院集中营去接收了几个俄国人，他们被关进7号牢房里还不老实，明天让细谷少佐狠狠地收拾收拾他们。付景岐自从听了他们的这次谈话后，知道了仓原曹长是专门负责押运犯人的；细谷少佐是管理犯人的头目。

七三一部队除用“特别”囚车押运“特别试验材料”外，还使用过“特别列车”。

1944年夏季的一天下午，一群日本兵把在七三一部队铁路专用线上干活的中国劳工撵走。他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铁路专用线四周实行了戒严。接着，一列瓦罐车驶进了临时站台。

中国劳工方振玉按照石井动物饲养班的日本小头目平山四郎的吩咐去给动力班的日本人河野送熟猪肉。当他拿着一包猪肉走到铁路专用线北头的时候，被日本哨兵拦住，和几个过路的劳工都被赶进一座空房内。他趁日本人离开时，站在桌子上往外看，看见瓦罐车的车门开着，车上的日本人往下卸着一捆一捆的东西，地上有几个穿白色防护服的日本人把它放在平板车上推进了四方楼的大院。方振玉再仔细一看，七三一部队队员往下卸的是活人，每捆是两个人，被一颠一倒地用草袋片包着和两道铁线捆着。草袋片的两头各露出一个脑袋和两只腿，胳膊和腿还在活动。

七三一部队使用“特别列车”运送犯人的活动，除方振玉看见外，石井班的中国劳工、马车老板张有才也看见了。

保护院集中营

向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实验材料”的除日伪宪兵队外，还有保护院集中营，在《日本军人审判材料》中提到的苏联红军战士“德姆琴科”，就是由保护院集中营特别输送到七三一部队的。

“保护院”是日本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管辖下的一个对“越境入满者”进行审查、管理的一个特务机关，“当地特务机关（支部）对越境者进行初步审查后，送往哈尔滨，在那里再进行系统、周密的审查，在讯问中收集情报资料的同时，审查他们是否负有秘密使命，充分利用那些对情报、宣传、谋略等各种秘密战有用的人，而对那些无逆用条件的伪装逃亡者则将其移交宪兵队或警察机关处理”。①同时，它也是收容、关押和迫害苏联、蒙古军队战俘的集中营、监狱。为掩人耳目，它还美其名曰“科学研究部”，其工作人员大都是设在东京若松町的培养日本军事谍报人员的基地——中野学校的毕业生。

这种保护院有两处：一处是设在内蒙古地区的王爷庙（即现在的乌兰浩特市）西北的保护院，它以关押蒙古战俘为主。另一处设在哈尔滨市郊香坊一带（即现黑龙江省气象研究所址）的哈尔滨保护院，它以关押苏联战俘及没有加入苏联国籍的俄国人为主。

1941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对苏、蒙的侵略，成立了一支直属于关东军情报部的武装部队，番号为特字“八六八部

①〔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第195页。

队”，1943年改为“满洲第二游击队”，代号为“五三部队”。这个部队为进行对外派遣活动，于1942年设立了西北保护院，配备日本宪兵、特务10余名，院长是唐木田博大尉，代理院长是吉田义雄曹长。蒙族人丹讚、哈木苏伦、甘珠尔扎布为翻译。这个保护院驻地分散，除在兴安街(现乌兰浩特市北郊的新五屯)设中心点之外，还在王爷庙东南、南门外、广义泉等地设立了3个保护分院。

据在保护院当过翻译的蒙族人丹讚于1956年8月3日的证实："仅在1943年8月被押苏联人7名，蒙古人11名。知其姓名的有ケトマ（谷特马）、タルビ（大路比）等外蒙派遣谍报者，ボーーライ（宝来）、ミセルサニ（米谢路沙尼）、イトムスル（伊特木斯鲁）等外蒙被俘者，ムニコエフ（莫尼科也夫）、ニーーコロフ（尼科罗夫）等苏军被俘者，トフトーーリニ（特夫德黑尼）苏联派遣者；1945年8月被收容者就有80名左右。很多人通过日本宪兵队交给哈尔滨的一支特种部队进行杀害。”

在哈尔滨市郊香坊的保护院集中营，始建于1941年。它名义上归伪哈尔滨市公署管辖，实际上是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直接领导。其配属人员都是日本宪兵。据查，历任保护院长（集中营主任）有：陆洛富士雄少佐、前田瑞穗中佐、田中义久中佐和饭岛良雄少佐。饭岛良雄于1940年11月从中野学校毕业后，先被派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不久到三河地区日本军事团任副团长，1945年2月调到哈尔滨香坊保护院当主任，日本投降后，他在逃跑途中被苏军捉获。在饭岛管理时期，日本工作人员大约有15名以上。

在这里的日本军人对外都隐瞒着真实身份。在营内。穿不带军衔的日军服装或者便衣。外出参加阴谋破坏活动时，根据情

况，不时地改换装束，有时穿伪满洲国军服，有时改换伪满警察装，甚至穿着苏联红军服装潜入苏联境内。这里长期保管着的苏联红军服装1000余套。这种服装是东京赤羽被服厂制作的，运到这里来以备策反人员使用。各军事团的阴谋破坏班的人员到这里来也是不穿军装的。

在这个保护院集中营监禁着的苏联红军俘虏和因从事秘密侦察工作而被捕的苏联人有350至400名，其中，苏军军官有海军大尉1人、中尉3—4人，少尉5——6人。① 据前哈尔滨宪兵队香坊分队宪补崔某证实，这里监押的苏联人，有的是把诺门汗战争中的俘虏后来转运来的，有的是从伪满洲国境内及边境抓来的。

保护院对外是隔绝的。里面大约有3栋（40——50间）砖瓦房。四周是木板围墙，并架设高压电网。围墙四角与门口设有岗楼，由日本兵严密看守与监视，被关押者是难以逃脱的。被关押者从保护院对他们采取的管理办法及其使用的各类刑具感觉到这里是接近“地狱”的地方。

被俘者被押进保护院集中营（包括蒙古人保护院集中营），首先要进行登记造册。对每一种国籍的人都标以特殊的符号：

对苏军的俘虏，军官记“ソトシ”（苏特西）第××号，军士为“ソトカ”（苏特卡）第××号，士兵为“ソトヘ”（苏特黑）第××号；

对外蒙俘虏，也按官级分别记以“モトシ”（蒙特西）、“モトカ”（蒙特卡）、“モトヘ”（蒙特黑）的符号；

对来自苏军的朝鲜人被俘者，则以“チトシ”（奇特西）、“チトカ”（奇特卡）、“チトヘ”（奇特黑）为符号；

〔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第196页。

对来自苏联的华侨、鲜侨被捕者，以“マトシ”（妈特西）加以区别；

作为苏联密探而被日方逮捕的，为“シ”（西）第××号。

日本人对被收容者采取了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按照《秘密战勤务工作指南》中的俘虏审讯大纲行事，实行不露声色的苦肉计，企图征服一些意志薄弱者；另一方面打着“保护”的招牌，实行用金钱、美女的收买政策，并给予被押者以生活上的安慰，例如，可以到特备的音乐室、娱乐室弹拉说唱，按照他们的要求代买各类食品甚至组织他们到附属的农场里进行自给性的劳动。这样，使有的被押者似乎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生还的希望。于是，一些意志薄弱者曾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之下屈服了，供出了机密，接受了利用充当了它的密探、成为叛徒。然而，绝大多数的被关押者把生死置之度外，既不惧怕严刑拷打，又不受生活上的收买，使日寇枉费心机，大失所望，采取“断然处置”。这种所谓“断然处置”，按照饭岛良雄的话说，就是“凡属违反营规的人，特别是蓄意逃脱的人，都应该送到驻扎在哈尔滨城外距保护院集中营20公里平房站的七三一部队里去。”

据曾任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兼情报调查科长的山岸研二在苏联滨海军事法庭上供认：把保护院关押的人转送给七三一部队是“依照哈尔滨日本军事团长秋草少将署名的书面指示，情报调查科工作人员在我的同意下，根据手边伤害人格的材料编出相当的名单，交给集中营主任饭岛少佐签字，然后将这个名单呈报给军事团长秋草批准，把拟定的苏联公民发送到七三一部队去消灭。”

“发遣苏联公民到七三一部队去遭死的事，由宪兵盐田直接经管，他预先用电话同七三一部队宪兵商定运送时间。七三一部

队总是派自己的轿式汽车来运载犯人，轿车里不带行李可容下20个人。

“发送到七三一部队的犯人都列成名单，一式两份，一份由七三一部队工作人员带走，另一份保存在‘保护院’集中营内。”

原保护院集中营的日军金倏伍长，在苏联受审期间，曾对原满洲第三七七部队谋略工作分队长森谷市五郎说过，被收容的人如不服从日本人工作员或在工作员审讯时不提供情报的，便送往平房细菌部队的石井四郎手下去处理。在送往石井部队之前，要扒下他们所穿的苏联红军服装。这些苏军服装要交给日军的阴谋破坏班、留作外出侦察、破坏时使用。

苏联红军战士德姆钦科是在1939年诺门罕战争中被日军俘获的，后来他被关押在这座保护院集中营里。日寇曾捆住他的双手，吊在房梁上进行拷打，他仍坚贞不屈拒不供出苏军的任何机密，最后，被送进七三一细菌部队作为细菌实验材料而惨遭杀害。

1985年8月，有3名澳大利亚籍的苏联人专程到原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他们是兄妹关系，哥哥叫尼古拉，弟弟叫沙沙、妹妹叫娜达莎。当他们在“特别输送”而被害的名单中发现有“德姆钦科”的名字时，泣不成声，悲痛万分，他们回忆说：“德姆钦科是我们的爷爷，他是苏联红军战士，在诺门罕战场上被俘，押赴到哈尔滨香坊保护院集中营后不久，就被送到这个石井部队里被杀害了。我们是白俄罗斯人，我们的父辈早在修筑中东铁路时就侨居哈尔滨。听父亲说，爷爷被押到哈尔滨的消息是从苏联情报机关那里听到的，我们的伯父当时在哈尔滨作谍报工作，被日寇逮捕后也牺牲于七三一部队。”

据山岸研二供认，从保护院集中营往七三一部队发送犯人，

是从1942年开始的。仅在1945年的8个月中，分批发遣到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杀戮的约有40名苏联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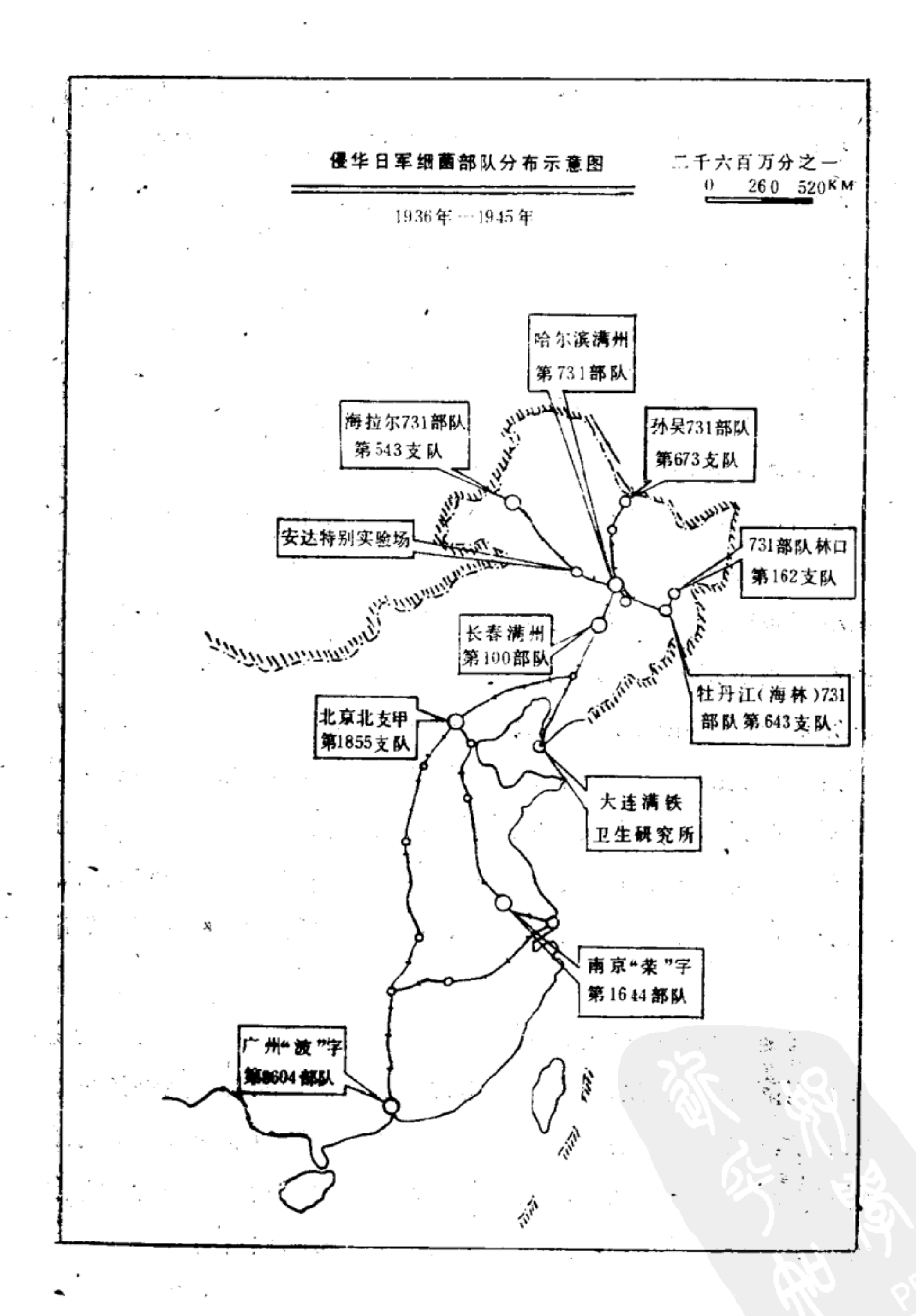
在保护院集中营里，也曾多次发生过外逃事件。1945年6月，两个苏联人从这里逃跑后，哈尔滨宪兵队香坊分队接到通缉令后，向每个宪兵发了一张逃犯的照片，四处搜索，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也加强了盘查，结果，在滨洲线的列车上发现了他们。他们被押回保护院集中营后，日寇气急败坏，不加审讯就把他俩和其余的30多名苏联人一起送进了七三一部队。这是保护院集中营向七三一“特别输送”的最后一批“实验材料”。

日本侵略军在
中国各地设立的细菌战基地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特别是在准备和使用细菌战的过程中，不仅仅设立了一个七三一部队，更不只是进行了细菌武器的试验，而是在实施着一个全面的庞大的细菌战的战略部署和计划。因此，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在设立和扩大七三一部队的同时，还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设置了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一些特种细菌部队和细菌战研究机关。主要有1936年在长春孟家屯（现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厂址）设立的名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的满洲第一〇〇部队、1938年在齐齐哈尔车站附近建立的与各细菌部队配合作战的五二六毒气部队、1939年在北京天坛附近建立了号称“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所、1939年在南京建立了“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和在广州建立了“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在侵华日军的各军事团内，还设置了“防疫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它们是在各细菌部队指导下的野战细菌部队。此外，在日军控制下的伪满国军内和伪满卫生科研机关、军医学院内，也都进行着以动物和人体为对象的细菌研究、实验活动，充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的一支别动队。

一、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它始建于1936年，是与七三一部队孪生的一对恶魔。它们名


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分布示意图
1936年—1945年
二千六百万分之一
0 260 520KM
哈尔滨满州
第731部队
海拉尔731部队
第543支队
孙吴731部队
第673支队
安达特别实验场
731部队林口
第162支队
长春满州
第100部队
牡丹江(海林)731
部队第643支队
北京北支甲
第1855支队
大连满铁
卫生研究所
南京"荣"字
第1644部队
广州"波"字
第8604部队

义上都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实际上直接由日本大本营日军参谋本部指挥。一〇〇部队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兽医部指导，负责人是中将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伪满大陆科学院的兽医处（对外称马疫研究所）处长安达诚太郎、中将北野政次对其也负有指导责任。其前身是驻屯在长春宽城子的号称高桥部队的“关东军马匹防疫厂”。1938年迁至长春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经过扩建后，改用了“满洲第一〇〇部队”的秘密番号。

该部队的部队长初期是竝河才三，迁至孟家屯后换为高岛，后来又由竝河才三担任，最后由兽医军官若松侑次郎少将接任。①

一〇〇部队位于日军营群中央的一块截然孤立的地方，营区面积东西宽1华里，南北长2华里。它的规模略小于七三一部队，拥有日籍研究和工作人员800名，中国劳工大约300名。本部下设总务部和4个细菌生产研究部门，1940年以后，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附近）等地建立了所属的支队。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它除在四平设立支队外，在关东军所属的部队里，都奉令设立了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配合一〇〇部队的细菌战活动。

它是以家畜和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同时还研究畜类病菌对活人的杀伤力。以此为目的，他们配备了足够数量的细菌学、化学、生物学和兽医专家学者，进行烈性病菌和毒药的研究和制造，并把牲畜、植物和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病毒菌的传染实验，以寻求用菌毒来大批杀害人命和牲畜的方法。

总务部，下设两个分部。除了负责整个部队的总务、后勤、

---

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加地信证言

医疗、卫生等工作外，还有一处种植实验场。

第一部，是实战研究部门，下设若干分部。通过细菌和病毒的实验，确立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以及植物病毒的效能和传染方法。

它为了使炭疽热菌、牛瘟和羊瘟菌以及各类毒药成为进行细菌的军事破坏最适宜的武器，每年都要多次进行这种实验。1943年，安达县鞠家窑的关占和曾看到一〇〇部队人员在安达特别实验场进行的炭疽菌传染实验。他们迫使中国人在实验场挖掘了不少深坑。他们从特别实验场的马舍里牵出10匹大马，分别拴在已经钉好的等距离的马桩上；把中国人撵走，实验场四周戒严，日本人也隐藏在1公里之外；一架飞机在实验场上空投下一种黄色东西，不久这10匹马都死了，就地埋进坑内。他们为取得氰化钾、马前霜碱对马匹致死量的数据，用四五十匹马作了实验，对每匹马注射不同份量的毒液，结果有10匹马当场倒毙。

第二部，主要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是该部队的主要部门。它使用着长约60米，宽约20米的三阶楼房，这里有官佐20名、科学工作者30名，技术人员50名。1943年前分设五个分部：一是细菌分部，拥有20人，在科学工作员西田和实验员山口的指导下，从事炭疽热菌、鼻疽菌的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一批人由高秋大尉领导，研究和大批制造牛瘟、羊瘟两种细菌；二是病理学分部；三是实验动物管理分部；四是有机化学分部；五是植物学分部，研究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1943年10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若松部队长曾多次说："一旦日本同苏联发生战争时，第一〇〇部队应当成为大量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便进行军事破坏

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一〇〇部队长若松侑次郎少将、副部队长坂斯道中佐，还有山口文二少佐及工程师井田清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联席会议。决定加强细菌的研究和生产，增设第六分部。从此，一〇〇部队就在设备和技术力量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生产细菌和繁殖传染病媒介物，以构成完整的有效的细菌武器。

该分部的任务是大量培殖细菌和在地下特种仓库内保存这种细菌。按照原定计划，在建筑若干栋兼设地下室的特种单层房屋、增派人员、补充设备的条件下，一年内可制造出1吨数量的炭疽热菌、500公斤鼻疽菌和100公斤锈菌。但设备安装计划未能完成，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只生产出炭疽热菌200公斤，鼻疽菌100公斤，锈菌不超30公斤。它所生产的细菌和烈性毒药都严密地保存在特制的铁盒内，放进附设的地下仓库里贮藏。这些盒子外面用油漆涂上只是有关人员明白的号码，没有任何说明。例如，他们把“杆菌”毒素提炼成纯质结晶体的烈性生物毒素，它能破坏动、植物，使土壤、牧场和饲料长期中毒。将它磨成细末稀释后注射给小动物，小动物立即呈现巴斯德杆菌病状，病毒损坏肠组织而死去。正因为这些病菌、病毒危险性极大，所以只有用浸透消毒水的多层纱布按住口鼻并带上胶皮手套才可放心地接触那些铁盒。

第三部，制造血清疫苗。

第四部，饲养动物。

第五部，是教育部，又称五三一部队，它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过去，关东军的兽医干部候补生，原则上都由东京陆军兽医学校进行培训。1943年以后，就由一〇〇部队代培，专业教育

由一〇〇部队的教官兼任。毕业后，由关东军统一分配到各军事团去。对兽医下士官候补生，始终由一〇〇部队负责教育。对一般兽医的教育，从1943年8月，对非军事的50余名工作员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来，由于日本国内的高等农林学校增设了兽医科，这项训练的计划就停止了。

一〇〇部队戒备森严。据原东北医大卢田广之证实："该部队所征用的劳工都是在指定的地方（如房屋、操场）来做活的。"在本部右前方有一座三层的高楼，由这座楼中央竖起一个高插云霄的白烟囱，这个地方是中国人的禁区。据在一〇〇部队当过10多年劳工的王庆有证实："栏有铁刺线，站在旁边往里看一眼都不行，如果让日本兵发现，开枪就打。"因为这里是一〇〇部队的要害部位——第二部，有庞大的细菌实验室、炼人炉。原一〇〇部队工作员三友在苏联滨海军事法庭上还供认，这个部队里设有"军人禁闭室"，在第二部的地下室里，那是两个连接的小屋，每屋4米见方，设有两层保险门，门高不到2尺，宽仅1.5尺；墙上是用软木做成的隔音装置；在这两间小屋的对门是化验室。在本部的后边也有这样的小屋。每屋至少监押30——40人。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军人禁闭室"，而是监押着准备作细菌实验的中国人的监狱。一〇〇部队备用了3辆"特别囚车"，经常从外边把监押人员秘密地运进来。

在本部西北的不远处，是一〇〇部队的"牲畜掩埋场"。它东西约半华里、南北一华里，不仅仅埋牲畜，而且也把进行细菌实验而致死的人埋在这里。

曾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有过接触的韩蔚回忆说，1941年6月，他和石井四郎的妹夫、军医中佐中村吉二到一〇〇部队

去参观。一〇〇部队的实验室皆用代号。进一个培养室要经过五道门。他们走到一个实验室，一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阻止说："现在正做试验，非本室人员不准入内。然后，中村又领他到地下室的实验室去参观。地下室设有温度计、湿度表、洗涤器具。洗完手，换上白服，戴上口罩、穿上胶皮靴子，经过消毒才准许进去。在实验室，看到一排排大小不同的电解槽，里边是用药水泡着的琼脂（又名洋菜，也叫白花菜），是用来培养细菌的养料。第二排案子上放着大小不同的培养皿，两边有大型烘烤箱，还有荧光灯和高压灭菌器等设备。再往里走，两边都是暗室。中村告诉他，这是培养室。中村又说，生物杆菌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媒介，生长于普通培养基，需氧气，不运动。如果把它放置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可以存活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如果放在完全干燥的地方，二三日内即可死去。这种菌可生存在米谷棉花上，加热到80°C时也会死亡，但它耐寒力很强，在冰冻之下几乎可以无限期生存。又往里走出50多米，往左拐入地下暗室。这时顿觉空气阴森，一股令人作呕而且强烈刺激眼睛的恶臭逼得人难以自由呼吸。只见走廊两旁约有十几个门，全用红黑布制的门帘挡着。这时，中间一扇门开了，由三个穿白衣服的日本人从里边推出一辆手术车，上面用白布盖着，高高垒起至少三具尸体。再往前走，看到两边的屋子里陈列着很多大小不同的干燥箱，另一个屋子里全是化学药品。再进另一座楼，里边特别宽敞，安装着4个能容1吨左右的形似灭菌器的装置（立式反应罐），正面装有冷凝管。另外几处不但都有人看守，并且还在牌子上写着"不准入内"。据中村讲，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有指定的工作范围，不许随

意乱走动，纪律特别严。①

1945年6月，一〇〇细菌部队参加日军在秦皇岛举行的军事演习。一次是先把两个"囚犯"放在指定地点，飞机低空飞行，在距目标前二三百米时，施放毒气和另一种化学毒品。结果，两个被害者的皮肤都被灼伤，呼吸困难，两眼睁不开，30分钟之后，皮肤上出现有扁豆大小的红斑。另一次是用飞机投放无声炸弹，爆炸时产生一股黑烟，接着地面上空笼盖一层黑绿色的烟雾，烟雾消失30分钟后，被害者呼吸困难、嗓子沙哑、晕眩咳嗽、流鼻涕、全身软弱无力、皮肤发热、呕吐、口流白沫，最后口流鲜血而死亡。

在1945年八一五的前五天，若松为销毁罪证，曾命令下属人员把该部队的建筑物、器材等全部烧毁，把饲养的各种动物放掉，所属的各支队也要这样做。据原一〇〇部队二六三〇支队的工作员桑原证实："我发现盛有鼻疽菌的玻璃管空了，木村工作员说已经使用了。原来他把这些鼻疽菌掺进燕麦里让马吃掉，然后捣毁栏杆，把马棚里的60匹马放出，都四散跑到附近的村庄去了。虽然不知效果如何，但可以想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②与此同时，若松部队长带领部队的全员连同家属，乘一列专车逃奔朝鲜。③

二、北京细菌兵器研究所

1939年，日本侵略军在北京天坛附近建立了一个细菌兵器研

---

①韩蔚："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录"《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

②长春市公安局档案：桑原明供词.

③长春市公安局档案：芦田广三证言.

究所，又称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这个细菌兵器研究所对外称“华北军防疫给水总部”，即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培殖鼠疫菌和繁殖细菌传染媒介物——跳蚤，准备对苏联作战。它由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下村定中将指挥，部队长是日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

这个细菌武器研究所规模较小，只设有三个课：第一课负责病理实验；第二课负责菌苗制造；第三课负责细菌武器的研究。同时在开封、天津、石家庄、张家口、青岛、太原分设六个所（支队）。其人员包括各分所（支队）在内共有1000多名。

第三课最为重要，设在北京西郊的静生物调查所内。它大量生产鼠疫菌和跳蚤，研究如何使鼠疫菌依附于跳蚤身上，并与南苑的第十五野战军航空厂配合，用飞机撒布细菌。这里的负责人筱田统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病理学博士、享受大佐待遇。他领导着军医将校2名、将校待遇的军佐3名、卫生下士官6名、卫生兵45名、女子军佐3名、下士官3名，还吸收北京高等女子学校的日侨女生10名，此外还有中国劳工5名。

这个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为第一工作室（跳蚤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生产、虐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生产）和小动物室（主要是鼠）等。在该课的地下室内，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室、虐疾研究室；二楼全部是跳蚤培养室。跳蚤发育需要黑暗及摄氏28度气温和90%的湿度，因此整个二楼的窗户始终是关闭的，玻璃内侧涂上了黑漆，室内黑暗无光。为了保持一定的湿度，在走廊和各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破布，每隔一小时就开动一次喷雾设备，使吊起的破布始终湿湿的，地面上也经常积有2寸深的水，整个房间充满着水气。房内的木架上

放着的无数空汽油罐内装满跳蚤，并把笼装的老鼠放进去，做为跳蚤的食饵。这些老鼠被几千个跳蚤吸血，4——7天便死去，死老鼠又拿到地下室，做苍蝇的食饵。

一八五五部队不仅在动物身上做细菌实验，而且和七三一部队一样，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实验。据在该部队当过卫生二等兵的松井宽治证实："听说，在我被调入该部队工作的前一年（即1944年），两个中国人的手脚被绑起来，口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在白天用大卡车从北京市内运到部队驻地（指一八五五部队），经过一个星期的细菌折磨就死了。此外，我听尾岐技师说，在1942年，有一次曾连夜把生产的大量的跳蚤运到外边去，举行过空中实验，得到了园满的效果。"

一八五五部队对活人的细菌试验，经常在它的济南细菌实验场进行。这个用双重铁丝网围着的细菌实验场下设细菌研究、细菌培养、细菌实验等三个班，配备20多名军医，部队长是渡边一夫中佐。它在进行细菌试验活动时，经常有七三一部队在外活动时伪称"防疫给水班"的人员参加。

据曾在这个部队担任中文翻译的朝鲜人崔亨振证实，他第一次看到日本军医所进行的人体试验是对10名中国俘虏注射天花病毒，然后临床观察。全身出现天花的被试验者声嘶力竭地喊着"救救我吧"，在谁都不理会的情况下悲惨地死去，最后尸体被烧成灰。他还说：日本军医进行鼠疫菌传染试验，被注射过鼠疫菌液的十几个人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而痛苦地死去了；研制肠伤寒菌苗时，则强迫被试验者吃下染菌的饭团；培养斑疹伤寒菌时，先收集被试验者身上的保菌虱子，抽其菌液注射到被试验者身上，致使他们病魔缠身而死亡；为了研制狂犬病疫苗，日本军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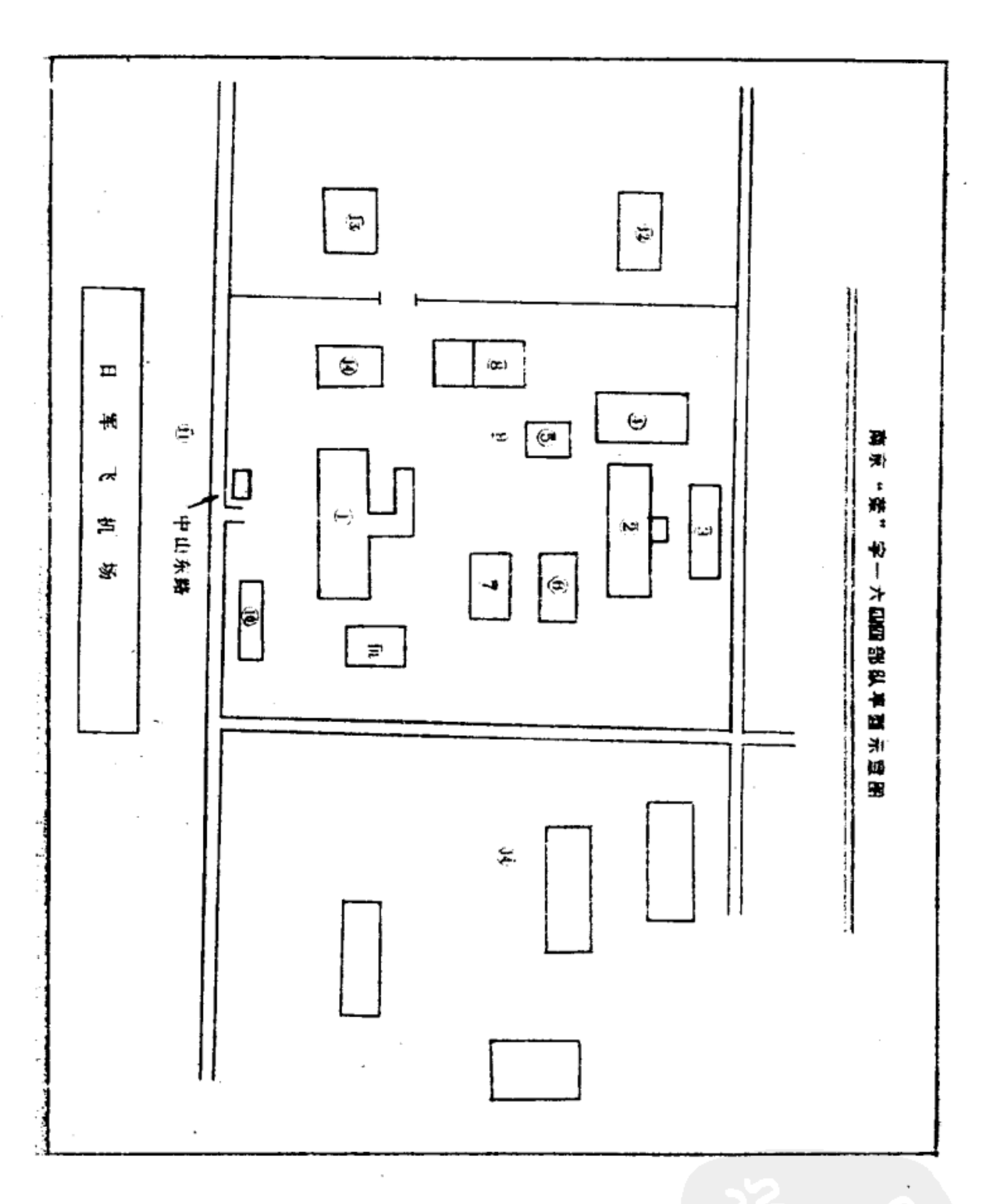
们从狗粪中提取病毒，经过培养后把它包在饭团内让被试验者吃下；日本军医在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对50多户300多名村民进行霍乱病菌的人体传染试验时，先把沾有霍乱菌的猪肉扔在村头，村民误吃以后，15天就连续死亡20多人。于是，日本军医就宣布这个村子是自然霍乱疫区，然后又进行防疫和治疗的试验。崔亨振最后说，这支部队平均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对活人的细菌传染试验，每次要害死100多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就看见死亡的俘虏有1000多人。”①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后，细菌研究所的人员奉命武装起来，开赴张家口作垂死挣扎。8月15日中午，筱田统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天皇宣传投降的广播20分钟后，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在后院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边，浇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资料和细菌培育器具也都烧毁；培养跳蚤的空汽油罐，用片车运走毁掉。灭迹之后，筱田统下令部队解散，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即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佯装转到各陆军医院去了。同年12月，部队长筱田统、军医大尉高岗满和军佐技师尾岐繁雄三人更换上西装，蓄起长发，扮成日侨，搭登陆艇逃回日本。曹长时冈孝也混进了其他部队，于同年11月逃回国内。

三、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

1939年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山东路北设立了“荣”字第一六四四细菌部队，又称“多摩部队”，1943年12月以后，又称“登”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外称，华中防疫给水部”，归日军华中派

①南鲜《中央日报》，1989年7月21日。



说　　明

①本部大楼，六层楼房，除设有事务部门外，还有队员、宿舍、仓库．②细菌研究楼，四层楼房，在此进行细菌培养和研究．③动物舍，平房建筑．④文职人员及一般军人宿舍．⑤锅炉房．⑥讲习楼，二层楼房．⑦药库，二层楼房．⑧车库、食堂，平房建筑．⑨烟囱．⑩物资仓库，平房建筑．⑪药草种植场．⑫日军空军部队本部．⑬日军空军部队兵舍，四层楼房．⑭伪军军官学校．

遣军司令部领导和指挥。

这支细菌部队是石井四郎亲自组建，并兼任部队长。后来，他的心腹太田澄军医大佐和增田知真军医大佐相继担任部长。最后一任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少将。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规模较小，全员有1500余人。本部下设总务课、细菌研究课、防疫给水课、材料供应课、理化研究课（理化研究所）。并在九江等地设立12个支队。

细菌研究课，又叫生产分部，课长（分部长）是村田军医大尉。它占用研究大楼二层至四层的房间。这里配置了供大批制造细菌用的各种设施和设备，主要有长宽各5米、高2.5米的孵育室一间；有直径1.5米、长2.5米的简型消毒罐2个；石井式细菌培养器200具；为繁殖跳蚤、备置了100多个空汽油桶，作简易培养器用；还有50台“科哈式”锅炉和10台其它型号的锅炉。利用这些设备，每一生产周期就能制造出各种细菌10公斤。

这个部队的将校以及准士官要进入生产分部的实验室，须持有特别许可证，否则，是严禁入内的。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为了适应野外实验的需要，在营区的南部设置了专用飞机场和3架飞机。该部队与七三一部队关系密切。七三一部队几次组织的“远征队”到宁波、常德以及浙赣铁路沿线投撒细菌，一六四四部队不仅出动人员、飞机配合，而且提供自己生产的跳蚤。此外，它还在南京、上海、武汉侵华日军的配合下，在华中、华南地区对中国军队进行细菌战、化学战。

1946年8月29日，在竭力回避日军进行细菌人体实验和实施细菌战问题的东京审判法庭上，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场面。这一天，在法庭上由检察方面进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证实，美国法

官D·N·萨顿朗读了《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关于敌人罪行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竟揭露了一六四四部队的罪行。据当时的法庭速记记载，萨顿读道：敌方的多摩部队将被俘的我国人民带入医药实验室，向他们的身体内注射多种有毒细菌，试验其反应。由于该部队是最秘密的机构，所以，无法弄清死者的确切数字。仁者为医学实验牺牲猫犬尚不忍，何况将我被俘同胞用于实验，其何哀哉！总而言之，敌人的罪行尽残暴凶恶无道之极。

萨顿的朗读使法庭出席者们大吃一惊。这是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细菌战较早的一次。它之所以能够揭露出来，除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检举外，还由于萨顿曾在中国搜集过日本有关细菌战的证据，对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比较了解，更对免于追求其责任不满。因此，他没有删掉揭露一六四四部队罪行的部分，并在法庭上朗读了。①

四、广州“波”字八六〇四部队

侵华日军在1939年设立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同时，在广州设立了“波”字第八六〇四细菌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少将。它也是由石井四郎亲手组建的，归华南派遣军司令部领导。它的作战任务和“荣”字一六四四细菌部队一样，除了进行细菌和传染媒介物的生产和细菌试验之外，也与七三一部队配合，在华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进攻中国部队，屠杀中国人民。

五、五一六毒气部队

众所周知，早在1899年7月，国际上就缔结了海牙宣言，规

①〔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第31－32页。

定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毒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缔结凡尔赛条时约，也曾讨论过禁止使用毒气，而且日本是该条约的签署国；1925年6月，国际上还签署了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协定书。然而，除意大利于1935年、1936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实施毒气作战外，日本侵略军也在中国各地进行生物化学战，屠杀中国人民。其使用的"细菌武器"是来自七三一、一〇〇等细菌部队；而"化学武器"则是驻扎在齐齐哈尔车站东1公里地方的五一六部队提供的。

五一六部队又称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是直属日军参谋本部的专门研制毒瓦斯的谋略部队。它始建于1938年，由秋山少将和另一名少将主持。该部队的250人，大部分是技术军官。他们大多数是位于日本千叶县的习志野学校培训过的。

日本最早研究毒气及其它化学武器的是在东京淀桥的日本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后来，它为了扩大对中国侵略战争而实施化学战，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增设了五一六毒气部队。

五一六部队设立了五个课，即总务课、第一课（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毒气防护的研究）、第三课（毒气治疗的研究）、第四课（化学剂的研究）。它的任务和第六技术研究所的任务一样，都是进行毒气、毒气弹的研究和制造。其中主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气属于速效性糜烂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酰氯肟和联苯氰基胂都是属于刺激性瓦斯。五一六部队研制的这些种类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它装进迫击炮弹内。这些毒气弹，首先由与其毗邻的满

洲第四一六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炮第三联队）使用。

五一六部队在其驻地南约600米处设有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各类毒气弹20万发。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日本侵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同美军作战时也都秘密地使用过。

五一六部队还与七三一部队密切配合，在安达特别实验场等地搞细菌和毒气的综合实验。

它还在佳木斯设立了一个附属支队（实验场）三岛理化研究所。

六、大陆科学院

1933年，日伪当局在新京（长春）建立了大陆科学院。它由日本关东军控制，研究的项目以生物化学武器以及防毒、防疫为主。其目的是为日本关东军实战服务。据原大陆科学院日籍研究人员志方益三证实："科学院防毒研究室专门从事化学兵器和防毒的研究，他们进行过麦角人工接种的实验，即：在大麦出穗期，把一种植物病毒液注射到麦穗上，培养麦角菌。并将培植成功的麦角菌，委托牙克石农业实验场、肇东学校进行试验，其目的是使农作物病毒传染。"

1936年，在关东军马匹防疫厂（一〇〇部队的前身）成立的同时，大陆科学院增设了马疫研究处。它设有细菌研究室（分设鼻疽、传染性流产、炭疽研究分室）、化学研究室、病理研究室、害虫研究室以及总务科。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是日本军籍的兽医专家，也有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人。

马疫研究处处长安达诚太郎，曾兼任长春兽医大学和东北农

学院的教授。他与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一〇〇部队若松侑次郎是同窗。他们打着"兽医防疫研究"的招牌，进行着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据岩下光之供认：我在马疫研究处担任细菌研究室主任，曾领导研究和制造炭疽、鼻疽等细菌。"

马疫研究处与一〇〇部队紧密配合从事细菌研究和实验工作。1950年，在苏联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时，安达诚太郎非常恐惧和不安。他供认，马疫研究处和日本细菌部队一〇〇部队在业务上、技术上有联系，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马疫处的实验室建立之前，曾借用一〇〇部队前身——高桥部队的病马场（位于马疫研究处西邻）做细菌实验。马疫研究处每月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都邀请一〇〇部队、马政局畜产系的人员参加，交流马疫细菌及其它细菌的研究情况；一〇〇部队召开类似的讨论会，也邀马疫研究处的人员参加。据岩下光之供认："1941年我参加过一次由一〇〇部队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听到了关于鼻疽细菌的化学分析及其作用的学术报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岩下光之的审讯笔录中完全可以证实马疫研究处和一〇〇部队在细菌实验的过程中，曾密切地互相配合。现将审讯笔录摘要如下：

你不能否认曾给过一〇〇部队使用过的细菌吧？

我不能否认。因为那时我们有50多种炭疽菌，究竟给他们多少我记不清了。

你对一〇〇部队还有过哪些援助？

我曾给过他们培养细菌的原素（芽胞系）及实验用的器材、小动物等。

第一〇〇部队给过你们在细菌研究上用的药品吗？

为了制造细菌，第一〇〇部队曾给过我们药品，种类很多，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甘油给的很多，给一次就够一年用的。①

岩下光之在供诉时，回避了一些重要罪行。据调查，一〇〇部队曾给过马疫研究处一些氰化钾等剧毒化学药品，同时马疫研究处也参予了一〇〇部队对人、畜的细菌实验活动。

在大陆科学院，还有长春卫生技术厂。它是制造疫苗、血清的工厂。虽然归属伪满大陆科学院领导，但已变成了日本关东军的御用工厂，完全在日本人控制下，由传染病研究专家阿部任厂长。它与一〇〇部队、七三一部队的关系密切，阿部曾受一〇〇部队的嘱託。他们在细菌制造和防疫方面互相配合。据原卫生技术厂的加地信证实："该厂的研究员高桥义夫，有一个时期和一〇〇部队某中佐共同研究过炭疽和疫苗。"、一〇〇部队在兴安北省进行牲畜细菌传染实验后，卫生技术厂曾参加免疫实验活动。七三一部队及其孙吴支队，在德都进行霍乱细菌传染实验时，卫生技术厂也曾参予疫情的调查和所谓的防疫活动。

七、伪满医大和北野政次的论文

日本侵略者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细菌实验，不仅在它的特种部队里进行，而且还在其控制下的医科大学里干过。从1939年1月11日北野政次亲笔撰写的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的论文中可得到充分地证明。1948年，曾在长春卫生技术厂工作过的斑疹伤寒专家日人河野通男病死于长春。与他在一起的一个名叫张大华的中国人从其遗物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份论文。报告书上署名为北野政次、岩田茂、渡边荣三人。曾任七三一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当时是伪满医科

①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

大学的教授，岩田茂和渡边荣也在这个大学里，一个是微生物学讲师，一个是研究员，他们都是北野从事细菌实验时的助手。

报告书是用日文写成的，封面上用红笔勾着“秘”字，全文约有15000多字，详尽地叙述了如何用活人进行细菌效能实验的方法和实验成果，还有50幅图表。论文中说：“在临江八道沟获得10名‘志愿者’和13名‘死刑犯人’，得到了作人体实验的机会。”这13位无辜被害者的名字是：孙×鸣、齐×山、秦×贵、王×正、李×春、陈×如、宗×耀、曹×光、宗×勤、将×凯、李×一、李×春、韩×学。北野虽然把这些人写成“死刑犯”或“志愿者”，但不敢写出他们的全名，把名字的中间的一个字有意地抠掉了。这就说明他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

在报告的“实验成绩”中写道：“宗×耀（死刑犯人），男，74岁，30年前自山东海阳县来蒙江务农，素健壮、未曾患重病、急性热病，父母不详。在注射后第九日夜间，头微痛，疲倦，第十日晚突发冷发热，体温上升，达38.3°C——40°C。继续两天，第十四日后，体温为39.3°C——40°C。第十六日解剖。在病程中，有腰痛、厌食、口渴、疲倦、关节痛等症状。于第十三日晚间头痛增剧、眩晕，此后言语不清，谵语，脸面的肌肉和舌都颤抖，不食，结膜充血，舌苔很厚，腹凹陷，脾肿大。”北野在解剖宗×耀的身体后写道：“脾肿约为健康人之3倍，膜紧，暗红，切面多血，灰白红色，软，脾材及滤胞不清，成传染病状，其它脏器无显著变化。”

这些“志愿者”和“死刑犯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报告中记载：“孙×鸣（志愿者），男，34岁，五年前由山东海阳来临江务农，曾作上等兵”；“齐×山（死刑犯人），男41岁，

六年前由山东来煤矿作工”；“秦×贵（志愿者），男，36岁，十二年前由山东蒙阴县来通化松树镇务农”；“李×一（志愿者），男，40岁，十年前由山东莱阳来通化，于抚松县农务”；“李×春(志愿者)，男，32岁，十年前由山东沂水县来此，由兴京迁抚松务农，父母已死，有弟一人”；“宗×勤（志愿者），男，44岁，八年前由山东来通化八道沟务农”；“曹×光(死刑犯人)，男，66岁，二十八年前由山东来三岔子务农”；“蒋×凯（志愿者），男，47岁，七年前来自山东，父母死因不详，有弟兄三人”；“韩×学（志愿者），男，52岁，十年前由山东即墨来间岛经商，三年前在抚松闲居”；“王×正（志愿者），男，43岁，十年前由山东来通化于抚松务农”；“阳×如（志愿者），男，45岁，五年前由山东莒县来通化抚江务农”；“宗×耀（死刑犯人），男，74岁，三十年前自山东海陈县来蒙江务农”；“李×春（志愿者），男，34岁，二十三年前由山东登州府来通化抚松务农，一向健康”。这些“志愿者”和“死刑犯人”，都是从山东来东北的农民。他们的居住地点，正是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所活动的地区。可想而知，北野政次等所杀害的都是英勇的抗联战士和善良的中国百姓。

据曾任中国医科大学细菌系副教授的景冠华证实，1942年底，他在伪满医科大学实习的时候，曾听到北野助手滨田丰博说，用一般动物作斑疹伤寒实验所需的时间太长，因为军方需要，已改用人作实验。由此看出，日本侵略者用活人作实验，决不局限于医科大学内。北野杀害的这13名无辜者，只不过是无数牺牲者之中的几个而已。①

---

①《东北日报》，1952年3月5日。

八、七三一部队在日本细菌战略网中的中心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占中国东北时起，陆续在中国各地秘密设立了一批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研究的基地和进行细菌实战的部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略网。在这个细菌战的战略网中，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始终是研究基地、指挥中心。石井四郎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不仅有权指挥关东军的特种部队，而且还有权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防疫给水部"。"①

石井四郎从创建七三一部队时起，日本大本营就赋于他建立细菌战略网，七三一部队发挥细菌战研究中心基地的使命。这是石井四郎的技术权威和七三一部队的规模、地位及设备实力所决定的。

七三一部队这个细菌研究基地和指挥中心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联合细菌武器性能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作战。

在中国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榊原秀夫，曾提供了关于它组织联合作战的线索："1942年1月，日军长沙作战失败后，我负责用飞机护送重症伤员，到了岳州。在岳州机场从一空军大尉的口中听说石井四郎少将已经到了汉口。"1940年到1942年期间，身任七三一部队长的石井四郎，经常秘密地窜到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活动。这次，他亲自带领七三一部队第二批远征队到华中地区，在第十一军军医部、华中军防疫给水部——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配合下，进行了投撒细菌的活动。这一军事秘密被中国军队察觉后，他到汉口去的。其实，在此期

①南太平洋方面的防疫给水部，系设在新加坡的"南方防疫给水部"，它也是细菌研究基地（部队）之一。

间，类似的联合作战，不止一次地在宁波、浙赣干线上进行。

二是指导各细菌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作战。

日军侵占山西省省会太原后，即在第一军里设置防疫给水部，同时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也派驻了一个支队。1942年8月，被日本大本营撤消了七三一部队长职务的石井四郎，秘密到太原担任了第一军防疫给水部长。从此，太原就变成了日本侵略军又一个准备和使用细菌战的基地。1943年7月，石井四郎主持了第一军召开的太行山区军医经验交流会。第一军防疫给水部、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太原支队的军医全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石井四郎大讲斑疹伤寒的传染过程，并透露出太原防疫给水部也像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那样，在用中国人作斑疹伤寒传染试验所取得的成果。曾在侵华第一军防疫给水部工作过的汤浅谦被我军俘获后证实说："据我所知，石井四郎接任第一军防疫给水部长后，曾三次秘密去潞安活动。第一次是1942年末，后两次是在1943年4月和9月。石井从对人的细菌试验、冻伤试验，到对植物病毒的传染，都通过实例详尽地作了讲解。石井四郎还歇斯底里地说，要把发霉的烟叶与小麦黑穗菌混合，即可培养成一种最厉害的菌。如果天皇有令，马上就往美、苏国土上一撒，就可让它寸草不生。"

在第一军防疫给水部工作的吉泽行雄也作过这样的证实："1943年3、4月间，石井两次去崞县。带去了幻灯机，一边放映幻灯片，一边给卫生下士官们大讲虐疾传染情况。"

石井四郎不仅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窜到东南亚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因为那里也有一支细菌部队。

三是培训细菌实验和作战人员。为此，七三一部队专门设立

了训练教育部。它有卫生兵教育队以及各类专业人员的训练队，还有少年队。七三一部队的新兵和军属，都首先要接受入队教育，然后进行专业培训。学习细菌学、防疫学、昆虫学、病理学以及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方面的特种知识，甚至学练刺杀格斗。培训结束后，再正式往各作业班里分配。

培训少年队员是从1939年开始的，1942年被纳入教育计划。每年培训一期，每期一个月，结业后分配到本部的各课以及各支队中去。

石井四郎很欣赏自己一手操办的少年队。1939年6月初，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第一次巡视石井部队时，他组织少年队员接受检阅，并向梅津夸耀说："这些少年队员顶上医科大学的学生了，不久将来就可成为部队的中坚、未来的军医官。"其实，结业后的少年队员，开始只有当佣员的资格，几年后才能升为充当研究助手的雇员。如果是当卫生兵的话，几年后，最高的仅为上士班长。

训练教育部不仅培训七三一部队人员，而且还为关东军管辖下的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培训人员。1940年2月，七三一部队高级军官担任教官，对各陆军医院30名军医官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细菌学方面的教育，并在各部的作业班里实习。1943年7月，为培训各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部长，根据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的指令，七三一部队在第三部所在地——"南栋"，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短训班，进行"特殊防疫"教育。据榊原秀夫的回忆，参加的人员有：

孙吴第一师团松平少佐；

佳木斯第十师团榊原少佐；

牡丹江第十一师团尾上少佐；

第十二师团野原少佐；

第二十五师团大木大尉；

第二十七师团小山田少佐；

还有第八师团、第九师团、第二十六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长。

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极力鼓吹进行细菌战；总务部长太田澄大佐大肆宣传战争与传染病的关系，并讲解用于战场上的细菌种类、细菌攻击目标以及攻击方法等；教育部长园田大佐介绍了细菌谋略及其教训；草味药剂少佐和江岛药剂中佐分别讲解了药物中毒预防和毒物检知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参观了野战消毒车的演习。

1944年以后，由于战局紧张，七三一部队及其各支队抽调了一批老队员开赴太平洋战场，致使它严重缺员，难以承担全部训练教育任务。于是，七三一部队决定训练教育部只负责本部教育培训，各支队负责本支队的培训。

七三一部队没有培训其它的细菌部队人员，但它把进行细菌战的骨干调到了各细菌部队。比如，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刚建时，把西村英二军医大佐调去任部长，同时还把篠田统中佐调走任分队长；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成立后，石井把太田澄大佐调去任一段时间的部队长；1944年下半年关东军驻虎林的第五部队设立了防疫给水部，北野即把川岛清军医少将派去任部长。

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

七三一部队是在一边研究、准备细菌战，一边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的。科学是属于人类的，然而它用科学屠杀人类，背叛了科学。事实表明，七三一部队从它建立之日起，就不是一个细菌研究的机关，更不仅仅是进行细菌的研究，而是不止一次地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的特种部队。因此，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七三一部队只是个进行细菌实验的杀人工厂；只是准备使用细菌武器的看法是很不够的。

一、参加诺门罕战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就把它作为进攻苏联的战争基地，不断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1936年11月，它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后，这种挑衅的规模更大，次数更多，气焰也更加嚣张。继1937年6月的乾岔子岛事件和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之后，于1939年又在罕达盖——将军庙——阿木古郎一线至哈拉哈河一带悍然发动了诺门罕事件。日本关东军、伪满国军和苏联军、蒙古军的对战，是以诺门罕布尔德为起点，沿着哈拉哈河及其支流胡鲁斯台河两岸展开的。这场由日本关东军具体策划的“边境纠纷”，很快就升级为一场大兵团作战。日本大本营多次向关东军下达命令，指挥这场战争。在诺门罕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到七三一部队视察，了解它的实力。这时，七三一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细菌生产能力，并掌

握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同时实战防疫使用的滤水机也研制成功。石井四郎为显示七三一部队的实力，命令总务部庶务主任饭田大尉和6名少年队员布置了一个临时陈列室，摆放了石井式培养器、胜矢式毒物检知器、卫生滤水机（乙、丙型）、各种炸弹碎片、细菌弹壳和生体试验的照片以及中国各地区的气候图等，进行展示。植田司令官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订出在诺门罕之战中配合行动的方案来。

据根关东军司令部的这个命令，拟订了七三一部队参战的三个方案：

一是将装有感染炭疽菌弹丸的炮弹，用日军炮兵的榴弹炮向苏蒙军阵地发射。

二是用飞机在哈拉哈河西岸上空投掷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或者空投受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这种土陶细菌炸弹，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每个里面装有5000只鼠疫蚤。借助附在弹体尾部的少量火药，使它在快接近地面时爆破。这样，疫蚤落地后，就能向人体传染细菌，发生鼠疫；那落地的小动物，人接触后也会发生传染病。

三是派出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源投撒细菌和毒品，使苏蒙军误饮被污染的水而患传染病。

由于七三一部队对鼠疫菌、炭疽菌能否达到传染的目的还没有十分把握；对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的传染途径，已基本上搞清了，所以，石井四郎提出，这次在诺门罕战场上使用鼠疫、炭疽菌是属于实验性的，而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则既是实验，又是向苏蒙军队的破坏性的攻击。因此，他决定把投撒霍乱、肠伤寒菌和赤痢菌作为重点。阴谋破坏班也按照他的意图，

绘制了对哈拉哈河西岸实行谋略的精密示意图，在地图上标有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饮用水源的作战目标。

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凭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和战场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对七三一部队的三个配合作战方案的实施作了详尽地预测：如果用迫击炮发射细菌弹，战斗打响后，日军的炮兵阵地就会遭到苏军的炮击，细菌弹就可能在本军阵地上爆炸，使日军自身受到危害；如果用飞机投掷细菌弹，高空作业命中率低，低空飞行就可能被苏军击毁，并落在哈拉哈东岸地区，这样也会危及本军；如果深入苏蒙军所在地区撒菌，凡是有水源的地方，苏蒙军必定严密把守，不易靠近，即使能够靠近，也难以进行撒菌活动。小松原道太郎等人最企望的是关东军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作战，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细菌战了；况且在进入西岸地区之前若使用了细菌武器，待日军进入西岸地区之后必将受到危害。

经过缜密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细菌武器只有在日军败退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此，决定放弃空投的计划；战败后，在做好隐蔽的情况下，突然把细菌炮弹发射出去；也是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将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上游，使位于下游的苏蒙军喝受细菌污染的水而发生传染病，损耗其攻击作战的能力。

石井四郎接到参战的命令后，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为“大东亚圣战”立功和进行检验细菌武器效能的机会。于是，他把七三一部队当时仅有的400名各种从事细菌战的人员抽出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关东军防疫班”按其参战任务，分为两部分：

一是组织了十几个以第三部的卫生下士官为主吸收正在教育

部受训的少年队员参加的，为日军前线部队防疫供水服务的防疫班和整备班，每班10人，由少年队教官佐佐木少尉带队。在此之前（6月下旬）就将准备的20个甲型滤水机、50个乙型和50个丙型滤水器以及其他一些必备的器材，分别装进50个大木箱内，用火车发往海拉尔。其人员乘七三一部队的专用汽车，昼夜兼程，开赴诺发门罕战场①。

作战时，每个防疫班配置一名装有甲型石井式滤水器的给水车，跟随野战部队行动。这种滤水器可以保证一个连队一周的用水。它的水箱是用木料制作的，一旦遇到被敌方缴获的危险，即可浇上汽油就地烧毁。这种设备，苏军当时尚未研制出来。

二是组织了阴谋破坏班，通过各种手段施放细菌武器。其组成人员是以第二部为主，适当吸收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少年队员参加，由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负责。早在6月末，石井四郎就组织了以碇常重少佐为队长的敢死队。出发时，在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碇常重少佐在石井四郎面前，带头咬破手指，用血在一面日本国旗上签了名，另一名官佐和22名敢死队员也一个接一个地照样签了名，以表示他们要发扬“大和魂”精神、为效忠天皇而誓死如归和永不泄露七三一部队秘密的决心。

7月12日，敢死队潜入哈拉哈河旁的一片松林中。他们都穿着没有肩章和帽徽的黄色日本军装，以防有人发现他们是关东军的正规军人。他们卸下了装备班用汽车偷偷运到这里来的两只充气式橡皮船、十几个大型金属瓶、一些玻璃容器、铁水桶、长柄勺、绳索和装有零碎物资的大型皮箱等，这些特殊器材分别背在身上。在碇常重少佐的指挥下，隐蔽地沿着松林的边缘向哈拉哈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言。

河岸靠近。

哈拉哈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达尔滨湖，最终弯弯曲曲地流入贝尔湖，全长近400公里，有12条小河汇入。河宽50—80米，水深平均2米，流速每秒1米。河西岸比东岸高50米，在东岸看不到西岸上面的情况。因此，七三一部队敢死队潜入哈拉河岸边，没有被苏蒙军队发现。他们隐蔽在茂密草丛里，把橡皮船充气后，装上金属的和玻璃的菌液瓶、铁水桶、长柄勺等物品，推进河里，用绳索拴在岸边的大树上。他们上了船急速地向河中心划去。当拴船的缆绳拉紧时，船上的士兵就做好了撒菌的准备。为了防止自身受污染，他们在逆水上行时撒菌，岸上的士兵解开拴在树上的缆绳往上游拉船，船上的士兵有的划动船桨，有的迅速打开菌液瓶盖，连菌液瓶一起扬进河里。在行进1公里的河段上，撒了各种细菌溶液22.5公斤。菌液瓶落入河底，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液慢慢地流出来，向下游漂去。两名军官立即用长柄勺提取水样，测试水温和流速，作了实验记录和拍照。船靠岸后，他们马上乘汽车返回了驻地——将军庙。于是，1939年7月13日午后1时30分，石井四郎到胡鲁斯台河南岸的日本关东军步兵第七十一联队队部，向那里的官兵通报说："不要饮用哈拉哈河的水了，那河水可能被污染。"接着，就通知诺门罕战场上第一线的各日军部队和伪满国军的部队，都要使用经过石井滤水器滤过的水。

七三一部队在实施这次细菌阴谋破坏活动前一个月，就加紧了细菌武器的生产。第四部在早川少佐、小林准尉和渡边准尉的指挥下，把60名队员分成两班，昼夜不停地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就把所需要的霍乱、伤寒和副伤寒菌赶制出来。石井四郎命令担负

霍乱菌制造任务的濑户川班必须在10天内完成任务。由于时间紧迫，莳田丰技师要求田村良雄和另一名队员每天要洗涤150个玻璃试管，由小林灭菌室灭菌消毒后交给培殖班。培殖班的13个人，除负责人今野信次技外，每3人编为一组，用150个培养罐，按时生产出了6公斤霍乱菌。另一个班抽出4名队员，利用两个大型培养罐，很快生产出10公斤伤寒菌。生产出的这些细菌密封后贮存在地下库里，然后由田村良雄和奥富克二把它专程送往将军庙，交给敢死队的队副难波准尉。专门研制和装配细菌弹的山口班6月抽调6名队员专门装配细菌榴散弹。据被俘的田村良雄在中国军事法庭上的证实，在山口班长的命令下，他和4名队员仅3天就制造出2000余个炭疽菌弹丸。这种弹丸是由0.5厘米粗1.5厘米长的铁筋锯成×型槽，染上炭疽菌后装入榴散炮弹内。这些炭疽菌炮弹制成后，由山口班的人员专程护送到诺门罕前线的炮兵阵地。

日本战败后，回国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鹤田回忆说："1939年8月，奉篠田班班长篠田统的命令，把我自己培殖的跳蚤装进空汽油桶内，用汽车护送到将军庙。随后我也参加了敢死队。一天晚上，难波班长命令我们往哈拉哈河里投放肠伤寒菌浓缩液。那次搞的好紧张，对岸有苏军的封锁，空中时时有信号弹升起。大概由于匆忙的缘故，我们的班长不慎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鹤田还说：那次撒菌，我们小分队是那天下午从将军庙出发的。途中在一户农家休息，谎说是过路的日本人。那户农家包了韭菜馅饺子招待我们。临走时，我们趁农户主人不防之机，把随身携带的鼠疫干燥菌偷撒在农房里。当我们完成在哈拉哈河的撒菌任务

返回这户农家的时候，发现那农户家3口人全都死掉了。

七三一部队以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出动了半数以上的队员在诺门罕战场上施放细菌，目的是削弱苏蒙军队的战斗力。但事与愿违，他们却自食其果，遭到了细菌的伤害。日军除有4786人战死和5455人受伤外，患伤寒病、赤痢病、霍乱病的就达1340人。这些伤病员都转送到海拉尔，把那里的陆军医院和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于是，七三一部队组织的庞大“防疫班”就有了用场。8月中旬，山下建次大尉所指挥的病源检查班和十几名防疫人员麇集在海拉尔，通过验便的方法进行其病源和细菌效能的调查，仅1个星期，对日军官兵验便就达8500人次。调查结果证明，病源来自他们自己投撒的细菌。

日本关东军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患——疫病流行。于是，他们又采取了紧急措施防疫。当时，它命令伪满民生部，从伪满的卫生机关抽调人员，组织防疫队前去配合，并在海拉尔设立了防疫检查所，各省政府也设立防疫所①。

七三一部队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人员，除被苏蒙军击毙者外，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就有40余人。10月，他们丢盔卸甲撤回了七三一部队本部。据山内丰纪证实：“我看见他们个个垂头丧气。听参战的人讲，苏蒙盟军英勇善战，我们被打得稀里哗拉。”新式装备的给水车拖回来时，七零八碎，不成样子，令人可笑的是，本来一败涂地的关东军却自我安慰，给七三一部队颁发了感谢状。

---

① 长春市公安局档案：加地信证言。

二、远 征 队

细菌武器的应用，是整个日本侵略军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由于特种细菌部队与研究机构遍及它的各个部队中，其中，七三一部队又充当着骨干，起着中心的作用。因此，七三一部队经常派出“远征队”与日军各个部队互相配合，协同进行细菌战。

1940年7月，七三一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在石井四郎的亲自带领下到达浙江省宁波。他们用飞机上的投撒器将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以及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布在这一带的居民区、河流和蓄水池中。10天之后，七三一部队又组织了一百余名医务、摄影人员，乘坐特别专用列车，从哈尔滨站出发，南下宁波。他们首先宿营在杭州西湖附近，待小型给水车和专用汽车用大车运来之后，便换上中国服装，在防护兵的保护下，秘密地向疫区移动。沿途“殷勤”地给中国的疾病患者诊疗，并发给药品。汽车行驶2日，临近目的地时，他们换上白色防护服。这些携带防疫器材和照相设备的七三一部队的人员，是奉命来测定细菌武器效果的。他们在一名尉官军医的指挥下，到河川、水井等地方取样并观察村庄，进行细菌污染程度的调查。他们在细菌实验地捕来包括妇女在内的二三十名中国人，进行身体检查，分析细菌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活动被中国人民识破，中国报纸载文揭露：这一带传染病的流行，是日本军用飞机投扔细菌武器所致。在中国人民强烈的谴责之下，七三一部队这些检疫班人员匆匆忙忙地返回了哈尔滨平房。但这批远征队却贼心不死，便秘密地转移了阵地。

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机在衢州县用同样的手段撒布麦粒、粟子等物，混有跳蚤。这种跳蚤经过检验，确系“人鼠共同蚤”。在日寇投下麦粟物的38天后，该地就发生鼠疫病患者22人，都不治而亡①。

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县上空撒下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该地发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接着陆续发生了鼠疫病。据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的丁立成医师说：“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跃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发生了鼠疫，有99人染患，其中仅有2人被治愈。”②当年曾在宁波防疫委员会工作的钟辉说：“那些在隔离室里的鼠疫患者对我说，当日飞机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和粟子一齐落下来。当时我穿着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下半身爬上了很多红红的平时少有的跳蚤；我发现凡是落麦子最多的人家，就死人最多，象宝昌祥商行死了14人，元太绍酒店死了6人，他俩家所落麦子就是最多的。”③当时宁波99个鼠疫患者中仅被救活的两人之一，元太绍酒店学徒钱贵法说：“1940年10月22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扔下许多小麦、面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落在屋顶上的面粉等都被冲落地上。到30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富生夫妇就都病死了，当晚我们店的何福林也染病不到一天就死去。那时，别的店也传出有人得急病而死的消

① “浙江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王毓榕、郑介安、俞汉杰、金秋等同志的书面报告”，《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

② 《东北日报》，1950年2月6日。

③ 《东北日报》，1950年2月6日。

息。我在那天晚上，也发热和头痛，同时淋巴腺胀痛、难受得手脚不知往哪放好。我进医院后，见到一起入院的病人都相继死掉了，只有我是死里逃生 。”①

1940年11月26、27日，两架日机两次侵入金华县上空，在空中撒布白色烟雾状、落地后即成蛋黄色小颗粒并遇水即溶化的鼠疫菌。此后，在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蔓延。被传染鼠疫病的东阳县有94人，死亡92人；义乌县有308人，死亡257人；兰溪县有36人，死亡12人。②

1940年12月10日，一架日机在上虞县散布鼠疫菌性的细粒。

1940年12月19日，四架日机在汤溪县投下鼠疫菌。

七三一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持续了将近5个月，给宁波地区带来了鼠疫隐患。据丁立成医师证实：“1941年日寇占领宁波后，天天派人到我医院里查问有没有传染病患者。同年5月，西北街西北村有一姓王病人求治，当时抽血进行动物接种，接种后的天竺鼠不久即发病而死，乃证实是鼠疫。按当时日军部的规定，我就把这个经过报告了他们。日本军部的军医便将死天竺鼠的脾割了一块去。”③

据《新华日报》刊载肖凡写的题为“一个江南目击者的控诉”一文，这位目击者说：“1940年下半年，我离开浙东宁波地区到金华。当时，宁波由于日机投掷鼠疫跳蚤而突然地发生了鼠疫，并很快地蔓延开来。到后来，鼠疫严重的地区只好被封锁，不准与外边接触。有的地区就纵火焚烧，房屋、东西被烧毁，人畜全部被活活地烧死，其惨状难以形容，且损失之巨大。然而，

① 《东北日报》，1950年2月6日.

② 《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1952年3月8日.

③ 《东北日报》，1950年2月6日.

鼠疫并未因此而扑灭，疫情四处蔓延到附近地区，医院都闹人满之患，一直闹了很久。”他还说：“我到金华又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每天上午敌机便在八绿江大桥车站等地投弹轰炸。一天，敌机又来了，在大桥附近轰炸一阵之后，即低空飞过，这时，随着‘嗖嗖’的一阵响声，大片的黑点正飞速地降落下来。防空洞里一片惊叫：‘哎，大批炸弹下来了。’一齐都往防空洞深处躲去。可是过了一会，飞机声渐小，而外面沉寂如故，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人们走出防空洞后，才知道在大桥附近投下了许多震裂了的装满泥土的麻袋，泥土里跳出无数只跳蚤，向四处跑散了。于是，这个地方迅速地戒了严，不准人们往里走，麻袋也不敢去动它。从那天起，敌机又接连来投了几次麻袋。不久之后，鼠疫便在金华发现了，不少人因不治而死亡，真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直到冬天后才稍为好一点。”①

1941年春，七三一部队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要破坏中国军队占领的重要枢纽常德城以及沿铁路交通线地区的一项命令，又派出第二批远征队。它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带领，开始为60多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细菌学专家。这个远征队在常德一带空中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该地区鼠疫的发生，死于鼠疫的有400多人。同年4月21日，日机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白色絮状物。②是年春，细菌灾难还遍及浙南。在温州，鼠疫像一阵阴风似的卷走了无数中国百姓的生命。西门一带是瘟疫流行得最厉害的地方，几乎每时都有人死亡，使整个温州城陷入极度的细菌恐怖之中。同年11月4日，一架日军飞机又在

① 《东北日报》，1950年2月7日。

② 《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人民日报》1954年。

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菌的棉絮、破布、谷麦等物。8天后发现了一个叫蔡桃儿的鼠疫患者，入院36小时后死亡。接着，鼠疫便在该市区蔓延，还流行到市郊及桃源、丰县等地，仅石公桥镇就有80多人受鼠疫传染致死，有的全家死亡。同年12月19日，日机在诸暨县上空散布大批沾有鼠疫菌的状似蜘蛛网的东西和棉花等物。直至1942年3月，义乌县崇山村还发生鼠疫，日军派人把李翠凤家正在染病的媳妇拖到村外，剖开肚皮，挖出肝脏带走，检验他们施放细菌的效果。同时，还将该村的房屋烧掉了72间，使160户农民无家可归。年底的一天，该村农民王化章下山砍柴，在路旁看到一个垂死的病人，用手扶了他一下，回家后就染上病，没过几天便和路旁那个病人一样满口流血而死。接着，鼠疫便在这个村蔓延。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380多户人家的村子，因被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320多人，全家死光的就有30户左右。当时只有8岁的王兴富的父母、祖父、祖母、三个弟弟和叔婶等9人仅10天的时间就相继死去，只剩下他一个孤儿。①

三、浙赣行动

1942年4月18日，美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袭击日本本土东京等城市，使得日本大本营甚感恐慌。当发现美军飞机完成轰炸任务后，降落在中国东部地区，这使它更为不安。为了破坏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这种作战行动方式，日本大本营命令侵略中国的上海第十三军团和武汉的第十一军团组织浙赣战役，东西夹击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打通浙赣铁路。战役从5月15日展开，日军先后占领了金华、衢州、玉山、广丰、丽水等

① 《东北日报》，1952年3月8日。

地，完成打通浙赣铁路计划后，在其沿线驻屯约两个月，大肆进行破坏。然后，除继续占领金华及其附近地区外，东西两路日军全部撤回原防地。在浙赣战役过程中，日本大本营令七三一部队以“浙赣行动”为名，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于是，它再次组成远征队，和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人员配合行动。其作战方法是，日军第十三军团自浙赣前线后撤上海时，在一些地区施放细菌。

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由120名官佐及雇员编成，7月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首先到南京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营舍内驻屯。由于“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一部分官佐和士兵参加，使这只“远征队”人员增至160人。七三一部队“远征队”出发前，据根柄泽少佐的指示，菌苗仓库主任松岛让佐佐木把仓库内盛有细菌的瓶子装到箱子里送往本部队的专用机场。这些炭疽热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总共有130公斤，分别装在标有“蛋白消化素”的瓶子里，用矿蜡封好瓶口，包上胶纸，再用特种线捆牢，然后装入印着“给水”字样的木箱内，每箱装15—16瓶，用一架标有“给水”字样的飞机运到南京。

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军团司令部奉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秦彦大将之令，派出侦探课长三品隆行，对金华、龙游、衢州、玉山等地中国军队兵力、居民分布状况作了详细的调查。8月24日（或8月25日），石井四郎飞至日军第十三军团驻地上海。他在该军团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后，便转乘飞机赶到南京。此时，“给水”字样的飞机也同时到达，这意味着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远征队人员把一部分细菌倒进通常用来盛水的铝瓶内，其余部分

仍然留在玻璃瓶内，连同南京“荣”字部队提供的必需量的跳蚤，一并用飞机运至预定地点。在石井四郎统一指挥下，用飞机将铝瓶和玻璃瓶以及跳蚤投撒到重庆一带的水源地、沼泽地和居民住宅区。8月31日以后，又在衢县、金华等地活动两个星期，致使这些地区陆续发生鼠疫，人大批死亡。9月中旬，“远征队”返回上海后，派出一支“阴谋破坏班”，在南京两座战俘营里，用注射器把伤寒和副伤寒病菌注入特制的烧饼中，由翻译春日中一分发给3000名中国战俘，在他们吃下后予以释放，使这种传染病广为流行。

参加这次“浙赣行动”的一六四四部队的一名成员曾为实施细菌战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感到可耻，逃到中国军队中。1946年4月，他向东京审判时的国际检察局提供了《日军罪行证明书》。他证实说：从1942年6月到7月，该部队曾将伤寒、鼠疫、赤痢等传染病细菌散布在以浙江省金华为中心的区域；在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害的同时，“因中国军队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便进入散布区域，在此稍事休息并宿营。结果，在做饭和饮用时使用了附近的水，出现了许多传染病患者。”由此可见，日军中也有许多受害者。这份证词中还说：“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沮丧其士气，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了颇为恶劣的后果。”“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就已住满了传染病患者（日军士兵），每天有3至5名患者死亡。”“我知道在‘圣战’的美名下干的这些非人道的勾当后，便从部队中逃走了”。①

① ［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第10页。

四、特殊器材的输送

七三一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所需的各种细菌和器材设备都加以伪装并冠以"特殊器材"的名称运送，有时也使用本部队的专用飞机输送。

1945年夏季，在苏联红军缴获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文件中，有两份关于七三一部队赴宁波的第一批"远征队"的"特殊器材"输送的文件：一是1940年7月25日17时由关东军总司令梅津中将签发的关东军丙字第659号作战命令："着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据根另纸所载一览表，将奈良部队器材沿铁道输送。"二是7月26日11时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草场中将签发的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后勤第178号命令："着令哈尔滨、沈阳、锦州各分部长，据根附件所载输送一览表计划并实行输送奈良部队。"

这里提到的"奈良部队"，是石井部队器材供应部的代称。这从把"关东军作战命令"抄送给七三一部队的文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工作员本田在收到"命令"文件的左上方用红墨水附注："将哈尔滨奈良部队官兵四十名及所带器材于7月30日至8月6日期间由哈尔滨运到上海一事的命令。"他还在"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命令"文件上，附一张字条："依据关东军作战命令丙字第659号所拟定的输送一览表，所输送的是驻在哈尔滨的奈良部队(平房石井部队之一部)佐级以下官兵共四十名及其所携带的武器（秘密器材）；行程是山海关——天津——上海。"从这两个比较详细的附注上还可以看出，关东宪兵队对七三一部队的一切活动的安全负有责任，因此，它有必要把七三

一部队重要活动的内容以及时间、地点及时地通报给有关宪兵队。这就是在收到的文件上加附注的原因。

根据输送一览表可以看出，特殊器材是通过两条路线输送到上海的。一条是从平房到哈尔滨、新京、沈阳、山海关、天津、上海，始终是用火车发运的；一条是用火车从平房运至大连，再通过海运到达上海。

在运输的“特殊器材”上分别标有“哈—1”、“尼—1”、“尼—2”，“尼—3”和“迪—15”。这是1938年和1939年七三一部队研制的“哈型”、“尼型”两种细菌炸弹的代号。据逃回日本的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的资料中说，哈型炸弹虽然存在着很多缺点，但如能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解决，肯定是一种很有威力和发展前途的炸弹；尼型炸弹经过爆炸实验，证明效果“相当良好”，是一种“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炸弹”。①而“迪”字代号的器材是改进了的“哈型”和“尼型”炸弹。

“哈”、“尼”、“迪”后边的数字，是车皮的数量。这些车皮虽然装的都是细菌炸弹，还有大量的服装、滤水器、医疗器械，消毒材料、帐蓬等器材，但也足以证明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的规模之大了。

日军的其它细菌部队需要的细菌武器，七三一部队派出细菌输送班的人员输送。细菌输送班是从每个大队抽调的一名可靠的甲种见习尉官组成的。七三一部队的细菌输送点共有50余处：在东北地区有安达、长春、白城子、海拉尔、黑河、热河以及南沈线的某些小站；在关内有济南、青岛、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广州等地。1944年1月15日，雇员山下升等人奉命执行输送

① 森村诚一著《恶魔的饱食》续集（修订本）。

细菌的任务。他们携带的鼠疫菌，装在一种特制的箱子里。由哈尔滨王岗的临时飞机场起飞，经沈阳送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以及杭州郊外，一个月后返回平房；接着，又分别给安达、香坊、孙家、白城子、南新京（长春）、海拉尔、黑河、热河和沈阳等地运送一次；4月，再次将一批细菌运送到济南、青岛和广州。

山下升等人第二次输送细菌是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这次共携带三个包装箱，其中送到上海的是白喉菌和肠伤寒菌各一箱，送到南京的是一箱鼠疫菌。他们从平房出发，经由沈阳到达上海，然后又转送到离上海较远的一个山上。这里有一支秘密撒布细菌的“防疫部队”。为了配合这支细菌部队进行撒布细菌的活动，山下升在这个“防疫部队”受训一个月，然后就参加了投撒细菌的活动。

五、阴谋破坏班与防疫班

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行动，除大规模地派出“远征队”外，还多次组织“阴谋破坏班”，散布细菌，残害中国人民。阴谋破坏班撒布细菌的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经过伪装后，身背鸽子笼，深夜潜入中国村庄，把笼子里装的附着染有鼠疫菌的跳蚤的老鼠放出，跳蚤就爬到当地的鼠类或人身上，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可能发生鼠疫；有的把细菌装在试管里，扔在人们常去的地方；或者把掺有细菌的食品送给中国的孩子。后面的几种方法传染霍乱、伤寒和副伤寒病最有效。①

1940年在吉林省农安县城发生的鼠疫，就是七三一部队“阴

① 〔日〕秋山浩：《731细菌部队》中译本第78、79页．

谋破坏班”造成的。这年6月12日，农安城西曹家铺屯，来了4个鱼贩子，其中有2个人因误入日军人为制造的疫区，被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咬后而发病。他们到县城李魁芳诊所治疗无效，不久即死去。与此同时，李魁芳和他家的保姆、弟妻及附近邻居也都染病而死。于是，鼠疫在整个农安县城开始流行。

7月12日，日伪从新京（长春）派来了防疫班，共5、60人，其中日本人和朝鲜人各一半。第二天，全县城开始大封锁，四门紧闭，交通断绝，工商业也关了门。全县城划了五个隔离区，还有十几个小隔离区。隔离区有的围上的草绳子，有的拦上铁丝网，由伪警察持枪看守，协和会派人日夜巡逻。防疫班在北关小学校院内的“孔庙”旁分别设立了轻、重隔离所；在南门外的一座小学校里设立了临时隔离所。凡是发现有患病的，不管什么病，都用汽车拉来，隔离检查。他们说是给患者治病，实际上只是测体温、抽血化验，使进入隔离所的人等死。更为残酷的是，把有的奄奄一息的患者进行活体解剖。防疫班组织了县城的赵守刚、阎德礼、张俊九、邵殿举等10多名中医到北关校隔离所参观，他们在试验室里看见水泥槽里装着3具被解剖的尸体。据当时在隔离所做木工的李凌荣证实，10月份拉进隔离所的人最多。亲眼见到的就有160余人。这些人多数被害，只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当时被鼠疫传染的幸存者李凤莲的姐姐李凤英21岁，被圈进隔离所的重病室时还挣扎哭喊，不一会就停止喊叫了，又过一顿饭的工夫，她的尸首就被抬出来了。所以，当时人们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鬼子防疫班，进宅民不安，拽人上汽车，入了鬼门关。”防疫班对隔离区的人，还以打防疫针为名，进行烈性毒剂的试验。

到12月，疫情还在继续蔓延。这时，七三一部队奉命倾巢出动，还带来了伪新京医大、哈尔滨医大的100余名实习生。他们到了疫区后，怕传染鼠疫，便住在火车的卧铺车箱里，并在火车站东200米处设一消毒站。每天进入疫区前在这里换上服装和消毒。他们进行疫情调查后，便烧毁一些民房。农安县城在这次鼠疫中，发现鼠疫患者353人，其中死亡和被杀害的295人①，农安县防疫站的材料记载，鼠疫患者354人，其中被杀害298人。

1942年冬，七三一部队的阴谋破坏班人员，又化装潜入吉林省农安县城，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撒布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致使鼠疫流行，大批人死亡。七三一部队佯装防疫保护，把农安县城上千户人家烧掉一大半。②

1942年9月中旬，七三一部队“远征队”返回上海后，对南京战俘营战俘食用注菌烧饼的就是“阴谋破坏班”。另外，还有由凑技师指挥，给押在这里的被俘的约500名美国军人进行食物的细菌传染实验。由于日本是把这些美国人作“人质”的缘故，而没将其害死。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各地不时地发生鼠疫、伤寒、霍乱，赤痢等传染病，这大都是和七三一部队及其它日军“特种部队”进行的阴谋破坏有关。

在七三一部队驻地平房附近，就先后发生两次传染病。

第一次是1940年7月，在新五屯发生的霍乱传染病。目击者郑万春、张朝卿、于孔达、张作礼等人记得，当时，仅几天的时间就有30—40人死亡。其原因是新五屯前有一条水沟，七三一部

---

① 农安县档案局，215号档案.

② 〔日〕秋山浩：“准备了细菌战”，《文艺春秋》.

队就位于它的中间。七三一部队把培植细菌所使用过的水排放到沟里；有人还看到日本人把瓶装的溶液倒进沟里，这些染菌的污水顺流而下。当时，从正黄旗五屯被迫迁到这里来的居民，无钱打水井，只好到沟子里提水饮用。霍乱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霍乱病发生以后，穿着防疫服的七三一部队的人员又开进屯里，挨家逐户地消毒，对患者进行检疫。

第二次是1944年8月，在正黄旗四屯发生的鼠疫传染病。据张廷亚回忆，一天下午2点多钟，他的母亲张商氏，在院前园子里侍弄菜，突然晕倒。把她抬到屋内炕上时，只见她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全身变紫青色，第二天早晨即病死。她的女儿、女婿从外屯赶来，探望她，结果都被传染发病，12小时以后死去。张廷亚的3岁儿子和邻居王普的孩子也都发病死去。传染病发生后，日本人和伪警察封锁了张廷亚的家，在大门口拦上草绳子，不让任何人进出。

这次瘟疫是怎么引起的呢？据张廷亚证实，在他母亲发病前两天晚上，发现有两个人影在院外晃动，出来看时，只见那两个人已走出北门外。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可疑的现象。解放后，一个七三一部队队员说，他们换上便装，背着鼠笼，在黑夜里去过正黄旗四屯，在屯内施放了染菌的黄鼠。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地区，七三一部队、一〇〇部队以及日军中的各“特种部队”，狼狈为奸，在原兴安北省的蒙古族部落、三河地区以及辽阳、本溪、新民、农安、长春、三岔河、哈尔滨、泰来、白城子、洮南、东丰、抚顺、双城、阿城、肇东、东宁、林口、佳木斯等地都有撒布鼠疫菌、炭疽菌、伤寒菌、霍乱菌的活动，而且在疫病流行后，它们也都出动，以防疫

为名，到疫区去调查、测验各类细菌的传染效果以及防疫方法，为其进行细菌战服务。如1940年9月和1942年，长春“三不管”地区，先后两次严重地流行着鼠疫传染病。伪新京市公署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动员医务力量进行防疫。伪长春卫生技术厂不仅出动了医师，而且还提供了鼠疫疫苗。每一次鼠疫发生后，石井四郎都亲自出马。七三一部队虽然对这两次鼠疫的防治都没见成效，且使鼠疫更加蔓延，死人增多，但它却立了功。据曾参加防疫的长春卫生技术厂的工作人员加地信证实：“当时石井领导的医务人员，因撒布细菌有功而获得了日军参谋本部颁发的奖章。”①有一年，北安至黑河之间的建设寺一带，流行马炭疽传染病。日籍医学教授卢田在证实一〇〇部队罪行时说：“此次发生的马炭疽病很严重，时间不长即死掉马匹数千。日本人当时造谣说是苏联施放的细菌，实际上是日军特种部队所作所为。”1941年夏天，德都县发生了严重的“虎”疫（“虎”疫即霍乱，俗称“虎利拉”）曾被伪满民生部委派去德都调查的加地信说：“七三一部队也参加了调查‘虎’疫工作。他们用了实验室和优良的各种器械，以防疫为名，来实验在德都地区撒布细菌的效用。”②1941年春，乌斯浑河对岸的七星泡村发生了混合性瘟疫，人间流行脑膜炎，畜间出现鼻疽和牛瘟。当时这个仅50余户的村屯，不仅有30多人受细菌传染而死，而且各家的耕牛也大多死掉了。该屯的街长魏志清家饲养的4、50头牛，只剩了5、6头。对这次瘟疫，七三一部队的第一六二支队出动，设岗把七星

① 长春市公安局1952年2月20日写的“关于细菌战的调查报告”和志方益三的证言。

② 长春市公安局档案：加地信证言。

泡全屯封锁起来，四周撒上白灰。他们打着防疫救护的旗号，干着细菌研究的勾当。对传染病患者，只进行病情的检查和化验，不给予治疗。由于瘟疫没有根除，以后的几年中，年年有牛瘟出现，并扩散到古城镇一带。

除七三一部队外，日本帝国主义的其它“特种部队”也在中国各地施放过细菌，进行细菌破坏活动。他们为了破坏华北一带抗日根据地，1941年6月，在晋绥边区扫荡结束后，借撤退之机，在曲河县巡镇一带撒布鼠疫菌，使许多人吐血、便血，短期内即死亡。①据新华社在50年代的揭露，日寇在侵略中国期间，曾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新乡、滑县、濬县，晋绥边区的曲河、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撒布鼠疫、伤寒等病菌，还在新乡发现日本飞机投放伤寒菌的装置。1942年，晋绥边区卫生机关即在曲河、保德一带发现散在性的鼠疫患者，死有数十人。②据统计，八年抗战中，边区患传染病的人数约1200万。③

七三一部队以及日军其它特种部队在进行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残害无辜的中国人民的过程中，往往也自作自受，自遭身亡。

对七三一部队的队员，无论是在实验室里或者在野外实验场上，都是经常处于细菌的威胁下。因此，他们深知，不知何时，不是被细菌吞掉，就是战死。石井四郎每次都对执行细菌实验任务的队员说：“现在又要给‘自杀队’添麻烦了。”所以，他们对细菌的威胁怕得要死。正象有的队员说的那样，如果身上没有消毒水的味，总有不安全之感。尽管这样，仅几年的时间，七三一

①③ 《日寇侵华暴行录》。

② 《东北日报》，1950年2月1日。

部队就有许多队员因此而丧命。

除前面所述，在“诺门罕”战场上，七三一部队以碇常重少佐为头目的“敢死队”在哈拉哈河及附近撒布鼠疫、伤寒、霍乱、赤痢等细菌，数十人因受细菌感染而丧命，在前线的日军部队中也流行了赤痢传染病外。据管中士说，表已上尉曾在安达的一次演习中，因使用鼠疫菌和脱疽菌受感染而死。据加地信证实，1940年长春发生鼠疫后，参加“防疫”的渡边道、中达恒等人都先后丧命。七三一部队自作自受，也自我安慰，特设了一个“安灵室”，将死者的骨灰摆放在内。这也无法改变不少队员对这种罪恶活动的厌恶心理和恐惧心情。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撒布各类细菌，也往往由于瘟疫蔓延而波及临近的日军部队。驻佳木斯、敦化的日军师团，所流行的疫情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距林口县七星泡村很近的日军第二十五师团，由于七星泡村瘟疫的蔓延，致使它和日本陆军医院里都发生脑膜炎的传染病。

中国人民反抗
日本细菌战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设立七三一部队，惨绝人寰地用活人进行各种细菌实验，大量制造并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这一罪恶活动一开始，就被中国人民所发现，并同它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

一、深入魔窟，冒死侦察

1936年夏天，刚接任东北国际情报组领导工作的庄克仁，来到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个僻静角落和中共哈尔滨特委负责军委工作的王东周接头。王东周原来负责东北国际情报组的领导工作。自庄克仁从苏联学习回哈尔滨以后，他就把东北国际情报组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庄克仁。中共哈尔滨特委得到情报：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南郊平房一带建立一支名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特种部队。因此，王东周委托庄克仁组织力量侦察，探明该部队的规模、性质和任务。

庄克仁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东北国际情报组的地下情报员史顺臣、赵忠波和敬恩瑞。庄克仁召集他们开会，商量打入的办法。敬恩瑞知道在道里买卖街有个日本人开办的铃木建设组合，人们都叫它“铃木组”。这个铃木组正在平房包揽一个日本兵营的建

筑工程。他还认识一个外号叫“摩托王”的中国人经常开着三轮摩托送铃木到工地去。并听“摩托王”说，那个工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还有个名称，叫“石井部队”。在讨论中，敬恩瑞提出采取充当劳工的办法混进工地的建议，得到了一致赞成。于是，他们趁夏锄大忙季节，通过打短工找机会再去石井部队作临时工。当二遍地快铲完的时候，石井部队派人到村里招收临时工，经过那家大户掌拒的推荐，他们打入了石井部队的建筑工地，当上了装卸工。他们利用跟马车，装卸砂子、石头、水泥、木料的机会跑遍各个工地，看到了七三一部队的规模、范围，并从日本监工、翻译、劳工的言谈里判断出它与细菌、防疫有关。他们凭着记忆，绘制了七三一部队的建筑分布图，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

七三一部队的石井班动物舍旁边，有一座狼狗圈，是四周用铁刺线圈的很大的一个院子，里边有由日本人豢养的20多条狼狗。劳务班班长工藤大尉以及其它日本监工，经常一手拎把钢丝鞭子，一手牵着狼狗到各个作业班去监视中国劳工。

1941年秋季的一天，在劳务班服役的中国劳工韩行岩和邓××，跟随汽车从第二仓库往回拉运木材。当汽车行驶到石井班动物舍的时候，押车的日本监工坂井从舵楼里伸出头，突然向坐在车厢里的韩行岩和邓××喝了一声：“爬下，不准向四下看。”韩行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迅速地和邓××一齐爬在木材上，并顺势向东扫了一眼，看见在狼狗圈里的一根木桩上，一个衣着褴褛的中国人被铁线紧紧捆着，四五条狼狗将其衣服撕破，身体被咬得血淋淋的。当把木材卸到劳务班仓库返回时，只见那些狼狗围着一堆人骨啃着。

汽车停在第二仓库后，韩行岩靠近日本司机山田并低声地问："你知道那被狼狗撕咬的是什么人？"山田虽然是日本人，但他厌恶七三一部队，同情中国劳工。他告诉韩行岩说，那人昨天在营区外窥视，被警备人员发现后逃跑，不幸被捕。他奉命开车去将其押回。他还说："那人是土八路的有、间谍的有。"

1982年夏，在原七三一部队当过判任官的斋藤怀着赎罪的心情来到七三一部队旧址，忏悔地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2年。那天，七三一部队要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斋藤被抽调出来担任警戒。他站在动力班大厂房顶盖的瞭望哨上，用望远镜往四下巡视，发现了一个人趴在停在铁路专用线上的一节货车上，翻看尚未卸下的物品。于是，他通知地面的流动哨，将那人逮捕，并押送到北门卫兵所审讯。那人既不暴露身份，又不说偷看车上物品的动机，日本宪兵气急败坏，将其按进附近的露天厕所里，一边往他嘴里灌粪汤，一边审问。可是他仍什么也不说，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他被用粪汤灌死了。在场的日本宪兵都知道，那人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地下工作者。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4年冬。那是一天下午5点多钟，七三一部队的警备人员在四方楼附近发现5名行动可疑的人。经讯问，他们说是劳工，可是他们谁也说不出在哪个班干活。这时，正是劳工下工时间，警备人员逼他们跪在北门卫兵所旁边，并问每个过来的劳工："谁认识这几个人？认出的就放掉。"劳工们谁也不认识他们，只好带着无能为力的表情离去。

警备人员审讯他们，他们谁也不说话。凶残的日本宪兵从卫

兵所里拿出一把烧红的炉勾子，往他们头上烫，并且把两个躲闪的人铡死了。接着，又用三楞胶皮鞭子抽打另外3个人，不一会，他们也都奄奄一息了。斋藤悔恨地说："当时，中国抗日地下工作者混进七三一部队营区里进行活动，也是常有的事。那两起事件，虽然他们都不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很显然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侦探人员。按照七三一部队的本意，是将他们押进特设监狱里，当作实验材料使用，但他们是被明抓的，不宜采取那种方法，只好当着劳工的面把他们处死。"

1945年，正当苏联红军向德国法西斯反攻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也节节失利。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命石井四郎（已晋升为中将军衔），重返老巢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也感到末日来临，精神异常紧张。他在拼命制造细菌武器的同时，命令"协防班"要"反侦探"，加强防范，主要是防止中共地下组织刺探他们的秘密。

从1941年夏七三一部队宪兵室的春日翻译官为了向哈尔滨宪兵队交差，把第一次发现的信号弹称为"火球事件"，受到上司的训斥。可此后的4年里，年年都发现几次信号弹，共发现了十多次，然而，就是抓不到肇事者。为此，春日也很恼火。

1942年8月中旬一天晚上，在七三一部队北面上空出现了信号弹，担任值勤的田村良雄等日本雇员，接到命令后，窜到一个村子里，企图通过查户口的办法搜捕打信号的人，但一无所得。临走时，为了出气，竟用枪托把一名45岁的男人腰部打伤。同年秋天，为了查明一起"火球事件"，派出几名"协防班"人员，由中国人翻译李初亭带队赶到瓦盆窑屯外蹲坑，直至半夜也没发现可疑的人。他们到屯长朱学孟家搜索，其势凶凶地按户口簿查

对人口，发现两名长工没有在册，于是，以政治嫌疑犯的名义把他们带到劳务班拘留所。经过审查，他们和“火球事件”无关。1944年2月，在正黄旗五屯北边又发现了“火球”。七三一部队派出宪兵西尾带队，到正黄旗五屯的海城劳工棚里搜查了1个多小时。为了交差，他们把两名劳工当作可疑分子带回宪兵室。他们明明知道这两名劳工不是放信号的人，竟将其打死了。

7月的一天晚上，黄恩东等4名协防班成员，根据七三一部队宪兵室的安排，在东乡宿舍事务所里值宿。半夜时分，黄恩东透过西窗，突然发现在高等官宿舍西部上空升起了3颗信号弹，往东南方向滑落。于是，他用电话向宪兵室春日翻译官报告。此时，春日正为连续发生“火球事件”而一筹莫展。这是因为几起“火球事件”都没侦破，哈尔滨宪兵队指示七三一部队宪兵室，如果再发现信号弹并不能破案，要按军法处置。于是，他接到黄恩东的报告后，立刻派出两批搜捕队，自己也骑上摩托车赶赴出事地点。天明时，他们从干草堆里搜出两个人，经审讯，结果还是与打信号弹无关。由于春日不敢再向上报告“火球事件”，就对此事隐瞒不报，不了了之。

二、在安达靶场的拚搏

1942年冬，七三一部队在安达实验场进行一次鼠疫菌传染试验，目的是准备把装有鼠疫菌的炸弹投下去，观察鼠疫菌在冬季的传染效果。30多名被试验对象用汽车从平房运来后，被分别绑在用冰冻住的木桩上。当七三一部队的实验人员撤退300米远的地方观察时，突然发现一个被试验者挣脱了绳绑。开始，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接着，他们看到被试验者由1变2，由2变4，再由

4变8地四处奔逃的时候，才明白过来。于是，日军指挥官下令用汽车追杀。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逃跑的被试验对象被机枪射死；有的被汽车碾死。最后，七三一部队队员匆忙把尸体装上车，返回哈尔滨。由于当时忙乱，没来得及检查尸体数目，到了七三一部队本部时才发现少了一具尸体。他们没敢报告北野部队长，又悄悄地开一辆汽车回去找，费了很大劲，转遍整个实验场，也没找到，只好把那29具尸体偷偷地送进焚尸炉火化了。

对日本这次失败了的实验和被实验对象的拼死抗争，鞠家窑的人虽然不清楚，但他们看到，从哈尔滨方向开来了几辆大汽车，日本人一下车后就把实验场封锁了。可是，不一会儿，就看到汽车在实验场东闯西窜，还听到一片枪声，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半天，汽车都开回哈尔滨去了。解除戒严后，人们惊奇地看到被白雪复盖的草原上，到处是汽车轮印，纵横交错，乱七八糟，不少地方还残留着一片片血迹。

这一事件，后来，一名参加了这次试验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予以了证实。

1943年初夏，鞠家窑的农民关占和在安达实验场附近的草原上放羊，突然在机场西南1华里的草丛里，发现一具人尸。这人衣着褴褛，袖筒的肘弯处有一块用口袋布缝补着的补丁，胳膊上有枪伤，透过衣袖都是模糊的凝固的血迹，尸体散发着腐臭味。关占和不知道这具尸体是从哪来的，但他想到去年冬天发生的事，很可能与日本人在这里搞的实验有关。其实，这正是七三一部队没找回的那具尸体。

三、监狱里的斗争

在“特别监狱”里，反细菌实验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被抓进七三一部队秘密监狱里的中共党员、爱国志士以及苏联红军战士，运用巧妙的斗争方法，英勇无畏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原七三一部队监狱的看守人员说：每当把染有细菌的饭食送进监号以后，“囚犯”们没有一个去吃；当一个新押犯人进入监号时，其它监号就知道新被押进的人的姓名、经历以及被逮捕的经过；在一个监号准备挑选“实验材料”时，全监狱就不约而同地绝食，表示抗议。事后，日本看守到各个监号进行严格检查，根本发现不了“囚犯”们相互联络的办法。据现在还活着的原监狱看守人员说：“当把领头闹事的人通过一次性的实验处死以后，各监号的联络讯息始终没断。”①

这种反细菌实验的斗争不是自发的。我们从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材料里得知，监狱里确实存在着有组织的反细菌实验的秘密活动。在押的牡丹江铁路员工孙朝山、木工吴殿兴、修理工朱之盈、大连的钟民慈和奉天（沈阳）的爱国者王瑛之所以能留下姓名，就是因为他们是进行绝食斗争的带头人。他们的行动就是在监狱里的某些人引导下进行的。他们知道，从被秘密押进这座监狱那天起，就意味着被判处了死刑；驯服顺从也根本换不来刽子手的“恩赐”；而公开闹事不过是加快死亡的进程。因此，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方法。

在监狱里，斗争此伏彼起。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去，又一批人

① 据《恶魔的饱食》第一部（修订本）。

站起来。山东籍的崔德恩，原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先关押在哈尔滨宪兵队的刑讯室里，因他不畏严刑拷打，保守党的机密，被特别输送到七三一部队的监狱里。日本侵略者对他多次反复地进行细菌实验，他几次昏迷过去，每次醒来后都坚持揭露日本侵略者用细菌杀人的罪行。他的行动对难友们教育，影响很大。日寇在毫无办法时，把他秘密杀害。他在壮烈牺牲前怒斥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将来要向你们讨还血债的！"

1945年夏天，七三一部队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对监狱看管得更严、更紧了。然而，监狱里的反细菌战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经过准备的一场战斗开始了。

这天上午，越狱的一切准备就绪。日本看守人员要把74号难友押出去作细菌试验。当牢门打开后，74号难友突然甩掉事先打开的手铐。他抢下门栓，把日本看守打倒在地，拿起钥匙，沿着走廊跑去，打开几个囚室，一部分被拘禁的人冲出了牢房。这时，日本卫兵发觉，采取了紧急措施，立刻关闭了走廊和地下道出入口的铁门，四方楼内则高处的窗户上都架上了机枪，并进行射击，越狱者一个又一个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监狱。在伯力军事法庭上，当法官问到监狱内所拘禁的那些预备进行实验的人是顺从的接受实验呢，还是有过反抗的事情时，受审的日本细菌战犯堀田证实：1945年夏天，目黑曾请我到他那个实验室内去作客，他说："监狱里的'犯人'进行过抵抗。我经过三楼到监狱里去，看到房顶上有两个人手持步枪，从上面看守监狱，他们都是特务队人员。当我走到那里时，监狱里已经恢复了平静。这些勇敢分子都被枪毙了。"①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案判材料》，第403页。

1988年夏天，两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忆起七三一部队当时为毁灭罪证而把最后在押的“囚犯”秘密处死的情况。他们是在七三一部队败退之前临时被抽调出来担任营区警卫任务的。其中，一个是警卫队长，一个是警卫队员。

那个队员回忆了他目睹的一件事。那是1945年8月11日，他和另一名队员在本部大楼门前值勤。担任留守队长的太田大佐突然发出命令，让他们俩人立即赶到特别监狱去，执行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当他们赶到特别监狱门口时，已有10余名队员等在那里。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被用毒气杀害的“囚犯”尸体拖到室外去。指挥这次行动的是特别班班长细谷（即石井刚男）少佐。当他们俩人冲进一间牢房的时候，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堵墙壁上有两条用鲜血写成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字虽然歪歪扭扭，但刚劲有力，墙根处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中国人。他怒容满面，右手仅剩下的半截手指还滴着鲜血。他们明白，这个中国人在被害死之前，把右手指掐断，用左手挤压出右胳膊上的血忍着极大的疼痛写了这么多的字。他们俩人被这位坚强的革命者的斗争精神所感动。

战后，这两个队员回到了日本。40多年来，这位中国革命者的英勇不屈的高大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败 逃 前 后

一、开始钻防空洞

在七三一部队盘踞平房不久，就驱使大批中国劳工为他们修筑防空设施，不仅建筑物有地下室，而且还有室外的防空壕（洞）。

早在1939年，七三一部队的建筑工程进入结尾阶段时，他们就计划挖掘一条从已迁屯的刘家窝堡经正黄旗五屯，最后至正黄旗头屯长达5公里长的防护壕，作为“外围防线”。这是一项较大的工程。他们从平房附近村屯强征了200多名劳工进行挖掘。工程要求极为严格，规格必须是上口宽5米、下口宽4米、深4米；每个劳工一天必须完成10立方米的土方量。因此，不少强壮劳动力被累倒。

三年以后，七三一部队又在正黄旗头屯东的一个高岗向东挖掘一条3米半高、3米宽的地下洞，并用木料支撑洞内的侧壁和洞顶。动工后，逼迫工人实行“三班倒”。为了保密，在洞口挡上苇席，不许外部人接近，外部的人只能看到劳工们从洞口往外推土的情形。

以上这两项工程都没有最后完成。防护壕工程中途停顿了，地洞只掘进100多米，就随着七三一部队的败退而停工。

七三一部队内部范围的防空壕（洞），是从1944年开始挖掘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激烈地进行。在欧洲战场上，苏军的反

攻已经开始，法西斯德国在苏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美、英军队从法国登陆后，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太地区的军民对日本侵略军也进行了局部反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军预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于是，它在进行垂死挣扎的同时，极力加强防御措施。七三一部队，也不再抽调人员到南洋前线去作战，大部分人员与设备分散到各支队的同时，加强了本部的防御，修筑防空设施，命令所属的士兵把挖掘防空洞当作重要任务。特别是进入1945年后，更加紧了防空壕（洞）的挖掘，从营区到东乡村，到处都是防空壕（洞），空袭警报也不绝于耳，防空演习频繁地进行，七三一部队里里外外都显出了空虚、恐慌和紧张。

8月9日晚，在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哈尔滨市区的上空被照明弹照得通亮，七三一部队也慌慌张张地采取了灯火管制，并要求夜班的中国劳工转入地下。此后，连续几天，整个部队作了防空袭的准备。8月14日晚，苏军飞机开始空袭，他们象老鼠一样钻进了地下洞。当时，阴雨连绵，地下洞里积满了一尺多深的水，他们不得不把脚插进积水里，凉得刺骨；蚊子也钻进洞里往他们身上叮咬。熬过一个多小时，等出来时吓得个个浑身直冒冷汗，往日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不见了。

当时，不少人还看到七三一部队各个班的日本人经常往三家子屯西的一片防空洞里钻。这地方的防空设施，是在不久前日本人自己动手秘密修筑的。在迁至新址的东乡日本小学校西边，他们也秘密地修筑了大片的防空洞（壕）。第一仓库和第二仓库的两个大院里，都迫使中国劳工修筑了防空壕。拥有发电室、锅炉房和给水室的“动力班”是七三一部队的大动脉，他们在这里修筑了能容纳几百人的几个防空洞；与此同时，还迫使几百名劳工

在航空班飞机滑行道旁边挖了飞机掩体。

二、貌似强大的表演

七三一部队濒临灭亡的时刻，强打着“武士道精神”、摆出貌似“强大”的架式。平房的街道上出现了这种情形：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刚从中国人面前过去，不一会，又有一队士兵杀气腾腾地走来。细心的中国人一眼就能看破，后队的人和前队的人长的是一个模样。原来，他们是在显示阵容。由于就那么点兵，只好过去后，马上更换服装，再走一次。他们演这样的滑稽剧，更加暴露胆怯的心理。其实这是日寇惯用的伎俩。也是在那时，七三一部队航空班的停机坪上突然摆满了数十架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这是劳务班白武斌等几名劳工在修理飞机库的铁瓦盖时，亲眼看到的。它使人们疑惑：航空班本来只有11架飞机，怎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第二天，他们又发现停机坪上只剩下几架飞机了。

过了几天，劳工们发现停机坪上的飞机经常发生变化，不是由少到多，就是由多变少。这个迷不久就被揭开了，原来日本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的“强大”和“雄厚”，弄来些飞机模型摆在那里。光复不久，人们在七三一部队附近的空军八三七二部队的仓库里发现了这些飞机模型。

三、销毁罪证

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前的半个月，整个七三一部队处于内紧外松的状态。中国劳工看到，他们行动匆忙，精神紧张，在背着中国劳工干些什么勾当；对劳工的管制也有些放松了；那

些曾耀武扬威的雇员和士兵们却一反常态地萎靡不振，并唉声叹气地发起愁来；甚至有时吞吞吐吐地对中国劳工说，我们要走了，你们也要快回家了，那时，中国人当“掌柜”的，日本人“苦力”的干活。中国劳工从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这些情绪中，觉察到日本侵略者即将垮台的预兆。

就在这时，在七三一部队的从事细菌战的骨干人物更处在慌乱之中。他们一方面纠集先遣人员，向通化转移，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清理文件、资料，并分别打成捆、装上箱，用汽车或马车，不停地往动力班锅炉房运送。已经停火的暖气锅炉又开动起来了。每当满载资料、文件的汽车或马车到来的时候，即把中国劳工撵得远远的，由日本人亲自把成箱成捆文件、资料扛到二楼，从投料口扬进正在燃烧着的炉膛里，并一直监视着，到烧光时才肯离开。动力班中国劳工韩建国就曾看到日本人用汽车往锅炉房拉东西，把各式各样的纸张、不同规格的木头箱子都投进锅炉里烧了。他在下面给收拾灰烬，日本人站在旁边监视，发现没烧尽的纸张，他们就拿到楼上重新去烧。由于焚烧的文件、资料太多，两台锅炉烧不完。于是，他们又把那座不经常使用的锅炉也开动起来。据中国劳工证实，日本人还把一些贵重的仪器和装菌的玻璃瓶、试管也打上包装，扔到炉膛里焚之一尽。七三一部队这样大规模地焚烧文件、物品就连续进行了半个多月。

8月10日晚上开始，七三一部队各个班的院内也都成了火海，成堆成堆的文件资料扔进火堆化为灰烬。一个个日本兵被烟熏火燎变成了“黑花脸”。他们尽管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还是烧不完，于是，就不得不把数百台精密的显微镜等贵重仪器摔碎；大量的一般性资料，无法顾及，任其飞散。八木班北边的场院里，

原来为破坏中国或苏联的农作物而准备的三大堆黑穗病的麦秸也被点着了，大火照红了半边天。山口班贮存的大量细菌瓷弹壳，全部转移200米以外的地方砸碎。

与此同时，“四方楼”的院内更是浓烟滚滚，散发出一股扑鼻的腥臭味。原来，那两座“特别监狱”里还监押着没来得及使用的活人“实验材料”，这对七三一部队来说，是更为要害的罪证。由于“实验材料”达400人之多，所以，他们采取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手段。他们为了加快速度，争取时间，使用了速效能的毒气，在不到几分钟时间就把这些“囚犯”置于死地。在他们施放毒气的时候，有的“囚犯”拚命地挣扎，甚至冲出铁制栅栏。但是，残暴的日本恶魔们开枪向手无寸铁的“囚犯”们疯狂扫射。然后，这些刽子手们把尸体拖进早已备好的大坑内，浇上汽油焚尸灭迹、由于尸体太多，摆了几层；加上他们逃跑心切，短时间内未烧透便匆忙地用土把尸体埋上。七三一部队的头目们觉得不彻底灭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于是，又下令把尸体再挖出来，进行第二次焚烧。一个在场的日本士兵在自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状：“许多尸体没有烧透，尸体漫出土坑，还有许多尸体，无法处理了。……一些烧得半生不熟的烂肉，和到处烧得糜烂的脏腑，简直叫人无法收拾。还有，仍带着象活人的眼球，烧剩下的半张脸，……碎骨烂肉裹着血污，满地都是！使我精神麻木了，就象疯子一样失去了知觉。有些尸骨和陈列室里摆放的细菌实验的标本还装上汽车，在夜里，运到50里外的松花江边，偷偷地投入江中。

据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贞夫证实，除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所有被关押在“特别监狱”的中国人外，对在日本战败前被抓进七三一部队并认为已经不再需要的中国人，还用注射氰酸化

合物的方法毒死了一大批。他就曾在下雨天的夜晚用汽车把装尸骨的袋子运到松花江边，投进江里，一次就运了50袋。

七三一部队列入破坏计划内的建筑物有“细菌实验中心”——四方楼、监押“囚犯”的“特别监狱”以及研制细菌武器的“兵器班”、装配与贮存细菌弹的“山口班”、培殖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田中班”和为细菌实验服务的“动物饲养班”，“航空班”和“动力班”的建筑。于是，自从8月10日中午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撤退命令后，对这些建筑物陆续开始破坏。据目击者证实，他们对这些建筑物破坏方法是，轰炸、爆破和焚烧，或兼而用之。

当时，由于整个七三一部队里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谁也记不清日本鬼子破坏建筑物的准确日期，据大多数目击者追忆，8月11日开始放火烧毁田中班昆虫饲养舍和石井班动物饲养舍。“兵器班”大院里，百余辆福特牌大卡车和炮车被烈火吞噬着，成箱的有毒子弹爆豆似地响着；“东乡村”的日本官兵楼舍以及大礼堂、神社等也燃起了大火；高等官宿舍西部地下的百余个燃料罐，先是一片火海，随即连声巨响，最后只剩下一片深坑了。

对重要建筑物的破坏措施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8月13日早晨，潘义明、李起余、王子余、侯安钦等中国劳工从正黄旗三屯到正黄旗五屯的“劳务班”去上工，当路过正黄旗头屯的时候，他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往东南一看，高大的“四方楼”塌了一大片，它的上空有一股滚滚的烟尘。他们改变了去劳务班的想法，从正黄旗头屯向南走，当临近设有电网的围墙西侧时，就又听到一阵爆炸声。他们看到高等官宿舍、日本小学校、东乡神社淹没在一片浓烟中。

“四方楼”等一些建筑物都是钢筋水泥导制的，普通炸弹难以破坏。8月14日上午，七三一部队在“航空班”飞机库旁架起数门大炮，连连向“动力班”锅炉房炮击，但大烟囱只遭到轻微的损伤。这种破坏效果，是七三一部队早已预料到的。于是，他们求援于工兵部队在“四方楼”、“特别监狱”等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地下室内，开凿放置炸药的槽孔。然而，这十分困难。他们不得不马马虎虎地装上黄色烈性炸药，进行第二次爆破。

七三一部队在毁灭各种罪证的同时，充当门卫的保机队员，奉命放弃了对大门的看守，转向了对营区内外的昼夜巡逻。他们个个凶相毕露，见人就打，还没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劳工有的也被他们枪杀了。

四、杀人灭口

石井四郎认为，七三一部队有2000余名队员及其家属，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和那些比较知情的中国翻译，在七三一部队溃败之后，如何防止泄露七三一部队的秘密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困难的问题。为此，石井四郎在8月10日晚召开各部部长紧急会议，决定杀人灭口。石井四郎主张迫使全体队员及其家属服毒自杀；对中国人毫不客气地全部杀掉。他的这个主张遭到了各个部长的反对。首先反对石井四郎主张的是第一部部长菊池少将。他认为，对第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应采取积极措施，设法营救回国，不宜让他们轻易地死去；至于对待中国人另作别论，但也不必采取一概处死的办法，因为还有用着他们的时候。一向飞扬跋扈的石井四郎，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中，第一次采纳了下级

的意见。

石井四郎等人杀人灭口的计划，首先选择的对象是几个中国籍的日语翻译，因为他们对第七三一部队的秘密知道的更多一些，留下来将会给日本带来后患。可是，有些中国翻译早有警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了。唯独与宪兵室的春日中一是拜把兄弟的李初亭没跑。他以为危难当头，日本人不致于背信弃义对他下毒手。然而，他错打了算盘。8月11日清晨，春日中一和劳务班头目工藤，带着上司的密令乘坐中国马车夫赶的"斗子车"去找李初亭。"斗子车刚上去正黄旗五屯的土包，遇到装满箱箱柜柜、锅碗瓢盆一类家俱和鼓鼓三条麻袋的两辆花轱辘马车迎面驶来。春日让马车停下，用中国话问：你们给谁搬家？车老板回答给李先生。于是，他立即放走了搬家的马车，催促着"斗子车"直奔屯内十字路口旁的李初亭家。李初亭迎出来后，春日用中国话说：石井部队长请他去一趟，有要事商量。

李初亭在春日陪同下，坐着"斗子车"来到本部大楼门前。春日让车夫稍等一下，然后和李初亭一起进了大院。不一会，春日出来对马车夫说："不要等李先生了，他已经坐飞机去了东京当坐卧不安的的李初亭的老婆孙爱珍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种可怕的念头使她嚎淘大哭起来。一个小时后，从"四方楼"里传出了连声巨响，使她更加意识到李初亭不会来了。李初亭果然没有回来。后来得知，他被日本人杀死了。这件事，被一个曾在七三一部队当过宪兵的人证实。原来，李初亭被骗至本部大院后，春日事先安排的人在暗处用枪把他击毙，并从他腕上撸下金壳手表。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一是日本侵略者的阴险、狡诈、毒辣，

当它需要你的时候，便装出一副亲善的面孔；当不需要你，甚至于它不利的时候，便毫不留情，下毒手加以除掉。二是“走狗烹”，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五、借机报复

七三一部队干完了毁灭罪证的勾当后，一些高级头目、上层人物差不多都仓皇地逃命了，留下一些下级人员处理善后，并准备同运送最后一批日本人家属的列车一起离开这里。

8月14日，几个日本小头目在劳务班院里就地铺着苇席，拎着酒瓶狂饮。其中有个叫加藤的雇员对菊池雇员说：“那天我打了你，感到很对不起。如果当时潘德亮不告你的‘状’，我是不会打你的。”当时是麦收季节，菊池到仓库领镰刀。第二仓库的中国劳工小队长潘德亮按加藤的要求把旧镰刀给菊池，菊池不同意，硬是把新镰刀拿走了。当加藤发现新镰刀少了的时候，潘德亮就把菊池拿新镰刀的事如实地讲了。因此，菊池挨了加藤的打。这时又有个叫“秋叶”的雇员也旧事重提。他也是因为在潘德亮没同意的情况下穿走了一双水靴子，加藤知道后责备了他。于是，菊池和秋叶就把仇恨都集中到了潘德亮身上。他们拾起战刀，走出大院，遇上了潘德亮，秋叶抡起战刀一下子把潘德亮的双手削掉、潘德亮忍痛跑到劳务班办公室，想找加藤论理，加藤却随手掏出手枪。潘德亮见势不妙，回身逃跑。当他跑到铁匠炉旁时，被加藤追上，一枪打倒，但没打死。这时，秋叶赶来，一刀从潘德亮的肩膀斜劈下去。赶车老板吴帮昌目睹了这一惨景。

日寇在失败之时，无端杀人，发泄兽性，对此，许多中国劳工早有预料。所以在此之前，不少人趁其不备，逃出了虎口。

但在要害岗位上的劳工，由于日本人看管得很严而无法逃脱。8月14日，四方楼爆炸后，这些劳工也都千方百计逃出魔窟。这时，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到各班去一看，一个劳工都没有了。

六、乱作一团

七三一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忙乱地做着逃跑的准备。

当时，平房火车站通知七三一部队去接收从外地发运来的一车“大眼贼”（黄鼠）。他们已顾及不了这些事了，管事的日本军官说：“真他妈的，没事干！”随即把电话摔了。8月13日，铁路专用线上甩进了一列闷罐货车，日本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集中几十名中国劳工，追使他们往火车上装上大米、白面、豆瓣酱、酱油、白糖、罐头和一些衣物，甚至还有备用的铁管，锅炉等物资。

这天下午，日军的家属挤到“酒保”内的小卖部抢购逃跑时用的必需品。高等官、判任官、雇员及教育部食堂里，都在准备食品。据王世友、鞠复家、韩建成等人证实，训练教育部的头目不许做饭的中国劳工离开，命令加班给他们赶蒸馒头。因为做的数量大，面来不及发酵就做，蒸出来的馒头都是硬的。

这时，七三一部队的营区里更是乱了套。后半夜里，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们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窜来窜去；教育队的学员，忙着整理行装，闹得乌烟瘴气；东乡宿舍里，吵杂声、漫骂声、哭嚎声连成一片；医院里的轻患者，不顾病痛奔回宿舍准备逃离，有的重患者，躺在病床上，看着床头上的一小瓶氰化钾流泪，有的在绝望地哭嚎；路上，日本妇女肩扛行李，手拎包袱或扯着小孩，鬼哭狼嚎地涌向铁路专用线，一窝蜂似地往闷罐车上

拥挤，有的为争夺一块立足之地而当仁不让，甚至吵骂起来，昔日那种温文尔雅、谦谦让让、彬彬有礼的样子已抛到九霄云外。事先制定的乘车计划、按部门分配车厢，统统没有人去管它，整趟列车挤得满满的。第一趟货车延续了几个小时后，总算是匆忙地开出了平房站。从这天开始，连续发出了几列火车，但是还有些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和家属挤不上车。此时，就是上了车，抢到座的雇员也大骂起他们的上司和本部的那些高级官员。原来，石井四郎一伙曾下令把航空班的大部分飞机烧毁，仅留下的两架运输机载着他们的家眷早已逃之夭夭了。其中，石井四郎坐的那架飞机，由他的女婿增田义穗少佐亲自驾驶。那些坐不着飞机，又挤不上火车的日本女人，顾不得地上的泥水，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地放声大哭起来；有的日本人看实在无法逃走，只好另找活路；还有些下级官兵在地下室、仓库里自尽了。光复后，人们在这些地方，曾发现了 3 名尉官尸体。

七、树倒猢狲散

七三一部队自顾不暇的时候，远离它的各支队也是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了。

当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林口第一六二支队的时候，它们立刻乱了营，捕捉的老鼠和饲养的白鼠、海猫、兔子、跳蚤以及培养保存的细菌也无法送交七三一部队本部了。

它根据驻屯地司令部的通报得知苏联红旗第一军的坦克部队追近八面通（林口南50公里，牡丹江东北80公里）时，决定将所有房屋塞满稻草、备足燃烧用的汽油；将乌斯浑河水源地的抽水机筒砸碎；间所少尉以下25名官兵和汽车 5 辆，作为后队暂时留

守待命。

8月10，榊原秀夫率领200人和50辆汽车（包括滤水车、消毒车各一辆）向牡丹江溃逃。此前，他命令留守队接到七三一命令时立即烧毁营舍，然后追赶大队；如果苏军迫近林口还未接到上级指令时，亦应及时焚烧。结果，第二天，留守队就将房屋、设备以及各种动物都烧毁后奔逃了。一六二支队逃跑时。携带着两套器材，共66捆包。其中有“小型蒸气灭菌器4具、干热灭菌器6具、小型孵卵器6具、大型孵卵器2具、培养皿1000个、试管1000支、显微镜80台、小型蒸气灭菌锅1个、石井式培养器1000个、蛋白消化素3.8吨、寒天7吨、压缩肉或肉汁3.7吨、食盐1吨和乙、丙、丁、戊型滤水器各10具，还有必备的粮食、枪弹等；携带的细菌有：保存培养的霍乱菌5管、伤寒菌4管、A型副伤寒菌4管、B型副伤寒菌10管和生产的霍乱菌1000管又100个培养皿、伤寒菌120管、A型副伤寒菌100管。经过龙爪附近的高湿地带时，行车困难，要在苏军战车进攻前到达牡丹江是不可能的。于是，8月10日晚，榊原秀夫命令支队庶务室机要员奥村军曹带领两名护卫兵，携带机密文件，由龙爪乘火车送往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本部。他们所带的文件有：关东军密码解读书、1945年度动员计划（各支队向新设师团防疫给水部调动基干人员的分担区分表）和关东军参谋部编纂的林口、东安、虎林的兵要地志、1943年7月七三一部队对各师团防疫站给水部长进行特殊防疫教育时分发的文件，还有细菌战的概念、毒物简易检查法等机密资料。

8月12日，逃跑的一六二支队到达七星时、苏军战车队已迫近牡丹江。这时，他们不得不将卡车和器材一并烧毁。8月13日，在东安师团长的指挥下，一六二支队人员分乘两列火车向牡

丹江逃去，但由于傍晚在桦林遭到苏军的攻击，队员四散，翌日集结了70名。榊原命令队员以10人为一组突围，由于苏军狙击，榊原和森军曹以及一名士兵掉队，于8月17日到横道河子。在这种情况下，榊原和牡丹江支队尾上少佐会面，并一起到牡丹江日军第五军司令部。军医部长佐藤少将转告他，七三一部队来电，命令一六二支队配属于第三军，今其速去延吉听从该军的指示。于是，榊原和集结在横道河子的70名队员，乘上了经由哈尔滨去延吉的火车，但火车只走一站就无法开动，他们只好徒步奔逃，最后，因走头无路不得不在一面坡解散了。

驻扎在海林镇北的第六四三支队，在8月9日晚接到了七三一部队本部昆虫动物研究班长田中少佐给尾上正男支队长的电话，要求火速把跳蚤发送到总部去。但由于形势紧张，他们只想逃命，根本顾不得发送跳蚤。8月13日，他们焚烧营舍时，把各种动物及跳蚤一并烧毁。北野政次于年初批准拨给他们的总重量为三车及75吨的细菌生产设备和蛋白消化素、肉精、肉汁及煮盐等材料，大部分都没用上，也都烧毁在仓库里。他们与一六二支队沿着一条路线，仓皇往西逃窜，大部分人战死。

第六七三支队支队长西俊英中佐从平房返回孙吴后，企图与驻地日军一起退至大兴安岭林中，以便作垂死挣扎。为了销毁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证、8月11日，由大熊带领4名日本兵，急忙把营舍、住宅、动物舍、设备、材料和各种文件等统统地烧掉了。为同样目的，在逃跑之前，给支队全体人员每人发一份毒药，以便在有被俘危险时服毒自尽。后来，这些队员并没按西俊英中佐的旨意办，大部分在败退的途中接受了苏军的劝降，只有一人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8 月11日，苏军飞机轰炸海拉尔。日军开始慌乱。他们想把关押在五四三支队附近第十军管区军法处监狱里准备用做细菌试验的人杀死，但没有得逞，10名苏联人从浓烟烈火中冲了出去。8 月 13日，五四三支队奉命把营舍、实验室、动物舍以及所有设备、材料和重要资料付之一炬，然后，四处逃窜。

遗留的罪孽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七三一部队肆无忌惮地大量制造细菌武器，惨绝人寰地用活人作试验，在中国各地使用细菌武器，残杀人民。尤为可恨的是在它垮台之时，继续干着灭绝人性的罪恶勾当，把自已生产的烈性传染病菌撒布出去，给中国人民造成长期难以根治的遗害。实践证明，凡是有日军细菌部队活动的地方，解放后都发生了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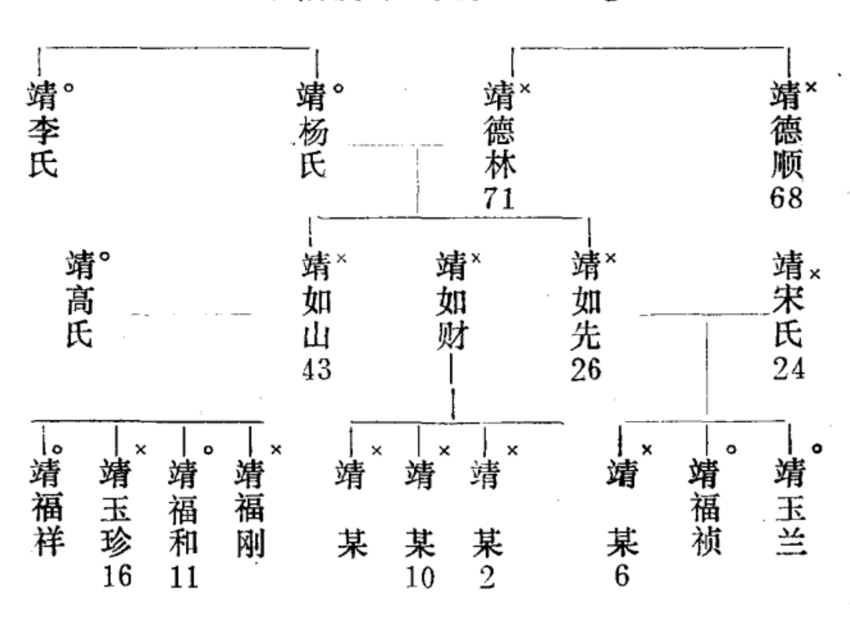
一、平房的又一次灾难和哈尔滨疫区的形成

1946年9月，平房地区人民迎来了哈尔滨解放后的第一个金色的秋天。他们正在准备收割即将成熟的庄稼。这时，祸从天降，后二道沟屯、义发源屯和东井子屯，发生了从来没有过的“窝子病”，疫情象决堤的洪水蔓延开来，暴死的现象接连发生，人们哭嚎连天。

这种厉害的传染病实际在6月份就开始发生了。后二道沟的张彦廷，当时44岁，身强力壮。那天，他到野地割草，身上被跳蚤咬了许多包。回家后，就头晕、高烧，接着腋窝处起了疙瘩，越来越大，痛苦难忍，没过两天的时间就死去了。年轻的村民靖如先去帮助办丧事，回到家后大腿根部起个包，没过两天也死了。靖如先的死，给他家带来了更大的不幸，全家19人，有12人传染了瘟疫，先后都离开了人世。从此，瘟疫在全屯迅猛地蔓延

开来。

死于鼠疫的靖福和一家人①



①此表根据靖福和记忆制作，°表示生存；×表示死于鼠疫传染病；数字系靖福和记忆的1946年当时的年龄。

与此同时，瘟疫在东井子屯和义发源屯都相继蔓延，几乎天天有人死，家家闻哭声，悲惨至极。

东井子屯李海新家有4人，瘟疫一来，妻子和两个孩子陆续受传染而死。李玉恒家12口人，仅7天就死亡6人。刘喜之家的父母和姐姐都先后病死，仅剩下他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生活无依无靠，本屯的好心人郭良昆收养了他们。

在义发源屯，当时刚刚30岁的刘佟氏，晚上突然得病，折腾了半夜，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她的尸体没来得及掩埋，其丈夫刘相坤也被传染发病死去了，只剩下不满1周岁的刘忠及其年过

花甲的老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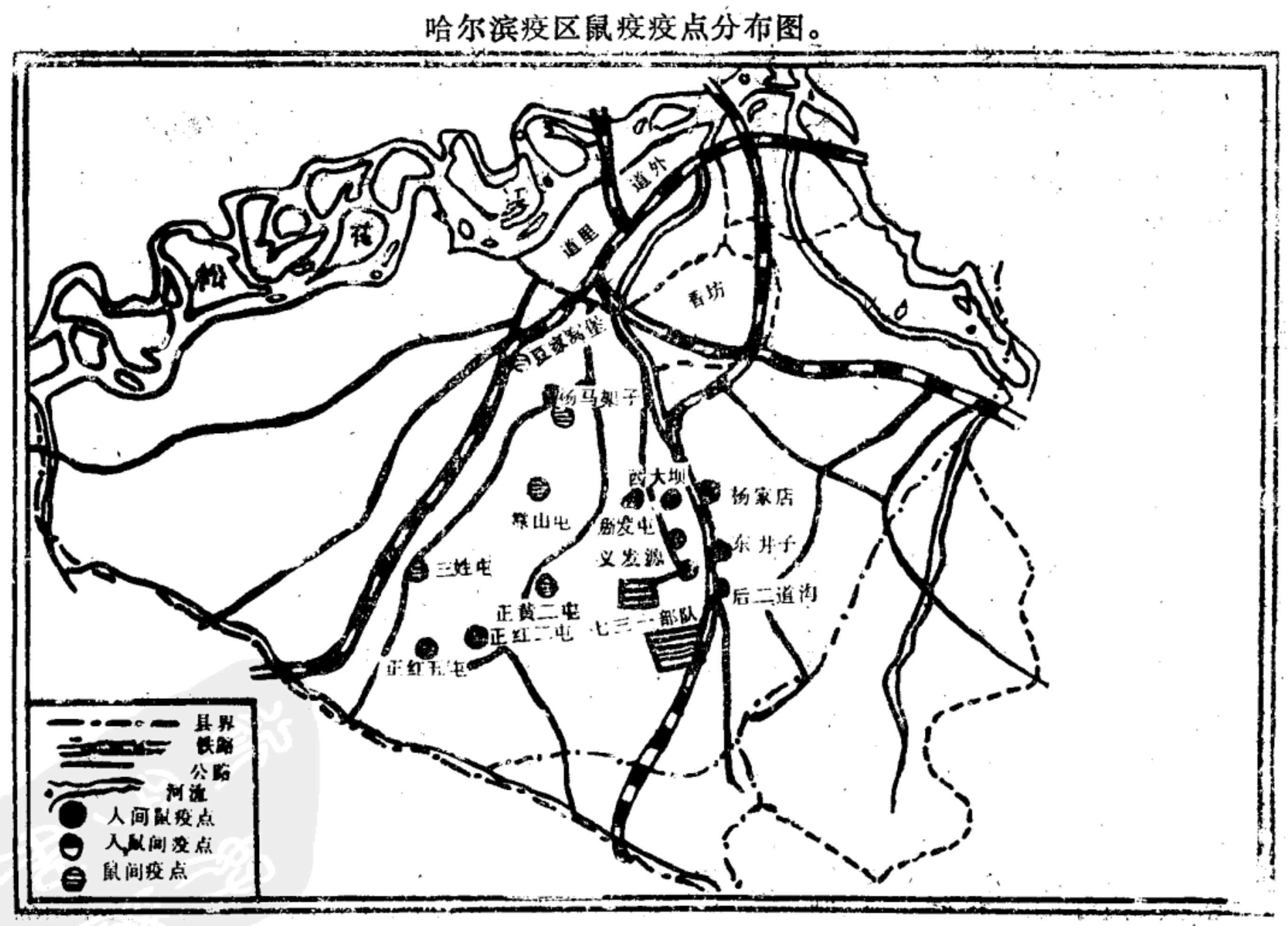
义发源屯死于鼠疫灾害一览表

户主姓名	一户人数	死亡姓名	年龄	死亡姓名	年龄	死亡姓名	年龄	死亡姓名	年龄
刘玉堂	6	刘相坤	36	刘佟氏	34	刘柱子	8		
杨梼高	4	本　人	25	杨翠云	19				
王殿明	5	王姜氏	44	王东才	7	王领弟	3		
高德升	6	高德胜	44	高淑琴	12				
陈守义	1	本　人	54	宋代子	18				
赵凤荣	10	赵桂琴	14	韩桂琴	14				
刘　江	2	刘百岁	5	刘志肥	11				
杨　春	2	本　人	41						
王殿选	9	王荆候	51	高　绿	30				
王老头	5	王孙氏	42	王的儿子	18	王小兰	17	王的儿子	5
赵凤乔	8	赵桂兰	12	赵桂英	14	赵小四	6		
陈万均	4	陈于氏	30	陈永富	15				
于学孟	2	老于太太	61						
陈万良	8	妻	32						
王守达	7	本　人	39	王凤琴	5				
赵凤翔	2	赵汝升	21	张喜坤	21				
林张氏	2	林桂芝	16						
温树德	6	温小子	12						
张治民	4	张桑氏	38	小　肥	5				
张炳春	10	张范氏	27						
王　才	1	本　人	23						

仅以上三个屯中，因瘟疫死亡的就有 103 人，其中后二道沟42人，义发源39人，东井子38人。

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这次瘟疫病的原因，笼统称之为“窝子病”。

哈尔滨疫区鼠疫疫点分布图。



就在瘟疫猖獗蔓延的紧急关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及时派来了防病医疗队。崔其盛、赵成林教授通过病体切片镜检，发现了鼠疫菌株，从而断定这场瘟疫是一场鼠疫传染病。防疫医疗队员不顾个人安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们一方面对患者进行救护治疗，一方面组织灭鼠、灭蚤活动。由于措施得力，加之当时连下40天大雨的有利条件，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扑灭了鼠疫。在防疫灾病的过程中，防疫人员对人民极端热情、高度负责，受到疫区人民的爱戴。有一位姓张的农民，由于被鼠疫折磨，已经奄奄一息，全家悲痛万分。卫生防疫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抢救，当这位老农民起死回生的时候，含着热泪，无比感激地说："日本侵略者要用细菌杀我们，而党和政府派来的防疫医疗队抢救我们，真是天地之别。不仅救了我一家，而且救了我们全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

鼠疫，也称黑死病，病原体是在鼠身上发病的一种杆菌。某些啮齿动物如黄鼠、土拨鼠等感染这种病后，再由跳蚤传入人体，从而发生人间鼠疫。当鼠疫菌蚤叮咬人体时，便发生腺鼠疫和皮肤鼠疫。同时，鼠疫菌还可以通过空气传入人的呼吸器官，致使发生肺鼠疫。这三个村屯被传染的患者就是这几种症状。

鼠疫研究专家认为平房并不是鼠疫自然源地，日军七三一部队侵占之前从未发生过鼠疫，而在解放后却意外地发生鼠疫，很可能和一个人为的疫源有关。因此，进行了疫源调查。

日本投降后不久，在平房附近的一些村屯里，黄鼠、灰白鼠突然多了起来，它们曾把一片片黄豆地的豆夹全部啃光。特别是还发现了大量的在中国东北从来没见到的白鼠。据动物学家鉴定，白鼠是实验动物。不少在石井部队（即七三一部队）当过劳

工的人，看到这种白鼠后，认定它正是“石井班”大量饲养过的那种白鼠，其鼠种是从日本运来的。同时还发现跳蚤也异常的多。

据在七三一部队当过劳工的郑喜祥、陈方东等人证实，这些鼠类和跳蚤是七三一部队在逃跑前有意放出来的。

1945年8月12日早晨，七三一部队的营区内呈现出撤退前一片慌乱景象。改换了军用工作服的动物饲养班长石井三男技师在动物舍前几个日本人跟随其后。他声嘶力竭地喊叫中国劳工集合。当时，由于大部分劳工都跑了，所以，才勉强把没来得及逃跑的十几名劳工聚集到一起。石井三男把两个劳工编成一组，再派一个日本人当监工；给每组发了装满汽油的铁桶，然后命令他们把汽油泼在动物舍上，再引火点燃。顿时，动物舍火光四起，浓烟滚滚，各种动物被烧得哇哇乱叫，有的马、骆驼拚命地挣脱出来；当烧到鼠舍和跳蚤饲养室的时候，那里的房门已洞开，里边的老鼠和跳蚤有的被烧死，有从打开门的笼子里和张开封口的容器里跳了出来。石井三男看着把房舍点燃后，带着惊恐的神情，急忙离开了现场。劳工张文俊，不仅看见各种老鼠窜来窜去，而且还发现成堆的跳蚤从开了盖的瓷罐里往外蹦。他们怕被跳蚤叮咬，也躲得很远。

关于这次鼠疫的起因，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还做了一个重要的交待。他说，七三一部队曾经苦心地研制出一种特效能的鼠疫菌投掷器，它是由玻璃制成的，管状10厘米长，直经为5厘米粗，落地即碎。他们把研制的鼠疫干菌装进去，加以密封，放在菌苗地下贮藏室内备用。这种“细菌武器”的有效期六、七年。七三一部队撤退之前，他奉命将这种“鼠疫菌投掷器”在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和义发源屯各投掷一枚。

七三一部队放出染菌的鼠、蚤和投掷“鼠疫菌投掷器”都是导致鼠疫流行的病源。这两种情况说明，这场灾难是七三一部队直接造成的。然而，它留下的罪孽还不止于此。更为严重的是，它制造并形成了一个“哈尔滨疫区”。

据历史资料记载哈尔滨地区虽有人间鼠疫流行，但都是外地传入的，属于输入性的流行。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前夕，七三一部队把大批染疫的鼠、蚤四处扩散，污染了平房及其周围地区，最后鼠疫疫源固着下来，并不断引起人间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形成了哈尔滨疫区。①

哈尔滨疫区自1946至1954年间，共发生鼠疫6次，患者200多人，死亡100多人。其中，当地原发性鼠疫患者100余人；由外地传入者2次，发病数十人。

二、给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患

七三一部队不仅在哈尔滨，而且在它所到的东北和华中许多地方，也都留下了发生细菌传染病的后患。

由于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经常利用安达特别实验场进行各种细菌的实验，致使鞠家窑一带的中国居民解放后还有不少人患脓肿，经检验是炭疽菌传染所致。七三一部队逃跑时，把安达特别实验场的建筑物全部烧毁，却用心极为险恶的留下了28匹马和50头牛。当地中国农民没加防备，把它们牵回去使用，结果，不仅这些牛马在很短的时期内病死，而且传染了大批其他牲畜，甚至使这一带地方连续几年都发生大面积的牛瘟，牛大量的死亡。

①中共黑龙江省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黑龙江省卫生宣传教育所：《地方病防治》（1985年，内部出版），第462页。

他们还别有用心的留下了大约10万斤的染上鼻疽菌的大麦饲料和新鲜猪肉。当时，老百姓深知日本侵略者是不会发善心的，因而有所提防，先让狗吃猪肉，结果，狗被药死了。

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1945年8月中旬，日军在逃跑之前，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兴安医院，把鼠疫菌撒在扔下的白面、大米等食物上，后来中国人误食了它，发生了鼠疫传染。这次鼠疫逐步蔓延，整整持续了一年多。据当时的目击者杨春证实：1945年9月15日，我老婆(当年24岁)得了一种传染病。起初发高烧，最后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就死亡了。经市里来的医疗队检查，认定是"百斯笃"病传染而死的。大夫让我看她的大腿根部，一边凸起一个象鸡蛋大小发红色的疙瘩。他还说：在王爷庙镇北大利根那地方有一蒙族人家，1946年冬得了'百斯笃'传染病，先后死了13口人，最小的仅10多岁，还有老头和老太太。他们有的死在炕上，有的爬到炕沿、地上而死去了，当时情景十分悲惨。这是我领着防疫队去那里亲眼看到的。①蒙古族老人木斯来扎布也证实说："在东北光复后几天，王爷庙发生了鼠疫传染病。得这种病的人，大腿根部和胳肢窝处长大红疙瘩。病情很严重，有的在一天内死亡，也有隔两三天后死去的。在东街，这种病特别盛行，有的一家仅剩下几口人，有不少全家死亡。"刘立本老人还说："1946年秋天，我的亲属王世荣家3口人都得了'百斯笃'病，他和其老婆折腾两三天就死了，只剩下他的12岁小女孩。后来我把这孩子养大成人"。

为了控制鼠疫蔓延，当地民主政府成立了防疫医疗队；苏联红军也给予大力支持成立了防疫司令部，由一名中校军医负责。

①《东北日报》，1950年2月12日。

防疫队员都穿着防疫服，戴着防毒面具，进行防疫救护。他们一方面把鼠疫患者隔离起来给予治疗，一方面在疫区消毒，终于战胜了鼠疫。

在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驻地附近的七星泡村、古城镇一带，解放后也连年发生人间疫病和牛瘟。

据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范说："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撒放带菌的鼠、蚤，1946年和1947年的两年内，在哈尔滨、长春、通辽、乾安、扶余、热河各地区，猖獗的鼠疫同时并发。1947年东北的鼠疫患者达3万人之多，仅通辽一地就死亡12000余人。热河、乾安、扶余等疫区各死亡1000余人"。①

华中地区也遭受了七三一部队等日军细菌部队的遗害。据新华社报道，1941年4月和以后的1946年、1947年，衢州曾三度遭受鼠疫侵袭，被鼠疫传染而死亡的人数共达201人。①

① 《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

历史的余波

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彻底失败而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怪胎七三一部队也已寿终正寝，不复存在了。作为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史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活动和七三一部队的阴魂未散，在战后新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想借尸还魂。于是，围绕着它的国际斗争又此伏彼起，成为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的延续。

一、东京国际审判前后美国对日本细菌战活动的庇护与利用

根据波茨坦公告，1946年2月，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处理日本战犯的主要机关，归驻日盟军总部管辖，审判国为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9个同盟国，即中、苏、英、美、法、荷、澳、加、新、再加上印、菲等11国，其代表，由盟军总司令任命。与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同时工作的还有国际检察局，它也属盟军司令部所辖机构，负责对日本战犯的检察，由11名检察官组成，并经盟军总司令任命。这样，由于盟军总司令部为美国独占；盟军最高统帅有对战犯减刑之权；检察长又系美国代表，所以，远东国际法庭和国际检察局完全被美国所控制和操纵。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使东京远东国际审判带有不公平性，特别是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逃脱了审判。其中，日本军队主要是七三一部队

的细菌战罪恶活动被免究责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

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就发现了日本准备细菌战。1943年4月，美国在华盛顿郊外的弗雷德里克建设戴特里克临时站，开始细菌战的研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了日军七三一部队和石井四郎其人。1945年8月下旬，美国的细菌专家M·桑得斯中校就到日本调查日军细菌战情况。他回国后由其同事A·T·汤普森继续调查。1945年秋，负责调查石井四郎和七三一部队的美国第二参谋部为了单独和抢先得到日本细菌部队最新研究成果，决定采取许诺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战犯责任的方针。于是，该部长C·A·威洛比少将和桑得斯科去会见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时，威洛比提出："要弄清七三一部队的情况，只有保证不把他们作为战犯追究，进展方能顺利。"麦克阿瑟接受了这个提议。实际上，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战犯责任的方针。1946年1月，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部发现并拘留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也乘美军飞机从上海回到日本。这时，国际检察局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结果是不准审问。所以，在1946年4月29日，在国际检察局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中无论何处都没有提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当然，在东京审判中，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也没有成为审理对象。因此，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荷兰审判官B·V·A·雷林克在1983年召开的东京审判问题国际讨论会上说："美国这样做是企图用卑鄙的手段获取这些耗费了巨额资金、牺牲数千人生命才得到的罪恶的实验成果。这样，实验结果便以不控告当事者为条件转交给美国，而犯罪的事实便在东京审判中不为人知地被一笔勾销了。"

美国之所以抢先得到或独占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的资料，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即有关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实验以及细菌战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然是美军一个优先的任务。因此，它对这些资料的提供是以不危及美国的安全，不损害美国同友好国家的关系，不降低美国的优先地位为前提的，甚至特别规定，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允许，有关科学和武器的研究、开发资料，不得让英国以外的国家看到。所以，它不允许在东京审判这样公开场合揭露日本细菌战。对此，国际审判法庭和国际检察局是知道的。因此，尽管在后来的东京审判过程中，检察局第二任侦查科长洛伊L·摩根提供了审 问 原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证词，萨顿也曾出人意料的揭露了南京一六四四部队罪行，但主审官的态度 冷 淡，均 被 束之高阁，不予追究。从1946年5月3日开庭，迄 1948 年 4 月 16 日休庭止，历时将近两年，人称“人生有尽时，法庭无限长”的东京审判就这样结束了。

东京审判后，美国帝国主义仍一意孤行，继续包庇和利用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据电通社1950年2月5日讯，在马里兰州底特雷齐营工作的科学家们说，该营正在从日本的一个研究所接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细菌战研究的报告。这个日本研究所是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在东京附近山区里成立的，其中有以前日本细菌战专家组成，并以石井四郎为首脑。除石井四郎外，日本大批细菌战犯不仅同样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继续在日本各机关和学院中任职。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领导和组织进行细菌战活动的笠原幸雄伪装“樱花”化装店老板，逍遥 法 外。1950年 夏，日 本

《真相》杂志第40期发表题为“细菌部队的雇员继续在日本活跃”一文中披露：北野政次为“中村”研究所所长、山内忠茂任“兴和”化学药品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河山善为庆应大学教授、吉村寿人为京都医学院教授、笠原四郎为木户里传染病研究院组长、冈本光三和凑正雄都为京都医学院教授、田部井一为兵库县医学院教授，林一郎为长崎医学院教授、二木秀夫为日本出版公司董事长。等等。

二、苏联滨海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对日本细菌战活动的公开揭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之间开始“冷战”。1947年1月，苏联就七三一部队问题通过国际检察局与美国第二参谋部威洛比联系，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等3名七三一部队骨干分子，被美国拒绝，苏美之间顿起风波。于是，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独自把拘留在苏联的12名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提交伯力滨海军事法庭。经审判，山田乙三、高桥隆笃，梶塚龙二等被判处徒刑。对此，东京国际法庭检察长基南等人公然为他们辩护。1950年2月3日，苏联政府因在伯力审判中证明日本天皇裕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竹雄等5人是在准备和实施反对人类的细菌战的主要战犯，特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建议委托特别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讯，又为美国国务院所拒绝。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苏联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它的公布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成为查证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活动的重要开端。

三、中国对日本细菌战活动的严正谴责与沈阳审判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部队开始乃至在宁波、浙赣铁路沿线地区投散细菌，进行细菌战争，就已被中国人民发现并采取了各种形式予以揭露。40年代末至50年代，在《东北日报》、《人民日报》上，通过大量的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细菌战活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严正谴责。1956年6月19日，在沈阳又对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长榊原秀夫的细菌战罪行进行了审判。当年的中国劳工还在法庭上作证，使日本细菌战犯不得不低头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监押的日本战犯中，有一个个头很高、罗锅腰、满脸络腮胡子的日本人。据掌握，他曾在细菌部队服役，是个佐级军官。但他编造说自己在日军师团里当普通士兵，他从不供认罪行。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曾在林口一六二支队当过劳工的张清林拿着鼠笼和装跳蚤的铝盒作证。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正是林口一六二支队长榊原秀夫。审判长指着张清林问榊原秀夫："你认识这个人吗？"榊原秀夫露出惊慌的目光，吞吞吐吐地说："不认识"。张清林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扒了皮可认识你骨头。你能否认少佐支队长的身份吗？你能否认领导制造细菌杀人武器吗？"并愤怒地举起榊原秀夫等人曾用过的鼠笼和装跳蚤的容器，揭露了他们为七三一本部养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罪行。接着，审判长审问榊原秀夫："把老鼠送往的哈尔滨本部，是指什么地方？""平房的七三一部队本部。""老鼠的用途是什么？""培殖跳蚤，进而进行细菌传染。"榊原秀夫终于在人证、物证面前认了罪。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在中

国历史上，对侵略战争中犯下血腥罪行的外国战犯进行审判，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民反对细菌战争的庄严表示。

四、否认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历史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当年，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残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罪行，有目共睹，并已载入国际的史册。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受害国人民记忆犹新，深恶痛绝。一些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日本细菌战犯有的直言不讳，供认自己违反人类的道义；有的痛心忏悔，深刻反省；还有的抱着将功补过的心情，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然而，也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势力成员以及受蒙蔽较深的日本人，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留恋所谓“保卫祖国”的口号和“屹立在北满的原野上，守卫着帝国的生命线”，“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是对日本天皇的忠诚之类”的赞歌，他们先后成立了什么“精魂会”、“房友会”、“波空会”等右翼团体，经常纠集在一起，怀念旧情，公开地美化、鼓吹军国主义。1981年6月1日在名古屋召开的“房友会第九次大会”以及同年9月5日在倍州美原温泉宾馆召开的“关东军七三一部队战友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就是不光彩的例证。他们吹捧说：“我石井部队的精兵在诺门罕及命运攸关的南线作战中，功勋卓著”，并为战死者和死亡者默祷。在战友会上，有人提出要修建赞颂已死的石井四郎的“威德”纪念碑。出尔反尔、自食其果的原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还给这个会发来贺电。在会前，他们在秘密发行的《房友》刊物第六十五期的卷末，印有“回忆歌集”特刊，发表有《关东军之歌》、《战友》、《依靠腰间的军刀》等七首歌曲，大肆宣扬“我们的精

锐，威武浩荡，盟邦的百姓，福泰安康，光荣啊，关东军”①。他们对自己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毫无痛悔感，对七三一部队的内幕和自己的那段经历不敢公布于世。当富于正义感、有良心的人站出来揭露七三一部队的秘密的时候，他们极端不满，甚至公开指责、谩骂。

战后，在日本，总是有那么一股反对中日友好的势力在兴风作浪；40多年来，日本重新崛起，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又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这就使一部分不接受发动侵略战争而惨败教训的军国主义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又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于是，通过修改教科书；发出推翻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日本战争罪行正义审判的喧嚣；拍摄鼓吹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一类的反动影片；参拜供奉有军国主义分子牌位的靖国神社，策划修改宪法等等，不断掀起篡改日本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浪。原七三一部队的一些的行为，正是与这股逆流遥相呼应的。日本的这股反动势力虽然在中日关系中不是主流，但这是一种破坏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危害世界和平的非常危险的动向。

五、正义的呼声

在日本，企图隐瞒甚至篡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人，只是少数；他们的行径根本代表不了日本人民的意愿。无数事实证明，日本人民积极主张同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真诚友好下去，并对日本的右翼势力所作所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就

①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第一部

是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也不仅对自己的那段历史表示忏悔，而且还主张从中吸取教训，希望这种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这种正义的心声，反映了日本广大人民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强信念。

早在50年代，一位亲身参加过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日本青年化名秋山浩，不怕一些人的围攻，勇敢地挥笔著书，带头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并用细菌武器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与此同时，许多参加侵华战争的人都站了出来，对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杀人的罪行加以揭露和抨击。1978年7月19日，以国友俊太郎为团长的“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友好访华团到哈尔滨平房参观七三一部队的罪证遗址。他们对过去参加侵华战争表示悔恨。其中，一位曾经当过东安县宪兵队长的成员，对自己批准把中国抗日地下工作者送往石井细菌部队一事表示检讨，并为中国死难者致哀和敬献花束。一个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的队员悲痛地说：“当时我充当了用细菌杀人的帮凶，这个心灵上的伤疤用什么也弥补不了。只好用加强日中友好的行动来赎罪了。”1981年8月2日，日本东京都星火产业株式会社派出的友好访华团，前来平房访问并参观七三一部队罪证遗址。该团团长石川士郎先生希望把这些遗址、遗迹保护起来，作为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教育场所。他说：“这个细菌工厂的旧址，对教育日本青年一代，使他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使日中两国永不再战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该公社遵照石川士郎先生的意愿，每年派出一批由青年社员参加的“阶级教育旅行访中团”到七三一部队遗址接受教育，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来访的日本青年说：“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吸取

教训，为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

反对、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意愿。1982年以来，到中国参观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到1990年底，参观的外国友人人数就达到1000余批（次），6000余人，大多数是来自日本的，也有来自朝鲜、美国、英国、巴基斯坦、捷克、西德、意大利、苏联、奥地利、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些参观者，有当年被迫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人，有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妇女、学生、新闻工作者，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还有归国观光的港、澳、台胞和华侨。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先生在下里正树先生的配合下，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反映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恶魔的饱食》以及该书的续集，对日中两国人民影响很大。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说："读完这本书后，我命令自己：把它放在眼前！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反面的教员，以免人再次堕落为魔鬼的弟子。”日本大映电影公司将要把书的内容搬上银幕之前，准备担任导演的山本萨夫写道："最近，文部省提出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这是不要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告诉不知道战争的一代。战争把人变成了集体的恶魔。我之所以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山本萨夫先生不幸逝世，但他一语中的，认识是是可贵的，夙愿也将会实现。

在"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森村诚一先生为了进一步收集七三一部队罪行可靠的证据，专程来哈尔滨平房访问，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是富有正义感，尊重历史的作家。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森村诚一先生误用几幅与七三一部队关系不大的照

片，攻击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恶毒诽谤，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一书，并以此达到否认七三一部队罪行的卑劣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森村诚一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继续进行调查。他说："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的七三一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在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平基石上添上一块小小的石头。"这样，森村先生又把所得到的材料用于《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为"和平基石"增加了强度。他回国后不久，反映受害者见证的《恶魔的饱食》第三部就问世了。

1982年8月13日，在东京涩谷举办的"争取和平的战争资料展览会"，以未公开的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照片和实物，向人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残暴罪行，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一位中年妇女对记者说："这明明是侵略，是犯罪，事实胜于雄辩。"①

在日本，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七三一部队的惨无人道罪行的原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中，有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他打破了长期的沉默，在"争取和平的战争资料展览会"的展览厅旁的一个大房间里，向各界观众揭露七三一部队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②事后，越贞夫又把当时所见所闻写成《日本国旗鲜红的眼泪》一书，公开发表。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不明真象，参加"七三一部队第一次战友会"后不满地说："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有谁还跟着太阳旗和军神跑？参加这样的战友会，只是极少数的。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本意是不要再进行战争了。七三一部队已经被历史埋藏了，

①② 《北京日报》，1982年8月15日.

不能让军神再次苏醒。”①

从1981年开始，日本大阪和京都的一些和平友好团体分别联合举办“为了和平，反对战争”展览会，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欢迎。1987年以后，中国提供的七三一部队罪证实物和资料，开始在展厅里陈列，使参观者骤增。“大阪战争展实行委员会”事务局长小森先生在回答对此不理解的日本人时说：“战争是不长眼睛的，不仅使被害国人民遭到灾难，而且也给我们侵略国的人民带来灾难。做为日本人只讲自己受害，不讲侵略的后果，能够了解战争的根源吗？如果不谈侵略战争，那么反对战争又能从何谈起呢！”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大搞细菌战的罪行，引起世界人民的愤慨。1981年10月，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题为“历史被隐瞒的一章”的长篇文章，详尽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和美国同日本细菌战犯之间的交易。鲍威尔原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1953年返美。此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以他曾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载过新华社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报道为名，罗织“煽动叛乱”罪和“叛国”罪对他起诉，使其受到长达七年之久的审讯。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又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对日本进行细菌战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将其成果发表。由于该文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俘当作细菌战的实验品而被活活弄死的问题，威廉尔的文章为美国各大报纸和通讯社所引述。1982年4月，哥伦比亚广播中心的著名电视评论员莫利·赛弗尔访问了他，并将这次采访在极有影响的“六十分钟”节目

①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

中播出。

※　　　※　　　※

综观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史，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是和军国主义分子石井四郎的狂热鼓吹、积极活动分不开的。因此，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死有余辜。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事实，这一切绝不止是石井四郎一个人的罪孽。它也是与日本的历史和社会分不开的。它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与反人类、反道义的德国法西斯同流合污的产物，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侵略政策的产物。

当时，在日本，石井四郎的支持者、同谋者何止是一个、二个，据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说："关于石井机关的创立之事，是在陆军省内，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医务局长等人知道，在关东军中，则只有小矶参谋长和我所知的机密而又机密的事项，而且只准许我直接和石井秘密接头并与中央联系。"① 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的远藤三郎也说，他"从前任石原莞尔大佐处接受命令，已命石井军医正在极密中进行细菌的研究，故请多加关照的嘱托"。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本，天皇是最高统帅。天皇是通过他命令设置的并直属于他的，以陆军参谋总长为首的陆军参谋本部和以海军军令部总长为首的海军军令部为掌管具体军务的机关来统帅军队的，也就是说，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根据天皇的命令制定作战计划和有关统帅军队的各项规定、命令草案，然后报告天皇，一经天皇批准就作为天皇的命令下达海陆军省、部队司令官以及其他陆海军机关执行。七三一部队的产生、发展以及重

①《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

大的细菌战活动也是在天皇的敕令下进行的。因此，天皇对于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责任是不容置疑的。在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复活的情况下，“澄清天皇裕仁在1931年—1945年战争中的责任，不单单是个追究过去责任的问题，这是在当前反对军国主义再起的斗争中，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重要的任务”。①

①〔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第207页。

附录一

有关七三一部队历史大事年表

1931年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向北大营中国军队和沈阳城进攻，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 石井四郎主张开发细菌武器，得到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的支持。

22日 关东军制订《满蒙问题解决方策案》，拟在东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亲日傀儡政权。

12月13日 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犬养毅内阁组成。

16日 关东军指令满铁修筑拉滨线铁路。

31日 苏联政府向日本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

2月5日 关东军侵入哈尔滨、

3月1日 伪满洲国成立。

12日 日本内阁通过《满蒙处理方案要纲》。

5月15日 “五·一五”事件，犬养首相被暗杀。

26日 日本斋藤内阁成立。

8月 日军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防疫研究室。

9月15日 日本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日满议定书》签订。

10月30日 关东军司令部迁至长春。

12月13日 日本政府复函苏联政府，提出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时机尚未成熟。

年底 石井四郎晋升为军医中佐。

1933年

年初 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

8月 日军在哈尔滨市宣化街和文庙街一带密设石井细菌研究所（石井部队），密称“加茂部队”。并在背荫河建立附属细菌工厂。

12月16日 拉滨线铁路通车，平房站设立。

1934年

9月 背荫河细菌工厂发生监狱暴动事件。

1935年

2月 伪满大陆科学院成立。

8月 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大佐被杀。

1936年

2月26日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

3月6日 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南次郎离任，植田谦吉继任。

9日 日本广田内阁成立。

8月 日本天皇敕令陆军参谋本部在中国东北地区重建两支细菌部队，即哈尔滨平房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和长春孟家屯的“关东军兽类防疫部”——若松部队。

1937年

2月2日 日本林内阁成立。

6月4日 日本近卫内阁成立。

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8月13日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

1938年

6月30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建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训令。

9月 石井部队工程建筑基本完成；强行将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迁走；正黄旗五屯变成“劳工村”。同时，“加茂部队”设备全部迁至平房，加茂部队营址改为石井部队的第三部。

▲日本在齐齐哈尔设立“满洲第五一六部队”。

▲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事务所成立。

1939年

5月12日 日本关东军向苏、蒙军发动进攻，诺门罕事件爆发。

22日 德、日、意军事同盟在柏林签定。

6月23日（6月23日——10月上旬） 石井部队参与诺门罕战争，派出以碇常重少佐为首的“敢死队”在哈拉哈河投撒细菌。石井部队的参战人员30多人丧命。

8月30日 日本阿部信行内阁成立。

9月1日 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3日　英、法对德宣战。

7日　梅津美治郎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

▲　石井部队启用"东乡部队"匿名。

▲　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令，日伪军警宪特等开始向石井部队"特别输送"活人为细菌实验材料。

▲　石井部队成立劳务班。

▲　五一六部队在佳木斯分设"三岛理化研究所"。

▲　侵华日军在北平设立"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华北军防疫给水部），在南京建立"'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华中军防疫给水部），在广州建立"'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华南军防疫给水部），在新加坡建立南方防疫给水部。

▲　侵华日军在28个师团部队中设立防疫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

1940年

1月16日　日本米内光政内阁成立。

5月　在华中宁波一带进行细菌战。

9月　意大利对英、法宣战。

7月22日　日本近卫第二次内阁成立。

26日　关东军发布第659号甲号作战命令。

夏　长春、农安发生鼠疫，石井部队前去进行"疫情调查"。

8月22日　石井部队对外正式启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名

称，本部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总务、教育、器材和诊疗等8个部，并计划在中国东北适当位置设立支部（支队）。

9月27日　《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10月　日军飞机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投撒了大量染菌小麦，不久，该地传染病流行。

12月2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和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的命令，石井部队设立牡丹江（海林）支队、林口支队、孙吴支队，和海拉尔支队。

▲　平房石井部队附近的新五屯发生霍乱传染病。

1941年

4月13日　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6月22日　德国进攻苏联。

7月　日本近卫第三次内阁成立。

2日　日本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开始。

夏　石井部队组成以太田澄大佐为首40至50人的远征队，在常德进行细菌战。

8月　石井部队变更番号。石井部队与若松部队合称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石井部队平房本部称"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牡丹江支队为"满洲第六四三部队"，孙吴支队为"满洲第六七三部队"，林口支队为"满洲第一六二部队"，海拉尔支队为"满洲第五四三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为"满洲第三一九部队"。

10月18日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 七三一部队在中国劳工中建立劳务大队、中队、小队。

▲ 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香坊保护院成立，它成为向七三一部队输送被实验人员的转运站。

▲ 七三一部队在安达建立特别实验场。

12月8日 日本对美、英、荷兰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

4月 七三一部队宪兵室在劳工组织中成立"协同防谍班"（简称"协防班"）。

6月—7月 七三一部队远征队与一六四四部队配合，将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传染病细菌散布在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中心的区域。

7月 北野政次接任石井四郎的七三一部队长的职务；石井四郎担任侵华日军第一军军医部长。

8月13日 浙赣作战日军退却时，石井四郎继续指挥七三一部队的100多人参加的远征队进行细菌战。

▲长春、农安再次发生鼠疫。

▲平房宪兵分遣队归哈尔滨宪兵队香坊分队领导。

1943年

2月 苏军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

4月 美国开始研究细菌战，在华盛顿郊外弗雷德里克建设戴特里克临时站。后来，扩大规模，改名为戴特里克永久站。

9月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12月 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事务所扩大；平房警察驻在所成立；平房宪兵分遣队改称派遣队，归哈尔滨宪兵队直接领导，七三一部队宪兵室也归哈尔滨宪兵队直接领导。

1944年

3月 日军发动对中国国民党战场的进攻。

春 苏军反击希特勒，中国解放区对侵华日军进行局部反攻。

6月 美、英军从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7月11日 山田乙三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兼驻“满”大使。

22日 日本小矶国昭内阁成立。

8月 平房附近的正黄旗四屯发生鼠疫。

秋 平房特别军事区域成立了“协防班”。

1945年

1月　七三一部队成立撤退留守处。

3月　石井四郎重任七三一部队长。

4月　七三一部队组织鼠疫特别攻击预备队。

5月　七三一部队改称二五二〇二部队。

2日　苏军攻克柏林。

5月8日　德国投降。

6月　香坊保护院在押的两名苏联人逃跑未遂。

八路军、新四军对侵华日军开展夏季攻势。

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暴动失败。

15日　大连卫生研究所成立鼠疫防疫队。

7月　七三一部队及其支队的重要设备向通化转移。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9日　苏军分三路进驻中国东北，反击侵华日军。

10日　中国抗日举行全国性大反攻；

七三一部队的太田澄大佐为队长的留守队开始工作；

七三一部队特别班石井刚男少佐根据石井四郎部队长的命令，组织力量杀害监狱里的人；

从即日开始，七三一部队全力以赴烧毁文件资料，砸毁仪器设备，烧炸建筑物；

从即日起到8月14日，七三一部队组织人员乘火车南逃。各支队也自行组织人员撤退；

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18日 七三一部队绝大部分人员逃回日本。

下旬 美国戴特里克临时站细菌学专家M·桑得斯中校调查日军进行细菌战情况，11月回国，写成《桑得斯报告》。

9月3日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东北解放，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北野政次从中国上海回日本。

10月11日 石井四郎从千叶县加茂地区的自己的住宅去若松町；

美军传讯原一六四四部队长增田知真。

11月 北野政次经常出入东大传染病研究所图书室。

1946年

1月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对敌情报部（CIC）发现并拘留石井四郎。

春 美军在若松町传讯石井四郎，同时在下北泽接触七三一部队干部。

秋 哈尔滨市平房地区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三个村屯发生鼠疫。

1947年

1月 苏联就七三一部队问题通过国际检察局与第二参谋部威洛比少将联系，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等七三一部队战犯，苏美之间顿起风波。

1949年

12月25日—30日 苏联滨海军事法庭审判12名七三一部队日本细菌战犯。

1950年

2月8日 苏联政府因在伯力审判中证明了裕仁天皇、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行雄五人是准备和进行反对人类的细菌战中起主导作用的战犯，特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建议委任特别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讯，为美国所拒绝。

▲以免于战犯起诉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等人向美国提供细菌研究资料。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莫斯科出版。

1952年

美国在侵略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1954年

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部分被俘的七三一部队队员受到审判。

1956年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不怕围攻，勇敢投笔著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9年

10月9日　石井四郎因患喉头癌死于东京。

1978年

7月19日　以国友俊太郎为团长的“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友好访华团参观原七三一部队罪证遗址，表示悔恨和检讨，并为中国死难者致哀。

1981年

10月　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报上发表了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长文，详尽地揭露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暴行和美日之间在细菌战研究上的肮脏交易。

1982年

8月13日　在日本东京涩谷举办的“争取和平的战争资料展览会”，以没公开的原七三一部队的照片和实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

▲年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原七三一部队遗址建立“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本年参观原七三一部队遗址的外国友人有21批108人。

9月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专程到原七三一部队遗址调查、访问。回国后不久，发表《恶魔的饱食》，在日本和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1983年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博士研究生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中发现原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两份报告书，一是《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是《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这是原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直接证据。是年8月15日日本《每日新闻》对此作了报导，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翌日，中国《人民日报》也作了报导。

参观原七三一部队遗址的外国友人有31批252人。他们有来自日本、朝鲜、美国、英国、巴基斯坦、捷克和斯洛伐克、德国、意大利、苏联、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

1985年

8月15日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正式对国内外开放。

▲ 本年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300人；中国参观人数达31437人，445个单位。

1986年

本年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470人；中国参观人数为9913人，179个单位。

1987年

本年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845人；中国参观人数为18613人，121个单位。

1988年

本年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1508人；中国参观人数为7306人，1085个单位。

1989年

本年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1133人；中国参观人数为14237人、940个单位。

1990年

本年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国友人达23个国家和地区的2162人；中国参观人数为14260人，1419个单位。自1978年迄1990年，中国参观人数达96466人，4189个单位。

附录二

日本参与细菌战活动人名录

（仅目前已知者）

裕仁天皇　是日本最高统治者，日军最高统帅。1901年4月29日生。1926年12月25日正式即位，改元昭和。在1931年—1945年的对外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其中，曾下达批准日本进行细菌战活动、建立和扩大七三一部队等敕令。1945年8月提出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新宪法，天皇由国家元首变为日本国象征，不再以最高统治者身份裁决国是。1989年病逝。

东条英机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甲级战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1884年12月30日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军阀家庭里。1935年9月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1937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6月任日本陆军次长，1940年7月晋升为陆军大臣，1941年10月任内阁首相。他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同时，也积极进行细菌战活动，对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与生产以及各支队的建立等问题都作过具体部署。日本战败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梅津美治郎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甲级战犯，1882年1月4日生于大分县。1934年—1936年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1936年—1938年任陆军次长，1939年—1944年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疯狂地烧杀、奸淫和掠夺。他把细菌战当作重要战略，曾多次批准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计划。1944年5月9日亲临七三

一部队视察。1944年7月任日军参谋本部总长,全面负责指挥侵略战争。日本战败投降时,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1949年1月10日患癌症死亡。

山田乙三 日本陆军大将,关东军司令官。1881年生于东京。从1944年任关东军司令官,直至日本投降。在此期间,曾领导所辖的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细菌武器生产能力,加速细菌实验和施用细菌武器。最后,逃往通化,被苏联红军俘虏,在滨海军事法庭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后转交中国,1956年被释放回国,1965年病死。

远藤三郎 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中将。1893年生于日本山形县,1922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副参谋长期间,曾参预石井部队细菌战活动。1946年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1953年以后经常发表反战文章,主张日中友好,积极参加日中友好活动,并任日中友好旧军人会长,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梶塚隆二 日本关东军医务部部长,军医中将。1888年生于田尻町城。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就鼓吹细菌战。在1936年任陆军省军医署科长时,主张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部队,并推荐石井四郎。1939年接任关东军医务部长后,曾亲临七三一部队视察,亲自指导七三一部队研究,制造细菌武器,并赞成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日本战败时,被苏军俘获,最后被滨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5年。

高桥隆笃 日本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1888年生于日本秋田郡百合县。化学家、生物学家。1941年至1945年8月任关东

军兽医部部长期间，曾直接领导"满洲第一〇〇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组织制造细菌武器，用各种烈性传染菌对活人进行残酷实验。日本战败时被苏军俘虏，在滨海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石井四郎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军医中将。1892年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后又攻读研究生，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被提升为少佐军官。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开始细菌战和细菌武器的研究。在日本天皇，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及其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创办了细菌战的研究机构，并使之不断扩大，发展成为石井部队，任部队长。1936年石井部队在哈尔滨市平房重建。此时，他晋升为大佐。由于在细菌战研究、实验上卓有成效，制造出石井式细菌培养器、土陶制细菌炸弹、滤水器等细菌武器，并大力发展细菌部队，疯狂进行细菌战争的罪恶活动而晋升为少将。后因涉嫌贪污军费问题，1942年7月被撤消了七三一部队长职务，调至侵华第一军担任军医部长，升为中将军衔。由于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形势不利，企图使用细菌战争，挽救失败的命运，所以，日军参谋本部于1945年3月又将他调回七三一部队，重任部队长。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他抢先逃命回国，隐居东京。不久，以提供细菌研究资料为条件，得到美国的庇护，逃脱了审判。1959年10月9日因患喉癌病死。

北野政次 曾用名北野政藏。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军医少将。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他也是热衷于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在任满洲医科大学教授期间就用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1942年8月接任七三一部队部队长职务后，更

疯狂地研制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活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时被俘，在美帝的庇护下，从上海战俘营回到日本。由于他向美军提供了细菌武器研究资料，也逃脱了审判。任“中村”研究所所长，隐度余生。

川岛清 日本关东军第五部队军医部部长、军医少将，1893年生于千叶县山武郡莲沼村。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医学博士。在七三一部队担任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期间，亲自领导繁殖大批致命的细菌，使用活人进行的细菌试验。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时被俘，并被苏联滨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5年，刑满后释放回国，度过残年。

佐藤俊二 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1896年生于爱知县，1923年毕业于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41年到1943年先后担任广州“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和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长，指挥并参加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活动。任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后，亲自指挥牡丹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和林口第一六二支队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和细菌战的准备的活动。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后，他在逃跑时被俘，并被滨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菊池×× 原七三一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军医少将。

太田澄 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兼第二部（细菌实验）部长，军医大佐。冈山医专毕业，医学博士。曾任广州“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和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长。在任七三一部队第二部部长期间，曾带领“远征队”去中国华中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在七三一部队撤退时，担任留守队队长。日本战败后逃回国，随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一起，向美国提

供细菌研究资料，得到美国的庇护，逃避了审判。

中留金藏 曾任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中佐。到任时，奉日军参谋本部之命，调查石井四郎贪污腐化案件。石井四郎重任七三一部队长后，利用权势，将他调至太平洋战场，使其不到一周时间就丧了命。

松村×× 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军医中佐。

村上隆口 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二部部长，军医中佐。

奥村×× 军医中佐，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三部代理部长后。

江口丰洁 原七三一部队第三部（防疫给水）部长，军医中佐。现住神奈川县川崎市，自办江口医院。

西俊英 原七三一部队训练教育部长兼孙吴第六七三支队长，军医中佐。1904年出生于鹿儿岛郡萨摩县通胁村。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从1943年起，亲自参加制造细菌武器和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等罪恶活动。任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长后，曾为七三一部队以及关东军各军事团防疫给水部培训从事细菌战的各类专业人员。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奉命回孙吴收拾残局，后被苏联红军俘虏，被滨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园田太郎 原七三一部队训练教育部长，军医大佐。现在芦屋市的一家病院担任院长。

大谷章 原七三一部队器材供应部长，少将。

永山太郎 原七三一部队医疗部长，军医大佐。曾以医疗为名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

田部井和 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军医中佐。现在兵库县立医科大学任细菌学教授。

碇常重 长崎医科大学毕业，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二部部长，军

医大佐。1939年夏季，带领七三一部队22名“敢死队”队员参加诺门罕战争。行前，他带头写血书。在日本关东军败退时，秘密往哈拉哈河里投撒细菌。

高桥××　庆应医大毕业。七三一部队总务部办公厅长，军医少佐。

山下××　七三一部队总务部人事课课长，少佐。

篠原××　七三一部队总务部庶务课课长，大尉。

田部××　七三一部队总务部计划课课长，军医中佐。

伊知地俊雄　七三一部队总务部调查课课长。现住熊本市大江町。

佐藤　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军需分部长，陆军少佐。

河野××　七三一部队“动力班”班长。

坂井××　七三一部队“运输班”班长。

工藤与四郎　日本退伍军人，日军参谋本部嘱托任七三一部队劳务班长。判任官。

关崗××　1940年由日本关东军调至七三一部队任劳务班主任，是工藤与四郎的助手。

石井刚男　化名细谷，石井四郎的二哥，七三一部队“特别班”——特设监狱管理班长，少佐。

石井三男　石井四郎的三哥，畜牧技师，七三一部队“石井班”—实验动物饲养班班长。

笠原四郎　庆应医科大学毕业，病理学博士。在七三一部队第一部担任“笠原班”——病毒研究班班长，专门研究“孙吴热”现住武藏野市，在北里研究所担任滤过性病毒研究部部长。

川上渐　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病理学博士，曾任庆应医科

大学教授。在七三一部队担任“川上班”——病理研究班班长。1943年冬病死。

凑正雄 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曾任讲师。在七三一部队任“凑班——赤痢研究班班长。

石川大刀雄丸 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病理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石川教授之子。参加七三一部队，担任“石川班”——病理研究班班长，多次进行活人解剖。后因厌恶细菌战活动，毅然脱离七三一部队回到日本。后在金泽医大任教授。

冈本耕造 七三一部队“冈本班”——病理研究班班长，后在东京大学任病理学教授。

田中英雄 七三一部队“田中班”——昆虫研究班班长，技师，专门研究鼠疫传染媒介物跳蚤。

吉村寿人 七三一部队“吉村班”——冻伤研究班班长，东京大学医学系毕业，病理学博士，技师，专门研究冻伤。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回国，担任日本南极考察队长，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

草味正夫 七三一部队草味班——毒物研究班班长，兼任大连卫生研究所（满洲第三一九部队）有机合成研究室室长。

篠田统 七三一部队“篠田班”——昆虫研究班班长，军医大尉，专门研究蚊子。1939年末调至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任“篠田队”（动物饲养）队长。

濑户川 七三一部队“濑户川班”——霍乱研究班班长，军医少佐。

平泽×× 七三一部队航空班班长，少佐。后战死。

增田美保 东京药专毕业，病理学博士。1939年参加七三一部

队，后为第二任航空班班长，军医少佐，石井四郎的女婿。七三一部队败退时，石井家族乘坐他驾驶的飞机抢先逃命。后任东京防卫大学教授。

八木泽行正 农业技师，七三一部队“八木班”——植物病毒研究班班长。后在东京都抗生物资协会事物所任职。

山口吾一 七三一部队“山口班”——细菌弹研究班班长，军医中佐。除研究细菌弹之外，还进行X线的研究。后转至陆军病院任院长。1943年8月调至林口一六二支队担任支队长。

柄泽十三夫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班班长，军医少佐。1911年出生于长野县丰里村，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他是制造细菌武器的积极组织者和进行细菌战的重要参加者，曾亲自领导繁殖细菌和参加对活人的细菌试验，同时参加远征队，在中国华中地区投撒细菌。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时逃跑被苏军俘获，后被滨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二木秀夫 医学博士，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二木班”——结核研究班班长。后任日本出版公司董事长、金泽医科大学细菌学教研室教授。

铃木启之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分部长，军医少佐。

三谷恒夫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干燥菌制造班班长，军医少佐。

田边邦男 庆应医大毕业。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训练教育部教育队队长。

早川清 东京大学毕业，专门从事细菌研究，医学博士。1939年参加七三一部队，不久晋升为军医中佐。后去过美国，并从南美回日本。

增田知真 东京大学毕业，医学博士。1939年参加七三一部队，军医中佐。

天辰良道 长崎药专毕业，理学博士，1939年参加七三一部队，药剂中佐。

林一郎 曾在七三一部队从事细菌研究，技师。后任长崎医科大学教授。

石光薰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从事细菌研究。

降 旗 北海道帝大毕业，传染病研究生。在七三一部队曾任军医大尉、少佐。

渡边道 熊本医专毕业，医学博士。1939 年参加七 三 一 部队，军医少佐。1940年在长春鼠疫调查中身染细菌死亡。

肥之藤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从事炭疽菌研究。

池田苗夫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曾用活人进行“黄弹”射击造成皮肤伤害、破伤风毒素及芽胞的实验。

荒木三郎 七三一部队陆军技师。

野崎幸雄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

田部××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

中黑××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

川岛三德 东京药专毕业，病理学博士。1939年参加七三一部队，药剂大尉。

江岛真平 七三一部队细菌研究人员。

山形风二 庆应大学医学系毕业，七三一部队军医大尉。

江田武一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技师。现住崎玉县川越市。

胡桃泽正帮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解剖技师。后在长野县从事农业。

田村良雄 又名贵宝院秋雄、百合好太郎，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被俘，监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释放回日本，在京都市自办贵宝院病院从业。

森×× 理学士，七三一部队昆虫技师。

河山善 医学博士，曾参加七三一部队，回日本后为庆应大学教授。

山内忠茂 七三一部队军医中佐，回日本后任"兴和"化学药品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

中马×× 日本陆军大尉，管辖"石井部队"背荫河实验场，因此，该实验场称为"中马场"。

冈本光三 曾参加七三一部队，回日本后为京都医学院教授。

田部井一 曾参加七三一部队，回日本后为兵库县医学院教授。

大泽×× 日本陆军外科医生，参加七三一部队，在吉村寿人指导下对活人进行冻伤试验。回国后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山下健次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雇员，技师。后在静冈县天龙市经营果子商店。

千田英男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人事干部。后为宫城县气仙沼市议会议员。

佐藤实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教官，大尉。

薮本勇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教官，少尉。

金田康志 七三一部队第一期少年队员。回日本后组织了"房友会"，任会长。

岛田正治 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曾在第一部"江岛班"参

与赤痢研究。七三一部队败逃前杀害“特别监狱”里的被关押的人后，他奉命往外拖运尸体。

堀口正夫 七三一部队“弹研班”技师，即制造氨瓶等玻璃制品，又制造玻璃细菌弹壳。

中込恒 七三一部队实验工作员，在参加施放细菌时，染菌而死。

松岛××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一分部细菌仓库主任。

安东清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尉。后为庆应医大细菌学讲师。

小林荣三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尉。后为庆应医大细菌学教授。

金泽谦 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七三一部队斑疹伤寒研究人员，后回日本。

小关重雄 1921年生，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

山下×× 七三一部队军医大尉。

远中××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教育助手。

小畑××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教育助手。

鹤 田 七三一部队“田中班”工作员，饲养跳蚤。1939年诺门罕战争爆发后，曾随“敢死队”到哈拉哈河投撒细菌。后调至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篠田队。

石桥 七三一部队特别班队员，管理监狱。

芦田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毒气防护研究人员，曾参与使用活人进行毒气实验。

熊本 1941年参加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卫生下士官。1942年10月调至关东军第二十八师团防疫给水部。1944年被派往冲绳。

森冈 1941年参加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后调至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卫生兵。1945年 8 月随支队逃跑，在大兴安岭被苏军俘

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后回日本。

沟渊 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后调至林口第一六二支队，教育助手。1945年3月参加七三一部队集训，结业后留在本部教育部担任助教。同年8月9日至14日参加本部留守队，担任警备指挥班班长。

油利 1945年初参加七三一部队，末期少年队员，被编入“特别攻击队”，同年8月根据2号作战命令，开赴前线。

户高 与油利经历相同。

森川 与油利经历相同。

春日中一 汉语翻译，判任官，1938年由哈尔滨宪兵司令部调入七三一部队宪兵室。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时，逃回日本。由于作恶多端。精神压力大而患半身不遂症，卧床不起。

卧床千守 1915年生。1938年由哈尔滨宪兵队司令部调到七三一部队宪兵室，任室长，曹长；1943年转至平房宪兵分遣队任队长；1944年调回哈尔滨宪兵队本部。

仓原一吾 1915年生。哈尔滨宪兵队特务分部部长、曹长，1940年3月调到七三一部队宪兵室，担负“特别输送”任务。1945年8月被苏军俘获，曾作为证人在滨海军事法庭受审。

酒井千三助 1943年任七三一部队宪兵室宪兵曹长。

佐田×× 七三一部队宪兵室宪兵中士。

古贺×× 曾是七三一部队宪兵室“特工”。

安藤×× 七三一部队雇员。

田中××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长江××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居池××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菊地　××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德永××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加藤××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西尾××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青木××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贞田××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秋叶××　七三一部队劳务班监工。

小松××　七三一部队警备队伍长。

铃柱××　七三一部队队员。

小山××　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看守员，中士。

福利觉藏　七三一部队第一仓库工作员。

福田××　1944年任七三一部队第二仓库工作员。

伊泽××　1943年任七三一部队第二仓库工作员。

山影××　七三一部队第二仓库被股库工作员。

竹内××　七三一部队第二仓库工作员。

郡司阳子　女，七三一部队“石井班”动物饲养员。

平山四郎　七三一部队“石井班”猪舍管理员。

河岛××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药剂中佐。

秦正氏　七三一部队总务部调查课工作人员，军医中尉。

宇野诚　七三一部队第一实验员。

山下升　七三一部队第一实验员。

须藤良雄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工作员，在生产细菌过程中染菌，未死即被解剖。

神崎知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无菌室，军医大尉。

今野信次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工作员。

今井信次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无菌室，军曹。

小林松藏　七三一部队材料班，军医少尉。

加藤嘉之　七三一部队材料班佣员。

河合美人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雇员。

宫崎淳臣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实验中队长，军医中尉。

增田××　七三一部队运输班汽车驾驶员；雇员。

清野谦次　东京大学毕业。1938年参加七三一部队，技师。

高桥××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柄泽班军医中尉。

天野××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柄泽班军医中尉，后调至田中班。

中野××　七三一部队第三部军医大尉。

中前秋雄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军曹。

桂岛长次郎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

福本一男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

横山三郎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

细矢博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军医中尉。

石井恒久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

奥富克二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雇员。

难波××　七三一部队第二部军医准尉。曾参加以碇常重中佐为队长的“敢死队”，在诺门罕战场投撒细菌。

肥田中信　七三一部队尉级军医官，在诺门罕战争中死亡。

井上贯一　七三一部队尉级军医官，在诺罕战争中死亡。

美马孝义　七三一部队尉级军医官，在诺门罕战争中死亡。

仓上正博　七三一部队尉级军医官，在诺门罕战争中死亡。

前川富治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军曹。

佐久间芳敏　七三一部队雇员。

樋口武雄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曹长。

上田弥太郎　1917年生于香川县。从1941年到1943年任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实验助手。1944年任军医。日本战败投降后混入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充当军医，1953年被捕，监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释放回日本。

小林儀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技术员。

太田正夫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技术员。

大西芳雄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军医大尉，技师。

江田武一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卫生兵曹长。

蓬田三子　七三一部队警备队少尉。

伊藤××　七三一部队见习技术员。

伊东新平　七三一部队见习技术员。

小林智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工作员。

细沼清一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工作员。

中村道夫　七三一部队第四部三谷班工作员。

富塚××　七三一部队第二部安达特别实验场实验器材仓库保管员、雇员。

濑越××　七三一部队器材供应部第四分部实验员，军需少尉。后调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

加藤恒则　七三一部队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长，军医少佐。

天野勇　七三一部队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长。

塚田德一郎　1919年生。七三一部队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工作员。军需少尉。

佐佐木　1940年至1944年任七三一部队孙吴第六七三支队

长，军医少佐。

松平×× 七三一部队孙吴第六七三支队长，军医少佐。

金泽一久 七三一部队长孙吴第六七三支队教育课工作员，军医大尉。后任第二课课长。

金子×× 七三一部队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工作员，管理中国劳工。

一条×× 七三一部队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工作员，管理水泵。

大熊×× 七三一部队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工作员，管理锅炉。

多井×× 在七三一部队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工作员，管理汽车。

尾上正男 七三一部队牡丹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长，军医少佐。1910年生于鹿儿岛郡出水县米津町。东京医科大学毕业，研究细菌学。曾研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细菌研究的器材，供七三二部队使用。同时还领导培训细菌专业人员。1945年8月13日令其下属人员烧毁支队的所有房舍、器材和文件，销毁罪证。随后逃跑，途中被苏军俘虏，并被滨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影山×× 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总务课长兼第二课课长。

中村×× 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第一课课长。

山田正 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第三课课长。

神尾×× 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供应课课长。

三根生清太 1922年生，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雇员。

斋藤正辉 1917年生，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雇员。

铃木×× 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雇员，饲养跳蚤。

冲崎×× 在七三一部队海林六四三支队雇员，饲养跳蚤。

须田××　七三一部队海林六四三支队卫生兵曹长。

矢吹××　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卫生兵伍长。

冲山××　七三一部队海林六四三支队卫生兵伍长。

古都良雄　1924年生，鸟取县人。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卫生兵，研究细菌传染媒介物。

爱智××　七三一部队海林六四三支队工作员。

西山××　七三一部队海林六四三支队卫生上等兵。

菊地则光　1943年4月至1945年8月任七三一部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实验员。

榊原秀夫　冈山医科大学毕业，1944年11月任七三一部队林口第一六二支队长，军医少佐。光复后，隐瞒身份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军医，1952年被捕，监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19日，在沈阳法庭审判时，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后回日本，住山口县，在总合病南阳分院担任医生。

荒濑精一　曾任七三一部队林口第一六二支队长，军医少佐。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从事心理学研究。1944年8月转至台湾军军医部。回日本后担任某诊疗所所长。1975年在出席学会中，因脑溢血病复发而死亡。

酒井亭三　福冈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军医大尉，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总务课长。1944年8月调至缅甸方面军军医部。

金田×　军医中尉，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教育课长。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回日本，在新泻县长冈市开设金田产妇病院，1970年死亡。

渡边诚　军医中尉。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专攻外科。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教育课长。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

回日本，在茨城县水户市病院工作，1988年死亡。

小原直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主计中尉。1943年 8 月转走。

竹田×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药剂见习士官，1943年12月调转华北军军医部。

间所登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药剂少尉。福井药学专科学校毕业。1945年8月11日一六二支队逃跑时，担任留守队长。后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回日本后住在福井市。

西尾敷正行　鹿儿岛高等商业学校毕业。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主计少尉。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回日本神户市，1971年病死。

江村宽二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主计军曹，1944年8月晋升为曹长后调至七三一部队本部。

木佐贯末雄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卫生下士官、军曹，晋升曹长后调至七三一部队第一部。

滨崎水雄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军曹，晋升曹长后调至七三一部队第一部。

七夕利则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曹长。

须田明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军曹，晋升曹长后调至海林六四三支队。

召田嘉广　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队军曹。

久留岛祐司　七三一部队一六二支队卫生兵，参加过霍乱菌、斑疹伤寒菌以及细菌炸弹的实验活动。

饭岛良雄　1945年1月至8月任哈尔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香坊保护院院长，陆军少佐。

山岸研二 香坊保护院副院长兼情报调查课课长。

唐木田博 哈尔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王爷庙保护院院长，陆军大尉。

上坪铁一 1902年4月9日生。原东安宪兵队队长，宪兵中佐。1944年经他批准将22名被俘的抗日爱国志士和群众“特别输送”七三一部队充当“实验材料”，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58年获释回国后，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若松侑次郎 满洲第一〇〇部队部队长，兽医少将。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兽医系。参加陆军后为兽医中尉，从事马鼻疽和消毒液的药理研究。1945年八一五前五天，乘专列逃往朝鲜，然后返回日本。由于同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提供细菌武器研究资料而得到美国的庇护，逃脱了审判。

並川才三 一〇〇部队第一和第三任部队长。

高岛×× 一〇〇部队第二任部队长。

保坂斯道 一〇〇部队兽医中佐。

雄板×× 一〇〇部队第二部部长，兽医中佐。

辻×× 一〇〇部队兽医中佐。

山口文二 一〇〇部队第二部实验员，兽医少佐。

村本×× 一〇〇部队兽医少佐。

佐藤秀之 一〇〇部队兽医教官。

高桥义夫 一〇〇部队研究员。

高秋×× 一〇〇部队第二部研究员，兽医大尉。

井田清 一〇〇部队技师，从事细菌研究。

满田×× 一〇〇部队工作员。

金田×× 一〇〇部队兽医少尉。

浅尾××　一〇〇部队兽医大尉。

三友胜雄　一〇〇部队第二部六分部工作员，培殖齿疽菌并参加用活人作细菌实验。

关孝　先后在七三一部队、东京传染病研究所、大连卫生研究所、长春卫生技术厂负责疫苗、血清研制。

平樱全作　一〇〇部队兽医中尉。

三友一男　一〇〇部队工作员。

福住光田　一〇〇部队兽医少尉。

桑原明　一〇〇部队雇员。

樱下清　一〇〇部队雇员。

烟木章　一〇〇部队雇员。

阿部××　长春卫生技术厂厂长。

安达诚太郎　长春马疫研究处处长。

西村英二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部队长。

宫川米次　医学博士，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最高顾问。

松井宽治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工作员。

时冈孝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曹长。

高岗满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军医大尉。

尾岐繁雄　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技师。

小野寺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总务部长，军医中佐。

村田××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军医大尉，负责菌蚤培殖。

安东洪次　七三一部队所属大连卫生研究所（满洲第三一九部队）所长，军医少将。专门研究疫苗、血清。曾任满洲医科大学教授。1949年被苏军逮捕，后被释放，同年秋回日本。

目黑正彦　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大连卫生研究所有机合成研究室代理室长。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逃回日本，在关西经营医药器械商店。

真子宪治　大连卫生研究所工作员，研究毒素预防液和血清。

田宫猛男　医学博士，东京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小岛三郎　东京传染病研究所第四研究部部长兼东京大学教授。

野口××　在陆军地理测量部工作时，曾配合七三一部队进行地志勘测。

早川××　侵占平房的日本空军第八三七二部队长，空军少将，与七三一部队关系密切。

附录三

七三一部队遗迹简介

平房区位于哈尔滨市南郊20公里处，是哈尔滨的“卫星城”。

半个世纪前，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的细菌战研究基地，使它变成了一片禁区。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它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工厂”的废墟上，建设者们用辛勤的双手把它建设成为驰名中外的国防工业区。

如今，这里有星罗棋布的工厂、学校、商店、剧院、体育场、居民住宅楼，也有与这现代化建筑风格不相协调的侵华日军

第七三一部队留下的20多处遗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就设在原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的一角。它每年都接待数以万计的国内外参观者。

本部大楼（1栋）旧址　新疆大街25号，是一座日式的二阶楼房，如今为哈尔滨市第十七职业中学校舍。与之连为一体的平房建筑，七三一部队败退前烧毁。1949年按原样修复并利用。

南门和卫兵所　正对着本部大楼，约距百米，专供日本人出入。水泥砌筑的门柱基础残留，旁边的卫兵所旧址尚存。

器材供应部和兵器库（2栋）　“工”字型平房位于本部大楼后面。

四方楼（3栋、4栋、5栋、6栋）在本部大楼北面200米处，是四方楼遗迹，残迹明显。它是由3栋、4栋、5栋、6栋楼组成的方型的高大建筑物。除位于南北两面的3栋、4栋的轴心处是五层楼外，其余部分都为三层建筑。整个建筑物占地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从1945年8月11日开始，七三一部队首先在楼内进行爆炸；8月14日，七三一部队最后逃离时将它全部炸倒。除南面、北面和中心走廊存在着明显的残迹外，其余部分均变成砖石瓦砾。残留痕迹还有，在四方楼地面上铺设的环绕一周的窄轨铁道；环形的地下洞，也铺着小铁轨；三个封闭着的大铁门。目前保存的细菌培养基箱、培地瓶、铝制烧瓶、注射器、显微镜、干热灭菌器、玻璃试管、平皿、标本瓶和各类手术用具等数千件罪证实物，都是从四方楼及其周围的建筑物残迹中发现的。

中心走廊　是本部大楼从地上和地下通往四方楼的2号乃至3号、4号、5号、6号楼的唯一通道。出入时，必须在本部大

楼与四方楼连接的“更衣室”更换衣服。如今，这段地上和地下中心走廊以及“更衣室”尚存。

特别监狱（7栋、8栋） 四方楼内侧，由于中心走廊的间隔形成了两个院套。在每个院套里，都有被炸毁的建筑物的残迹。这里是关押被试验人员的“特别监狱”。它是构造相同的两座灰色二阶小楼，还设有地下室。如今，除地下室外，地面残迹因70年代在此建厂时清除了。原监狱前后场地，由于监狱被炸毁时没有被砖石瓦块复盖，别处飘落下来的榆树籽生根发芽，长出了四棵大榆树。1945年9月时，一间地下室里的地面上还埋有一根铁柱子，铁柱上端镶有一个碗口大的铁环，铁柱旁的地面上散扔着一副张开着的手铐。

吉村班冷冻实验室 它是一座相当于二层楼高，简式平顶建筑物，长20米，宽40米、高8米，1940年冬建成。与它连接的是上下两层、分为三室的低矮建筑物，这是与冷冻室配套使用的操作室。筒子房里，屋顶上有几个能开能关的大通气孔；墙壁的上半部伸出十几根铁管；在房屋一角有安装冷冻机的基座，还比较完整的保留着。

二木班实验室 位于四方楼遗址西南，是一座兼设地下室的建筑物，现残留着。现在陈列馆展出的带有“二木班研究室用”字样的仪器盒，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小动物地下饲养室 它属于石井班。七三一部队逃跑前，石井班的建筑物大部烧毁和破坏，仅残留这座兼有地下室的水泥建筑物。现已基本按照原状修复。它的洞口深入地面，面朝西，两扇铁门对开，门高1.9米，宽1.2米。从洞口下踏12个台阶，便到了洞底。洞宽2米、高1.2米，长8米。此洞东端靠北壁有一用砖砌

成的洗手槽。贴南壁连着两个向南延伸的“姊妹洞”，两个洞的构造相同。每个洞高2.9米、宽2.8米、长10米。沿洞两侧各有三层水泥槽，槽宽0.6米，槽沿高0.15米，槽的上下间距0.46米。

黄鼠饲养槽 原在一座木制板房内，七三一部队败逃，木板房被烧毁，但3个门口的水泥台和水泥制的养鼠槽依然存在着。这些鼠槽稍微突出地面，槽体卧入地下，4排连为一体，每排25个槽，每槽规格为1平方米。现已修复。

兵器班 被七三一部队自行炸毁。在这里发现过成堆的因火烧而自爆的手枪毒弹壳，还有瓶装的“水银”。现在，实验室和菌苗、疫苗贮藏室的残迹依存，是保存比较好的“罪证”。

田中班昆虫舍 1945年8月。被七三一部队烧毁。现在一栋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建筑，宽12.6米，长91米。原窗户宽0.3米，高0.6米，现已改大。室内有2米宽的中心走廊；南北各有上下两层，每个21个饲养间，共有饲养间84个，为透笼式。现在水泥导制的大梁上还能看到挂铁丝网用的铁勾。“田中班”在这里用黄鼠培殖跳蚤。在该建筑物东部不远处，还有一段围墙残迹。在这个建筑南50米处，原有一栋类似的建筑物，现已荡然无存。在这个建筑物北25米处，还有保存完好的“工”字型、“门”型两栋平房，是“田中班”培殖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细菌传染媒介物的房舍。在“门”型房屋北面和东面，尚存47米长的砖墙残迹。

山口班建筑物 1945年8月，被七三一部队炸毁。现仅剩一幢二层建筑的楼房。楼南部有一条长10多米的地下道，北部有一处分为两层的地下建筑物。这是菌苗贮藏室。

瓦斯发生室 这座建筑物和它东面瓦斯罐还完好留存，但内

部设施已面目皆非。

土墙、电网和防护壕 从本部大楼的南门开始，围绕四方楼及附近设施修筑了长5公里的土墙，墙顶上架设着高压电网，墙外挖有3米宽、2.5米深的防护壕，墙的四面设门3处，各有一个卫兵所。整个土墙、电网早已拆除。

动力班 七三一部队逃跑时，将建筑物炸毁。解放初期，锅炉房的铁制房架和吊式锅炉还残存着。如今，仅剩一堵残壁连接着三座身着弹孔的大烟囱残迹，中间一座大烟囱已被炸毁。现在周围已初步进行清理并砌上砖墙保护起来。东南处的地下水库尚存，但已废弃。在锅炉房的东北，原有一座利用锅炉废水养鱼的池子，现已被填死，盖上了民房。

焚尸炉 位于四方楼西北的一座，日寇逃跑前炸毁。现位置可辨，残迹皆无；位于北岗上的第二座，现残迹清晰可见，尚有地下洞；位于八木班农田里的第三座现只剩一个大烟囱。

八木班农场 七三一部队败逃前全部毁掉，毫无遗迹。

物资仓库 七三一部队败逃前两处设施全部烧毁，遗迹荡然无存。

航空班和气象班建筑物 平房七三一部队败逃前烧毁，解放后被我修复，现为哈尔滨市第八十八中学使用；整个飞机库遭到彻底破坏，遗迹皆无。飞机滑行路和飞机跑道虽然面貌皆非，但还清晰可辨。

东乡村 除了西岗高等官宿舍毁光之外，其余的官兵宿舍和“连三楼”的锅炉房都依然存在；酒吧间已无残迹；西岗给水室，至今仍利用着；东乡村西部“东乡神社”、日本小学校和各处小花园也已无残迹；医院及地下室、锅炉房依然存在；称为63

栋的大礼堂和64栋的综合楼，七三一部队逃跑之前烧毁，现仅剩大礼堂部分残迹。

教育训练部建筑物 七三一部队逃跑时全部烧毁，现在遗迹荡然无存。

城子沟临时实验场 遗址依然存在。

飞机场北“靶场”临时实验场 荡然无存。

劳工棚 原劳工棚共有四处，一处在原黄家窝堡，一处在刘家窝堡，一处在正黄旗五屯，一处在七三一部队营区的西北。正黄旗五屯的劳工棚是七三一部队把中国居民撵走后，将房舍改为劳工们住用的。现在，那些劳工住用房舍早已被居民的砖瓦房所代替。北门外“劳工坟”遗址，残迹清晰可辨。其余三处劳工棚，虽然遗迹无存，但幸存的劳工们对日寇铁蹄下苦难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永世不忘。

第三部 它的建筑设施和七三一部队本部一样，都是在败退前烧毁的。现在遗址处仅剩下一幢二层的楼房和一座高大的烟囱，整个遗址和遗留的建筑物被哈尔滨电池厂使用；在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哈尔滨市西郊杨马架子一带），尚存完好的焙烧弹壳的窑体和一座三层建筑的楼房，现被龙江橡胶厂使用。

孙吴支队 1945年8月11日将动物舍、营舍和宿舍以及各种文件、资料全部自行烧毁，遗迹尚存。

海拉尔支队 1945年8月13日将全部实验室和动物舍付之一炬，遗迹无存。

重要设备和资料 1945年7月，日本侵略军看到自己的败局已定，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各种逃跑的准备。七三一部队一边叫喊加

紧增加细菌武器生产，一边却抽出一部分人员秘密地携带重要的设备和资料向通化转移。在苏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他们又携带这些重要资料从通化先行取道朝鲜退至日本国内。